

# 目 录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艺运动.....	( 1 )
一九三七年.....	( 29 )
一九三八年.....	( 49 )
一九三九年.....	( 106 )
一九四〇年.....	( 132 )
一九四一年.....	( 166 )
一九四二年.....	( 190 )
一九四三年.....	( 213 )
一九四四年.....	( 232 )
一九四五年.....	( 262 )
一九四六年.....	( 302 )
后 记.....	( 330 )

---

##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艺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文艺运动呈现出了空前的繁荣。延安及各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上海“孤岛”、沦陷区等地的进步文艺工作者，都以饱满的爱国热情，投身于文艺阵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成效最为显著、影响最为深远者，还是延安地区和国统区的文艺运动。茅盾说：“中国抗战文艺运动实开始于‘七七’以前，可是‘七七’以后这‘老根’派生了两支，一在大后方，一在边区和解放区。这两支所托的土壤不同，所呼吸的空气也不同，所受的风日雨露霜雪也不同；这就决定了它们各自的发展也不同。更由于政治上的关系，这一本派生的两支，多少年来就连交换经验的机会也少得很。然而无论如何，它们总是同根生的。它们的立场是一致的。”（《抗战文艺运动概略》，载1946年10月《中学生》增刊《战争与和平》）解放后，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也说过：“我们有两支文艺队伍，一支在解放区，一支在国统区”，他还为这“两支文艺队伍胜利会师”而感到激动和高兴。（冯法祀《画家徐悲鸿赞抗敌演剧队》，载1978年《美术》第4期）解放以后，文艺史家对我国现代文艺运动作了认真的探讨并出版了若干专著，可是，对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对世界反法西斯文艺运动的中国组成部分，是研究得很不够的；而其中特别是对国统区的抗战文艺运动，不仅研究不够，还存在一些偏见，诸如斥之为右倾之类。这无疑是极左思潮的影响，不符合国统

区抗战文艺运动的实际。

研究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必须研究它的分期。抗日战争时期，整个文艺运动与政治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密切。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不同阶段，在文艺运动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当然文艺运动有它自己发展的规律。研究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应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文艺运动的分期，不是现在才开始，还在抗战激烈进行中就开始了。郭沫若、茅盾、老舍、胡风、邵荃麟、司马文森等的文章及发言，都不同程度涉及到这个问题。当时思考得比较多的，似乎是孔罗荪。一九四二年，以叶知秋之名在《学习生活》上发表了《抗战文艺运动的五年》，着重谈了抗战文艺运动的分期问题。他说：“我们从这五年间的文艺运动纵的方面来考察，大致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从战争开始到武汉撤守，第二期是从二十七年冬天到二十九年冬天，第三期是从三十年到目前为止。”他还分别叙述了每一时期的特点：“第一期的现象是由于战争初期形势的狂热，表现于文艺运动上的，也就为这种蓬勃的狂热情绪所笼罩。”“第二期，由于战争形势逐渐入于相持阶段，文艺工作也渐入于沉潜而深入的阶段。”“第三期，由于长期战争中所带来的情绪上的滞着，反映于文艺运动上来的，则恰恰和第一期的狂热蓬勃有了一个相反的对比。但不是停滞和退步，乃是在更沉着的、深入的工作中，使抗战文艺运动有它更深一层的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虽说时间短——仅三年多，而形势变化也神速，但文艺家们仍在思考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的分期问题。一九四六年九月，茅盾写了《抗战文艺运动概略》，对抗战文艺运动的分期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与孔罗荪一样，茅盾也是分的三个时期，但在具体的上下限方面，在对各时期文艺运动的认识上，有所不同。他认为：“第一个时期，应从抗战前两年（或者也可说是‘左联’自动解散那一年）起算，到武汉失守（抗战第二年）为止。”他认为这一时期的抗战文艺运动“颂扬多于批判，热情多于理智，其有缺点，自毋庸讳言，曾有人给它以八字的考语：‘轰轰烈烈，空空洞洞。’而在‘空空洞洞’之外，尚有一严重的错误，即忽略了抗战两大目标之一——对内的民主要求。”其实，这一时期的文艺运动，在动员民众抗日救亡方面，有自己不可磨灭的功绩，而在抗战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上，也有自己肯定的地位。缺点乃至错误，不可避免是有的。茅盾认为：“武汉失守以后，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是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军事上是‘苟安’，政治上是逆转，经济上是饮鸩止渴。”“思想统治决不宽容前进的民主言论。”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在这样恶劣万分的环境中艰苦挣扎着。”但继承了“五四”新文艺传统精神的文艺家们仍坚守岗位，竭力使工作有意义。“他们介绍西欧古典名著，这仿佛是说，现在既然不是出击的时候，就研究兵法，练习把式罢。他们也把笔锋转向沦陷区（解放区是不许写的），这用意是借沦陷区的民气给大后方的人心一点刺激。他们也竭力想法反映大后方的现实，迂回曲折地描写了从抗战阵营中落伍而终于堕落的知识分子（如《雾重庆》剧本）。然而在当时文网之下，这已是可能反映的现实的最大限度！同时我们也得承

认，也有借西欧古典名著作遁逃蔽的，也有为了避重就轻而写沦陷区的，更也有挂抗战之羊头，卖恋爱之狗肉而亦自以为反映了可能限度之现实的。”茅盾认为：“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直到日本投降，是抗战文艺运动的第三时期。”这一期，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最险恶的阶段。”而在文艺上，那“冲破了那多年的窒息，放出了第一声号炮的是一九四一年秋剧本《屈原》的演出。这虽是一个历史剧，然而有百分之百的现实意义，是适当其时的‘爆炸’，是大后方抗战文艺运动在黑暗深沉中再进军的嘹亮的号角。”这时期的文艺运动也存在一些问题。“这恶俗的风气，可以总名之曰市儇作风。”

一九四九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茅盾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这是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总结提纲，“实际参加起草者前后共七人，开会多次，交换意见的结果。”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分期，是这个报告提纲最先提到的重要问题。报告提纲对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的分期与一九四六年茅盾的分期有很大不同，在对具体内容的认识上也有差异。茅盾在报告提纲中说：“从抗日战争开始到武汉陷落后一年半的时间（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九三八年底），这算是第一个时期。”这正是抗战之初，“全国文艺工作者都非常兴奋，立即组织了许多演剧队、抗宣队，到农村和部队中去，写出了许多短篇和小型的作品”，尽管“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但没人能够抹煞它们在抗战初期所起的宣传作用。”他还谈到许多文艺工作者到战地和乡村去，不仅“扩大了视野，丰富了题材”，而且还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作品“不适合大众的需要，因而企求追寻新的东西。”“第二个时期是从武汉

陷落后，中间经过一九四一年初的皖南事变，直到抗战结束的前一年。”这一时期，顽固派“对反共反人民”“越来越采取积极的态度。进步的文艺运动所受到的迫害也就愈来愈严重。”尽管这时期有部分作家“表现了消沉的情绪”，但整个来看，“国统区的文艺运动仍旧继续保持与巩固着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对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战斗，小说、诗歌、戏剧等等部门，都曾出现了暴露反动统治，鼓舞人民革命情绪的作品。”“第三时期是从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法西斯深入进攻湘桂诸省到胜利的前夜。”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国民党反动派已公开和敌伪往来，经济的危机日益严重，对文艺界的压迫也日益加烈。”而这时期的文艺运动也“立刻参加到了这时候的民主运动中。”茅盾将“抗战结束以后，经过旧政协前后以至人民解放战争的这几年间”作为第四时期，划分这个时期的着眼点是“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而非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

建国以前对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分期问题的探讨，不管有否一致意见，对于深入研究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二

笔者在前辈研究分期的基础上，将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分成五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九一八”事变起至“七七”事变止。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我国东北的进攻。由于国民党当局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短短两

个月时间内，东北三千万同胞、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沦入了日本侵略者之手。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又向上海进攻。侵吞中国的狼子野心，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开始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之下，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建立起来了，与日寇进行坚韧不拔的战斗。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重要报告，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抗日的文艺运动，也随着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进攻而日盛起来。在这方面，东北作家群的贡献是卓越的。他们亲历日寇占领之苦，以饱蘸爱国热情之笔，投身于抗日救亡。茅盾说，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主题的作品，“在‘一·二八’以后就已经出世。这些作品的题材，主要是东北的义勇军和‘一·二八’淞沪战争。”还不仅如此，“‘左联’自动解散，正式号召文艺上的统一战线而提出‘国防文学’之类的口号以后，作为一种运动的抗战文艺确乎声势日盛而且推进了反日的群众运动”，不过，“卓越的作品并不见得比以前为多。”（《抗战文艺运动概略》，载1946年10月《中学生》增刊《战争与和平》）这一时期的抗战文艺运动，给“七七”事变以后迅猛开展起来的抗战文艺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个时期，从“七七”事变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芦沟桥事变以后，日寇疯狂进攻，河山不断丧失。人民群众火热的心里激荡着对敌人的恨和对祖国的爱。党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给人民群众以胜利的信心，使人民群众心里燃烧着的爱国主义火焰更加猛烈起来，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抗战文艺运动是整个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显示了自己的战斗活力。这时期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的中心主要在上海、广州、武汉。比较而言，武汉的文艺运动比上海、广州成效更大，因上海和广州在“八一三”以后不久就成为了“孤岛”沦陷了。在这些地区，文艺界开展的活动是十分突出的，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救亡演剧队、宣传队，还建立了许多全国性的文艺组织，如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歌咏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等。一九三八年四月成立的第三厅，虽不限于搞文艺活动，但在领导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方面，那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各种组织开展的活动，真是不胜枚举。比如，举办抗战扩大宣传周、纪念鲁迅与高尔基、举行抗日救亡公演、召开露天音乐会、举行漫画木刻展览等。“五四”以来的新文艺有一个显明的缺点，那就是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有些隔膜。抗战开始以后，这种脱离群众的倾向有所改变。从客观上来讲，抗战不久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相继沦于敌手，原在那里的许多文艺家们被迫撤往中小城镇和村乡，无形中与人民群众就接近了一步。与人民群众接近使他们逐渐认识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抗日热情和力量，只要发动起来了，中国有无限的希望。文艺家们考虑到群众多数没有文化或只有很少的文化，于是开展了文艺通俗化运动。抗战初期的报告文学、诗歌、戏剧、小说等，差不多都是以通俗化的形式出现的。从文艺理论来看，当时讨论得最多的是文艺与



宣传的问题，歌颂与暴露问题也提出来了。抗战初期，当局的文禁略有放松，大大小小的刊物不断涌现。《七月》、《烽火》、《抗战文艺》、《战地》、《文艺后防》、《文化岗位》、《战歌》、《抗到底》等等。这一时期的文艺运动，是搞得轰轰烈烈的，起到了抗日救亡的作用；对艺术家与群众结合，对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均打下了良好基础。问题也是存在的。这主要反映出一些文艺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严重，当然不是说没有艺术性较高的作品。在当时那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形势之下产生这样的作品虽有可理解之处，但是，毕竟是不足。

第三个时期，从武汉失守到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形势日益复杂化起来。日本侵略者加紧进攻，顽固派积极反共。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〇年春，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他们集中军队，向陕甘宁、晋西等地区的我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和晋东南的八路军进攻，同时还搜罗反动文人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重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老调。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顽固派并未因此而死心，一九四〇年十月，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一年一月达到顶点。我新四军北移部队九千余人，在皖南遭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伤亡重大，震惊中外。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文艺运动如何呢？与上一时期相比，显得沉潜而深入。上一时期的文艺运动，大都为动员抗日而发；这一时期，逐渐增加了争民主的分量。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的据点又重新分布了。重庆、桂林、成都、昆明、贵阳、永安、西安等城市都聚集了一些文艺工作者，积极开展活动；重庆和桂林，尤其显得重要。第三厅在党的关怀、郭沫若的具体领导下做了

许多工作，遭到顽固派的嫉恨，一九四〇年秋将其“改组”了。接着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被任命为主任。文工会在领导抗战文艺运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一时期各种全国性的文艺组织都纷纷在各地建立自己的分会，特别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建立的分会更是星罗棋布。纪念中外著名艺术家，在这一时期是很突出的。鲁迅逝世纪念的年会照常举行之外，一九四〇年还举行了大规模的鲁迅诞生六十周年紀念会。高尔基逝世紀念会照例每年举行，此外还举行了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周年紀念会。争民主的因素或明或暗贯穿在这些紀念活动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以后，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在作家与生活关系问题上，采取了主动态度。虽提出后就在实践，但有组织、有影响的实践活动，还是武汉失守后开始的。一九三九年六月，以王礼锡为团长、宋之的为副团长的作家战地访问团组成了。这个团从重庆出发，经成都、西安、洛阳等地，达中条山和晋东南前线。他们深入军民之中，体验了生活，慰劳了将士，产生了硕果。此后，其他一些地区也效法起来。从文艺创作来看，作家们逐渐从抗战初期狂热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开始了冷静的思考和观察，努力跳出“抗战八股”的圈子，而一些人已着手长篇巨制的创作了。从文艺理论来看，这一时期着重讨论的是两个问题：民族形式，作家思想与创作方法的关系。民族形式的讨论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就开始了，争论得最多的是源泉问题，争论的总结，一般认为是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兑》。一九三九年苏联国内产生了现实主义的论争，抗战初期我国文艺界在如何对待光明与黑暗问题上本来就有分歧，两相结合，作家思想与创作方法的关系的讨论就提到

了议事日程。可是这场讨论未能深入，因为皖南事变爆发了。为了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和文艺批评的开展，这时期各种文艺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如戏剧座谈会、诗歌座谈会、小说座谈会、音乐座谈会、漫画座谈会、木刻座谈会等，成效颇大。

第四个时期。从皖南事变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皖南事变以后，顽固派为了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法西斯统治，一九四三年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是年三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鼓吹法西斯，诬蔑中国共产党，并叫嚣要消灭共产党和革命力量，两年内决定中国命运。他们在军事上包围陕甘宁边区，还企图闪击延安。由于党作了充分准备，坚决与顽固派斗争，迫使这次反共高潮停止了下來，但是，顽固派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他们的白色恐怖。“在重庆，就到了一九四四年，民主运动还没有十分开展。那时候差不多的集会都是禁止的，即使有集会，要想当众畅所欲言，差不多有生命的危险。”（《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载《沫若文集》第13卷）民主的潮流毕竟是阻止不住的，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领导下，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国统区争民主的运动日益开展并发展、壮大起来。文艺运动亦与此紧紧相联。开展各种纪念活动，是上一时期的文艺运动的主要内容，也是这一时期文艺运动的重要特色。不同之点在于：这一时期纪念活动范围扩大了许多。鲁迅、高尔基等逝世年祭仍在进行不用说了，还增加了对其他世界著名艺术家的纪念，比如一九四五年，重庆就举行了两次罗曼·罗兰悼念活动。而纪念诗人节、艺术节，也是这时期开始的。为生者开的诞辰纪念会，已成为这时期纪念活动的一大特色。比如，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

十五周年、庆祝老舍创作二十周年、庆祝茅盾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等。宣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是这时期国统区文艺运动的重要内容。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召开了座谈会，围绕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阐述，给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六月，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就有了反响，并积极宣传起来；对国统区文艺健康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顽固派因《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和影响而恐惧、而仇视，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他们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文艺政策，竭力往自己脸上贴金，企图抵消《讲话》在国统区的作用。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开展了一场规模盛大的批判顽固派文艺政策的斗争。茅盾说：我们“曾经对于当时大吹大擂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文艺政策’从各种角度上加以抨击，使之体无完肤。”（《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在国民党文艺政策的鼓噪之下，战国策派卖力地鼓吹所谓“民族文学运动”。进步文艺界从各个方面向这些国民党文人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从文艺创作来看，这一时期的历史剧创作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达到了高峰，密切配合了抗日民主运动。这是从郭沫若创作历史剧《屈原》开始的。继《屈原》之后，郭沫若又连续创作了《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许多剧作家也面向历史。田汉、阳翰笙等的历史剧，各具特色，颇有影响。这一时期诗歌和小说的创作，无论是在揭示生活，还是在艺术技巧方面都比前一个时期高一筹。从文艺思想上看，这一时期主要强调的是人民本位，也就是要深入群众、反映群众、歌颂群众。这与《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分不开，《讲

话》主要谈的就是文艺与人民的问题。在现实主义问题上，一些理论家比较强调主观的作用，强调发挥主观战斗精神。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文艺家“局限在后方的小天地之中，被阻塞了和人民大众接触的路子，出版事业濒于窒息，文艺不当作整个抗日战争的一环而被视为‘娱乐’的手段，于是而风花雪月的风气抬头，消闲猎奇，谈狐说鬼的‘文艺’继起，文艺变成了少数人茶余酒后的消遣。”（1944年4月16日《新华日报》社论《祝“文协”成立六周年》）

第五个时期，从抗日战争胜利到解放战争爆发。抗战胜利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运动并没有嘎然而止。随着民族矛盾下降，阶级矛盾又上升了。顽固派抢夺胜利果实，收刮民脂民膏，钳制社会舆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统区掀起了大规模的争民主运动。而文艺运动正是这一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家复原、废出书报检查，都是其具体内容。抗战胜利后，还有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就是清查附逆文化人。这些汉奸文人是民族的败类。

### 三

“九一八”事变后，党就注意了联合抗日的问题。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了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党即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由于党的不懈的努力，由于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由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国民党被迫接受了联合抗日的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贯穿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国统区的文艺运动也不例外。

一九三〇年，在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旗帜，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文艺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一九三五年底、一九三六年初，“左联”解散了，其目的就是为了成立更广泛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主张解散左联的同志认为应将“国防文学”作为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口号；鲁迅认为“国防文学”这口号本身及阐述的某些文章都有不足，于是又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载《且介亭杂文末编》）由于认识上的差异，两个口号进行了激烈的论争，虽说未能统一，但观点总在接近。不久，由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代表文艺界各方面，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抗日的力量即刻统一起来。”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统区的文艺界也联合起来了。抗战初期，达到空前的团结。无论哪个阶级，哪个团体，那个流派，凡稍有爱国心者，都立志要把日本侵略者赶下海去。不仅如此，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雨后春笋般产生。如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等。各种形式的活动也极为频繁，而且各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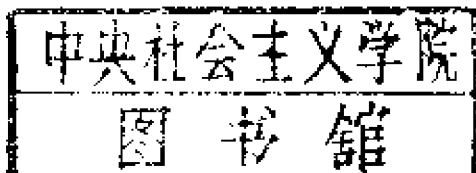
不同政治观点的人相聚，谈论的大体上也是抗日的问题。抗战初期上海曾就“鲁迅风”展开过争论。一者认为，应继续向鲁迅学习“不避强权，不避强敌，不依附于豪贵而歪曲事实，敢说、敢笑、敢作、敢为”（巴人《超越鲁迅——为鲁迅逝世二周年作》，载《申报》《自由谈》），将力量贡献给抗战。一者认为，现在是抗战时期了，不应该再写“鲁迅风”似的杂文，还不指名地批评了提倡者，从而引起了争论。但争论的双方似乎都很快认识到在日寇进攻的炮声中作这样的争论不太适宜，本着团结御侮的精神，很快就自动平熄了这场论争。问题当然没有完全解决，但为完全解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抗战初期团结之风盛行，这自然是好的，但批评之风颇弱，也是不足。武汉失守之后，联合抗日之风气曾一度发展，文艺界各种全国性的组织纷纷在各地建立自己的分会，推动当地的文艺运动，而文艺界各组织还联合开展了许多颇有影响的活动，如举办抗战扩大宣传周等，为团结抗日作出了贡献。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顽固派又越来越明显地开始了反共活动，一九四一年初达顶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这很快就在文艺运动中有了反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是老舍等具体领导的一个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顽固派竭力想将其抓在自己手中。在“文协”的第一次年会上，叶楚傖说：“过去我们的文艺不能建筑在民族的、国家的、大众的基础上，仅仅建筑在个人的主观上。”他要求全国文艺家做“中宣部政治部的编辑员撰稿人”，中宣部、政治部做“作家的发行部”。他立即遭到郭沫若巧妙的驳斥。而在这时期，统一战线文艺运动中的右翼也开始兴风作浪，干破坏团结抗日的勾当。一九三八年底，梁实秋承办《中央日报》的

《平明副刊》。他刚“登基”，就发表《编者的话》，说：“我老实承认，我的交游不广，所谓‘文坛’我就根本不知其座落何处，至于‘文坛’主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这挑拨性的语言即遭到进步文艺界的驳斥。老舍在他代表“文协”起草的致《中央日报》的信中说：“唯对于‘文坛座落何处’等语之居心设词，实未敢一笑置之。在梁实秋先生个人，容或因一时逞才，蔑视一切，暂忘团结之重要，独蹈文人相轻之陋习，本会不欲加以指斥。不过，此种玩弄笔墨之风气一开，则以文艺为儿戏者流，行将盈篇累牍争为交相诋诮之文字，破坏抗战以来一致对外之文风，有碍抗战文艺之发展，关系甚重。”皖南事变之后，顽固派进一步加强了法西斯统治。他们搞文化专制主义，分裂文艺队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是文艺界最具成效的一个组织，顽固派竭力想抵消它的影响，进而瓦解它。为此，他们不顾人们的反对，成立了中国著作人协会，与之分庭抗礼。在开展纪念活动方面，顽固派也横加干涉，百般阻止。一九四二年十月，鲁迅逝世六周年。文艺界已作好开纪念会的准备，但当局以未准为由，派警察巡守会场，不准入内，致使会议未能开成。一九四五年春，重庆举行了大规模的罗曼·罗兰追悼会，当局竭力禁止，未能得逞后，亦未罢休，还将其作为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一条理由。从文艺思想来说，右翼文人立脚国民党的文艺政策，大肆提倡民族文学运动，企图取代进步文艺运动。抗日战争胜利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了辉煌的过去，但统一战线依然是存在的，因为这也是克蒋家王朝致胜的法宝。从文艺运动来看，也有重新组合。在党的领导下，文艺界反内战、争民主的各种力量联合起来了，铸成了反对专制独裁的利剑。开展



的各种活动、提倡的各种思想、创作的各种作品，都在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战斗。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艺运动，是统一战线的文艺运动。

五四时期，我国的新文艺运动就孕育了大众化的方向，但未能及时展开讨论。“左联”成立后，这个问题又提了出来，文艺大众化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一九三〇年春，《大众文艺》组织了一次“文艺大众化座谈会”，注意的主要是大众化形式问题。“九一八”事变后，左翼作家们又围绕大众化问题展开了第二次讨论，这次讨论，比前一次前进了一步，涉及到大众化从形式到内容十分广泛的问题。但是，轰轰烈烈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开展，还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夺取抗日争民主的胜利，是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根本原因。抗战初期文艺大众化运动，无论是声势或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首先，创作是大众化的。从内容来看，反映的都是大众能看懂、听懂的和日寇的斗争；从形式上来看，无论是报告文学、诗歌、戏剧、小说、鼓词、漫画、木刻等等，都很通俗。大众化的文艺活动也颇盛行。诗歌朗诵运动的开展，就是其一。锡金在《朗诵去》中写道：“去，朗诵去！／别再坐在房里尽发呆，／站起来，／走出门去／门外有千万的群众在等待，／等待着你／把喉咙放开。”这一运动中出现了些有名的朗诵诗人，开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朗诵会。特别是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的诗歌朗诵，对推动诗歌朗诵运动起了良好作用。抗战初期歌咏活动十分普遍，除单独举行的歌咏会外，许多宣传活动都夹有唱歌的节目。此外，创作队伍的扩大也使人瞩目。茅盾说：“抗战的现实，——充满了英勇的斗争，可歌可泣的悲壮与矛盾现象的，刺激着人民大众的心灵，觉醒了人民大众的创造的才能，大批的青年文



艺工作者从社会各阶层涌现出来，★持了抗战文艺的★的阵线。”（《抗战期间中国文艺运动的发展》，载1941年4月20日《中苏文艺》第8卷第3、4期合刊）开展这项工作最有成效的是广东文学会。他们积极帮助文艺青年，发展文艺通讯员。他们公开征集，不几天，就有来自广东各县及湖南、云南、贵州、江西、四川等地的三百多名青年报名。他们设立了众多的联络点，对这些青年进行具体的辅导，使文艺运动更为活跃起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文艺大众化运动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从文艺大众化的角度讲，是作家在深入群众，是在文艺大众化道路上迈进。在如何理解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上，这一时期与上一时期也有不同。上一时期纠缠得最多的，是旧瓶装新酒问题，这一时期除继续讨论这一问题外，还提出：文艺大众化不能只理解为利用旧形式，“五四”以来的新形式也是可以大众化的。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后，国统区文艺界逐渐开始了大规模的、持续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民族形式的讨论是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继续和深入。讨论民族形式使文艺大众化运动向前大大迈进了。在讨论中，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是将民间形式作为了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一是过分夸大了“五四”以来的新形式在形成民族形式中的作用。皖南事变后，国统区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受到了压抑与摧残。但《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又给文艺大众化运动吹来了强劲的东风。随着抗日争民主运动的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又以新的姿态迈进。《讲话》传到国统区，“人民文艺”的口号提出来了，而且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格外响亮。“人民文艺”的口号是进步文艺工作者根据《讲话》精神、结合国统区的实际提出来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聚集在这

面旗帜下，开展了各种活动，如创作、理论研究、集会结社等。抗战胜利了，文艺大众化运动又迈出了新的步伐。这就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为民主与自由而斗争。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艺运动是大众化的文艺运动。

五四时期，我国就涌现了现实主义文艺思潮。鲁迅的现实主义杰作《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就是在这思潮中产生的。文学研究会提出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口号，就是当时现实主义理论的精粹表现。三十年代，苏联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传入我国，给我国“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注入了新的血液，出现了一批遵循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创作的作品，也出现了一批探讨新现实主义的理论文章。但作为一种运动，大规模开展起来，还是抗战爆发以后。郭沫若就曾经说过：由于战争，由于作家与民众的接近，文艺工作者们“把向来和社会游离的生活、玄虚的思索、高蹈的表现，完全改变了，并已化除了向来的门户之见，而正确地、集体地、踏上了新现实主义的阶”（《郭沫若文集》第12卷第12页）。抗战初期出现的大量通俗作品，无论是报告文学、街头戏剧、墙头小说，还是诗歌、通俗文艺，总的来看都具现实主义色彩。对于现实主义理论，一些艺术家们也注意了探讨，集中在光明与黑暗、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上。有的人认为，团结抗日了，应该大写光明面，应该歌颂。茅盾说：“一篇文艺作品如果只写了抗战的光明面，则虽有加强最后胜利信念作用；但‘争取’的意义是没有了。这样的‘加强’会诱引起‘定命论’的盲目的乐观，而盲目的乐观在现实主义的打击下往往会一变而为无条件的悲观。抗战的现实是光明与黑暗的交错，一方面有血淋淋的英勇的斗争，同时另一方面又有荒淫无耻，自私

卑劣。人民大众是目击这种种的，而且又是身受那些荒淫无耻自私卑劣的蹂躏的。消灭这些荒淫无耻自私卑劣，便是‘争取’最后胜利之首先第一的要件。”（《论加强批评工作》，载1938年7月《抗战文艺》第2卷第1期）在创作抗战时期典型的问题上，进步文艺工作者也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武汉失守后，现实主义的文艺运动又有了新的发展。文艺家们逐渐认识到，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而从抗战初期的狂热中冷静了下来。他们对于抗战初期那些急就的短篇已不满足，注意了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塑造典型，而且，有的还致力于反映社会生活的长篇巨制的创作。在现实主义理论问题上，主要讨论的不是光明与黑暗、歌颂与暴殄的问题，而是作家的主观世界与创作方法的问题。有的认为世界观对创作方法有指导意义，有的认为创作方法有相对的独立性，还有的过分强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用，或多或少抹煞世界观的意义。人们深深认识到，在国统区，现实主义文艺运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为现实主义文艺运动的发展必然要深刻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这是当局绝不允许的。皖南事变的枪声阻止了现实主义文艺运动的发展，而且给文艺运动带来了有害倾向。尽管如此，国统区现实主义文艺运动也在艰难地向前。历史剧的大量产生便是当时突出的现象。剧作家们描写历史，隐寓现实，抨击顽固派，激励人民群众勇敢战斗，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自然主义对抗战文艺运动带来了很大危害。邵荃麟在他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文中说：“对抗着那些自然主义的倾向，便出现了所谓追求主观精神的倾向。他们认为创作衰落的原因，是作家热情的衰退，生命力的枯萎，缺乏向客观突入的主观精

神，因此要求这种精神的加强，强调了艺术的生命力与作家个人的人格力量，强调了作品上内在精神世界的描绘。”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六周年纪念会上，宣读了论文《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这篇文章是理事会推举了五位理事商讨要点，然后由研究部执笔写成的。文章重点强调要发挥主观战斗精神。抗战结束了，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又与新的形势紧密结合，从而发挥自己的作用。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艺运动是现实主义的文艺运动。

## 四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艺运动，是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开展起来的。这种领导和关怀，表现在多方面。这里主要谈谈政治路线、组织建设、文艺思想方面。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法宝。既是统一战线，就非铁板一块，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成分。周恩来说：“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这样大、这样复杂的队伍，如果不搞清楚，就会发生‘左’的右的错误。”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订出了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也就是联合大多数，反对少数，打击最顽固的力量的方针。”（《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3页、214页）在国统区，周恩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当然包含了多方面的内容，这里仅就文艺方面谈谈与国民党的联合与斗争。武汉失守之前，文艺界响起的是一片团结的呼声，对于揭露和批

评，总的来讲，是不够的。在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上，周恩来作了发言：他指出“抗战已经一年有余，更走到一个艰苦困难的阶段，纪念鲁迅先生，更应该学习这种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鲁迅，不退让，不妥协。”“特别要紧的是要有最后胜利的信心”。但也谈到“鲁迅先生一贯地对旧社会给以无情的批判与揭露。”（《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载1938年10月20日《新华日报》）实质上也是在告诫大家，要注意国统区的社会问题，要敢于提出，敢于批评。随着顽固派反共面目的日益暴露，周恩来更强调文艺工作者的批评任务了。在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会上，周恩来围绕统一战线问题谈鲁迅的特点，以鲁迅的特点来启发大家应如何对待统一战线问题，其中特别突出了批评。他说：“鲁迅先生在任何斗争中，都是敌友分明的，认清了敌人，便集中了火力对准敌人投射，绝不放松地斗争到底。鲁迅先生可以说是我们文艺界最优秀的战略家。我们今天的团结，也正是说明了认清我们唯一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记“鲁迅纪念会”和“鲁迅晚会”》，载1940年12月1日《抗战文艺》第6卷第4期）这实际上在曲折地揭露和抗议顽固派的反共政策。周恩来还强调了鲁迅“嫉恶如仇”的特点，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鲁迅先生并不是无原则的交朋友，所以他的对友处事，凡是认为不对的，都要加以批评，绝不轻易放过。即使是早年最好的朋友，但到晚年如有错误，他仍是不容情的指责。”（同上）这难道不是在告诫文艺界，对那些破坏统一战线、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家伙们，“要加以批评”、要“不容情的指责”吗？皖南事变后，顽固派大搞白色恐怖，要取得抗战胜利，那就要冲破阻力，与之坚决战斗。周恩来亲自领导了这场斗争。一九四一年十月上

旬，周恩来对郭沫若与阳翰笙说，要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郭沫若自谦。周恩来说：“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还说：“我们这次要举行全国性的纪念活动。估计这事情问题不大。但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由各方面的人来参加筹备工作，不能单由‘文工会’来出面。”（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载1980年《新文学史料》第2期）在周恩来的倡导下，一场大规模的、隆重的纪念活动按时举行了。活动的中心可以说就是抗议顽固派挑起的皖南事变，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这是皖南事变后最有影响的一次大规模活动，团结了队伍，打击了顽固势力。

对国统区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周恩来很关心。在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阳翰笙根据统一战线方针，提出了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问题。周恩来对成立这全国性的组织是赞同的。谁来具体负这个组织的领导责任呢？老舍最为合适。田仲济在《回忆老舍》中说：“许多人都知道了，这是按周恩来的意见安排的，这个安排是非常恰当的。”《抗战文艺》编委会有三十三人，除了在武汉的以外，多散居在延安、上海、香港、广州、昆明、西安、成都、长沙等地，实际参加编辑工作的只有三、四个人。蒋锡金回忆道：“老舍在文协的常务理事会上推举适夷、我、姚蓬子三人执行《抗战文艺》的编务。”“适夷拒绝接受这个任务，他不愿与姚蓬子共事。”“我们在小组（党小组——

笔者注)中讨论了此事,后来还请示了周恩来同志。最后决定,还是这个方案较好,就由我去说服适夷,适夷就接受了。”(《“左联”解散后党对国统区文艺工作领导的亲历侧记》,载1979年《新文学史料》第4期)对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开展的活动,周恩来是常参加的。而每次到场几乎都要讲话。比如在成立大会上,他热烈地说:“诸位先知先觉,是民族的先驱者,有了先驱者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团结,象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凝固的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是第一点感想。其次希望作家多多取材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与战区敌人的残暴,后方全民众动员的热烈,一定可以发扬举国同仇敌忾,加强战胜敌人的信心!第三,在今天抗战过程中,我们还负有建国的任务。文学家应分布各战场,各内地,更多接触内地的人民生活,同时要承继祖先遗下的优秀文艺传统。第四,不仅是对抗战文艺,民族文艺,即对世界文艺,也负有重大的责任。”(《全国文艺界空前大团结》,载1938年3月28日《新华日报》)给文艺工作者指出了奋斗的方向。党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给这个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以有力的支持,为其发表了许多社论。如成立时发表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第一届年会发表了《用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第五届年会发表了《祝“文协”成立五周年》,第六届年会发表了《祝文协成立六周年》等。

第三厅是宣传厅,并不限于搞文艺工作,但它领导国统区的抗战文艺运动却是无疑的。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开始不愿干。周恩来说:“考虑是可以的,不妨听听朋友们的意见。在必要上我们也还须得争取些有利条件。但我们可不要把宣传工作太看菲薄了。宣传应该把重点放在教育方面去看,我



倒宁肯做第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啦。不过他们是不肯答应的。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郭沫若选集》第1卷下册第121页）三厅成立后，党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周恩来同志指出，三厅的斗争非常尖锐、非常错综复杂，要充分提高警惕。这是在国民党的军事机关里工作，党组织的活动方式也要适应这个特殊的环境。上面的主要干部成立一个党小组，三厅下面的党员另外成立一个支部，互相不要发生联系。万一发生了问题，就不致互相影响。一旦暴露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一点要千万加以注意。”（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一〉载1980年《新文学史料》第4期）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对于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三厅刚成立，即进行抗战扩大宣传周、献金等活动，在武汉影响极大。武汉时，三厅还将在武汉的上海救亡演剧队及其他戏剧团体进行了改编，改编为十个抗敌演剧队和五个宣传队。改编后即受了两周以上军事训练。训练结束，周恩来召见了各演剧、宣传队党组织负责人，指示遇着重大问题可通过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向他汇报。接着，各演剧、宣传队奔赴自己的岗位，在前线，在后方，演出宣传，抗日救亡。

三厅解散后，即组建文化工作委员会。也是在周恩来的帮助和支持下，郭沫若才出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在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开展方面，积极推动。皖南事变后国统区文艺界开展的重要活动，没有哪一次没有文化工作委员会参加领导或其成员参加。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以后，对国统区立即产生了影响。《新华日报》对讲话的精神作了大力宣传。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肖军写的《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这是听了毛泽东同志讲话后写的感想，也是最早公开向广大读者宣传《讲话》精神的文章。六月十二日，《新华日报》就把这篇文章转载了。作者在文章开头就说：“五月二日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举行过一次‘文艺座谈会’。作者为参加者之一。对当时提出诸问题，曾口头上表达过个人的见解，并提出几个问题，作为个人的补充。这里想把它所能记忆的大致写出，同时增删一些，以佐参考。”从此，《新华日报》就陆续宣传《讲话》。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新华日报》以第六版整版篇幅发表了《讲话》的部分内容。总题为《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具体包括三篇文章：（一）、《文艺上的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二）、《文艺的普及和提高》；（三）、《文艺和政治》。编者在附言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发表过两次讲话，有系统地说明了目前文艺和文艺运动上的根本问题。原文不可能全部发表，只好提要介绍一下。”除了直接刊载《讲话》内容外，《新华日报》还刊登了许多学习《讲话》的心得体会，及《讲话》发表后在延安文艺界显现出来的实绩：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的变化。

一九四四年初春，正在延安的周恩来叫何其芳、刘白羽去他那儿。周恩来对他们说，中央决定他俩去大后方向进步文化人士传达《讲话》精神。周恩来让他俩先去郭沫若那里，详细报告一下，听听郭沫若的意见，并请他主持传达会议。他俩到重庆向郭沫若介绍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郭沫若十分兴奋，决定第二天就召开座谈会。座谈会取得圆满成功。抗战刚胜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召开了更名会，会上，周恩来较详地介绍了延安文艺活动的情况。“他说延

文艺活动，大约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是抗战初期，那是各方面的作家，许多到延安去了，产生了许多反映适合抗战初期的作品。”“中间一个时期，因为作家在延安住了一个时期，延安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性质还是农村环境，社会生活比较少，大家忙于生产，生活很紧张，但也单纯，没有什么复杂曲折的生活，因此这时期作品产生较少。”“第三个时期，一方面因为经过了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即整风），其次是生产运动，后者是物质基础，人民对于文化的要求增高了。”“许多就从城里走到乡村，走到广大的农民中去，并且生活在他们中间，因此发现了深厚的民间艺术源泉，如秧歌舞等等。中国的新歌剧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话剧也要吸收这个形式的优良因素。”（《文协昨开联谊晚会》，载1945年10月22日《新华日报》）介绍延安文艺的发展，给国统区文艺以启示，以促进。显示《讲话》后延安文艺创作的实绩，是向国统区文艺界宣传《讲话》的有力形式。重庆“周公馆”的过道里，曾举行过新秧歌剧演出，有《兄妹开荒》、《一朵红花》、《牛水贵挂彩》等。临结束还增加了一个集体秧歌舞，周恩来等领导同志首先从座中参加进秧歌队，兴致勃勃地跳了起来。

由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正确领导，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虽说经历了曲折，但总是在前进着，什么力量也阻止不住。

## 五

在我国现代文艺史上，有三次大的浪潮，或者说三次高峰。一是五四时期的新文艺运动，一是“左联”时期的左翼

文艺运动，一是抗战时期的抗战文艺运动。比较而言，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比前两次规模都大、都深入。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是我国整个抗战文艺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许多著名文艺家在国统区，由于许多有影响的刊物在国统区，由于许多全国性的文艺组织在国统区，国统区文艺运动对其他地区的影响是大的；反过来说，其他地区的文艺运动也有自己的特色，对国统区的影响也是大的。革命圣地延安的文艺运动，特别是在《讲话》发表以后，对全国各地区的抗战文艺运动都有指导性的意义。

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与抗日争民主的斗争有密切关系，起了重要配合作用。抗战初期，国统区的文艺运动以抗日救亡为己任，运用各种形式，采取各种方法，动员民众，增强抗战之力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顽固派日甚一日露出反共的凶相，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也加强了争民主的成分。皖南事变后，顽固派大搞法西斯专政，国统区文艺运动成了争民主潮流的有力组织部分，打击了黑暗统治。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在我国新文艺的发展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抗战以前的新文艺，虽说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有不可磨灭的勋绩，但存在脱离群众的倾向。抗战爆发，由于时代的推动，尤其是《讲话》发表以后，国统区的抗战文艺运动逐渐接近了、深入了群众，战前新文艺脱离群众的倾向，有所克服。文艺家深入群众，对于改造思想，对于积累生活，对于塑造典型都有极大好处。当然，在国统区，深入群众也是有限度的。当局害怕文艺家与人民群众结合，因为这样就可能形成反对黑暗统治的更强大的力量，他们对此十分畏惧。另外，严酷的战争年代使文艺家更明白了自己的职责、文艺的社会作用。脱离现实的文艺、为艺术而

艺术的文艺，不为人民所需。文艺是战斗的。正因为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在解放战争中才成了有力的反独裁、争民主的号角，求解放的战鼓。

八年的抗日战争，培养和锻炼了文艺工作者。战争，将许多知识青年、学生青年推上了宣传阵地，推上了文艺舞台。在这些工作中，他们经受了锻炼和考验，逐渐成长起来。有些还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我国现代文艺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国统区的抗战文艺运动也存在不足。统一战线的组织本来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应该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可一些进步文艺工作者一度过分强调了联合而忽视了斗争，因而出现了右的错误。《讲话》发表后，在国统区宣传贯彻是完全应该的，也是必要的，可有的同志没有很好结合国统区的实际，存在机械搬用的现象。抗战文艺的创作是繁荣的，但是，急就篇不少，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较为突出，特别是抗战初期。抗战时期，国统区文艺界开展的纪念活动比较多，这是不能认为是缺点的，而应看成是特点，因为这是战争年代特有的现象。

## 一九三七年

### 七 月

七日 芦沟桥事件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开始大规模进攻。第二天，党就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团结起来，抵抗日寇的侵略。

芦沟桥事变后，北平爱国学生纷纷走向街头，运用包括文艺在内的多种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然而，北平终于沦陷了。“他们一到济南，救亡工作又紧张起来，组织了流亡学生救亡工作队一类团体，那担任演剧，写壁报，歌咏等宣传工作的大抵就是那部分爱好文艺的青年，也许可以说，这就是抗战以后中国文艺界最初较实际的抗战文艺活动。”

（魏孟克《抗战以来的中国文艺界》，载1938年11月26日《抗战文艺》第2卷第11、12期合刊）。

十二日 成都复兴职业学校举行画展，中西画不下千件，参观者颇不少。漠清发表了《艺专画展参观记——琳琅满目可惜未见流民图》，对画展提出了批评。作者“总觉得他们的‘因袭性’太深，‘摹仿性’太强。”还指出：“一件作品，是应该是‘时代’、‘民族’、‘社会’的写真，才不会失掉艺术的真义，而他们的西画中之油画水彩画等等，我们寻不出一张是有上述含义的东西，它们通通是描写风景和近物与人体。与时代人生毫不相关仍然是有闲阶级的娱乐艺术。”

“现在，看国家、民族已到了生死关头，看四川是灾荒奇惨，死亡载道。这时的艺术，是应该怎样去做，以求唤醒大众救亡图存？贵族式的艺术，个人的娱乐品，现在需用不着了。”“改弦更张罢。”

十五日 中国剧作者协会在沪成立。中国剧作者协会是在上海剧作者协会的基础上扩大而成的。在成立会上，通过了集体创作《保卫芦沟桥》议案。崔嵬、张季纯、马彦祥、阿英、于伶、宋之的、姚时晓、舒非等十七人参加写作，夏衍、张庚、郑伯奇等四人整理，冼星海、周巍峙等六人作曲。《保卫芦沟桥》为三幕剧，第一幕写暴风雨的前夕，第二幕写“芦沟桥是我们的坟墓”，第三幕写全民的抗战。二十日，该剧脱稿。阿英作序，曰：“《保卫芦沟桥》是我们在战时工作的开始，我们热烈的希望这个剧本能够广泛的上演于前后方，我们更希望看过这个戏的观众，能和我们——和剧中所有的民众士官们相共鸣，高呼：保卫芦沟桥！保卫华北！保卫祖国！一切不愿作奴隶的人们，起来呀！”

十八日 鲁迅纪念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沪华安大厦举行，主席郑振铎，四十余人出席。郑振铎报告了纪念鲁迅筹备委员会的工作经过，大会还推举了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马相伯为委员会委员。

二十七日 郭沫若几经曲折，终于从日本回到了上海。郁达夫专程从福州赶来迎接，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也从南京赶来迎接。早晨，船还未抵上海，郭沫若作诗一首：“此来拼得全家哭，今往还将遍地哀。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拢上海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又出示诗一首：“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

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同日 广州艺协剧团、蓝白剧社、峰社、新儿童剧社等十四个剧团假广州青年会举行联合公演，演出的主要是国防剧。

二十八日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蔡元培、潘公展、胡愈之、张志让等八十三人被选为理事。该会有团体会员七十三个，个人会员二百五十一人。团体会员中有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等。

## 八 月

八日 广东戏剧协会借广州女青年会召开成立大会，到八十余人。大会选举罗海沙、胡春冰、余俊贤、唐叔明等十五人为理事。

十日 南京新闻界在大华戏剧院举行募捐公演，慰劳前线将士，演出剧目：田汉的《芦沟桥》。观众踊跃，情绪高涨。观众中，有刚出狱的著名的“七君子”。从次日起，该剧即在首都、国民、新都三戏院各演一天。

十三日 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遭到上海守军的抵抗。

十五日 中国剧作者协会在沪卡尔登剧场召开会议，讨论如何适应形势、开展救亡活动、组织救亡演剧队等问题。随即组织了十三个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救亡演剧队，并迅速开展工作。第一队，队长宋之的、马彦祥，队员崔嵬、丁里、塞克、贺绿汀、王震之、聂绀弩、欧阳山尊、邱力、王萍等。第二队，队长洪深、金山，队员冼星海、田方、张季纯、王



莹、欧阳红缨、熊塞声、顾一烟、田烈、白露、贺路等。第三队，队长应云卫、郑君里，队员赵丹、魏曼青、王为一、沙蒙、舒非、顾而已、吕班、叶露茜、朱今明等。第四队，队长陈鲤庭、瞿白音，队员赵明、魏鹤龄、陶金、吕夏、舒强、张客、严恭、吴晓邦、赵惠深、吴湄等。第五队，队长左明。第六队，队长李实。第七队，队长丁洋。第八队，队长刘斐章。第九队，不详。第十队，队长辛汉文、王惕予。第十一队，队长侯枫。第十二队，队长于伶、凌鹤。第十三队，队长陈铿然。

同日 《金箭》月刊在成都创刊。抗战前夕成都文艺作者协会就在筹备该刊，但未问世。“到了‘七七’抗战爆发，成都文艺作者协会，即以‘金箭社’的名义出版《金箭》月刊，一开始就发出了拥护抗战到底，为抗战文艺而努力的主张。这刊物是以抗战观点，来反映当前现实的。”（周文《成都抗战文艺运动鸟瞰》，载1939年4月10日《抗战文艺》第4卷第1期）。

二十四日 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在沪创刊。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在沪出至十月二十二日停刊。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在广州复刊，广州沦陷该报也停刊了。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在桂林又复刊，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二十五日 《呐喊》周刊创刊号在沪出版。编者在《本刊启事》中说：“沪战发生，文学、文丛、中流、译文等四刊物暂时不能出版，四社同人当此非常时期，思竭绵薄，为我前方忠勇之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秀笔，呐喊助威，爰集群力，合组此小小刊物。”创刊献词为《站在各自的岗位》，说抗战“需要热血，但也需要沉着，在必要的时候，

人人要有拿起枪来的决心，但在尚未至此必要时，人人应当从容不慌不迫，站在各自的岗位上，做他应做的而且能做的工作。”该文还简略陈述了文艺为抗战尽力的历史，表示“我们今后仍将如此做”，努力为抗战作出贡献。创刊号刊登了郭源新、巴金、萧乾、王统照、靳以、黎烈文、黄源、胡风、茅盾的诗文。

二十六日 四川省抗敌后援会抗敌歌咏团成立，廖育群为团长。内分四股：总务股，黄沫泽负责；组织股，贺敬樨负责；采撰股，黄振英负责；训练股，邱仲广负责。

三十日 上海《救亡日报》刊载《中国诗人协会抗战宣言》。称：“民族战争的号角，已经震响得使我们全身的热血，波涛似的汹涌起来了！我们再也不能容忍敌人的横暴，不能接受屈辱的和平了。”“在这种全国抗战的非常时期里，我们诗歌工作者，谁还要哼着不关痛痒的花，草，情人的诗歌的话，那不是白痴便是汉奸。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将我们的诗歌，武装起来；我们要用我们的诗歌吼叫出弱小民族反抗强权的激怒；我们要用我们的诗歌，歌唱出民族战士英勇的成绩；我们要用我们的诗歌，暴露出敌人蹂躏我民族的暴行；我们要用我们的诗歌，描写出在敌人铁蹄下的同胞们的牛马生活。我们是诗人也就是战士，我们的笔杆也就是枪杆。拿起笔来歌唱吧，前方的战士正需要我们的诗歌，以壮杀敌的勇气！拿起笔来歌唱吧，后方的同胞们正需要我们的诗歌，以加强抗敌的决心！拿起笔来歌唱吧，全世界上我们的同情者，正需要听到我们民族争自由平等的号叫！”

三十一日 成都话剧宣传团在成都大光明电影院化装预演章泯、尤兢、夏衍等编的大型抗战话剧《保卫芦沟桥》，翌日即开始正式演出，参加演出者一百三十人以上，

观众十分踊跃。仅九月一日，就有三四千人到场观看，剧场无法容纳。董仲篪在《战时救亡文学的重要》中说：“本市所演之保卫芦沟桥一剧，其感动人心之深，无以复加，民心一经激发，一旦需要其出力，即愿抛弃妻室，荷上枪弹，到前线杀敌，不惜牺牲。”《新新新闻》为这次公演出了特刊，登载了《中国剧协会宣言》，还发表了张善、鬻绀弩、金丁、洛人、征农的短评和田汉为《保卫芦沟桥》写的插曲。

八月 成都四川漫画社成立。抗战爆发后，“成都有几个艺术青年，常聚在‘休谈国事’的小茶馆里，忧心忡忡，窃窃私议。他们深感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应当拿起画笔，宣传抗敌救亡，唤醒民众，以尽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分职责。几经磋商，共同决定选择犀利尖锐、艺术感染力特别强烈的漫画为武器，打击敌人，揭露汉奸，讽刺醉生梦死者；从而鼓舞抗日军民斗志，激励广大群众爱国热情。就这样，一个自发的民间抗日美术团体——‘四川漫画社’诞生了。”（乐以钧、巫怀毅、车福、龚敬威、洪毅然《记‘四川漫画社’的抗日美术宣传活动》，载1982年《抗战文艺研究》第3期）最初，只有张漾兮、乐以钧、苗瀚然等数人，后又有谢趣生、梁正宇、蒋丁引、龚敬威、冯楨、江宁、洪毅然、刘素怀、巫怀毅、牟康华等十余人参加。

同月 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成立。这个协会出版了《救亡漫画》和成立了抗日漫画宣传队。丁聪、华君武、万籁鸣、鲁少飞、叶浅予、张乐平等担任《救亡漫画》的编委，叶浅予、张乐平任抗日漫画宣传队正副队长，队员有特伟等七人。

## 九 月

三日 孩子剧团在上海成立。干事长吴新稼，干事会由吴新稼、许立明、傅承漠、张宗元、张莺、罗真理等组成。全团共二十二人，最大的十九岁，最小的九岁。其宣言说：“我们是一群流浪儿。我们是一群不愿跟着爸妈逃难享福的孩子。在从前我们就相信抗日战争一定要爆发，我们曾经发过誓：不逃，不躲，要同日本鬼子拼。现在抗日战争真的开始了，我们虽然没有了爸妈，没有了家庭，成了流离无靠的孤儿，但是我们没有哭，没有伤心，相反的，只有快活，只有怒恨，只有振作。”“我们大部份是沪东战区里的孩子，爱演剧，爱唱歌，过去也曾经演过一些戏，唱过一些歌，在抗日战争开始了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上前线去同鬼子拼，不能作大规模的事情，我们只有以我们所有的力量，团结起来，以过去所爱好的工作来为国家服务，为民族尽力。”表示：“我们愿意永远演戏，愿意上前线去演，愿意到内地去演，也愿意到受难的同胞里面去演。”还说：“我们的力量是很薄弱的，我们的戏同歌是很幼稚的，经济也是很困难的，我们诚恳的希望社会上各界先生同戏剧界前辈先生指教，帮忙。”

五日 《烽火》周刊创刊号在沪出版。文学社、文季社、中流社、译文社联合编。《烽火》由《呐喊》出二期后改名而成，《呐喊》一、二期重印时也改为《烽火》。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停刊，连《呐喊》共出了十二期。一九三八

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复刊，十月十一日停刊，出了八期（十三到二十期）。

同日 四川漫画社在成都《新新新闻》出《四川漫画》专页，有漾兮的《没有退后只向前……》、《请你在这里来休息休息》，乐以钧的《前线》（木刻），苗勃然的《原来如此》，梁正宇的《日本帝国化学队科学兵》，龚敬威的《它忘了自身会爆炸的》，还有《读者的盼望》、《亲爱的，不要怕！上海隔这儿还远得很呢！》、《这两种异曲同工》等未署名。内容为抗日和揭国统区的有钱有势者。编者在《投稿规则》里说：“内容不拘，如描写时事，批评政治，甚至恭颂德政，宣扬贞节，以及男盗女娼，贪官污吏等题材，均所欢迎。”从此起，《新新新闻》与成都《新民报》交替刊出四川漫画社编的漫画专页。

八月 洪深、沈起予编辑的《光明·战时号外》第一号在上海出版。沈起予在他写的《编者的话》中说：“光明自创刊以来，即以唤起抗敌救亡为己任，而现在歼敌的炮声，终于响遍大地，足证吾人一年来的呐喊，并未虚掷。”“假如我们操纵枪杆之术精于操纵笔杆，我们也许早已赴战场，假如我们直接受到了政府的调动，我们也许已‘投笔从戎’了，但现在政府的总动员令既迟迟未下，而投效无门也还是青年大众的普遍烦闷，所以我们不能不仍暂守着原来的岗位，用我们惯用的笔来作前线的鼓励，作后方的督促；在这敌我自刃相接的时刻，笔杆的确已变成了次要的意义，然而我们相信冲锋号，进军歌自亦有它积极的效用。”为什么要改出“战时号外”？“因为邮局停寄印刷品，因为从前的书店不肯再替我们发售，使我们在资金上受到了重大的打击。我们不能维持从前那样的大量篇幅，只得改出这末小小的一

个周刊。”这个周刊“仍然偏重于有时间性的抗敌救亡的带文艺性的文字”，编者希望文长千字左右。“战时号外”第一号发表了绮雨的《庆祝中苏不侵犯公约公布》及《没收敌人在华财产及其租界》、郭沫若的《一二八的炮手》、郑伯奇的《一个明朗的故事》（小小说）、周扬的《在后方我们也是在前线》、任钧的《中国已经开始怒吼了》（诗）、臧克家的《兵车行》（诗）、立波的《募捐种种》、尤兢的《皇军的伟绩》（街头剧）。

十五日 《文艺》第五卷第三期出版。该期是抗战诗歌特辑。内载冯乃超《诗歌的宣言》：“听！抗战的号角吹响，／民族解放的黎明逼近了。／悠长的黑夜走完了它的尽头，／奴隶的滋味我们已经尝够，／曙光驱散了中古黑暗的幕，／鲜血写成中华民族的平等自由！／昨天里我们千万人有千万颗心，／今天大家只知道一个民族的命运。／钢铁般的意志已经铸成，／除掉它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歌咏？／摔掉你手里的绣花针，／脱掉你身上的美衣裳，／不要关在沙龙里再逞幻想，／诗歌的世界就是现实的疆场。／拨动手上的竖琴，／我们整队作跋涉的游吟，／让大众的意志得到语言的表现，／让我们唤醒每颗睡着的心。／让诗歌的触手伸到街头，伸到穷乡，／让它吸收埋藏土里未经发掘的营养，／让它哑了的嗓音润泽，断了的声带重张，／让我们用活的语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听！抗战的号角已经吹响，／诗人们，起来，保卫我们的家乡！”

十六日 上海《救亡日报》在“战时的电影界”的大标题下发表了沈西苓的《我们要申诉》、庶山的《银色的战士何处去》、且同的《日本的“华北事变”新闻片》、之尔的《本位之外》。沈西苓说：“在救亡阵线中，文化界最弱

的一环是电影！”他谈了存在的问题：沪战开始各电影公司停止了工作，内部成分复杂，缺乏资金等。但是，“我们的血在沸着，我们的心在动着，我们头脑时时在计划着。”最后说：“我们切望着各界给我们的援助，领导文化部分的当局有具体的计划，使我们得效命前途，工作有方！”

十八日 华南绘画界救亡协会在广州举办华南抗敌绘画展览会，接着又到广东几个县和广西梧州、柳州、南宁、桂林等地展出。华南绘画界救亡协会创办了两个刊物：《漫画战线》和《广州漫画》。

二十九日 上海《救亡日报》刊载金人《关于通俗文学的几个疑问》。作者提出：一、什么是通俗文学？通俗文学和普通文学质量上的差别何在？二、通俗文学要什么形式？三、通俗文学怎样写作？还说：“第一项是属于通俗文学的定义方面的，二三项都是关于技术方面的”。“希望注意这问题的人大家都公开地交换些意见”。

九月 怒吼剧社在渝建立。发起人有陈叔亮、余克稷、梁少侯等，共五十多人。其成员部分是北京、天津流亡重庆的剧人，部分是重庆电力公司、成渝铁路局的业余戏剧爱好者。第一次公演剧目是《保卫芦沟桥》。

## 十 月

三日 上海《救亡日报》刊登林娜《展开通俗运动》。作者说：“过去对于通俗化问题的讨论，我觉得有一个很普遍的缺点，大部分都只注意到一般理论的检讨，而忽视了实际去干。”还说：“我是主张尽量利用旧形式来装新内容的”，“至于写作的方法我们不能一定说是用土话写对，也不能说一定要用普通话对，这需要看情形而定。”

同日 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于伶等与周信芳、高百岁、余素琴等座谈，商讨旧剧如何适应抗战形势问题。郭沫若、欧阳予倩等主张采用历史上民族御敌的故事编成新评剧来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周信芳畅谈了多年来所企望的改良旧剧的愿望。田汉作了长篇总结发言。

六日 上海战时文艺协会成立。上海战时文艺协会是由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文艺组的报告文学者协会、诗人协会、文艺界战时服务团合并而成。主席戴平万作了报告后，即由周钢鸣、关露、林林、金丁等发言。会议决定文艺协会分总务、写作，出版三部。会议讨论的问题有：一、负责撰写报告文学小册子、通俗小册子、电台播音故事；二、文艺的通俗化问题；三、派关露代表协会慰问受伤的金人、辛人；四、与内地文艺工作者联络；五、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工作。

九日 上海《救亡日报》刊载阿英《再论抗战的通俗文学》，十一日登完。作者说：“从抗战通俗文学的内容方面说，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在充分说明全面的持久的抗战的意义，克复广大读者的在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不正确的心理，发动他们积极的组织起来参加抗敌救亡的工作，以保障战争的最后胜利。在作家方面，于整个的战争，必须有辩证的理解，时时刻刻地，随着战争的发展与需要，配合的写作能以适应的作品，以增强巩固抗战的力量。通俗的抗战文学与战争，与非常时期的政治形势，与战时的大众生活因素，不能有时刻的分离。”

十日 《抗战戏剧》月刊在广州创刊，主办者为广东文艺作家协会、广东戏剧协会、前锋剧社，主编罗海河、黎觉奔、胡春冰、赵如琳、舒湮。



十三日 上海国民救亡协会宣传团离沪，去内地。路线是：浙、赣、粤、桂、湘、鄂。他们要将救亡歌声带到内地去。全团十七人，团长何士德，团员有孟波、朱幸意、张元、赵定保、金重民、张啄萍、赵新奋、何家堆、张弘、张轨、王莉雷、华瞻、戴蒙梅、殷素琴、李璞、郑玉秀。

十六日 胡风编辑的《七月》第一集第一期出版。代致词《愿和读者一同成长》对“有人说，到这样的紧急关头，应该放下笔来”不仅明确表示反对，而且还说：“中国的革命文学是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五四运动）一同产生，一同受难，一同成长。斗争养育了文学，从这斗争里面成长的文学又反过来养育了这个斗争。”还说：“在神圣的火线下面，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的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在这反映里提高民众底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文艺作家底这工作，一方面将被壮烈的抗战行动所推动，所激励，一方面将被在抗战热情里面踊动着、成长着的万千读者所需要，所监视。”

同日 《哨岗》在武汉创刊，丽尼、聂绀弩、杨朔、陈荒煤、罗烽等编辑。该刊只出了一期，第二期预告了要目并未出版。

十七日 《烽火》周刊为鲁迅逝世周年出了“鲁迅先生周年祭”专栏，同人在《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中说：“想到逝去的鲁迅先生，我们的心情是沉重的。失掉这一个我们大家敬爱的老人，中国的青年失去了一个最能爱护他们的友人；文艺界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导师；民族解放运动中失去了一个热烈的战士；人类解放运动中失去了一个勇敢的先驱。一年前我们的巨大的损失至今还不曾得到补偿，而且这缺陷一时

恐怕也不能够被填补了。”还说“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实现便是纪念我们的伟人鲁迅先生的最好的纪念碑了。”此外，王统照、景宋、郑振铎、孟十还、克夫、黄源、方之中还发表了纪念诗文。

十八日 上海《救亡日报》刊载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宣传大纲》。《大纲》历数了鲁迅的功绩，最后说：对于鲁迅，“尤须我们学取的，是鲁迅的韧战的精神。”“目前全面抗战虽然展开，但由于统一战线部分的软弱，还留下能‘妥协’的因素，与懦弱的幻想；而民族的生路，却惟有‘抗战到底’一条。妥协与幻想，是只有断送民族的生命。鲁迅的“韧战”精神，正是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的唯一条件。”还指出：扩大这一精神，“是我们目前急迫的任务。”

十九日 鲁迅先生周年忌。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与上海战时文艺家协会会员郭沫若、王统照、王馥泉、巴金、包天笑等联合发起，邀文艺界同人于浦东大厦举行座谈会，到会一百余人。主席团由沈衡山、郭沫若、胡愈之、郑振铎、汪馥泉、巴金、陈望道七人组成。郑振铎报告筹备经过，沈衡山、郭沫若、田汉、陈望道、黎烈文等相继演说。发言者从鲁迅精神谈到了文艺界思想、组织上存在的不足。大会议定：组织文艺界救亡协会。选出的临时执委有郭沫若、王统照、郑振铎、汪馥泉、陈望道、巴金、欧阳予倩、田汉、傅东华、戴平万、谢六逸。临时提议有：一、促商务印书馆从速出版《鲁迅全集》；二、邀请现有一切文艺作家及团体为文艺界救亡协会会员；三、请政府即日宣布对日绝交。

上海《救亡日报》出“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辑”，内有景宋的《纪念鲁迅与抗日战争》、郑振铎的《“失去了

的导师”》，巴金的《深的怀念》、周建人的《鲁迅先生小的时候》、郭沫若的《鲁迅并没有死》等。翌日该报的“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辑”载有冯雪峰的《关于鲁迅》，辛劳的《献给鲁迅先生坟前》（诗）、亚丁的《再没有工夫流泪》（诗）、马丁的《纪念鲁迅先生》（诗）等。

同日 巴人以编者名义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超越鲁迅——为鲁迅逝世二周年作》的文章，提出要认真学习鲁迅，“不避强权，不避强敌，不依附于豪贵而歪曲事实，敢说，敢笑，敢作，敢为”，将自己的力量贡献给抗战。同日，鹰隼（阿英）在《译报·大家谈》上也发表了纪念文章，题为《守成与发展》。他指责了《文汇报·世纪风》上撰写杂文的作者，说他们不该写“鲁迅风”似的杂文，还不点名地批评了巴人，说“有人在‘抽抽乙乙’作碎感”。这就引起了关于“鲁迅风”的论争。

二十日 阿英在《译报·大家谈》上发表《题外的文章》，向巴人提出质问：模仿鲁迅的风气目前是否太盛？这种倾向的增长是否会有害？如有害，应不应表示抗议？如鲁迅还在，是否会依旧写从前那样的杂文？同时要求巴人作“进一步的反省”，“不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同日 上海《救亡日报》刊载许幸之《抗战美术摄影展览会》一文。展览会展出了新闻摄影和木刻漫画。摄影作品中，《倭寇残暴的成绩》、《又一个无辜牺牲的头颅》、《难民之一、二》、《南站之血痕遍地》、《龙华寺内·寺前》、《这是战马吗？》、《阿妈呀！》、《收容所内》、《难民缝衣队》等引人瞩目。木刻、漫画中，陈烟桥的《群情愤怒》、马达的《以轰炸还轰炸》、倪志钺君的《东北老汉抱定三死主义》等，给人印象较深。

二十一日 《文艺月刊·战时特刊》创刊号出版。该刊以“本社同人”之名发表了《创刊话》，吹捧“我蒋委员长禀承总理遗教，应全国民众一致的要求，尊重各友邦维护和平的公意，领导抗敌，给予侵略者以打击，不但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神圣的战争，在世界民族解放史上，同为最光荣的一页。”还要求“文艺工作者应该尽其所能，实现智力与劳力的协作，特别注意于国家新生命的发扬光大，务必做到使人民与政府结成一体，使战争与文化，打成一片。”

二十二日 巴人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题内的话》，反驳阿英，指出模仿本是创作的必要过程。在今天，我以为对于鲁迅的学习，还不够深入，还不够扩大！没有守成，即想发展，那是取消鲁迅的企图，这正是鹰隼先生所要做的。”

二十三日 文艺界救亡协会举行临时执委会，到会有郑振铎、汪馥泉、夏衍、陈望道、王统照、谢六逸、田汉、欧阳予倩、巴金、傅东华、戴平万，郑振铎任主席。议决：一、巴金起草致前方将士的慰问书；二、田汉起草请各国文艺作家援助中国抗战书；三、傅东华起草协会成立宣言；四、谢六逸起草协会章程；五、郑振铎以“鲁迅周年忌座谈会出席者”署名，致函商务印书馆，请从速印行《鲁迅全集》。在组织问题上，议定：协会分第一和第二两部。第一部为司事；务第二部为司制作。为扩大组织，普遍邀请各种文艺团体和个人参加。对于各重要团体，如中国文艺协会上海本会、译文社、光明社、文学社、文丛社、战时文艺协会、戏剧界救亡协会、作曲协会、语文协会、木刻者协会、漫画界救亡协会等，分头进行接洽。

二十八日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召集各团体歌咏组联席会议，出席团体二十余。会议中心：保卫大上海。主席殷扬

报告会务、歌咏者之使命以及今后工作路线和统一歌咏阵线计划等。会上议定：一、立刻发动歌咏同志到前方去，以最英勇的几只歌曲教给兵士们；二、动员各收容所、里弄、伤兵医院等印行歌谱；三、对工部局的禁歌令应立即提出抗议（工部局禁止的歌有《义勇军进行曲》、《只怕不抵抗》、《八一三战歌》、《活路歌》等）；四、组织临时干事会，当场推定作曲家协会、国防歌曲播音联合会、国民歌咏救亡协会、大公读书会、扬帆社等为团体干事；五、讨论歌剧问题。

三十一日 上海《救亡日报》出《八百战士专页》（一），刊有郭沫若的《由四行想到四川》、林林的《八百勇士礼赞》（诗）、逸美的《八百壮士抗战行》（诗）、白兮的《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翌日，又出《八百战士专页》。（二），刊有田汉的《敬献我死守闸北之忠勇将士》（诗）、公孙旻的《闸北现在还是我们的！》（诗）、关露的《勇敢的军队——八百人》（诗）、张殊明的《颂神军》（诗）、宋寒衣的《孤军》（诗）、郭我力的《慰勉谢晋元将军》（五古）、辛劳的《火中一兵士》（诗）。二日，又出《八百战士专页》。（三），刊有艾芜的《八百勇士》（小说）、胡怀琛的《八百孤军》（诗）、白华的《为四行仓库谢团殊死战咏》（诗）、赵景深的《八百英雄》（大鼓）。

## 十一月

一日 《中苏文化》在渝出抗战特刊。《创刊词》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无论在华北、晋绥以及淞沪，英勇的民族战士，都以浴血的苦战，使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

的战略遭到了意志和行动上的失败。日寇所立意企求的‘速战速决’既不可能，而集中海陆空军以求‘中央突破’的歼灭战，又遇到持久抗战的打击。所以目前的事实以及将来的演变，都使我们应确信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我们。”“本刊素以沟通中苏文化的伟大工作为主，但在目前全民族对日抗战，以争取中华民族自由、独立与幸福的时候，除了努力于检讨怎样达到广泛的民众工作，和怎样组成全体性与持久性的抗战之外，还应积极从事于国际形势演变的分析，革命外交的研究；并向苏联革命的丰富经验去学习求得打倒侵略者的理论与实际。”

同日 《时调》诗歌半月刊在武汉创刊，穆木天、蒋锡金主编。《编余语》曰：“我们的工作”是“救亡歌曲的制作，国防诗歌的创作，通俗诗歌、歌谣、民间俗曲的编撰。希望诗歌运动有好的展开，也想叫诗歌工作者能在救亡运动中多尽些力。”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终刊。

三日 上海文艺界在新雅酒楼举行座谈会，但国民党分子夺取了会场，召开文艺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成立大会通过了组织大纲，发表了成立宣言。郭沫若、田汉、王统照、巴金、陈望道、郑振铎、欧阳予倩、戴平万、谢六逸、傅东华、王馥泉在六日上海《大公报》发表声明，说“我们对于本月三日在新雅成立之文艺界救亡协会并未预闻。”

同日 上海《救亡日报》刊载艾芜《从文艺通俗化说到战时文艺》一文，五日登完。作者认为：“把通俗化的文艺，和纯艺术的文艺，对立起来，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们做通俗的作品，并非丢开艺术的制作，来降格干的事情，而是文艺本身要通俗化，才有它的远大前途。”他还批评道：“现在还不少人怀疑，作品通俗化了，会失掉好些艺术性，

因而，便无意之间，把艺术作品，和通俗作品，对立起来。其实，这是‘短视’。我们的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些应用口语写作的杰作，谁敢说它没有艺术价值？”

十一月 阿英编《抗战独幕剧选》由抗战读物出版社出版，内有阿英撰写的《淞沪战争戏剧初探》一文，记载了淞沪战时发表的剧本，计有夏衍的《咱们要反攻》、《八一三之夜》，尤兢的《省一粒子弹》、《我们打冲锋》、《以身许国》，方岩的《专门造谣》、《血债》，沈西苓的《在烽火中》、《血战罗店》，司徒慧敏的《我们的飞机》，凌鹤的《再上前线》、《到前线去》，李一的《姚子青将军及其部下》，侯枫的《往哪里逃》，朔风的《壮烈牺牲》、《捉汉奸》，陈白尘的《扫射》，姚时晓的《汉奸末路》，子幽的《开里弄会去》，徐系宇的《宝山城》，苓君的《血城》，春晖的《汉奸之女》，言式的《我们一条心》，夏野士的《复仇》，孙瑜的《最初的一课》，夏蔡的《改良拾黄金》。

## 十二月

十六日 《诗报》半月刊在重庆创刊。编者在《我们的告白》中说：“把握住每一种于抗战有利的武器，这是展开全面抗战的条件，也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因素。诗歌，这短小精悍的武器，毫无疑义，对抗战是有利的，它可以以经济的手段暴露出敌人的罪恶，也能以澎湃的热情去激发民众抗敌的意志。”

二十五日 全国话剧界在汉口大光明戏院联合公演，目的是为华北义勇军募捐，演出剧目是《最后的胜利》。演出单位：军委会政训处抗敌剧团、国立戏剧学校同学会、首都

抗敌剧团、怒潮剧社、广西国防艺术社、山东省立剧院、拓荒剧团、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救亡演剧二队、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国旅行剧团、平津学生救亡宣传部等。

二十七日 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在市党部会客室举行理事会，执行主席钟期森。这个协会是十二月十九日成立的。理事会选举了常务理事七名，还议定了各部负责人。音乐方面是马丝白、梁韬，美术方面是宋一痕，电影方面是郑凌生，戏剧方面是阳翰笙、朱双云，文艺方面是钟期森、胡风、冯乃超等。

三十一日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大光明戏院开成立大会，参加者四百余人。大会通过了会章，还确定每年十月十日为戏剧节。会章称：“本会以团结戏剧界人士，发展戏剧艺术，推动抗敌工作为宗旨。”规定：本会常务理事会之下分设总务、话剧、歌剧、杂剧、编译五部；每部设正副主任各一人。”还发表了宣言，指出：“第一，我们的团结是为着抗战。”而“对于全国广大民众作宣传，其最有效的武器无疑的是戏剧——各种各样的戏剧。”“第二，只有抗敌使我们团结。”“今日中国的戏剧艺术界不怕不能发挥伟大的抗敌宣传力量，而怕的是这一团结不能充分巩固。”“第三，我们虽不是艺术至上论者，但我们相信中国戏剧艺术必因和抗敌任务结合能掘弃过去的积弊，开拓新的境地。”“第四，我们不可忘记把我们的戏剧艺术作为国际宣传的工作”，因为获得全世界的同情和援助，可使敌人陷入孤立，这“实为我们争取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宣言最后说：“以上所陈，在事急寇深的今日，殆为极平凡的要求。”迫切地希望“我国戏剧界人士群策群力为这些平凡要求的实现而奋斗。”大会推举了九十七名理事：张道藩、方治、刘伯闳、郑



用之、王亚明、王平陵、田汉、阳翰笙、吴漱予、陈礼江、朱双云、谢寿康、洪深、唐槐秋、袁牧之、陈立夫、孙师毅、光未然、王瑞麟、陈波儿、马彦祥、冼群、安娥、袁昌英、金山、王莹、王家齐、应云卫、赵丹、郑君里、赵铭彝、孙怒潮、陈白尘、宋之的、熊佛西、潘梓农、黄天佐、陈豫源、余上源、万家宝、向培良、赵太侔、陈治策、谷剑尘、罗海沙、胡春冰、赵如琳、钟启南、万籟天、章泯、陈明中、郑伯奇、戴涯、周伯勋、朱光、姚时晓、张季纯、崔嵬、萧萧、凌鹤、保罗、李朴园、辛汉文、熊式一、夏衍、欧阳予倩、阿英、胡萍、尤竞、顾仲彝、李健吾、梁实秋、张彭春、陈绵、顾无为、王泊生、白云生、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高百岁、赵小楼、王若愚、李百川、傅心一、吴天保、易健全、封至模、王天民、盖无红、唐广体、赵唤庭、安冠英、蒋寿世、白凤奎、富少舫、马立元。

会后，武汉各剧院在普海春公宴会员。阳翰笙回忆道：“由于‘那天会场中一种空前热烈的情绪激动了我’，我忽然‘灵机一动’，一下就想起了我们作家间的团结问题来，我想：在抗战的旗帜下，戏剧界的朋友们都能够精诚团结，为什么我们作家之间会不能够精诚团结呢！（《“文协”诞生之前》，载1943年3月27日《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他即找王平陵详谈，得到支持。阳翰笙提出了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最初的动议。

## 一九三八年

### 一 月

一日 《抗战底》半月刊在武汉创刊，老向编辑。《发刊词》曰：“《抗战底》这个半月刊，创办伊始，篇幅有限，可是力求实效，愿望无穷。我们希望这里边的每一篇文章，甚至每一个字，都有炸弹般的力量，炸碎敌人的阵营。所有的作家、学者，与全体抗战爱国的同胞，只要有‘多写一个字，多增一分抗力’的热诚，便都是本刊的合作者。”

“我们要根绝妥协，永不屈服，抗战到底。我们不说大话，但绝对不说软话。不说于抗战无益的话，更不为谁造消闲趣话。我们愿以血为墨，使文学化为武器，赠与全国的同胞。”《发刊词》最后说要“服从领袖的指导”，“拥护领袖的主张”。从第十期起，由何容编辑。从第十五期起，在重庆出版，仍由何容编辑。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出至第二十六期停刊。

二日 郭沫若、祝秀侠、林林、林焕平、蒲风、黄鲁、湛小岑、姚非厂、杨邨人、陈达人等五十余人在广州太平支馆举行新年文艺座谈会，座谈中心是文化界统一问题与一年来文艺运动的检讨。座谈会议定了筹组广东艺术工作者协会。“文教”组织部、宣传部文字组、文艺座谈会等负责筹备。

四日 广州新亚二楼举行沪港粤文化界同人聚餐会。郭

沫若、茅盾、夏衍、吴永刚、蔡楚生、费穆、严谔声、严斐、姜君辰、林焕平、孔德沚、郁风、欧阳山、草明、林林等三十余人参加。茅盾、吴永刚、费穆、蔡楚生、严谔声、萨空了、罗叔章等人讲了话。茅盾说，从上海到香港后，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从香港到广州就不同了，好象到了祖家一样。广州的抗日救亡工作的活泼与紧张，使他得了无限的安慰。费穆讲前线情形很详细。他说平汉线的战事实在使人失望，但燕赵一带的民众都起来了，组成的游击队有一百万人之多。至于北战场，现在可算是平静无事了。蔡楚生以为香港可以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他又觉得文化人应加紧团结，因为集体的奋斗比个人奋斗强得多。后来欧阳山报告广东文化界情况，从“党政军”、“妇联会”、“市抗会”一直说到最近成立的“文教”紧张工作的情形。他觉得广东人做事有浮躁空虚的毛病，希望文化人，尤其是文化先进，给广东人一种援助，使广东人变得沉着、充实。

八日《七月》社举办的“抗敌木刻画展览会”在武汉民众教育馆大厅开幕，展至十日闭幕。参观者各阶层人士计六千人左右。展览会展出了李祥、沃渣、江烽、王天基、力群、陈烟桥、野夫、新波、马达、张在民、惊白、罗清桢、温涛等二十余人的作品。《新华日报》曾发表了未署名的《“抗敌木刻画展览会”参观记》，说：“中国的木刻已渐渐从摹拟苏联或西欧的阶段进到能自己创作的境地了。希望诸作家能对现实生活作更紧密的联结，使得未来的作品将更充实、更伟大，更能把神圣的民族战争在黑与白的画面上记录下来。”十三日，《新华日报》还出了“抗敌木刻展览会特刊”，载了胡风的《“抗敌木刻画展览会”小解》、艾青的《略论中国的木刻》、萧军的《“木刻画展”纪》、田间的

《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木刻》，对抗敌木刻展览会作了充分肯定。

十一日 《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周恩来题词是：“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这是我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有崇高威望的报纸，仅就抗战文艺方面来说，一直起着指导作用。十月二十五日从武汉迁往重庆。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被国民党政府强迫停刊。共出了三千二百三十一号。

十二日 徐特立、田汉、孙伏园、黄源等在长沙举行茶会，欢迎到达长沙的茅盾夫妇。徐特立说，我不赞成青年们离开湖南去陕北，湖南的活动比陕西更重要，学习环境也更丰富。

十五日 成都四川漫画社在蓉基督教青年会举行救亡漫画展览会。其《宣言》曰：“自‘九一八’，‘一二八’，到‘七七’，‘八一三’以来，痛受国际黠武主义者法西斯蒂前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的侵略，而已经掀起了举国一致的抗敌救亡运动，展开了壮烈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因为这一斗争的本身即为整个民族国家存亡生死的关键，更因为支持这一斗争的责任，本来是普遍地人人具有的。所以，在全面的长期的御侮救亡的大目标下，为了要完成艺术与艺术家之在抗敌阵线中的任务和功能，我们的‘四川漫画社’应运而生；并且同时我们的救亡漫画展览会也应运而产生了。”“‘漫画’在大家的耳目中虽然绝不会是一种生疏的东西，但不免总多少在一部分人的观念中是有着各种的歧视的吧？至于以致力漫画的抗敌救亡运动为职志的团体，在本省却实在未之前闻，因而作为漫画的抗敌救亡工作之一形式的漫画展览会，在本省也还的确是一种创举”。还说：“真正

的‘漫画’并非仅只是‘怪理怪趣’，专门惹人发笑和解闷的东西，它本质地是幽默的，但它却不是无聊的打趣和开玩笑。以它的最尖锐最活泼的本质与它底最洗炼最明快之形式论，实则是最适合于目前，这伟大的时代之需要的一种最深刻、最具体的表现，尤其以我国同胞中无智识的文盲大众，既不能读通电，听讲演，接受一切为智识界所专有的宣传，而同时我们的抗敌救亡大事业，又恰巧不能够不需要他们的力量之支持，因而它更是最有效，最普及，最富于煽动性的一种启发与激励——甚而是组织广大的无智识文盲同胞的工具，赞颂同胞们英勇的战斗的姿态，它也对敌人及其走狗——汉奸们——之丑恶的面相予以极辛辣的讽刺。”展出作品一百六十余幅。共分两部分：一、漫画；二、木刻、水粉、水彩、素描等。颇有影响。

十六日 《新华日报》出副刊《星期文艺》第一期。编者在《致读者》中说：“我们想，诸位在紧张的工作以后，在理论的探讨或逻辑的方式上运用了自己的思维以后，如果能够有一点关于培养情绪，提高意志的粮食，能够注意一下关于培养情绪，提高意志的工作，那也许不是无益的。”还谈到刊载的内容：“文艺上的具体问题（在这里当然不想展开系统的文艺理论或全面的文艺运动问题），例如应该指明的倾向或应该注释的论点，可以短警的提出意见；应该介绍或警告的文艺作品，也可以短警地提出批判；至于短小的诗歌、报告、速写、通讯等，也未始不能从一个小的视角反映出民族战争大潮里的人生面相来。我们还想每次有一幅木刻或漫画，几则关于文艺事业的简报；以及和读者间的关于文艺理论、文艺作品、文艺工作的通讯讨论。”第一期发表了符真、艾青、黄明等的诗文。

十七日 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在武汉成立，这是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

中旬 《七月》社举行抗战文艺问题座谈会，参加者有艾青、东平、聂绀弩、田间、胡风、冯乃超、萧红、端木蕻良、适夷、王淑明。主要谈了四个问题。第一，抗战后的文艺动态印象记。冯乃超说：“抗战以后，商业的文学关系，或者说文学的商业关系，相当地被打破了。”具体表现是：购买力衰退和文学杂志非常少。“好象文学有衰落的现象，不过，这是表面的；实际上文学依然在发展。”“还有就是纯粹消遣性的文学衰落了，离开了抗战生活的文学没有存在的余地。”发言者普遍认为文艺作品没力量，缺乏伟大作品。第二，关于新形式的产生问题。胡风等批评了达达主义，认为这是抗战中不健康的形式，不能认为是新形式。楼适夷说：“我们要求的新形式，要更大众化，可以多方面的表现生活，决不是向神秘的道路走的。如象诗歌中的报告诗、朗诵诗、剧本中的街头剧，散文中的报告和通讯文学。”第三，作家与生活问题。艾青、萧红、胡风等均发言要重视生活问题，要“打进实际生活里面”去，要“抓住”生活。第四，今后文艺工作方向的估计。胡风说：“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讲。一方面是怎样能够动员和团结一切文艺作家参加到抗战工作里面，另一方面是怎样保障现实主义底前进。”这个问题没来得及展开讨论，就在“笑声中散会”了。座谈会记录以《抗战以来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为题发表在《七月》第七期上。

二十一日 汉口文化工作者假普海春举行茶会，阳翰笙、罗刚等提议建立全国电影界人士的组织，获得了一致赞同。当即推定张道藩、吴佑人、陈波儿、沈汉卿、方治、姚

苏凤、梁鼎铭、陈立夫、罗刚、张常人、万籁鸣、罗静予、张冲、孙师毅、田汉、洪深、安娥、史东山、沙梅、郑用之、甘雨耕、王平陵、唐纳、汪洋、郑君里、应云卫、杨霁明、杜洞荪、叶浅予、尹伯休、袁丛美、洪伟烈、阳翰笙、郑孝坤、王瑞麟、万籁天、袁牧之、徐正道、刘雪厂、刘念渠、马彦祥、金山、崔万秋四十三人为筹备委员。当日晚间，二十四日及二十六日，先后召开了三次筹备会，议定事情多项：一、定名为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二、推罗刚、郑用之、尹伯休负责起草会章；三、推阳翰笙、唐纳、郑君里、孙师毅、姚苏凤起草大会宣言；四、同月二十九日开成立大会。

二十四日 从是日起，《新华日报》连续三天为上旬到达武汉的孩子剧团出专刊。编者以《大时代的孩子们》为题写了刊头语，称：“在这个特辑中，我们介绍了五篇少年的作品，记述孩子剧团的一群孩子团员，从失陷的上海流亡到武汉来的经验，也可说是一个集体创作。文笔上虽然有些地方还不脱稚气，但它却是一篇用生命写出来的佳作，因此我们毫不吝惜地以三天的副刊地位，给予郑重的介绍。”介绍的作品有：张莺的《我们是怎样到武汉来的》、许立明的《八天的小船生活》、傅承谟的《走吧！走向那不知生死的运河车站》、林黎田的《从运河站到郑州公演》、罗真理的《想到武汉走向武汉到了武汉》。专刊还发表了适夷的《孩子剧团印象记》，称赞孩子剧团，说“我们后一代的人，比我们强得多了。”《孩子剧团宣言》刊登在二十五日专刊的显著地位。

二十八日 《抗战日报》在长沙出版。田汉主编，辟有戏剧与电影、诗歌战线等专栏。田汉在代发刊词中称这个报纸与《救亡日报》是姊妹报，是体现统一战线精神的报纸。

二十九日 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江汉路一家餐馆开成立大会，来宾踊跃。张道藩、沈钧儒、邵力子等讲了话。大会发布了《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宣言》。《宣言》检查了电影事业配合抗战不力的弱点，号召团结起来，“用同一的意志趋向同一的战斗目标”，“我们要每一个电影从业员能锻炼成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勇敢的战士。”“我们要每一个电影片成为抗战底有力的武器。”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电影底战场。”大会通过了章程，选出了张道藩、方治、罗刚、史东山、温涛、应云卫、田汉、费穆、蔡楚生、袁牧之、陈波儿、张石川、周剑云等七十二人为理事。《新华日报》出了成立大会特刊，登载：阳翰笙的《今后的一点希望》、史东山的《中全电抗会成立大会前言》、郑用之的《筹备工作述略》及成立宣言。

一月 荷兰电影艺术家约里斯·伊文思来到我国。其目的是利用电影艺术将“世界公敌的狰狞残暴面目和为民族独立解放的中国英勇抗战的事实，能尽情地暴露在世界人民的面前。”他来即开始拍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

## 二 月

八日 广州《救亡日报》开始连载集体创作的长篇小说《华北的烽火》。茅盾在《此亦“集体创作”》中说：“这书里的故事，包括有将士们的浴血抗战，汉奸们的卖国求荣，民众的愤慨，平津失陷前念九军将领内部之不一致，宋哲元之感于‘能和’，……一大幅血淋淋的现实。”全书分四部分，从芦沟桥抗战起，至平津陷落。每部分拟二至三万字。参加创作者共二十几位作家。连载至四月二十八日止，并未



载完。已刊的有沙汀的《前夜》、艾芜的《演习》、周文的《怒火》、舒群的《爆发》、蒋牧良的《突破》、聂绀弩的《找和平》、张天翼的《左右为难》、陈白尘的《全线总进攻》、罗烽的《反正》。

九日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举行欢迎会，欢迎孩子剧团。参加欢迎会的有周恩来、叶剑英、博古、郭沫若、潘汉年、邓颖超、叶挺等。小招待主任致开幕词说：“我代表办事处全体同志，欢迎我们民族最优秀的，千辛万苦从敌人枪刀下跑出来的，为解放而斗争的小战士，勇敢的小英雄！”郭沫若说：“中国有了你们这群不怕艰苦的儿女，中国也要在苦难中渐渐长大起来的。你们就象征着中国，在艰难困苦中一天天长大起来吧！要建立一个国家，决不是容易的事情，一定是流许许多多勇士的血，牺牲许许多多战士的头颅，用这些血液来作水门汀，头颅作砖块，这样才能建设得起来！我希望你们在困苦艰难和磨炼中长成起来，中国要跟着你们一道长成起来！”周恩来也在热烈的掌声中致词。他说：“你们这些小朋友，比我们自己队伍里教育出来的小战士更进步。因为他们的能力，是从大集团的帮助中得到的，而你们呢，都是在人们瞧不起的环境中，自己斗争，创造出来的。我送你们救国、革命、创造三种精神好吗？你们要一手打倒日本强盗，一手创造新中国。”

十二日 反侵略宣传周文化日。武汉除隆重集会表示要“握着文化的火炬反抗侵略”外，下午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还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公开演出。演出剧目共四个：《血洒晴空》、《最后一计》、《杀敌报国》和《为自由和平而战》。后者是几个剧中演出最成功、最受欢迎的一个。手法新颖，场面热烈庄严，很是感人。

二十日 黎嘉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批评文章，题为《诗人，你们往哪里去？》。文章对“鸥外鸥、柳木下、黄鲁、欧罗巴、胡明树、杨起等自称为‘少壮诗人’派的诗人们”最近出的“一种漂亮的诗刊《诗群众》”提出了批评，说他们与抗日战争“似乎没有多少关系”，在他们的宣言里，并没有新鲜的东西，“他们只是混杂的抄袭着未来派（意大利的未来派和俄国的未来派同样被抄袭）以及日本早就没落了的‘新感觉派’的玩意儿而已。”并“提醒”他们：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诗人们的诗篇，也必须是帮助这种神圣的战争的。”

### 三 月

一日 《七月》发表大漠文章《毛泽东论鲁迅》。作者说：“这是鲁迅周年祭日，毛泽东先生在‘陕公’的纪念大会上的演讲，当时由我记录下来的。”“这篇演讲是非常精辟独到的作家论，而且，对于每个正在艰苦奋斗着的民族解放战士，都是具有特殊的意义的。”毛泽东同志的演讲说，鲁迅“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他指出了鲁迅的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远见。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的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憎恨的一切。”

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喊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不丝毫妥协，他具备了坚决心。”“综合了上述这几个条件，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

五日 长沙《抗日战报》刊登短剧《晚会之歌》。徐特立阅后，即投书报社，提出批评：“贵报三月五号《晚会之歌》有许多严重错误，对于目前的外交和国内的统一战线是不利的。”报纸全文发表了徐特立的来信，同时发了编者的复信，表示“诚恳接受”，并“承先生指出这个错误，使我们有更正的机会，这是十二分感激的。”

同日 全国歌咏协会邀请武汉合唱团主办的音乐演奏大会在三教街俄国俱乐部举行。演出收入为救济武汉被炸难民。这个合唱团由四十八人组成，均为业余爱好音乐之青年。演出前，合唱团发表了《关于这次演出》的文章，说：

“受着时代的需要，为着掩不住的热情，我们在抗战期中，组成武汉合唱团。亲爱的先生们，一定不会怀疑我们在卖弄着艺术。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将我们所做的工作，呈现在诸位先生之前。”《新华日报》还为这次演出出了特刊，刊载了沙梅的《对抗战歌咏的意见》，宋如海的《为武汉合唱团进一言》，适夷的《歌咏与抗战》。演出取得了成功。

六日 周文、孤萍、蔡天心、岱辉等在成都发起筹组文艺界抗战工作团，五十余人出席，主席周文。周文报告筹备经过及开会理由。会上发布了《成都文艺青年抗敌工作团发起意见书》，称：“对日抗战，已经过了七个足月。敌人加速度的侵略，深刻化民族的苦难，我们的政府以及民众，已经为了整个的民族解放斗争，统一在一个最高目标之下，而进行着全民的总动员。作为民族成员和特种战斗员的文艺青

年，在今天，他的责任已非单纯的艺术创作所能概括，而需要站上他的这项战斗中的岗位，以强有力的斗士姿态，推行文艺动员的历史任务，推动这个战斗，战争的艰苦长远的进程。我们觉得要使文艺部门在救亡的洪流中，能够发挥它最大的战斗力量，是需要一切文艺青年的共同努力的，所以我们需要产生一个组织，以集体的力量，和我们青年的积极战斗性来推动整个文艺的救亡工作。”议定四项原则：一、在政府领导下为巩固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二、文艺界救亡工作者与全国文艺界统一战线工作相配合；三、采取通俗文艺形式；四、扩大文艺工作范围深入民间。会上推出马宗融、周文、朱孟引、沙汀、水草平、方白非、任钧、蔡天心、陈思苓、毛一波、羊角为筹备员，并议定两周内就召开成立大会（由于市党部不予立案，未果）。

十五日 广州中国诗坛社在市播音台朗诵诗歌。之前，中国诗坛社曾进行过四次朗诵，但都是趁别的集会或演剧插进去的，影响不大。这次播音朗诵，颇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和兴趣。胡危舟朗诵的《中国，坚韧的弹簧》和宁婴朗诵的一首诗最受欢迎。

同日 《弹花》在武汉创刊，赵清阁主编。创刊词《我们的话》曰：“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站在民族战争的大时代！阵容上，不分前线与后方；作战上，不分军队与民众；动员上，除了人力与物力还要加上精神，文艺就是精神动员的有力因子之一。被侵略民族为要求生存而抗战，是神圣的，是有真实性的，惟有充分表现这种真实的文艺才是目前真正的艺术，才有它历史的不朽性。敌人的奸淫掳掠，烧杀凶横，我们可以写，将士的慷慨赴义、壮烈牺牲，我们可以写；人民的琐尾流离、饥寒疾苦，我们

可以写，甚而至于汉奸土劣贪官污吏之不知人间羞耻的丑态，都是我们描写的对象。”出一卷六期后迁渝出版。一九四一年八月停刊。共出到第三卷第八期。

十六日 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易俗社演出三幕剧《突击》，获得了热烈欢迎。若望观后发表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突击〉》一文，说：“我是戏剧的门外汉，但它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突击》处理了中国现时代的重要的伟大的主题，这在戏剧运动的新阶段上确实是一块不朽的功碑。主题充分表现了日本的残暴和不分男女老幼与日寇决死的斗争。”“技巧的纯熟，排练的逼真，都证明《突击》是一部好戏。”但也指出了布景方面的缺点，还说票价太高，不能争取下层群众。《突击》的编剧是塞克、萧红、绉弩、端木蕻良。塞克花的心血为最多。

十八日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在昆明成立。高竹秋被推为理事长，陈豫源、王旦东、刘海青、范启新等被推为理事。

二十日 《战地》在武汉创刊。这个刊物是以丁玲为团长、舒群为副团长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名义创办的。丁玲在延安，实际是由舒群主持编务。周扬在创刊号上发表《我所希望于“战地”的》，说要“把战地的活生生的材料、战地的气息，随着刊物带给我们，带给广大的读者。这应当是一个以战地为中心的刊物。战地通讯和速写应占它的主要篇幅。”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停刊。共出了六期。

二十五日 汉口市剧业剧人劳军公演团为筹款救济难童，举行公演，参加的剧院有十七家之多，动员人数三千以上。《新华日报》于二十六日出了特刊，刊登了田汉的《戏剧的荣光》、常任侠的《武汉戏剧界为保育儿童公演》、阳

翰笙的《大家来拥护这神圣的工作》、傅俊仪的《保育儿童与保育世界文化》、常任侠的诗《保育苦难的孩子》。田汉在文中说：“全武汉十七家中国戏园一日演出所得，全部捐给保育会为幼年的中国主人造福，这真足以为百业楷模，群伦倡导！”阳翰笙在文中说：“全市的同胞们，我们谁无子女？谁不对中华民族的将来负有责任？不要让制业剧人同胞专门于前，各以全力来拥护这神圣的工作啊！”演出取得了很大成功，获款八千元。

二十七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假汉口总商会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到五百余人，济济一堂。名誉主席团由蔡元培、周恩来、罗曼·罗兰、史沫特莱等十三人组成，主席团由邵力子、冯玉祥、郭沫若、陈铭枢、田汉、张道藩、老舍、胡风等十余人组成，秘书处由王平陵、冯乃超等八人组成，方治、鹿地亘、周恩来、郭沫若、冯玉祥、张道藩、陈真如等讲了话。周恩来说：“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诸位先知先觉，是民族的先驱者，有了先驱者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团结，象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凝固的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是第一点感想。其次希望作家多多取材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与战区敌人的残暴，后方全民众动员的热烈，一定可以发扬举国同仇敌忾，加强战胜敌人的信心！第三，在今天抗战过程中，我们还负有建国的任务。文学家应分布各战场，各内地，更多接触内地的人民生活，同时要承继祖先遗下的优秀文艺传统。第四，不仅是对抗战文艺，民族文艺，即对世界文艺，也负有重大的责

任。总理昭示我们，要我们迎头赶上，一定要能与世界进步的文艺联系起来，使我们的文艺在世界上也有辉煌的地位！”

会未完，已逾十三时，即在普海春叙餐。在宴会上，老舍宣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餐后，通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章》。下午大会还推举了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田汉、陈铭枢、老向、郁达夫、成仿吾、巴金、张天翼、王平陵、胡风、马彦祥、穆木天、盛成、冯乃超、张道藩、楼适夷、胡秋原、姚蓬子、吴组缃、陈西滢、陈纪滢、华林、胡绍轩、徐蔚南、沈从文、曹禹、郑振铎、朱自清、朱光潜、曹聚仁、黎烈文、许地山、夏衍、曹靖华、张恨水、沈起予、施蛰存、谢六逸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周扬、吴奚如、孔罗荪、罗烽、舒群、曾虚白、吴漱予、立波、立东平、艾芜、欧阳山、黄源、宗白华、梁宗岱等十五人为候补理事。通过的提案有请全国作家写士兵读物百种，组织作家前线慰劳队及慰劳空军难民儿童，组织全国文艺通讯网，设立通俗文艺工作委员会，向文化界捐献书报输送前线，组织文艺周会，创办机关杂志等。

为庆祝“文协”的成立，《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充分估价了文艺界团结的意义，指出了“文艺的大众化，应该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最主要的任务。”该报还出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特刊”，郭沫若的题词刊登在显著位置：

统一文艺阵线

巩固精神国防

《七月》也为成立“文协”发表了一组文章，计有陈绍禹的《用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博古的《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奚如的《感想和希望》、辛人的《为“扫除病

根”而斗争》、魏孟克的《由质到量的集中》。

三十一日 田汉和张志让以政治部宣传厅（即第三厅）名义为扩大宣传周事举行招待会，到党政军及各团体代表一百五十余人。主席田汉致词，张志让报告筹备经过及草拟计划，大家商讨筹备扩大宣传周的各项具体办法。会上推定了党政军及全国文艺界、电影界、戏剧界、歌咏界各抗敌协会、国民外交协会、国际反侵略中国分会、中国青年救国团、中国妇女慰劳总会等三十余团体为筹备会委员。宣传周定四月四日开始，后因故延至七日才开始。

同日 《抗战电影》在武汉创刊。唐纳在他写的《发刊词》中，对国防电影作了充分肯定，并指出“中国电影是在三次大的论争中成长起来的。”“第一次论争发生在‘一二八’之后，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第二次论争发生在一九三四年，给了‘眼睛吃的冰淇淋，心灵坐的沙发椅’的‘软性电影’论以致命的打击。第三次论争发生在一九三六年，环绕着国防电影的口号，而开始了电影领域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些论争的意义，由今天的新电影——直接反映抗战现实，并站在抗战现实之上——的产生得了解释。”还指出：“中国电影艺人已经准备好以开末拉来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新中国。”创刊号在“关于国防电影之建立”大标题下，发表了郑用之、端木兵斯、奔扬、罗静予、苏怡、杨霁明、史东山、袁丛美、适夷的讨论文章，此外还出了“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专辑”，包括大会宣言、筹备经过、成立情形、大会花絮。



## 四 月

一日 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厅长郭沫若，主任秘书阳翰笙。三厅设五、六、七处。第六处处长田汉，掌管艺术宣传，下设三科：第一科科长洪深，管戏剧音乐；第二科科长郑用之，管电影；第三科科长徐悲鸿，管绘画木刻。

完成了第三厅机构设置，人事安排等筹备工作，在确定三厅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上，阳翰笙和郭沫若商讨后，去请示周恩来。“恩来同志说，蒋介石撤走了刘建群，要郭沫若来主持第三厅的工作，目的是想利用郭沫若的声望去延揽社会贤达、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用三厅来为他装点门面，制造假象，掩盖他的法西斯一党专政。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既定方针是不变的，就是限制共产党和左派的活动。如果不按照他的主张办，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分化你们、破坏你们的团结，用升官发财来腐蚀你，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限制你的行动。如果这些都无效，你坚持宣传十大纲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他们可能采取断然措施，可能下毒手，甚至把你杀掉。因此，我们到第三厅去，不是去作官而是去工作，去斗争，去坚决斗争，而且是一种非常尖锐复杂的斗争，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性，要有很高的策略思想，不要那么天真，不要那么盲目乐观，工作是不会一帆风顺的，但也不要悲观。你们三厅的人要团结起来，要放手工作。”“对于党组织的活动方式，恩来同志指出，三厅的斗争非常尖锐、非常错综复杂，要充分提高警

惕。这是在国民党的军事机关里工作，党组织的活动方式也要适应这个特殊的环境。上面的主要干部成立一个党小组，三厅下面的党员另外成立一个支部，互相不要发生联系。万一发生了问题，就不致互相影响。一旦暴露了，这是个严重问题，这一点要千万加以注意。”“说到宣传方针，我问，他们那份‘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宣传大纲有没有撤销？恩来同志说，他们没有撤销，不过也没有重新提出来。看这个样子，他们是既不撤销，也不好再提，就这样挂在那里了。我们呢？他宣传他的，我们宣传我们的十大纲领，各人宣传各人的。对他们那一套，我们是不管、不理、不睬，怕他什么？”“恩来同志对我说，有些有清高思想的人，对第三厅的作用是估计不够的，要知道第三厅是个政权组织，政权组织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不能小看它。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要求改革政府组织，政权公开。国民党就寸权不让，死不公开，为什么？他就要搞一党专政嘛！我们如果有一个政权机构，哪怕是很小的机构，也可以利用它为全面抗战作许多事情。”“我们拿着三厅这个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义，组织团体到前线去，也可以到后方去，到后方大大小小的城市乡村去，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既可以宣传民众，也可以宣传士兵。”（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一〕，1980年《新文学史料》第4期）

同日 《自由中国》在武汉创刊，臧云远、孙陵主编。创刊号上发表了郭沫若的题词：“要建设自由的中国须得每一个中国人牺牲却自己的自由。每一个中国人把自己的奉献给祖国的解放。中国得到自由，则每一个中国人也就得到自由了。”二期发表了毛泽东同志为创办该刊的题词：“一切

爱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的中国而斗争。”出至第一卷第三期后停刊。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一日该刊在桂林重新出版，孙陵编，刊号为新一卷第一号。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出新二卷第一、二期合刊后终刊。

同日 《七月》第二集第六期出版，内载塞克、端木蕻良、萧红、聂绀弩集体创作之三幕剧《突击》。这剧的“设意”和“制出”，主要是塞克。这个剧写一九三八年初春发生在太原附近一个小村子里的抗日故事。塞克说：“《突击》的制作和演出，——是主要地向那些日本法西斯蒂，向那些惯用手榴弹与机关枪的强盗，提示着武士道和毒瓦斯是不能烧完全中国全人民的血、冤屈、仇恨，是不能摇撼全中国全人民唯一的自卫的向敌人突击的意志。”茅盾曾作书评《突击》，说“《突击》这三幕剧最大的优点就是真实，就是一点也不公式化。”

二日 武汉十一个团体假普海春举行欢迎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茶会。主席孙师毅，参加者二百多人。郭沫若在会上说：“我们欢迎鹿地先生和池田女士不仅因为他们日本反战作家而且因为他们人类的斗士。日本有许多作家都作了军阀的喇叭，像林房雄之类。和林房雄这些人比起来，鹿地亘先生是多么值得我们钦佩！”田汉、郁达夫、郑用之等人也讲了话。鹿地亘致了答谢词。他用具体事例说明日本正义之士对法西斯的痛恨，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预示了“坐在巨大的冰山上”的日本法西斯被打得粉碎“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四日 冯玉祥召集“文协”第一次理事会，胡风、郁达夫、王平陵、适夷、老舍、胡秋原等十五人被推为常务理事，老舍、华林为总务部正副主任，王平陵、楼适夷为组织

部正副主任，姚蓬子、老向为出版部正副主任，郁达夫、胡风为究研部正副主任。

七日 政治部第三厅主办的扩大宣传周第一日：文学宣传和开幕大会。正碰上台儿庄大捷，临时决定举行十万人的祝捷大会和火炬游行。

为搞好这个扩大宣传周，周恩来和三厅各处领导同志一道研究了多次，并作了重要指示。“他说，这次扩大宣传，一要扩大宣传的对象，二要扩大宣传的范围，要深入到劳动阶层中去；要到工厂农村里去，到前线，到战壕里去，去提高广大工农的抗战意识和鼓舞激励战士们的杀敌情绪。文字宣传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口头宣讲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艺术宣传要更加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恩来同志要求大家要注意各阶层民众觉醒和了解程度的不同和情绪的差异；针对不同对象提出易于触动他们的口号；街头标语要多用易于使人记忆的语句。无论漫画、电影、演剧都要使人看了听了印象深刻，难以忘怀；要使看戏的、听唱的感动得当场落泪，兴奋得矢志报仇。他还具体提出每个宣讲队都要做到本地人与外省人渗合组合，宣传要注意对象，指出他们能理解的情形，说出他们能懂的话，提出他们可以接受和可做到的办法。恩来同志还指示，应该印发小型的宣传刊物及画报迅速输送前方；必须派宣传队分赴前线去慰劳；必须募集药品和经费支援前线和伤兵；要作好救济儿童和救济难民的工作；而且还要使这次抗战宣传扩大到敌占区和敌人的队伍中去。”（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二〉，载1981年《新文学史料》第1期）

同日 “文协”在《新华日报》出《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特刊》，内载陈诚的《巩固胜利基础与争取光

明的前途》、郭沫若的《鲁南胜利之外因》、陈绍禹的题词、孟庆树的《反对日寇放毒杀人！》、王平陵的《光荣的台儿庄大战》、罗荪的《我们要争取更多更大的胜利》、宋云彬的《加紧团结取得最后的胜利》，以及适夷的诗《胜利的春天》。

同日 在武汉举行庆祝台儿庄大捷火炬游行时，一些进步文艺工作者开始了三幕剧《台儿庄》的蕴酿。这个剧为王莹、舒群、适夷、锡金、罗烽、罗荪六人集体创作，锡金、罗烽、罗荪执笔。这个剧没有特别注意人物创造，尽力表现的是故事。“所要表现的主题，是要说明台儿庄胜利的基本原因，是要说明这次胜利是一个开始，是一个开始在更艰苦的更英勇的斗争中争取最后的胜利的基点。”（罗荪《台儿庄》序）茅盾曾写书评《台儿庄》，说：“这里‘没有特别发展的写一个典型的人物’，但大多数人物是写得好的”，“是有个性的”。还肯定了“它避开了历史剧的手法，只抓住了台儿庄战役的中心意义在合乎事实的条件下虚构出一个故事来，它不从正面去描写炮火的场面，却从火线后的军民合作来指出这一典型事件的积极的意义。”

八日 扩大宣传周口头宣传日。云集武汉的许多民众团体自动到街头、工厂、各家各户去宣讲。这些民众团体是中国青年救亡协会、青年救国团、中国工人抗敌总会、蚁社、儿童救国团等。

九日 抗战扩大宣传周歌咏日。大会上午十时左右在中山公园市体育场举行，武汉十余个歌咏团体，千余人参加了会议。郭沫若主席，行礼如仪即演说。他说：“我们要用歌咏的力量，扩大我们的宣传！”田汉也讲了话。演说毕，全体唱歌，冼星海总指挥，张曙副指挥，军乐伴唱。歌咏毕，

即出发游行。晚在大光明戏院举行歌咏宣传大会。参加者十分踊跃，戏院已无法容纳。田汉说：“我们要为民族独立，抗战胜利而歌咏！”讲演完毕，节目开始。全体合唱《胜利开始》、无锡青年抗敌工作团唱《一齐上前线》、民族歌咏队唱《抗敌歌》、海星歌咏队唱《新中国》、量才歌咏队唱《女战士》、孩子剧团唱《游击军歌》……

十日 扩大宣传周美术日。阳翰笙回忆道：“大会是晚上在黄鹤楼举行的。黄鹤楼两旁展出了数百幅色彩夺目，激励人心的抗战宣传画。夜幕降临，探照灯放射万丈光芒，开始了画灯火炬游行。数百幅画，数百盏花灯点缀在火炬中间，有飞机灯，铁甲灯，国旗灯，巨大的漫画灯，形形色色，这游行真是又绮丽又壮观。两旁密密层层观众报以雷动的掌声。行列象火龙一般地通过各个主要街道，无数群众潮水一般跟随着行列，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慰问前方将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到晚上十点钟，一队队火炬来到江边下了船，开始了水上火炬歌咏游行。几百条船在江中展开了一幅壮丽的场面，火花灯影映在水面，激越的救亡歌声与滚滚江潮溶成一片。”（《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二〉，载1931年《新文学史料》第1期）

十一日 扩大宣传周戏剧日。洪深在《新华日报》发表《第二期抗战中的戏剧运动》，提出了四点看法：一、“抗战爆发之初，各地剧团、演剧队均系自发的组织，与官方殊少联系，且在各地工作，往往发生故障。其后随着统一战线之巩固与发展，戏剧运动渐能由官民分离，走上官民合作的道路。这是一个进步，然而这进步是不够的。抗战第二期的戏剧运动，应该随着抗战的新形式与统一战线的新发展，从

官民合作的道路更进一步地走上官民一体。”二、“必须培植大量的戏剧人材。”三、为“解决目前严重的剧本荒，首先必须有计划地与大量地供给大批新的剧本（包括话剧的与歌剧的）。”四、“改良旧的歌剧，培养改良旧剧的大量新干部，并创立抗敌歌剧队，从事移动公演，深入农村及战区，以补话剧之不及。”参加戏剧日演出的单位有：湖北学生抗敌工作联合会、青年妇女行动队、青年铁血抗敌剧社、汉市抗敌后援会宣传大队、湖北民众抗敌后援会、江浙青年流动宣传剧团、怒吼剧社、孩子剧团、湖北民众抗敌后援会怒吼剧社、新运剧团、中国旅行剧团、抗敌剧团、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上海剧团、首都抗敌剧团等。

十二日 扩大宣传周电影日。电影院全部放映抗战电影，同时还组织了几个流动放映队，把抗战电影送到平时看不到电影的穷乡僻壤去。当时的抗战电影还很少，只有纪录片《抗战特辑》（多辑）、《火中的上海》及史东山编导、魏鹤龄、舒绣文主演的《保卫我们的土地》。

十三日 扩大宣传周最后一天：武汉三镇大游行，计划六十万人参加。游行前一天，陈诚派人给郭沫若送了一封亲笔信，说有坏人破坏。阳翰笙回忆说：“游行这天，虽然天上下着细雨，可是成千上万的群众精神抖擞，兴高采烈地整队向集合地点涌去。在大会开始以前，聚在广场上的群众，身上已被雨水淋湿了，可是脸上露着兴奋的笑容，他们向化妆队、彩扎队欢呼。掌声、歌声、口号声交织成一片，情绪十分热烈。这时，突然拉响了空袭警报。我和郭老在主席台上感到愕然，怎么下雨天还有警报？与会群众并没有受警报的干扰，仍然情绪饱满，队伍没有动摇，他们等着宣布开大会。这时又响起了紧急警报，康泽带来的那个宪兵团长急不

可待地抢过话筒就宣布大会解散……就这样，这次事先充分组织好的几十万人大游行就被他们破坏掉了。”（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二），载1981年《新文学史料》第1期）他们拉的是假警报。

十六日 广州出版《文艺阵地》创刊号，茅盾主编。发刊词说：“我们现阶段的文艺运动，一方面需要在各地多多建立战斗的单位，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个比较集中的研究理论、讨论论题、切磋、观摩……而同时也是战斗的刊物。”还说：“要立一面大旗，大书‘拥护抗战到底，巩固抗战的统一战线’！”“这阵地上，将有各种各类的‘文艺兵’，在献出他们的心血，这阵地上，将有各式各样的兵器，——只要是为了抗战，兵器的新式或旧式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我们且以为祖传的旧兵器极应加以拂拭或修改，使能发挥新的威力。”创刊号刊载了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

同日 茅盾在《文艺阵地》发表书评《给予者》。这是由欧阳山、草明、车平、邵子南、于逢集体创作的中篇小说，车平执笔。其主题是“中国人民大众的抗战意志如何在压迫下、践踏下、侮辱下、欺骗下，沉郁而坚定地发展，终于达到‘由自己来担当’，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步；而这，是在主人翁黄伯祥的惨痛而平凡的经历上得到了形象的反映的。”技巧方面，茅盾指出了“大自然和无生物的拟人化”的特点，但也指出了弱点，“就是文字颇多不大简洁的地方，而且不很‘中国化’。”

同日 武汉木刻人联谊会开成立大会，马达、力群、卢鸿基等十余人到会。会上，推定力群、马达、卢鸿基、阿田、建庵五人为理事，并议决事多项。晚召开理事会，研究最近之工作：一、举办木刻研究班，本月二十五日开班；



二、五月一日举办木刻展览会；三、尽快出木刻壁报。

十七日 汉口文艺界在德明饭店招待英国诗人奥登和小说家伊粟伍特。二氏畅谈了对我国抗战的观感，还颂扬了我国军民的努力。奥登即席写了十四行诗《中国士兵》，田汉以旧诗一首和之。

二十六日 《七月》举行座谈会，到会有胡风、聂绀弩、吴组缜、欧阳凡海、鹿地亘、艾青、奚如、池田幸子诸人，座谈围绕旧形式的利用进行。欧阳凡海等肯定了对旧形式的利用。欧阳凡海还说：要站在批判的立场上来利用，“既然站在批判的立场，那么，我们利用旧形式的同时，不能不包含有对旧形式改造的一个侧面。”艾青说：“我自己对于利用旧形式这一口号是取怀疑的态度的。如其为了宣传不得不利用旧形式，我们也应该有利用的界限。宣传与文学是不能混在一起说的。我们的文学革命已这么多年了，一开始，它就否定了旧形式，现在如果又把旧形式肯定了，将来不是又要重新来一次否定么？”欧阳凡海认为：“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否定了旧形式，后来又回头来说要利用旧形式，是必然的现象，而不是开倒车。”吴奚如、鹿地亘等认为利用旧形式是为了宣传，“不是从文学的见地上出发，而是从一定的政治宣传的效果上出发。”吴组缜认为：“文学本身就是宣传的，文学和宣传不必分开来说，问题是在所宣传的对象。我们新文学作品所可宣传的对象只是一般知识分子。广大的知识落后的同胞，无法能被我们的作品所宣传，因此我们不得不使我们的文艺通俗化，以便能向他们宣传。”座谈记录以《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为题发表在《七月》第三集第一期上。

二十九日 《七月》举行座谈会，到会有胡风、端木蕻良、鹿地亘、冯乃超、适夷、奚如、辛人、萧红、宋之的、艾

青，座谈会围绕对《七月》的评价举行。具体内容有：一、“不肯让位”的精神；二、组织者和作家态度的形成；三、一个历史转换期的速写；四、同仁杂志一席办；五、东平片断；六、其它。大家对《七月》作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它“能在最艰苦的处境凛然屹立”，并且培养出了有影响的作家。座谈记录以《现实文艺活动与〈七月〉》为题发表在《七月》第三集第三期上。

下旬 夏衍到武汉向周恩来汇报《救亡日报》工作。周恩来“详细地问了报社的情况之后，问我：‘你们的报销八千份，占广州各报总销数的百分之几？’我一时答不上来。他说，当然，问题不单在销数，而在于读者敢不敢看你们的报和欢不欢喜看你们的报。你不是说和国民党有点关系的人不肯给你们写文章么？这就是一个问题。这张报纸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这一点就规定了你们的办报方针。办成象国民党的报纸一样当然不行。办得象《新华日报》一样也不合适。办成《中央日报》一样，人家不要看，办成象《新华日报》一样，有些人就不敢看了。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你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夏衍《巨星永放光芒》，载1978年3月2日《人民日报》）周恩来还问起救亡演剧队情况，夏衍说与郭沫若等商量后，打算把这些演剧队改组为第三厅直属的抗敌演剧队。“总理说，抗日救国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国共两党都有庄严的责任，可是国民党对抗敌宣传消极怠工，那么这分工作只能由我们担负起来了，

让这些演剧队有一块‘政治部第三厅’的招牌，用他们的钱，演我们的戏，唱我们的歌，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夏衍《周总理对演剧队的关怀》，载1978年《人民戏剧》第3期）

四月 战地服务队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召开支部大会，历时两天。周恩来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他精辟地分析了形势，讲明了任务，揭示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明确指出在联合抗日的过程中一定有斗争，而且会有很尖锐激烈的斗争，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并就如何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贯彻执行我党提出的民主、团结、抗战的主张，开展上中下层统战工作，实行全面抗战，全民抗战；如何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用以掩护和保存自己，坚持在国统区稳打稳地进行斗争，积蓄力量；如何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讲究政策策略，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问题作了全面而又具体的指示。”（左洪涛《周总理领导我们胜利前进》，载《周总理与抗敌演剧队》）

春 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在成都成立，发起人：吴雪、戴碧湘、丁洪等。

## 五 月

一日 云南文艺工作者抗敌座谈会更名为“文协”云南分会。会议在昆华民众教育馆举行，到各方人士六十余人。张克诚主席并致词，说明开会理由及筹备经过，张友仁、唐京轩、冯素陶、施章、楚图南、甘师禹等相继讲话。大会通过了简章，并选举了张克诚、杨季生、李剑秋、查宗藩、李家鼎、刘惠之、宋昉、甘师禹、唐登岷等为理事。

同日 《烽火》在广州复刊。《复刊献词》谈了我们的“想贡献个人的微薄的力量为前方的忠勇的将士和后方的义愤的民众尽一点‘呐喊助威’的职责”，创刊以来遇到的“种种意外的阻挠和困难”，及胜利的信念、坚定的勇气。“甚至在东战场形势改变；国军退出淞沪大上海完全沦陷以后，我们还竭力使我们的《烽火》燃烧在敌人的阵地，但我们的发行处却已经成为灰烬了，接着来的禁止和封锁，断绝了我们和许多作者读者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在中立区域里自由地扬起我们的呼声。但我们不愿让敌人永远窒息了它。现在经了一些时日努力的结果，我们又在自己的土地上重燃起我们的《烽火》。”“重新燃起”的《烽火》从周刊改为了旬刊，并扩大了篇幅。

同日 茅盾在《文艺阵地》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书评《八百壮士》。三幕剧《八百壮士》为丁里、宋之的、王余杞、陈凝秋、王震之、崔嵬八人集体创作，崔嵬、王震之执笔。茅盾说：“总起来，三幕剧《八百壮士》的成功之处，一在他能不为事实所拘束，且能将事实活用”，“二在它能注意人物个性的描写，并且创造了生铁蛋这个典型。在目前所有的关于‘八百壮士’的作品中，不能不以这篇三幕剧为最佳了。”

四日 “文协”会报《抗战文艺》创刊。编委会由王平陵、田汉、安娥、朱自清、朱光潜、成仿吾、老向、老舍、吴组湘、宋云彬、周文、郁达夫、胡风、胡秋原、茅盾、徐炳昶、姚蓬子、冯乃超、夏衍、陈西滢、张天翼、舒群、阳翰笙、叶以群、叶绍钧、适夷、郑伯奇、郑振铎、穆木天、锡金、钟天心、丰子恺、罗荪三十三人组成。发刊词说：《抗战文艺》的发刊是“树起一杆进军的大旗，在这面旗子之

下，我们号召全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为着强固文艺的国防，首先强固起自己阵营的团结，清扫内部一切纠纷和磨擦，小集团观念和门户之见，而把大家的视线一致集注于当前的民族大敌。其次把文艺运动和各部门的文化的艺术的活动作密切的机动的配合，谋均衡的普遍的健全的发展。并且我们要把整个的文艺运动，作为文艺的大众化的运动，使文艺的影响突破过去的狭窄的知识分子的圈子，深入于广大的抗战大众中去。”

五日 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文化界，声讨无耻附逆文人周作人。电云：

全国文化界公鉴：倭寇谋我，不仅侵占我土地，攫夺我经济，尤在永远奴役我中华民族。欲达此目的，必先毁灭我数千年传统之文化而代以奴才文化。此抗战以来，我全体文化界同人所深深痛感者。故皆淬砺奋发，誓歼蛮魔。乃阅最近之大阪《每日新闻》内载“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内容记倭寇对我民族施行“精神奴化”之一幕丑剧。参加此剧之其他汉奸，原不足责，所为异者，素以新文学权威著称之周作人及钱稻荪等，于北平陷落以后，不即避地远引，应如何深藏自珍，另图报国，或静候国军收复失地，乃竟面不知耻，不惜葬送过去之清名，公然附会倭寇，出卖人格。照片赫然，言论俱在，当非枉诬。诚我文化界之耻辱，亦国民中之败类者。请授鸣鼓而攻之义，声明周作人、钱稻荪及其他参与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以外，藉示精神制裁，至各汉奸通敌叛国之罪责，俟诸政府明正典刑可也。尚希我文化界及爱国同胞一致主张，是所至盼。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叩微。

六日 《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文化界驱逐周作人》，

指出“武汉文化界把这种文化败类驱逐出‘界’，实属应当。”还指出：“我们对于罪恶昭彰如周作人、钱稻荪等固应‘鸣鼓而攻’，对于以前辈自负，言论怪诞，或不问时事的‘学者’，也应在平时严加督责，使参加救亡，至少也要使他们保全文人气节，不致堕落到甘为敌寇效劳的汉奸。”

七日 力群为抗战木刻展览会发表了《我所要说的话》，指出“许多木刻作家一听到抗战的炮声，就勇敢的跑上战场了。”但是，“现在，在武汉工作的木刻者并不多，木刻家的大部份是在军队中，农村里……”，困难是很多的，然“在这种困难之下，我们的展览会居然和大家见面了。”他还说：“在目前，更多的人能爱好木刻，这是我所高兴的，但当大家象迎抱一个可爱的婴儿似的接近了木刻的时候，却不应该忘却苦心养育这婴儿的保姆的。”“这个婴儿的伟大的保姆是——鲁迅先生。”

八日 陈纪莹、碧野、李辉英、黑丁、罗荪、高兰、丽尼、锡金等人集会，讨论以诗歌、小说、戏剧形式表现“七七”以来前后方之情形问题。

十二日 “文协”云南分会召开会员大会，通过修正简章及工作纲领，还研究了出会刊、进行通俗讲演等问题。

十四日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查禁书报问题》，指出兰州、郑州、开封、长沙、衡阳、贵阳、福州、南昌、广西、武汉等地陆续出现查禁抗日书报、封锁书店的现象。这是“亟应有个解决”的问题。社论号召“各地书业公会或文化团体与文化机关”，“来争取自身的民主自由。”

同日 茅盾、郁达夫、老舍、冯乃超、王平陵、胡风、胡秋原、张天翼、丁玲、舒群、奚如、夏衍、郑伯奇、邵冠

华、孔罗荪、锡金、以群、适夷发表《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揭露了周作人参加日寇“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的事实，并指出“此种行动或非出于偶然”，是多年来“对中华民族的轻视与悲观”之结果。最后说：“我们最后一次忠告先生，希望能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奋发自赎”，“否则惟有一致声讨”，公认为“民族之大罪人，文化界之叛逆者。”

十五日 《戏剧新闻》创刊，吴激予编。该刊是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会刊。

中旬 “文协”召开理事会，名誉理事周恩来、于右任等均参加。老舍作会务报告，声称了会中办事的三原则：一、不许有大会成立即完事大吉的心理，必须多办事；二、积极推动各地方“文协”分会的成立；三、帐目力求清楚，花钱力求节省得当。“轮到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的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止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的在一块儿工作。他说，必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的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郭沫若报告了一件事：政治部与其他机关要办一个战时文化服务团，征集图书及创撰，分送前方。他希望“文协”帮忙，多捐书，多写书。

二十二日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抗战期中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指出“言论出版的自由，是增进民权的第一步，同时也就是发展民权的第一步。”“用需要统一来做夺

去人民自由的理由，实在没有懂得求得真正统一的正确道路。”社论说：“我们要求抗战言论的完全自由！要求目前混乱状态的查禁书报迅速停止！”

二十四日 武汉音乐界追悼本月九日在上海逝世的音乐家黄自。田汉、黄炎培、张曙、冼星海、章文宪等三百余人参加了追悼会。章文宪主持。田汉说：“黄自是最有青年气的音乐家，他学习音乐的动机是为民族国家，和一般的学院派音乐家不同。”他说黄自逝世是音乐界的一大损失。他还向音乐界贡献了两点：“第一，天才和环境的关系：一个天才的成就有他的条件，中国的各种天才很多，但有成就的只是个别的、偶然的不是普遍的。在今天的抗战中我们中华民族天才的女儿正好找寻发展的机会。第二，工作与团结的问题：目前歌咏界还有许多缺点，主要的是团结得不够，这是我敢对音乐界一个不客气的迫切要求……应该不分派别和感情，为着一个目标奋斗，才是今天追悼黄自先生的意义。”讲话后即演奏黄自遗作。肃穆的大会在悲壮之气氛中结束。

二十六日 文艺界、美术界、戏剧界、电影界、歌咏界、孩子剧团等团体在政治部第三厅开欢迎大会，欢迎国际学联代表柯乐曼、傅路德、雷克难、雅德。郭沫若主席并致开幕词：“今天我们欢迎最亲密的国际学联代表，他们虽只四个人，但实际等于带给我们四百万大兵，在前方给我们增加了无数的武器，给我们以无限的鼓励，提高了我们必胜的信念。我们艺术界没有什么作品可以贡献给我们亲爱的朋友们，但我们可以告慰的，是我全国人民，全国艺术界已团结起来，在为反法西斯侵略、为民族生存、国家独立而奋斗！”政治部第三厅代表范寿康、美术家代表艺专唐校长、戏剧界代表傅心一、电影界代表陈波儿、音乐界代表彭鄂



英、文艺家代表冯乃超及孩子剧团代表相继致词。柯曼乐、雅德致了答词。

二十七日 “文协”召开常务理事会，议定：一、为了联络、增强会员之间的感情，到中山公园开个联欢会；二、联欢会后即分组座谈；三、各部制定预算。

三十一日 老舍、胡风、宋之的，臧克家、艾青、姚蓬子等四十七人在中山公园举行园会，情况甚为热烈。

五月底 综合诗歌丛刊《五月》在武汉出版，诗歌工作社编辑。这是《时调》停刊后武汉和长沙诗歌工作者合办的诗刊，办刊方针与《时调》同：面向现实，服务抗战。

五月 教育部巡回教育演剧队成立。先是试办两队，后续有成立。《教育部巡回戏剧教育队暂行组织简章》曰：“教育部为谋戏剧教育之实施，抗战宣传之推进起见，特组织教育部巡回戏剧教育队。”“本队组织，分总务、宣传、教务、研究四组。每组设组长一人，干事一人至三人，助理干事三人至五人，均由队长就队员选派之。”“本队工作，以巡回战区，及边远省分乡村、流动施教为原则。”

五月 老舍、锡金、徐炳昶、老向、方振武、王平陵、蓬子、安娥、白桃、穆木天、冯乃超、王亚平、柳倩、田汉、宋云彬、罗荪、沙蕾、沙雁、胡绍轩举行座谈会，讨论通俗文艺问题。老舍要求大家“先谈谈士兵与民众所需要的通俗读物是否是一致这问题”。普遍认为“兵士本多来自田间，所以兵士与民众的生活有相同之处；不过，现在一在前方作战，一在后方作事，生活自然又有不同之处；所以写的时候应该注意这是给士兵读的，那是给民众读的。”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利用旧形式来制作新的东西？所谓旧瓶装新酒的问题。”大家认为：利用旧形式、旧瓶装

新酒，是必须的。田汉说：“我认为利用旧形式写新作，在目前是万分必要的。因为当前的政治任务是在争取最广大的群众来参加抗日战争，所以艺术作品也必须采取为大众所最熟悉的形式。”

## 六 月

五日 《新华日报》刊载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为响应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声讨周作人等的通电。曰：“全国文化界公鉴：五月五日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以北平文化人周作人、徐祖正、钱稻荪、文元模等附逆媚敌，参加伪组织所召开之‘更生中国建设座谈会’，特通电申讨。敝会同人对于该电意见，完全赞同，并认为周作人等之堕落，必非一时威力逼迫所致，而自有其事实来源。全国文化界应发动讨论，分析彼等思想发展之基础与线索，使全国人得知彼等何以面靦走上无耻的路途，更进一步号召全国文化人更扩大紧密的团结，为肃清文化汉奸而斗争，并积极参加抗战工作，竭尽一分国民的努力，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之建立。”

六日 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一百余人。主席张善子。主席致词说：“今天我全国美术界一致联合起来，其唯一的目的是在发扬美术的力量，使民族抗战的精神磅礴充实，以打倒侵略中国扰乱世界和平的日本强盗。”田汉致词说：“我们有一个最大目的，就是为民族生存而抗战。只有抗战胜利，中国民族才有生路。我们艺术家应认清这一任务，通过美术的手腕，来动员广大民众抗战。今天各个艺术家，都能在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的组织之下团结起来，

一定能表现出巨大的力量。”后即通过简章，推举蔡子民、冯玉祥、张道藩、郭沫若、田汉、陈树人、何香凝、叶恭綽、高剑父、滕固等为名誉理事，张善子、唐义精、徐悲鸿、唐一禾、汪日章、孙福煦、吴作人、倪贻德、段平右、郎鲁逊、周圭、伍千里、陈之佛、高龙生、叶浅予、力群、马达、罗寄梅、盛了庵、马绍文等四十三人为理事。此外，该会在成立期间，在武昌青年会举行抗敌美术展览会三天，展出作品二百多件。展出的作品，从题材看，有：关于增强必胜信念的、关于暴露敌人兽行的、关于军民合作的、关于发扬民族抗战的。油画、水彩画、素描、国画、漫画、版面等，各种形式均有。

十二日 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假培心小学开成立大会，到会百人左右。力群主席，并且报告了筹备经过；潘梓年、谢晋云、常任侠等致词。会后即通过了简章及宣言。大会推蔡元培、冯玉祥、田汉、胡风、唐义精等为名誉理事，马达、力群、少其、建庵、陈九、安林、卢鸿基、罗工柳、铸夫、赖少其、文云龙、沙清泉、李桦、李海流、鄧中铁等二十八人为理事。该会会员包括全国木刻家共一百零一人。开会时还设立了展览室，陈列了数百幅作品供参观，至者甚为踊跃。

同日 “文协”召开临时理事会，商讨了武汉在军事形势紧急时如何进行工作，并议定：会刊不能停，要为保卫武汉尽力，寻找财源等。

十四日 战时摄影服务团在武昌、汉口分别举行摄影展览，照片给观众印象强烈。据翌日《新华日报》载：“尤其是一个失去了父母的孩子，在路旁哭喊‘阿妈啊！’饿很了的失神的幼童，抱着一盆残饭的情景，使人最感动。但看了

前线士兵沉毅果敢的姿态，难童为将士编草鞋，青年们在难民收容所教歌，逃难妇女组织缝纫队等，都表示了我国旺盛民气。”这些照片都是摄影团冒极大危险摄来的。他们曾在广州、香港等地展出。

十八日 高尔基逝世两周年。《新华日报》发表了《高尔基逝世两周年》的社论，叙述了高尔基的伟大功绩和对中国的影响，最后说：“纪念高尔基逝世两周年时，我们就应该：（一）动员我们的笔杆，反对人类的公敌及文化的破坏者——法西斯主义及其走狗杀害高尔基的刽子手——托洛斯基匪徒，我们要消灭屠杀文化的凶手，要为高尔基复仇！（二）我们应该本着高尔基不屈不挠的精神，积极的参加一切的事业，为了真理，为了新人类的幸福而斗争！（三）最后，我国的文人，应该舍弃过去‘文人相轻’的旧观念，要学习高尔基的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更亲切地团结起来，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自由，及民生幸福，与我们的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阀及其走狗汉奸托派分子作坚决无情的斗争，以答报高尔基生前对我们的希望和同情！”同时，该报还出了“高尔基逝世两周年特刊”，载了凯丰的《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郭沫若的《高尔基万岁》（诗）、戈宝权译的《高尔基致中山先生书》、戈矛的《高尔基永远活在大众的心灵里》。

同日 “文协”发布《为时局告同胞书》，指出：“我们不仅要关心武汉安全，而且要保卫武汉安全。”为达此目的，“我们要站在全线的前线，在山西河南和皖南北，一致发挥攻击精神，使敌人不能集中兵力来进攻武汉。”此外还要扩大兵役、训练新军、发展生产，以及“充实和严密人民的组织和训练，组织难民从事生产和自卫”等等。“文协”还发布了

《为敌机轰炸广州告世界友人书》，叙述了日机轰炸广州给无辜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呼吁世界友人“起来，督促你们的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作严重的抗议，实行经济的军事的制裁，严禁把飞机、炸弹、汽油，以及一切军火和使用于战争的物质输送到日本，不借款与日本，不购买一切日本的货物，并请更广大的展开援华运动，多多的给予我们物质的和精神的援助”。这两个文献均载《抗战文艺》第一卷第九期。

二十六日 “文协”召开常务理事会，议决出五种通俗读物、协同戏剧界抗敌协会演剧宣传等。

## 七 月

一日 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成立，团长臧克家，副团长于黑丁，团员王淑明、田涛、田一文、伍乐、李石峰、鲁夫、武智仁、胡小翔、梅丽莎、曾克、张克刚、邹获帆、郑桂文等。该团主要任务是对前线士兵民众提供文化食粮，动员第五战区的文化人努力开展活动、与后方各文化团体密切联系，相互促进。

同日 戏剧界公祭第一个死于敌人枪弹下的戏剧工作者赵曙。他是抗敌剧团演员。台儿庄会战该团奉命出发，不料在随军撤离徐州时牺牲。追悼会有一千多人参加，由张道藩、阳翰笙、洪深、朱双云、唐槐秋、应云卫等主祭。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汉口市剧业剧人劳军公演团、抗敌剧团宣读祭文后，由抗敌剧团代表报告赵曙殉难经过。唐槐秋、应云卫赞扬了赵曙工作的努力和生活的严肃，并勉励戏剧界同人要继续奋斗。郑君里代表家属及抗敌剧团致谢词，并代表抗敌剧团同人向赵曙立誓，继续出发到前线去，完成赵曙志

愿。《新华日报》发表了悼念文章。一是赵戈今的《献上敌血作祭酒》，一是《赵曙同志略历》。

七日 “七七”周年纪念。武汉献金活动甚为热烈。献金台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献金的有各阶层人士，所献有纸币、金银首饰、医药用品等。八路军办事处全体人员也组成中共献金团，前来献金。周恩来亲自将他在政治部的一个月薪金二百四十元向管理员点明投柜。董必武、秦邦宪、邓颖超等六位中共国民参政员也亲将其七月份参政员全部薪金献出，每人三百五十元。后来毛泽东同志也来电捐献他作为国民参政员的一月薪金。献金台开始只六座，后又增设了十几个流动献金台。

八日 汉口全体剧业剧人共同举行献金公演。其启事曰：“今日举行献金公演，以演剧收入，不除任何开支，全数慰问出征军人家属及受伤官兵。恭恳各界人士踊跃购票，襄助此举。”主演剧目是洪深、龚啸岚的《新天河配》。这个剧分别在新市场大舞台、长乐大戏院、美成大戏院、宁汉等十个戏院演出。同日，《新华日报》还发表了《十二家歌剧戏院及二千演员职工敬告各界》，曰：“各位先生们！我们虽然是渺小的戏剧从业者，可是也知道‘匹夫有责’。‘七七’抗战到现在，除了演过四十八次劳军，以及救济难民，救济儿童等公演外，今天又共同举行这个‘慰问出征军人家属受伤官兵献金公演’。这一次是我们十二家戏院经营者捐出房租开支，二千多大小职员捐出一天薪酬勉力完成的。请诸位鼓励我们这点赤忱，踊跃购票，多买一张，就可以多慰问一位出征军人的家属或受伤官兵。”

十日 “文协”在汉口公园举行茶话会，到会四十人。总务部报告了会务及账目，出版部报告了会刊的情况。

十六日 “文协”在武汉三教街九号出版部举行第一次晚会，到会二十余人。大家在空袭警报中进行漫谈。曾谈到抗战文艺问题。“有人认为仅仅表面的，甚至公式主义的描写胜利和光明，是非现实的，而且斗争力量也非常薄弱。抗战是在最艰苦的道路上前进，在每一步往前跨去的行程中，都伴了最高的痛苦斗争。我们要写胜利，但我们更要写怎样才能接近和得到胜利。我们的光明是通过了重重的黑暗才得到的，倘写成一脚踢去便碰到光明，这是非现实的。但也有人认为不必过份强调黑暗面，容易使人陷入失望和悲观。”（《第一次晚会》，载《“文协”史料选编》第76页）发言的人有老舍、白薇、师陀、穆木天、臧克家、冯乃超、锡金、蓬子等。

十七日 聂耳逝世三周年。聂耳逝世三周年纪念筹备会发表《纪念聂耳》一文，指出“正当救亡歌曲兴起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一位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开路先锋”，还指出聂耳“遗留下来一、二十首优秀的作品，成了中国大众的精神食粮。”文章号召学习聂耳，积极参加歌咏活动，扩大歌咏与其他部门的合作，“忠实于创作的精神”。这“不但是应该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聂耳先生也正是和我们一样的常人。”《新华日报》出了“聂耳先生逝世三周年特刊”，发表了徐进迈的《学习聂耳先生》、覃子豪的《战争中的歌人》（诗）、唐纳的《忆聂耳先生》、张曙的《聂耳作品的历史性》、冼星海的《聂耳，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等。该报还发表了短评《纪念聂耳同志》，说“不应徒具形式，而应深刻去学习聂耳同志的精神。”

十八日 武汉音乐界举行献金音乐大会，地点：光明戏院。观众踊跃，挤得水泄不通。郭沫若说：“要保持精诚团

结的精神，更加团结起来，团结成钢铁一般”，“把所有一切的力量奉献给抗战建国，才能保证抗战的胜利，赶日寇出中国，建设灿烂的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参加演出团体有：励志社管弦乐队、武汉合唱团、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等，还有外国音乐家参加演奏。演奏内容分各省名歌、国际歌唱、抗战歌曲三种。参观券分三角、五角、一元三种。

二十一日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和《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并决定成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及各省市的图书杂志审查处。

二十六日 “文协”在武汉举行晚会，到会员二十余人，主要讨论“文协”总会迁渝问题。

二十九日 “文协”在中法比瑞同学会欢迎《泥脚的日本》的作者阿特丽女士。

三十日 老舍携“文协”总会印鉴入川。

夏 党中央根据周恩来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同志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

## 八 月

五日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文化界动员保卫大武汉！》，指出：动员一切文化人、一切报章杂志进行大规模的口头及文字的宣传；组织文化界的宣传、慰劳及救护等类的工作队，到战地去服务；积极发动各种青年、学生及群众团体的组织工作，并予以各种帮助；加强战时文化服务一类的组织，供给前线战士以精神上的食粮。社论还谴责了国民



党政府对民主的压抑。

九日 节约运动歌咏漫画火炬游行示威日。这是在武汉告急、一致动员保卫大武汉的情景中举行的。武昌公共体育场聚集了五千多人，计有抗战教育研究会、新安旅行团、东北救亡总会、群声、群蜂、青救、民先、业余歌咏队、业余歌咏团、海星歌咏队、怒涛歌咏队、三八女子歌咏队、军委政治部抗敌剧团第三队、武汉歌咏干部训练班、朝鲜民族战线联盟、朝鲜青年战时服务团等二十余歌咏团体。主席田汉致词：“节约运动并非是道德的运动，而实是一个政治运动……我们在今天要保卫我国唯一文化、政治、军事、交通的中心——武汉！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冼星海指挥歌咏表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后即游行，群情激昂。

二十日 贵阳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主席：贺寿萱，理事由民教馆、狼火、时代、浪潮、克强、华生、天下七团体担任。

二十一日 “文协”云南分会召开会员大会，决定补充理事，研究抗战教育，拟定纪念“九一八”的办法，邀请中学教员暑期讲习会会员联欢。

八月 第三厅将在武汉的上海救亡演剧队及其他戏剧团体进行改编，改编为十个抗敌演剧队及五个宣传队。第一队，队长徐韬、魏曼青，成员：原救亡三、四队。第二队，队长郑君里、吕复，成员：原救亡三、四队。第三队，队长徐世津、王负图，成员：武汉拓荒剧社。第四队，队长侯枫，成员：原救亡十一队。第五队，队长王梦生，成员：汉口一文明戏剧团。第六队，队长陆万美，成员：平津学生抗敌移动剧团。第七队，队长冼群、罗毅之，成员：武汉友联剧社。第

八队，队长刘斐章，成员：原救亡八队。第九队，队长徐桑楚，成员：原三厅歌舞团、武汉与长沙中学生。第十队，队长不详，成员：河南大学及开封与洛阳中学的学生。

抗战演剧队成立后，即受了两周以上的军事训练，学习陆军礼节，识别号音，使用枪枝等。周恩来曾到集训队作了长达四——五小时的形势报告，坚定队员抗战必胜的信念。在分赴各战区前，周恩来还召见了各演剧队党组织负责人，指示遇着重大问题可通过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向他汇报。

三厅向各抗敌演剧队发布艺术工作者信条：“一、吾辈艺术工作者，以抗战建国之目的结成此铁的文化队伍，便当随时随地提高政治军事的认识与训练；为此伟大目的之实现而斗争，一刻不容稍懈。二、吾辈当知艺术之良窳，直接影响宣传之效果。故当从工作中竭力磨练本身技术，使艺术水平因抗战之持久而愈益提高。三、吾辈艺术工作者不仅以言语文字或其他形象接近大众，尤当直接以身为教；盖艺术风格与艺术家之人格为不可分，抗战艺术运动尤然，要求每一工作者皆为刻苦耐劳沉毅果敢之民族斗士，沉毅故持久，果敢故能成功。四、吾辈艺术工作者的全部努力，以广大抗战军民为对象，因而艺术大众化，成为迫切之课题。必须充分忠实于大众之理解、趣味，特别是其苦痛和要求，艺术才能真正成为唤起大众，组织大众的武器。五，吾辈艺术工作者应知协同一致、为达成战斗目的之要素，艺术工作亦然。不仅一艺术集团内应协同一致，同时应集中艺术战线之各兵种于重要之一点，使能发挥无限之力量，收到伟大之战果。”

## 九 月

八日 “文协”在渝举行茶话会，四十多人参加。老舍、姚蓬子、王平陵分别报告了总务部、出版部、组织部过去的工作和拟定的关于将来的计划。

二十三日 一江春三楼礼堂二百余中外人士聚会，欢送武汉合唱团出国。这次出国是二十六人。出国之经费：一、由团员筹得；二、由团员私人关系去征募；三、用团体名义向各机关募集。在欢送茶会上，合唱团唱了十一只救亡歌曲。他们出国之路线是由新加坡、南洋各地、印度、以至于欧洲各地，再由美返国。除宣传日寇暴行外，他们还将沿途向国际人士和华侨募捐，用来救济难民、慰劳伤兵、购买军用品、捐助游击队。

二十七日 《新华日报》发表《十九集团军战场剧社武汉卫戍总部劳动妇女服务团访问记》，还发表了胡兰畦的《我们的生活》等文。胡兰畦组织的劳动妇女服务团，成立于上海。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是她们的赴部队做宣传工作的第一天。文艺宣传是她们的重要的宣传方式。后随部队撤离上海。三八年三月尾她们辗转到武汉，旋即扩大组织，增加了八人。文艺宣传也更为活跃。不久，以服务团妇女为主，成立了十九集团军战场剧社。他们演出的剧目有《大战东林寺》、《难民苦》、《活捉东洋兵》、《我们要反攻》、《觉悟的伪军》、《最后一条路》等。

## 十月

一日 四川省立剧校在成都开办，校长熊佛西。学校设有音乐、戏剧科，还设有剧团为学生作示范表演。校歌曰：“向前进，向前进，／我们是戏剧的铁军。／严守集团的纪律，／抱着火样的热情；／坚定志向，／勇往前进；／不怕崎岖，／不怕牺牲。／为戏剧树立新风格，／为教育创造新精神。／向前进，向前进，／我们是教育的剧人。／适应国家的需要，／推动时代的齿轮；／教化大众，／指示人生，／努力研究，／努力推行；／为戏剧开辟新天地，／为文化建设新长城。”校训曰：“本艺人热情，守军队纪律以；戏剧为教育，完心成里建设。”校歌与校训均为熊佛西制作，该校一九四一年被国民党政府解散。

二日 七七少年剧团举行募集寒衣首次公演，六百余人参加。七七剧团领队罗时慧说：“七七少年剧团的小朋友们，在救亡的大道上，是不肯落在旁人后面的。今天武汉非常危急的时候，前线将士的勇敢杀敌，是值得我们感动的。为了帮助前线军队作战，为了积极开展救亡工作，增加保卫大武汉的力量，七七剧团举行首次公演，以募集寒衣献给抗战的将士们……”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青年代表赵君说：“一、七七剧团的小朋友们，今天能为前方将士募寒衣而举行公演，我代表八路军办事处的青年同志们，向诸位致敬；二、我们八路军办事处在征集寒衣运动当中，首先节食献金，帮助前线将士英勇抗战；三、在目前武汉非常危急的时候，切

切实实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广大的宣传、组织、发动民众运动之下，使民众的力量充分发挥，才能把武汉保卫得住的！”演说毕，七七剧团即唱《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杀敌歌》等。歌毕即演《死里求生》、《太阳旗下》。

十日 戏剧节。“剧协”在渝举行盛大纪念会，五百余人参加。余上沅报告筹备经过，通过了征求抗战剧本、在都市和乡村开展戏剧活动等提案。戏剧工作者被编为二十五个演出队，分赴市区及近郊（中央公园、夫子池、江北、南岸、化龙桥、磁器口、小龙坎、菜园坝、大溪沟、高店子、红庙等）演出，形式有歌剧、街头剧、话剧等。演出持续到本月底。参加演出的单位有四川旅外剧人演剧队、怒吼剧社、国立剧校、怒潮剧社、南开学生剧团、七七剧团、中电剧团等。压轴戏是曹禺的《全民总动员》。参加这个抗战戏演出的有赵丹、白杨、舒绣文、顾而已、施超、魏鹤龄、高占非、王为一等。自二十九日到下月一日，在国泰剧院连演七场，场场满座，盛况空前。武汉、成都、广州等地也举行了第一届戏剧节的庆祝活动。

上旬 周恩来在武汉邦可花园茶座召开会议，内容：“给文艺工作者介绍国际国内形势，提出文艺要为抗日救国出力，把舞台当作炮台，把剧场当作战场。并且指出如果敌人占领武汉，就向后方撤退，决不替敌人歌舞升平。”（何仲勉《抗日时期周总理在武汉》，载1977年《湖北文艺》第2期）

十一日 演剧九队为募款购买防毒面具在青年会公演。节目开始是唱歌，唱了《抗敌歌》、《壮丁上前线》等。剧有《打鬼子去》、《火海中的孤军》等。助演的有青抗协会、三八女子歌咏队、业余歌咏团等。演出日夜两场。下午

一場观众七百多，楼上下全满。票价为五元与十元。

十二日 “文协”假中苏文化协会四川分会举行第一次重庆会员大会，到新旧会员七十余人。

十三日 庆祝朝鲜义勇队成立，举行盛大游艺晚会。在汉口的朝鲜人，为参加抗战，组织朝鲜义勇队，拟到前线做对敌宣传工作。游艺晚会在青年会礼堂举行。节目除朝鲜义勇队本身演出外，业余歌咏团、三八女子歌咏队、汉口市后援会宣传大队、汉口市青年抗敌协会、儿童保育院等也参加了演出。演出前朝鲜义勇队主席金先生致词：“不要看我们人少，朝鲜三千万民众都是我们的力量。不！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都是我们的力量！”游艺会演唱了《民族解放歌》、《自由之光》、《亚里罗》、《起重匠》、《赴敌》、《军民合作》等，剧有《光荣的牺牲》、《铁》、《北中国之夜》、《死里求生》、《图门江边》等。

十七日 九月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主办了留汉歌咏演员讲习班，是日是末次纪念周，他们已经毕业了。而且，戏剧界人士又趁是日补行戏剧节开幕礼。讲习班演员对于献金不遗余力。九月十八日，义演捐款一千余元，购奎宁丸一万五千粒，现又捐棉衣五百件。这具双重意义的会议由田汉任主席，到演剧四队和九队、七七少年剧团、朝鲜义勇队，还有旧剧界人士。郭沫若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外间常非难文化人唱高调，今日我们尚能举行戏剧界的会，至少表示未离岗位。”“各位在保卫武汉的阵地战上已经尽力，现在是要在运动战和游击战上努力，今后文化人应分散开来做宣传工作。”“敌人虽占领惠州，乃是极欲作军事的孤注一掷，企图以扩大战争来结束战争。但是，它忽视了华南的国际关系。它更进一步进攻，必受严重打击。”“最后，演戏而

成名角，成名人，必有他个人独特的精神，和努力的秘诀。当此之际，我们要舍得拼命，舍得干，继续努力，继续拼命。拼命研究政治问题，国际问题，将来所演戏，必有更大效果！”会后拍照留念。

十九日 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在武汉青年会举行。纪念会由“文协”和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召开。郭沫若主席，到会有周恩来、邓颖超、秦博古、田汉、潘梓年、任光、安娥、吴奚如、李岷源、陈农菲、叶以群、陈北鸥、郭镜人、吕霞光等数十人。主席致词说：“一般人把鲁迅先生看做文学家，小说家，其实不仅如此，鲁迅先生任何地方都是值得纪念的。我们在今天正同日寇进行激烈的战争时，我们更应该有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我们希望今天更能发扬鲁迅精神，使中国人都成为鲁迅，那么便不至有气馁、妥协之表现。”胡愈之、冯乃超、周恩来、秦博古、田汉等也讲了话。《新华日报》出了“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特刊，刊登了郭沫若的《持久抗战中纪念鲁迅》、田汉的《鲁迅翁逝世二周年》、吴克坚的《纪念伟大的鲁迅先生》、蒋弼的《并非照例》等文。周恩来的题词刊登在报纸显著地位：“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于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种伟大，是我们今日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

二十四日 自强读书社文艺组扩大组织，请“文协”指导。“文协”派魏猛克主办此事。二十四日文艺组举行第一次集会，老舍担任指导。

三十一日 “文协”主办的通俗文艺讲习会开班。何容、老向、萧伯清、老舍分别担任音韵、文艺宣传、音乐、技巧的讲授。学员二十二名。

十日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同月 白危写成《毛泽东断片》。作者在附记中说：“此文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延安会见毛泽东先生之后写就，其时因武汉危机，急于返汉，其中谈话，未经毛先生校阅，倘有出入之处，该由我负责。”访问记对毛泽东同志简朴的生活、和蔼的态度、模范的作用、渊博的学识等作了真实生动的描述，表现了对毛泽东同志衷心的热爱。后发表在《七月》第四卷第一期上。

同日 “木协”从武汉迁往重庆。鄧中诤在《早期木刻运动在四川》中说：“总会迁渝是政治地理决定的，抗战形势使重庆由一个僻远山城迅速变成了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当时在国统区的木刻作者，由于战争关系流散各方，在后方只有重庆还有点木刻运动的基础，还保持着阵地”。

同月 “文协”举行首次诗歌座谈会，到会有老舍、方殷、蓬子、袁勃、厂民、鲜鱼羊、孟克等十余人。讨论座谈会的工作性质，并认为有出版诗刊之必要，最后还交换了对于诗歌的一些意见。



同月 《每月新歌选》在桂林创刊，林路主编。

秋 魏孟克在重庆文化座谈会上代表“文协”研究部作了《抗战以来的中国文艺界》的报告，全文分四部份：一、“作家们的动态”。回顾了北京、济南、上海、武汉的文艺运动。二、“创作上的倾向”。指出抗战开始以后，“结构极为庞大的作品渐不多见了，已大底属于短小精悍、富有煽动性的速写和随想——即所谓报告文学和杂文一类；就是戏剧及诗歌，也往往取着报告的体裁。”三、“通俗文学的重新提出”。认为这是“必须担负起来”的“一个重大的任务”，当然，“我们的利用，决不是没有条件，不但要涤除其毒质，并且还要将优点蜕变，使它将来本身也就是一种新艺术。”四、“大众作家的发现”。批评了“有些人们还在轻视大众的才能”，肯定了“在大众中大有文艺天才在。”该文后发表在《抗战文艺》第二卷第六期上。

## 十一月

四日 “文协”出版部在会所召开临时座谈会，到会有姚蓬子、黄芝冈、魏孟克、华林、方殷、老舍、金满城、陈凤兮、宋之的、葛一虹、梅林、王平陵、端木蕻良、戈宝权、胡绍轩、向林冰。大家谈道：“我们必须使沦陷区的抗战力量更加充实坚强起来，聚歼敌人于中国的腹地。”指出：应从交通上“打破联络上的困难”，加紧联系。还说“文协”应该成为“我们的后方”“一个指挥各沦陷区域的文艺工作的中心机关”，还具体指出要做到“1. 研究各沦陷区域的工作情报。2. 制定各沦陷区域的工作方针，替各区域的工作人员交换工作经验，供给读物。3. 广大的动员文艺工作

者到各沦陷区域工作。”还指出要揭露敌人的欺骗宣传，要暴露其罪恶。座谈会由方殷记录，经孟克整理后，以《建立沦陷区域的文艺工作》为题发表在《抗战文艺》第二卷第十一、十五期合刊上。

五日 教育部第三巡回戏剧教育队在国立戏剧学校举行成立典礼。队长虞文、副队长王勉之。全队二十来人。余上沅致词：“第一、救亡宣传同志们要言行合一”；“第二、我们固然负有教育民众的责任，但还应该虚心地向民众学习，向工作学习；”“第三、要灵活地运用一切适合群众口味的形式，以不妨碍新的内容的发展为原则地表演出，才能收得很好的效果。”第三巡回戏剧教育队成立不久，即假演武厅社交会堂举行公演（同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公演剧目为《模范富翁》、《张家店》、《壮丁》。公演时还展出了七十余幅宣传画。

六日 “文协”在永年春举行茶话会，招待通俗文艺讲习会学员及新近来渝之理事，并报告会务。

十二日 在长沙，夏衍向周恩来汇报广州失守后《救亡日报》的情况。周恩来指示说，“《救亡日报》的事，到桂林后再和你联系，现在先交给你两个任务”：第一，到桂林，“立即自筹经费，赶快恢复《救亡日报》，建立宣传据点。”第二，“目前战事紧张，散在各地的演剧队不可能和三厅保持联系了，在桂林的《救亡日报》是一个公开合法的报纸，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由你和各演剧队保持联系，你能解决的就帮他们解决，不能解决的，通过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向南方局请示。”（夏衍《周总理对演剧队的关怀》，载1978年《人民戏剧》第3期）

十二日 “文协”召开理事会，议决：一、各地分会宜

积极成立；二、继续办通俗文艺讲习会，先设戏剧与小说两组。

十三日 方殷、厂民、梅林、袁勃、鲜鱼羊、猛克、蓬子等举行诗歌座谈会，讨论组织问题及一年来之抗战诗歌。老舍、老向等出席在开智小学召开的通俗文艺座谈会，并进行指导。

中旬 长沙湘剧抗敌宣传队离开长沙。一队拟往醴陵，二队拟往湘潭，三队拟往衡阳。长沙湘剧抗敌宣传队是十一月初田汉到长沙时在湘剧班的基础上改建的。“各队出发那天，恰好是孙中山先生诞辰。郭老和田汉同志一早就将从战区撤下来的文化服务队、演剧队和长沙湘剧抗敌宣传队合于又一村教育会坪，举行一个简短的纪念会，请周恩来同志讲话。那时，长沙已是风声鹤唳，疏散工作紧张而忙乱。但周恩来同志却从容不迫，他趁这个机会，勉励文艺工作者到乡村去，到人民大众中去，运用文艺这一武器，宣传、动员群众坚持抗战救亡。同时，还给步行的人作了详尽的行军指示。他要大家特别注意敌机空袭，队伍不可密集，要保持相当的距离，时时照管空中。发现敌机，迅速隐蔽。”（魏杰《为作全民战 动员到菊部》，载1983年《抗战文艺研究》第5期）

中旬 在长沙，吕复代表演剧二队去水风井找郭沫若，遇周恩来。吕复提出不愿去江西国民党军队中工作的要求。周恩来“打开地图，指着江西省说道：江西可是个好地方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那里创立了红军，发展壮大了红军，群众基础很好。你们还是应该去，这地方需要我们去宣传，把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以及同群众的切身关系，用歌曲、戏剧等各种文艺形式去扩大宣传，你们到战地前线去，要到

士兵中去，也要接触农民，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战主张。我们要占领更多的文化宣传阵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你们应该拿出革命的勇气，大胆地去锻炼。你们去过台儿庄，你们经历过徐州突围，还怕什么？我相信你们能够克服困难，深入前线，随军行动。你们要服从革命的需要，要学会独立作战。今后，如果遇到特殊困难，可以就近找八路军办事处。在必要的时候，我会派人来找你们的。”（吕复《周总理对“演剧队”的亲切教诲》，载1978年3月4日《文汇报》）

二十三日 中苏文艺研究会举行筹备座谈会。出席者有张西曼、谢大祺、舒舍予、姚蓬子、宋之的、孔罗荪、魏孟克、沈西苓、高磷度、沙梅、盛家伦、艾寒松、赵铭彝、姜公伟、鄧中铁、袁孟超、葛一虹、戈宝权、塔斯社社长罗果夫、亚洲影片公司经理谢雅江等二十余人。主席袁孟超致词说：“该会将集体研究苏联之文学、戏剧、电影、音乐及美术等，介绍于国人之前。同时并将我抗战期间之文学戏剧艺术，介绍于苏联人民之前。”继由葛一虹报告该会成立经过，戈宝权报告工作方针。罗果夫及谢雅江也相继演说。翌日，中苏文艺研究会正式成立。该会共分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五组。每组各设正副组长一人。文学组为戈宝权、罗果夫，戏剧组为余上沅、宋之的，电影组为史东山、谢雅江，音乐组为盛家伦、安娥，美术组为魏孟克、鄧中铁。任期半年。参加委员会者，有张西曼、谢大祺、袁孟超等三人。

二十五日 “文协”举行诗歌座谈会，到会有厂民、老舍、方殷、何容、李华飞、梅林、长虹、蓬子、孟克、袁勃、鲜鱼羊、程铮等。讨论题为“我们对于抗战诗歌的意见。”老舍说：“今天抗战诗歌的任务，我认为有三方面：

一、在感情上，激发民众抗战情绪。二、在技巧上，不论音节文字要普遍的使民众接受，普遍的激励民众。三、思想上，正面发展抗战意识，反面检出汉奸的倾向。廿年来的新诗没有什么成绩；在情绪方面，多数诗人还多注意个人情绪。”“文字上，因为廿年来的新诗一开始即是打倒旧诗，另起途径，好处是形式多变化，但多不简练，音节也不响亮。”厂民认为，抗战诗歌的缺点是：一、口号标语化；二、软弱无力。“到今天为止，我们见到了多少描写战斗生活的逼真动人的诗歌了呢？”第三、感伤气氛太浓。鱼羊说：“我以为一个诗人，首先应该有正确的世界观，这是思想方面。感情方面，应该有实际的生活经验。技巧方面，五四运动固然废除了旧诗，但无形中却又承接了它的短处。”记录稿以《我们对于抗战诗歌的意见》为题刊登在《抗战文艺》第三卷第三期上。

十一月 老舍通俗文艺集子《三四一》由独立出版社出版。包括三篇鼓词：《王小赶驴》、《张忠定计》、《打小日本》；二簧戏四篇：《新刺虎》、《忠烈图》、《王家镇》、《薛二娘》；旧型小说一篇：《兄妹从军》。作者在小序中写道：“这八篇东西，都是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写成的。‘旧瓶新酒’这问题的讨论已有不少，我不想再谈什么。我只愿作出几篇，看看到底有无好处。不动手制作而专事讨论，恐怕问题就老悬在那里，而且也许还越说离题越远了。”

## 十二月

一日 梁实秋在《中央日报》的《平明》副刊上发表了《编者的话》，说：“我老实承认，我的交游不广，所谓‘文坛’我就根本不知其座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还说：“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于抗战有关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准都没有益处的。”

三日 “文协”襄阳分会成立。陈北鸥、臧克家、胡绳、彭澎、白克、江陵等被选为理事。

同日 罗荪作《“与抗战无关”》。该文写道：“梁实秋先生希望写文章的人，不必一定‘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尽可以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但又要求‘要真实’。是的，一个忠实于现实的写作者，他是不应该也不能忘掉‘真实’的，但在今日的中国，要做一个作者既忠于真实，又要找寻‘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依我拙笨的想法也实在还不容易。除非他把‘真实’丢开，硬关在自己的客厅里去幻想吧。”作者认为梁实秋是在压冷门，但“这个冷门怕是压空了的。”后这篇文章发表在五日的《大公报》上。

六日 梁实秋在《中央日报》发表《“与抗战无关”》，反对罗荪《“与抗战无关”》。梁实秋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一）于抗战有关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二）于抗战

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还说：“在重庆住房子的问题，像是与抗战有关了，然而也不尽然。”文章最后说批评者涉及了对私人“无聊的攻击”、“恶意的挑拨”，表示不愿“奉陪”了。

九日 罗荪作《再论“与抗战无关”》，驳梁实秋房子问题也“不尽然”与抗战有关的议论，揭露“一二·九”学生运动不久梁实秋就在他主编的《自由评论》发表了很多媚外“伟论”的事实，还愤慨地说：“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也要为祖国的抗战服务，要为祖国的抗战献身，要把一切工作成为有利于祖国抗战的工作，要把一切人力成为有利于祖国抗战的人力！然而梁实秋先生抹杀了‘抗战八股’；抹杀了今日抗战的伟大力量的影响，抹杀了存在于今日中国的真实只有抗战，抹杀了今日全国文艺界在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抗战文艺。”

十四日 “文协”与通俗读物编刊社共同召开通俗文化运动座谈会，到会二十余人。会议对抗战以来的通俗文艺的状况及前途讨论甚详。

十五日 “文协”举行诗歌座谈会，到会有胡风、孟克、黄芝冈、程铮、沙蕾、厂民、袁勃、方殷、鲜鱼羊等人，讨论题为“抗战以来诗歌创作之检讨”，以抗战后的诗为例说明好的和坏的倾向，并深入到诗的特质问题。

二十日 上海《文汇报·世纪风》发表了《我们对鲁迅风杂文问题的意见》，大致内容是：反日反汉奸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不能因争论鲁迅风问题而影响这个首要任务，主张通过座谈会解决争端，停止争论；鲁迅是伟大的，其杂文的幽默讽刺风格，不仅过去、现在，就是将来也有伟大价值；应作自我批判，态度要真挚而严肃，讨论问题要心平气和；

希上海文艺界更紧密团结，负起重任。这个公开的意见书被认为是关于“鲁迅风”争论的小结。签名的有应服群（林淡秋）、孔另境、黄峰、关露、杨帆、司徒宗（孔令杰）、石灵、陈骏、文载道、周黎庵、钟望阳、柯灵、辨微（周木斋）、蓝烟、舒岱、江浙离（蒋炳勋）、列车、（陆象贤）、华铃、洛蚀文（王元化）、蒋天佑、拓荒、叶蒂、栖桦、岳昭（戴平万）、鹰隼（阿英）、郭源新（郑振铎）、白曙、齐明、唐弢、美懿（梅益）、巴人（王任叔）、叶富根（于伶）、莫思、宗珏（卢豫冬），共计三十四人。发表意见书之前，即同月七日，孙一洲（孙冶方）就在《译报周刊》上发表了《向上海文艺界呼吁》的文章，呼吁互相劝阻自己的战友勿作精力浪费，肯定鲁迅风的杂文是“最厉害的工具”，指出争论显示出文艺界统一战线的薄弱，决不能因争论而削弱甚至分裂了队伍。

二十一日 怒潮剧社举行《中国万岁》义卖日，地点：国泰大戏院。日夜二场观众甚为踊跃。《新华日报》载：该剧社“由全体社员捐资购买广播数千只及梅花等，由演职员化装下台义卖，全日二场共得国币五百余元。夜场除义卖广播外，还将剧中老农妇及青年农妇用以砍死两日兵之菜刀斧头，及日兵之钢盔日章旗拍卖（按该两物是我前线英勇将士之战利品）。结果钢盔与日章旗由国民参政会共产党参政员吴玉章及合格服装公司经理丁文浩君各以两百元购去，菜刀与斧头由税鸿元小姐范合言君各以廿元购去，计共捐得一千零八元四角六分，将与票资收入合并捐献政府。”

二十三日 “文协”宜昌襄樊分会成立，到会七十余人，推选臧克家为总务股股长，姚雪垠为习作指导股股长，孙陵为出版股股长，田涛为研究股股长。



二十九日 “文协”云南分会在昆明会员假昆华民众教育馆桂香楼热烈聚会，欢迎茅盾抵昆。楚图南致词，茅盾演讲，题为《统一战线与基本工作》。《云南日报》发表欢迎文章，题为《敬献给茅盾先生》，给茅盾以崇高评价，并希望“以他的血和乳，来喂养我们，领导我们‘学习鲁迅’”；“还有待于茅盾先生的‘老将出马，以一当千’，更有待于茅盾先生的‘培育新人，扶掖后进’”；“分出一部分心力在文艺的写作方面，尤其在文化工作方面，能够给我们以正确的指示和积极的指导。”

十二月 老舍代表“文协”起草给《中央日报》的公开信，对该报发表梁实秋挑衅性的语言和有违抗战文艺宗旨的议论提出抗议，同时对梁实秋进行了严词批驳：“梁实秋先生之《编者的话》中，竟有不知文坛座落何处，大将盟主是谁等语，态度轻佻，出语倨薄，为抗战以来文艺刊物上所仅见。”“梁实秋先生个人行为，有自由之权，本会也无从干涉。唯对于‘文坛座落何处’等语之居心设词，实未敢一笑置之。在梁先生个人，容或因一时逞才，蔑视一切，暂忘团结之重要，独蹈文人相轻之陋习，本会不欲加以指斥。不过，此种玩弄笔墨之风气一开，则以文艺为儿戏者流，行将盈篇累牍争为交相诋诮之文字，破坏抗战以来一致对外之文风，有碍抗战文艺之发展，关系甚重；目前一切，必须与抗战有关，文艺为军民精神食粮，断难舍抗战而从事琐细之争辩；本会未便以缄默代宽大，贵报当有同感。”由于张道藩的干涉，此信未能发表。

同月 陶行知在桂林为少年儿童召开了一次大会，请到桂的郭沫若演讲。到会有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厦门儿童剧团、广州儿童剧团、桂林少年剧社、广西实验小学，以及

李克农、李济深、夏衍、金山、王莹等。郭沫若热情赞扬了少年儿童离别父母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爱国精神，还说现在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是上一代不如下一代。

同月 中华全国漫画家抗敌协会由武汉迁到桂林。

## 一九三九年

### 一月

一日 渝文艺界扩大抗敌宣传，中国文艺社举办美艺展览，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举行街头剧表演，全国木刻界和漫画界合办展览并出特刊，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举行大规模演奏会，中央摄影场及中国制片厂组织放映电影……其内容大体是节约献金，鼓励兵役，铲除汉奸，表扬忠烈，持久抗战，募集寒衣。

同日 重庆戏剧界为纪念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一周年，动员二千多人火炬游行，游行中表演了《自由魂》、《民族公敌》、《群魔乱舞》、《怒吼吧中国》、《为自由和平而战》、《全民总动员》、《最后胜利》等剧组成的《抗战建国进行曲》，同时还表演了高跷、耍龙、舞狮等。

二日 “文协”云南分会借昆华民众教育馆桂香楼召开联欢会。茅盾应邀参加。同日下午，云南大学文史学研究会邀请茅盾讲演，讲题是《抗战文艺的创作与现实》，听众颇多。主要内容是：现在有光明及黑暗两面，文艺工作者需两面切实把握，从黑暗中衬出光明，从光明中暴露黑暗；文艺创作需深切体验人生社会，使之印象化，从印象中，抽出共同点，再加上个性的成份，成为一典型的人物或事象，所谓伟大作品，不一定是将抗战诸现象均描写无遗，只需选择最精采之一角，加以描写，能反映出全体即可。

六日 华北同学工作队演出陈白尘编剧、沈浮导演之四幕剧《〈群魔乱舞〉》，在国泰大戏院连演三天。这是渝各界抗敌后援会战时服务团为募集前线抗敌将士鞋袜特邀演出的。观众异常踊跃。八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署名江写的《〈群魔乱舞〉观感》，认为这个剧的成功，“主题的积极方面的意义，（号召广大民众打击汉奸傀儡民族叛徒），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人物的创造，自然也是使剧本得到成功的一个原因。演出方面，无论导演、演员、布景、灯光、效果，都有相当可观的收获”。

八日 “文协”云南分会召开会员大会，分会所属各部报告工作，改选理事。除穆木天、朱自清、施蛰存、沈从文四名总会理事为当然理事外，选举了理事二十七名：冯素陶、赵图南、杨季生、顾颉刚、方刚、刘惠之、张克诚、张友仁、彭惠、陆晶清、马子华、徐梦麟、迟习儒、李剑秋、徐炳昶、吴晗、陈豫源、杨东明、李生庄、李乔、彭桂萼、马鹤麟、杨一波、赵祖武、辛毓庄、王子政、宋素先。候补理事十三人：王秉心、雷溅波、张镜秋、冯至、汪梦九、唐登岷、杨亚宁、甘汝棠、谢冰心、张增智、梅绍农、赵生百、任孝慈。

十日 “文协”举行扩大诗歌座谈会，到向思广、鱼羊、李惠元、姚蓬子、唐积庆、安娥、葛一虹、方殷、袁勃、梅林、沁吾、厂民、程铮、孟克、赵象离、沙雁、胡绍轩、贺绿汀、胡风、夏祿堃、唐泉、高兰、李辉英、沙梅等。讨论题为“诗与歌的问题”，由胡风提出关于诗的报告《略观抗战以来的诗》，贺绿汀提出关于歌的报告。报告后，出席者就诗与歌的诸问题，发表了很多意见。

十四日 “文协”成都分会成立。到冯玉祥、老舍、李

劫人、谢文炳、周文、罗念生、周太玄、熊佛西、叶雄、任钧、邓均吾、陈翔鹤、刘盛亚、刘开渠、葛保华、肖军、朱光潜、郭子雄、顾绶昌、肖蔓若、陶雄、毛一波等六十余人。周文报告筹备经过，冯玉祥代表总会致词，老舍报告总会情况。大会通过数则重要提案。李劫人、周文、肖军、罗念生、谢文炳、刘开渠等被选为理事。

十九日 曹禺、应云卫、史东山、沈西苓、宋之的等二十余人在国泰饭店举行座谈会，并借此欢迎新来的阳翰笙、郑伯奇、万籟天、郑君里诸君。

二十三日 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重庆分会为义卖献金假演武厅社交会堂公演。公演剧目有话剧《菱姑》、三幕剧《国旗飘飘》。参加演出者均系有经验之演员。演出收入，悉数捐献。

二十五日 孩子剧团为纪念“一·二八”公演，是日招待各机关团体及新闻界，《新华日报》为孩子剧团辟了专栏。戈宝权发表了《写在孩子剧团公演之前》，称赞孩子们“所表演的戏剧，也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弦，感动多少人落泪，和激起多少人去舍身卫国！”还发表了吴新稼写的《关于纪念“一二八”的公演》、孩子剧团的《为纪念“一二八”写给全国小朋友的一封信》、《“一二八”纪念给前线将士的信》、以及何忆嫔的诗《纪念一二八》、范钦宪的短文《“孩子们，动员吧”！》。公演的节目有国歌、歌咏、儿童舞、水兵舞，《不愿做奴隶的孩子》、快板、《捉汉奸》、《梨膏糖》、《帮助咱们的游击队》、独唱、《孩子血》。公演地点：大梁子一园。

同日 “文协”举行茶会，到会四十余人。王礼锡报告欧州文艺界同情中国抗战之一般情况，郑伯奇报告西北文艺

界近况，老舍报告成都分会成立经过，阳翰笙报告华南及上海文艺界的情况，王平陵报告各地组织分会的情形。

二十七日 “文协”理事会议决函聘留居香港的许地山、戴望舒、欧阳予倩、简又文、楼适夷等积极筹备“文协”香港分会。

## 二 月

二日 “文协”理事会决议：函知陈西滢理事，推动嘉定文艺工作；函知楼适夷理事，设立“文协”香港办事处；指定王礼锡、戈宝权、徐仲年、胡风为筹备员，王礼锡负责召集，组织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

四日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加紧沦陷区的文化工作》，指出敌后急需大量文化工作人员，号召从事救亡工作的文化人到敌人后方去。

五日 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借中央公园举办露天音乐会。参加者数千人。先由郑用之致词，接着邵力子讲话，然后就开始了音乐会。中电表演了救亡歌曲二十余首，孩子剧团表演了十余首。中有独唱、对唱、齐唱、二部及四部合唱。孩子剧团的《石榴青》、中电的《游击队》最熟练。《募寒衣》、《上战场》等四部合唱最佳。《流浪儿》也颇为别致。

六日 “文协”举行诗歌座谈会，到会有戈茅、袁勃、胡风、王礼锡、方殷、何容、厂民、王平陵、程铮、赵象离、安娥、孟克、老舍、鱼羊等。这次为工作讨论会，决定出版诗刊，并议到了编辑方针。

十日 《新华日报》登载“文协”决议：一、成立图书

室，着手购置及捐募书报杂志；二、组织座谈会；三、加强与各团体文艺活动之联系。

同日 重庆市成立戏剧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市党部、市政府、宪兵三团、警备司令部联合组成，负责审查戏剧、电影及管理剧场等。

十六日 “文协”成都分会会刊《笔阵》创刊。陈翔鹤、顾绶昌、肖军任常务编委，李劫人、邓均吾、罗念生、毛一波、曹葆华、叶菲洛、任钧、周文为编委。终刊时间是一九四四年五月五日，共出了三十期。

二十五日 《抗战文艺》第三卷第十一期出版，载理事会决议：因通俗读物委员会委员穆木天等不在重庆，因此推黄芝冈、马祖武、向林冰、阎哲吾、李一非等十六人为委员，由老舍召集会议。还载了“文协”诗歌座谈会发布的重要启事：一、出诗刊《抗战诗歌》；二、征求抗战以来各种诗歌作品。

二月 “文协”成立小说座谈会。欧阳山、徐盈、罗烽负责。第一次会议出席者有王平陵、谢冰莹、欧阳山、草明、梅林、郑伯奇、崔禹秋、宋之的、胡风、杨骚、罗荪，会上决定了工作方针，推定了七人组成小委员会，负责对抗战以来的小说、报告、通讯等进行总结，并起草介绍到国外去的论文。

同月 “文协”国际宣传委员会举行首次谈话会，到王礼锡、王平陵、戈宝权、郑伯奇、安娥等人，决致函世界各国文学团体及文学杂志，致谢世界对中国抗战表同情的诸作家，并计划系统介绍中国抗战文艺运动及作品于国外，还加聘林语堂、谢寿康、肖石君为驻法代表，熊式一、苏芹生为驻英代表，肖三为驻苏代表，胡天石为驻日内瓦代表。

## 三 月

一日 “文协”举行诗歌座谈会，到会有罗烽、蓬子、安娥、孙铤、李华飞、陶生、袁勃、鱼羊、程铮、胡风、王礼锡、老舍、常任侠、方殷、何容、厂民、沙蕾、杨骚、贺绿汀等。孙铤、陶生谈了对于座谈会的感想后，讨论了工作，推定了《抗战诗歌》七人审稿委员会，又推定了七人组织小委员会，负责检讨抗战以来的诗歌成绩并起草介绍到国外去的论文。

同日 “文协”成都分会在罗念生宅举行文艺晚会，四十余人参加。晚会节目有朗诵诗歌、散文、希腊文，还唱了中、英、俄文歌及表演了大鼓、昆曲、平剧等。

九日 渝市各界第二期抗战第一宣传周艺术宣传大会开幕。参加表演的有孩子剧团、业余歌咏团等。地点在社交会堂。翌日参加演出的有怒吼剧社，七七宣传队等。演出剧目均以抗战为主题。票价五分。十日，各影院须放有关抗战之影片，门票五分，悉数捐献。从十日起还举行了抗战美术展览会，会期三天，不收门票。

十二日 “文协”长沙分会成立。王亚平等人负责。因会员不足十人，按章是不能成立分会的，所以总会电告，将分会改为长沙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通讯处。

二十二日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上午假新环球戏院开年会，出席者四百多人。主席张道藩讲话后，各代表致词，后即修改会章，改选理监事，欧阳予倩等二十一人被选为监事。下午继续开会。总会及分会代表报告会务工作，并



通过提案和宣言。

二十六日 “文协”香港分会成立。为了适应环境，决定名称定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留港会员通讯处。参加成立会共七十一人，楼适夷、许地山、欧阳予倩、戴望舒等九人被选为干事。会报为《文艺周刊》。

二十八日 周恩来来到绍兴。“周恩来同志向绍兴人民详细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了光明的前途。他说：只要团结民众力量，抗日之胜券必操我手。他在题词中鼓舞人民：‘埋头苦干，只要抗战胜利，定必苦尽甜来，前途光明。’他号召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要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与日本侵略者作拚死的斗争，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中共绍兴地区、县委员会《绍兴人民怀念敬爱的周总理》，载1977年1月18日《人民日报》）三十一日离去。

## 四 月

六日 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主办的第三届全国抗敌木刻展览会在社交会堂开始展出，共展三天。七日的《新华日报》为这次展览出了专刊。中铁、大化、云龙合写了《一年来的中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一文，回顾了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的成立，从组织方面、出版方面、展览方面、供应方面、研究方面谈了一年来的成绩，也谈了“除了财力上人力上的贫乏以外，我们不能不承认理事会的分工合作的组织形态，很不充实，以致减低了工作效率。”此外，还发表了张望的《中国木刻十年》、铸夫的《中国的新兴木刻运动》。鄧中铁在《早期木刻运动在四川》中回忆说：“这个展览的规模与影响在当时是很大的。展出作品571幅，还有一批套色木刻。作品质量比在汉口举行的一、二两届有

所提高，作者也要广泛些，包括全国各地102人。作品来源是以汉口移交来的为基础，和后来向各地征集来的。除作品以外，还有少数的解放区的印刷品放在木刻资料中展出，还把木刻制作的全过程按工序展出，这个办法对学习木刻开展木刻运动很有帮助。”

九日“文协”在渝陝西街举行年会，一百五十余人出席。主席团成员有邵力子、叶楚伦、于右任、郭沫若等。执行主席邵力子。在大会上讲话的有邵力子、胡风、于右任、叶楚伦、郭沫若、老舍等。叶楚伦说：“现在艺术家可以说是整个的了，但还不够，还没有把文艺的基础建立得合理，应该是使作家与行政机构合而为一，进一步说，要能调整文艺宣传的机构，使中宣部、政治部和文艺界协会很合理的配合起来，那力量的发挥必然很大。”“假使全国艺术家做了中宣部政治部的编辑员、撰稿人，而中宣部政治部做了作家的发行部，则所有困难均可克服。”郭沫若说：“今天在各报上都有纪念文章，方才又听到了邵先生、于院长、叶部长许多有力的指示，关于今后本会应做的工作，已得到充分的指导，现在剩下来的便是怎样来实现这许多宝贵的意见与正确的指导。我要说的话很简单，现愿仅就上述意见略作补充。我以为要实现各位及大家在文章中所企望的事，主要的还是在于物质条件，无论我们的精神如何充分，如无物质条件，也还难以实现。我们知道世界有许多国家都有他们的文艺政策，即以敌人日本，每年还要以三十万元的经费来培植他们的‘号筒作家’。中国的艺术家从来就在困苦艰难中生长的，就以现在这样一个空前的全国艺术家庞大的组织来说，仅有一千元的经费，实在是非常惭愧，也非常不够的。”“我们也不必一定如别国那样，只要把现在中宣部的五百元扩充

到五千元，把政治部的五百元也扩充到五千元，那么有了一万元的补助费，那我们成绩必更可观了。组织前线工作队也不成问题了，出版条件也不致再如此感到拮据了。不然，可也真是‘不得了’！”老舍报告了会务。“文协”成立一年，“文协”各部——总务部、组织部、研究部、出版部都对自己的工作做了总结，这些总结分别以《总务部报告》、《组织概况》、《研究部报告》、《出版状况报告》为题，发表在第四卷第一期《抗战文艺》上。大会还通过了各种提案。讨汪提案曰：“汪精卫及其徒党通敌卖国，前虽经中央开除其党籍，乃近又与敌订所谓‘汪平沼协定’，劣迹昭彰，全国震愤，请大会电中央，迅速明令通缉，扫除余孽，并且我全体会员，为文笔伐！”大会改选了理事，本埠三十名，计有老舍、郭沫若、胡风、冯玉祥、姚蓬子、邵力子、叶楚傖、王平陵、老向、田汉、郑伯奇、洪深、沈起予、张道藩、阳翰笙、戈宝权、宋之的、曹禺、潘梓年、冯乃超、王礼锡、靳以、宗白华、曹靖华、华林、安娥、谢冰莹、马宗融、吴组缃、罗荪；外埠十五名，计有茅盾、郁达夫、丁玲、巴金、张天翼、黎烈文、叶圣陶、周文、许地山、郑振铎、穆木天、楼适夷、谢六逸、成仿吾、朱自清。

为纪念“文协”成立一周年，《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用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号召“广大的作家群到敌人的后方去”，“加强‘文章入伍’的工作”，“实现‘文章下乡’”的口号，揭露日寇的暴行。该报还以第四版整版篇幅刊登了胡风、欧阳山、梓年、蒋一虹等人的祝贺文章。

十四日 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周年纪念日。“文协”假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纪念晚会，出席者三十多人。胡风主席。主席致词后，臧云远报告了马雅可夫斯基生平，郭沫若特别

指出了诗歌的政治作用。继而是诗歌朗诵。光未然朗读了胡风的献诗《血誓》，方殷、常任侠、光未然、高兰、雷克等先后朗诵了《列宁的葬礼》、《好》、《呈给同志涅特》、《给艺术军的命令》等诗的中译文。丘琴、王语今、戈宝权等先后读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俄文原作。最精彩者，是光未然朗诵《好》一诗。朗诵后即讨论其作品及朗诵的意义。同日的《新华日报》出“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周年纪念特辑”，内发表了戈茅的《纪念马雅可夫斯基》，指出“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位新世界的革命的诗人。”此外还发表了马雅可夫作、CK翻译的《甚么是好的甚么是坏的》(诗)，杜勃洛夫斯基著、范剑涯译的《伟大的人民之子——马雅可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著作、宝权译的《列宁的葬礼》——《列宁》一诗的断片》。同时，还刊载了《文学月报》第四期预告，该期出版了马雅可夫斯基纪念特辑，内发了彭慧、王春江、戈宝权的翻译和论文。

十五日 “文协”第二届理事举行第一次会议，邵力子、张道藩、老向、阳翰笙、洪深、宋之的等二十人出席。会上选举了叶楚傖、张道藩、郭沫若、老舍、郑伯奇等十五人为常务理事，老舍、华林为总务部正副主任，王平陵、老向为组织部正副主任，姚蓬子、孔罗荪为出版部正副主任，胡风、郑伯奇为研究部正副主任。

十八日 “文协”召开常务理事会，决定了“关于人事的”、“关于分会的”、“关于研究的”、“关于总务部的”提案多项。尽快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去战地和派老舍、胡风、姚蓬子、王平陵参加慰劳总会也包括在内。

三十日 《救亡日报》载：前自称第三种人的杜衡，近受卖国贼汪精卫指使，拟在香港出版《自由评论》，“文

协”香港通讯处通过决议，对杜衡严加警告。

春 “文协”成立戏剧座谈会。宋之的、葛一虹负责。第一次座谈会出席者有罗烽、杨骚、章泯、赵铭彝、姜公伟、胡风、草明、欧阳山、葛一虹、郑伯奇、蓬子、梅林、宋之的等。大家谈了座谈会的中心工作，议定目前座谈的中心为研究战时演剧理论，建立演剧批评。还议定了要起草到国外去的戏剧论文，内容有中国戏剧运动概况，抗战戏剧运动概况，战时演剧及敌后演剧，关于剧本创作、结论等六方面，被推举的六名撰著者是郑伯奇、葛一虹、章泯、赵铭彝、凌鹤、胡风。

## 五 月

三日 “文协”拟开理事会，因日寇狂轰滥炸，到会理事不足法定人数，遂改为五日晚再开，然四日又遭狂炸，五日的会又未开成。

十六日 《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创刊于桂林，这是《工作与学习》和《漫画与木刻》两个刊物合并而成的。刘季平、赖少其编辑。一九三九年秋终刊，共出了六期。编者在《发刊词》中说：“既然是两个刊物的合刊，内容似乎应该充实一点，但我们暂时还不敢有多少太过夸张的希望，与其说我们要在工作与学习方面帮助读者进步，或是提倡什么新的漫木运动，还不如说我们是要和读者一齐工作，一齐学习，一齐进步，一齐创造新的漫画木刻。”“我们热忱地希望他一出世就能和读者打成一片，愈益成为一个大家所共同创造的东西，所有正在或愿意参加实际工作的人，正在

或愿意学习切实知能的人，正在或愿意从事漫画木刻的人都是他的主人。我们要通过这个刊物，互相学习，互相帮忙，互相交换经验，互相纠正错误，互相鼓励，互相督促，把我们大家都锻炼成为一群更好的民族斗士：更忠诚切实齐心协力地在最高领袖的统一指挥下，根据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为争取抗战胜利，建设三民主义国家而努力。”还表示：“绝对不谈空话，不唱高调，一定要做到点点滴滴都有用。提出的问题要根据实际需要，想的主意要能马上拿去行，供给的材料，大家都可以拿去用。当然，在开始时，我们决不能一切都满意”，但“我们是要和读者一同前进的，我们再健全也一定要靠读者一同来努力。我们要在这里提出两句口号：编者作者读者打成一家！编者作者读者一同来做！”

## 六 月

一日 《锻冶厂》在四川罗江国立第六中学四分校创刊，李广田主编。发刊词曰：“对于我们，这伟大的时代正是一个最好的锻冶厂，我们将在这工厂中锻冶我们自己。我们一方面要锻冶我们的手艺，希望能为这‘抗日建国’的伟大时代画一些光荣的记号；一方面更要锻冶我们整个的生命，使我们的力量变得更加坚强，更有耐性，以期为国家民族多尽一些应尽的责任。而且，如果我们于经过长期的锻冶之后，能产生出一种较为象样的作品来，那就再好没有了。自然，这还不过是一种愿望。因此，我们就出版了这个刊物——《锻冶厂》。”《锻冶厂》共出了十期，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终刊。

十日 张庚对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同学作报告，题为《话剧民族化与旧戏现代化》，后发表在《理论与现实》第一卷第三期上。报告共分四个部份：第一部份：“分析五四到战前戏剧的历史倾向”，第二个部份谈“抗战发生以来，戏剧所起的变化和它的矛盾”，第三个部份“说明话剧中国化与旧剧现代化是一个运动”，第四个部分指出“新旧戏剧改革的困难和可能性，以及工作应如何开始。”作者认为，旧剧“不仅仅是在它的艺术方面，就在它的演出集团的组织形态，它的学习制度上，也都可以看出是封建时代的行会的一种。”

十二日 诗月刊《顶点》创刊于桂林，艾青、戴望舒主编，仅出了一期。编者在《编后杂记》中说：“《顶点》是一个抗战时期的刊物。它不能离开抗战，而应该成为抗战的一种力量。为此之故，我们不拟发表和我们生活着的向前迈进的时代背离的作品。但同时我们也得声明，我们所说不离开抗战的作品并不是狭义的战争诗。”“《顶点》的鸿愿是：从现在的新诗的现状中更踏进一步。不管我们现在表现的是怎样，我们所希望的是把水准尽可能地更提高，使中国新诗有更深远一点的内容，更完善一点的表现方式。我们知道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的，可是我们却要时时刻刻怀着这个愿望，时时刻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最后说：“《顶点》不是一个同人刊物，它接受一切优秀的作品”。

十四日 作家战地访问团在重庆生生花园举行出发仪式。周恩来、郭沫若、邵力子等参加了出发仪式，并致了勉励词。该团共十三人，团长是王礼锡，副团长是宋之的，团员有陈晓南、以群、方殷、袁勃、张周、李辉英、葛一虹、杨骚、白朗、罗烽、杨朔。

作家战地访问团发表了告别词，说：“我们十三个人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一次派出的笔部队——或者因为目的在敌后方，即叫着笔游击队——所以我们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并表示：“我们当尽我们的能力把敌后方一切可歌可泣的壮烈英雄的事实，用我们的钝的可是纯真的热情的笔把他们写出来”；“我们的责任不仅在写，而且在搜集材料，供给无数的现在及未来的诗人、小说、戏剧、散文家，让他们去歌咏、去表演、去记叙。”“我们还要去发现士兵中、工人中、农人中、一般市民中的写作的天才，并且沟通他们和我们的关系”。“我们还要沟通敌后方和国际作家的联系。”老舍写了《欢送文协战地访问团出发》，回顾了组织访问团的经过，并提出此行应注意的问题：“各战区都有文艺同志在军队或民间工作，我们应当与他们取得更密切的联络；在没有成立文协通讯处或分会的地方，急须马上组织起来。”“我希望诸位能和他们谈谈现阶段中的文艺宣传实际上的困难和问题。”希望诸位随时随地留神，并与各地方的文艺工作者商得交换与寄送”刊物的办法。莽发表了《送作家战地访问团出发》，着重指出了三点：“一、须要在这广大的新土里汲取作家自己必需的营养，丰富自己的生活内容，从那里学习自己从未经验过的无比繁复的生活样式。”

“二、须要使文艺的影响扩大，不但能够号召在自己地区里的人民和士兵，而且能更进一步的号召在敌区里生活着的人民和伪军。”“三、须要把文艺的种子传播在那广大而肥沃的新土里，培植我们文艺的新军，从那里生根发芽，而且茂盛的滋长起来。”

周恩来对于作家战地访问团是非常关切的。罗烽回忆说：“在组团之初，周恩来同志特别嘱咐我国几个负责同志



一定要尊重礼锡先生，说他是位正直的爱国者，他从英国喘返祖国，就是为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不图名利，更不想做国民党的官，只希望马上奔赴战地当一名普通战士，竭尽棉薄。”（见罗烽致王士志信）。

十七日 高尔基生平与创作展览会在渝开幕。

十八日 高尔基逝世三周年。渝文化界举行纪念会，郭沫若题词曰：“朗诵《海燕歌》，就好象和高尔基见了面。纪念高尔基，最好是成为他所歌颂的海燕，不怕暴风雨，在黑暗当中确信着光明就在眼前！”

同日 成都文化界在新剧院举行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纪念会，全市各文化机关团体均参加，会后演出了根据高尔基小说改编的《母亲》和光未然创作的《武装宣传》，同时放映了苏联影片《高尔基》。

同日 作家战地访问团由重庆出发。

## 七 月

十九日 日寇狂轰滥炸，重庆疏散人口。中国文艺社同“文协”议定：每月在渝市附近举行流动座谈会一次，交换意见，以便集中力量，搞好抗战文艺工作。

二十五日 “文协”昆明分会主办的暑期文艺讲习班开学。楚图南讲现代文艺思潮，冯素陶讲文艺基本理论，彭惠、施蛰存讲写作方法，朱自清讲作品讲读，徐炳昶讲抗战文艺工作，顾颉刚讲通俗化运动，张天虚讲文艺通讯，徐嘉瑞讲民间文艺，杨东明讲文艺批评，穆木天讲诗歌，冯子华讲小说，曹禺讲戏剧。听众四、五十人。

七月 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由重庆迁往桂林。为什么迁往？鄞中铁在《早期木刻运动在四川》中说：“全国从事

木刻的作者几乎都是进步青年，二十来岁左右。”“思想上、政治上以及艺术水平、组织能力各方面都是不成熟的。一切要白手起家，困难可以想见。”而“当时的桂林，由于政治的演变，已逐渐形成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总会原来负责组织的同志刘建庵在桂林，赖少其、黄新波也到了桂林，并成立了总会办事处，李桦也准备去桂林，力量比重庆强得多。”再者，“重庆自1939年5月初起经常遭受敌机大轰炸，整个城市乱了套，市面停顿，各报停刊，文化活动全部停止，‘木协’的工作当然也停下来了。”“我们反复研究，估计了可能发展的形势，认为以迁往桂林为宜，得到党的同意后去信桂林商量，提出了两个办法：一迁桂；二移交与谁。他们同意第一个办法，于是于七月以敌机轰炸为理由报社会部备案正式迁往桂林。”

同月 《七月》第四集第一期出版。七月社发表《愿再和读者一同成长》，回顾了《七月》的历史，并说“战争前进了，文艺运动前进了，我们当然希望《七月》能够更健康、更有力量，但同时也明白地知道，它不过是整个文艺战线上的堡垒之一，无论它的影响如何，在关联的形式上它只能是一个岗位。”“当然，文艺界统一战线在民族战争里面的前进，当不会仅仅止于政治上的共同目的‘抗敌’一点，就是创作方法，也会趋向接近的罢。”“在今天，我们底微小的目的是：希望在同情我们底作家底合作和批评下面，在爱护我们的读者底监视和参加下面，多少能够使进步的文艺发展，为光荣的祖国效命。”

同月 育才学校在重庆北碚开学，该校是陶行知创办的。学校设有文学、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等组。音乐组主任贺绿汀，舞蹈组主任吴晓邦，戏剧组主任章泯。

同月 罗荪作《害虫政策》。文章对抗战时期的第三种人提出了批评。“我们从他最近的出版物上，又看到了他一贯的理论，他表明着自己的态度，一如七年前说自己是一个既不左又不右，是个‘拔着自己头发’，中立起来的自由人一样。他表白着，他们这个刊物是个非常中立的立场，既不是××党的右派，也不是××党的左派，更不是××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他没有说，其实正是说了，因为在中华民族伟大的革命抗战中间，是不容许中立的，只要是‘中国人’，他必须参加战斗，除了他不是中国人，而是……汉奸、叛逆、奴才、敌人的走狗，但是即使是汉奸，也已并不中立了，因为他早投降了敌人那一边。”

## 八月

十六日 《新华日报》第四版整版均为谈论电影《马门教授》之文章。《马门教授》通过教授马门的遭遇，反映了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人民群众反纳粹统治的事实，鼓励与德国纳粹主义进行斗争。《马门教授》送审批准后，八月五日在唯一电影院开映，观众拥挤不堪。驻渝德国大使馆向当局抗议，说“唯一影院公映之《马门教授》影片，系煽动仇德”，要求“剪裁或禁令停映。”重庆社会局竟遵其所旨，禁令停映，并派一队警察来执行此令。市政府还张贴告牌：“违抗命令，停止营业三日。”舆论哗然。电影检查所复审《马门教授》，在群众压力之下，原样演出。《新华日报》的文章叙述了事件始末，对当局禁演进行了谴责。所发文章有吴克坚的《从〈马门教授〉影片说到我们的外交方针》、企程的

《介绍〈马门教授〉》、期望的《漫谈电影》、吴敏的《〈马门教授〉影片事件的始末》、闵廉的《电影与抗战》，以及《美国各报对〈马门教授〉的评价》。

二十日 《通俗文艺》在成都创刊。苏子涵、朱孟引、水草平、江伦等编辑。共出了四十五期。

二十六 作家战地访问团团长王礼锡因病在洛阳逝世。

三十日 “文协”致作家战地访问团慰唁团长王礼锡之妻，云：“惊闻礼锡噩耗，同人等莫不哀泣。此间得兄等归来，当筹开追悼大会。望将礼公沿途笔记文件，妥为保存，各出专集。当地长官热忱哀恤，同人感荷实深，即希兄等代总会致谢。事毕，盼之的兄偕全团继续前进，完成礼公遗志。途中一切珍摄，无任祷祝。”

八月 鄂中铁等创办中国木刻供应社。该社办理木刻工具、材料的购置、书刊供应、函授木刻作法的业务，主要是解决木刻刀子问题。木刻刀开始的质量都还不错，后因通货膨胀迅速、木刻刀不能提价、需要量有限等原因，承担制作厂子感到无利可图，质量就逐渐下降了。

同月 “文协”总会与“文协”香港分会合编的英文月刊《中国作家》出版。

## 九 月

十日 “文协”三峡区会员在黄桷树王家花园举行茶话会，二十余人到会。这是由胡风、陈子展等人发起的。会上决定：定期召开茶话会。老向、王洁之两人负责召集。

## 十月

二日 “文协”桂林分会成立。梁寒操任主席，到百余人。李文钊报告筹备经过。总会代表夏衍宣读总会贺电。大会通过了章程及组织文艺界战地访问团，开展通俗文艺运动、培养文艺青年、举办青年文艺奖等多种提案。大会选出理事二十五名：鲁彦、林林、夏衍、胡愈之、欧阳凡海、宋云彬、焦菊隐、艾芜、黄药眠、欧阳予倩、司马文森、周钢鸣、孟超、新波、孙陵、陈此生、陈迺冬、季平、钟敬文、孙施誼、舒群、李文钊、盛成、钟期森、梁寒操。候补理事十五名：芦荻、杨晦、冯培瀚、向培良、秋江、梁中铭、汪止豪、华嘉、陈原、莫宝铿、陈紫秋、汪子美、刘建庵、任重、金炜。《救亡日报》出了纪念专刊，鲁彦、夏衍、药眠、孙陵、李文钊等发表了纪念文章。

同日 《新华日报》载：作家战地访问团葛一虹、李辉英、白朗等由前方归来，“文协”借中国文艺社开座谈会欢迎，到胡风、葛一虹、孔罗荪、储安平等二十余人。李辉英报告了访问团在前方之情形。座谈会议定返回者以访问团名义参加王礼锡追悼会，还商讨了出版王礼锡遗著问题。

五日 叶紫病逝，终年二十八岁。叶紫逝世后，其家庭生活更为困窘。夏衍、艾芜、立波等十五人在《文艺阵地》第四卷第三期上发表《为援助叶紫先生遗族募捐启事》，说：“先生不独为青年艺术家之秀出，且身世之凄凉，身世之艰苦，实集人生之惨痛于一身，而为社会损害之结果。”希望社会给予叶紫家属以援助。

九日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招待文艺界、新闻界，

公布了从明日（第二届戏剧节）起到十五日止的戏剧活动内容。张道藩说，这次演出的目的是：一、捐募寒衣；二、讨逆除奸；三、宣传兵役；四、加强生产建设；五、表扬抗战英雄史迹。沈钧儒特别提出募捐寒衣和讨逆除奸问题，号召要把反汪运动变成广泛的群众运动。郭沫若以团结的精神来勉励戏剧界同人，要求他们反映中华民族的真实感情。剧协披露，参加这次活动的有怒潮、怒吼、复旦、华北宣传队、儿童演剧队、孩子剧团、上海剧社、山东省立剧院、抗敌剧团、青年剧社、国立剧校校友会重庆分会、戈兴剧社、重庆业余剧团、复兴剧社、难民妇女服务第十五剧团。

十九日 渝召开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会。邵力子主席，参加者有秦博古、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叶挺、吴克坚等千余人。邵力子说：“鲁迅先生的死，是我们的莫大损失。鲁迅先生的精神将永远埋在我们的深心。我们虽然哀悼鲁迅先生，但我们却继承了鲁迅先生的遗志：中国已经团结起来了！”苏联塔斯社罗果夫说：“鲁迅先生的死，不但是全中国人民的损失，而且是全世界先进人类的损失！鲁迅先生的作品，是和世界最有名的作家高尔基、罗曼·罗兰、巴比塞等一样地被人重视！”“鲁迅先生是苏联的真实朋友，是苏联文学流进中国来的介绍者。他的死，特别给全苏联人民以无限的悲哀，在今天，和贵处一样，苏联也有无数的人在哀念鲁迅先生！”陈绍禹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后全文发表在二十日的《新华日报》上。

《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纪念伟大的民族战士鲁迅先生》，概述了鲁迅的贡献，指出：“鲁迅先生是伟大的，鲁迅先生是不朽的。毛泽东同志曾告诉我们，鲁迅先生有政治的远见，有斗争的精神和牺牲的精神，这几个特点的综合，就

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当此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时，我们每一个真诚的人，都应该继续‘鲁迅精神’的这种伟大传统，来坚持我们的民族抗战，这也就是我们纪念这么伟大的民族战士的唯一的、有效的方法！”该报还出了纪念专版，刊载了胡风的《鲁迅先生·日本·汪精卫》、欧阳山的《怎样纪念我们底巨人》、罗荪的《反虚伪的精神》、草明的《不妥协的人》、戈宝权的《鲁迅先生与苏联——并介绍鲁迅先生的作品在苏联的情形》、潘梓年的《纪念为自由而奋斗的战士》。

同日 “文协”桂林分会在乐群社举行了鲁迅逝世三周年大会，欧阳予倩主席，胡愈之、鹿地亘等报告了鲁迅事迹。《救亡日报》与《广西日报》分别出了特刊，发表了鹿地亘、宋云彬、芦荻等的纪念文章。“木协”还举办了木刻展览。

同日 “文协”成都分会举行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活动，《笔阵》还出了《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特辑》，周文、肖军、孟引等写了纪念文章。

三十日 老舍、何容编辑的《通俗文艺五讲》出版。内收老舍的《通俗文艺概论》、纪彬的《民间形式的评价与运用》、王泽民的《通俗文艺的写作方法》、老舍的《通俗文艺的技巧》、何容的《通俗韵文浅说》五篇文章。老舍在《序》中说，“这几篇文字都是给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创办的通俗文艺讲习会预备出来的讲义。”老舍“概括的说明通俗文艺为何物，并略言推行的方法。”赵纪彬、王泽民谈的是“理论与方法。”“老舍先生的‘概论’是提纲，赵王二先生的讲演是个别的讨论。”老舍主要讲的是“实际写作的技巧。”何容“讲通俗韵文的用字与声韵的问题。”

秋 李克农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向吕复等传达南方局指

示：“主要内容是演剧队当前的主要任务还是长期隐蔽，保全实力，团结一切要求进步和爱国的人，反对国民党的顽固分子。各地情况不同，必须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国民党内也有不同派别，余汉谋与张发奎不同，李宗仁和白崇禧也不完全一样，所以应该利用这些矛盾保全自己。要广交朋友，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但一定要坚持原则，不演一出反共戏，不唱一支反共歌，又要谨慎小心，不要冲动急躁，不要自己戴上红帽子。如有遇到被强迫入党时，可拖则拖，拖不下去的时候，可以集体加入，但有三点必需注意：一、必须向全队讲清楚，使大家有个思想准备，取得队内的意见一致；二、个别队员坚决不愿参加和已被国民党监视有危险的人，应设法保护他们安全离队；三、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弄假成真’。”（夏衍《周总理对演剧队的关怀》，载1978年《人民戏剧》第3期）

秋：长沙举办戏剧艺人讲习班，二百余人参加，集中开餐，每日早操，学习训练，长达三个多月。徐特立和田汉常对艺人进行国内外形势、戏剧与抗战的关系、文艺工作者的职责等方面的教育。讲习班的班歌是：“同志们，／莫忘了，／我们第一是中华民族的儿女，／第二是戏剧界的同行。／抗战使我们打成一片；／抗战使我们聚会一堂。／我们要教人必先自教，／要强国必须自强。／剧运的兴衰，／关系国家的兴亡。／我们要把舞台当做炮台，／要把剧场当做战场。／要每一句话成为杀敌的子弹；／让每一位观众拿起救亡的刀枪。／对汉奸走狗我们打击、打击；／对民族战士我们赞扬、赞扬。／鼓起前进的勇气，／消灭妥协的心肠。／同志们！／大家团结起来啊！／永远为光明而舞蹈，／永远为自由而歌唱。／歌唱，歌唱，／永远为自由而歌唱！”



## 十一月

四日 “文协”桂林分会设立文艺习作指导小组为文艺青年评改稿件。欧阳予倩、王鲁彦、黄药眠、夏衍、艾芜等参加指导。

十六日 本日出版的《文艺战线》发表萧三的文章《论诗歌的民族形式》，指出：“中国的新诗直到现在还没有‘成形’——这是无可讳言的。”其原因，“我以为是，自从‘白话’战胜‘文言’以来，作新诗的一下子从古诗的各种形式和体裁‘解放’了出来，于是绝对‘自由’”，“弄得毫无‘章法’”。另外，“有少数的新诗人完全学西洋诗的作法。结果呢？中了‘洋八股’的毒，写出来的东西不合中国人的口胃，不受一般读者的欢迎。”提出：“发展诗歌的民族形式应根据两个泉源：一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化里许多珍贵的遗产，离骚、诗、词、歌、赋、唐诗、元曲……二是广大民间所流行的民歌，山歌、歌谣、小调、弹词、大鼓词、戏曲……”

二十八日 作家战地访问团在老河口与此间文化界人士举行座谈会，除各报告工作外，并交换了意见，史沫特莱参加了这次座谈会。

## 十二月

一日 重庆《新民报》开始连载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八十一梦》，至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结束。作者采用

“寓言十九，托之于梦”的手法，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当局有关人士曾以“是否准备到息峰休息两年”之话进行威胁。

六日 “文协”桂林分会召开理事会，议定了要组织文艺界前线慰劳团，推定李文钊、舒群、黄药眠三人负责筹备。

十二日 宋之的和作家战地访问团团员们返渝。

十六日 “文协”为作家战地访问团举行欢迎会，七十多人到会。老舍、宋之的、姚蓬子谈了各处文艺工作之情形。

十七日 沈钧儒、钱俊瑞、邹韬奋、崔仲远、潘梓年、金则人、王炳南、孙克定等发起组织青年作家柳乃夫追悼会。柳乃夫是本年六月六日在中条山被日围攻殉难的。追悼会在巴蜀小学举行。沈钧儒指出追悼柳乃夫的三点：一、应该真正懂得生与死的意义；二、在生命的旅途中找自己忠实的伙伴；三、继承遗志。钱俊瑞指出柳乃夫的三种特性：战斗性、坚持团结、不断学习。《新华日报》发表了俊瑞的《悼乃夫》（诗），吴敏的《念乃夫》、时且的《新生的开始——乃夫生活的一段》、金则人的《文化战士之死——悼柳乃夫兄》、孙克定的《对乃夫的纪念和誓约》，以资悼念。

二十三日 “文协”借青年会礼堂举行茶会，招待各界，感谢各界对作家战地访问团的帮助与关怀，还报告了劳军与访问的感想，一百四十余人到会。

二十四日 黄芝冈写《评〈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后发表在《新演剧》第一期上。这篇文章对张庚《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提出不同意见：“张庚先生对‘剧运本质’未曾‘改变’之前的旧剧估价，是以都市旧剧为代表的。因此，他以为旧剧撇掉忠孝节义的内容便会手足

无措；他以为旧剧的观众没有欣赏，只是散心，没有尊重，只是开玩笑；他以为旧剧只有一个主角而没有戏；他以为旧剧光剩下唱，观众对规矩无所要求。”“他的估价和事实太离得远了。”作者还指出，张庚在“旧瓶新酒”的问题上，“认为装‘新酒’的前途，不是酒瓶爆裂就是酒味变坏”，“不无武断之处。”在谈到延安的剧运问题上，作者说：“就条件上的便利说，它自然是天之骄子，但它在技术上却没有多大的可夸耀的进步，尽在技术以外夸耀着‘内容现实政治意义，就剧运谈到剧运，也不见得怎样可以乐观，这即是说，延安的剧运者——纵然是广大动员了——也还得要不断地耗费他们的心与力的。”

二十六日《新华日报》发表《积极加强战地文化工作》的社论。社论从南北两路慰劳团及作家战地访问团返渝谈起，肯定了抗战以来战地文化工作的“长足的进步”，但也指出“我们战地文化工作还未做到理想地步。”社论说：“在第二期抗战的今日，敌人对我们的进攻，以政治为主，以军事为辅，而文化麻醉政策，则是敌人的进攻手腕之一。所以我们目前在战区，特别是在文化知识水准落后的地区，为了要动员群众和发动游击战争，为了要反对敌人的文化进攻，战地的文化宣传工作及与敌人的文化宣传战，实占有重要的地位。”“讲到加强目前战区的文化宣传工作，我们首先应该使得目前战区的文化工作与目前的军事形势配合起来，并能积极帮助目前的军事进展。”其次，“揭破敌人的文化麻醉政策，使得一般人民不为敌人的政策所混淆，而粉碎敌人以文化进攻的阴谋。”再者，“还要组织民众和训练民众，使得这些民众能和在前线作战士兵一样，组成一个伟大的力量，而与敌人以顽强的打击。”要达此目的，首先就是要

“动员大批的文化工作人员和热心从事于救亡工作的人到战区去”，第二就是要“扩大战地文化宣传和服务的组织”，第三就是要“组织各种文化工作队、宣传队、演剧队、歌咏队、战地服务团等，固定地或是流动地在战区工作。”

## 一九四〇年

### 一月

一日 《新音乐》月刊创刊，李绿林，林路主编。这个刊物在国统区有较大影响。不久，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办事处接见《新音乐》编者，“他谈到重庆的文学、戏剧、美术都有定期的刊物，就是音乐方面还没有。他说我们要把刊物作为推动各地抗日歌咏运动的联络工具，有组织地开展工作，使各地群众性的新音乐运动活跃起来，配合当地的青年运动工作，起团结青年，教育青年的作用，把广大青年争取到抗日战线上来。”“他特别强调我们把边区（主要指陕甘宁边区）的新歌介绍给国统区的人民，使歌咏运动注入新血液，说这样‘意义不小’。”（李凌《忆周总理和新音乐运动二、三事》，载1978年《人民音乐》第1期）。

二日 中国艺术展览会在莫斯科国立东方文化博物馆开幕。苏外交人民委员会、全苏对外文化协会、艺术委员会、苏联画家及中国大使馆多人参加了开幕式。全苏对外文化协会还特开盛大招待会，庆祝展览会开幕。参观者非常踊跃。五日内有七千多人观看。阿·托尔斯泰称：“余入会场后，恍如置身神仙境界，至以为乐。”苏名雕塑家莫基那对于中国古画传统之超选手法，甚为推崇。老画家格拉巴说：苏联人民对于为国家独立而战之中国人民，寄以无限之同情。莫斯科交通研究院学生留言曰：“具有如此先进文化如此伟大艺术之民族，非其他民族所能奴役者也。”

三日 《新华日报》召开欢迎会，欢迎参加慰劳团和作家战地访问团的老舍、宋之的等从前线归来，并征求大家对报纸创刊两周年的意见。

四日 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举行年会，到会会员百余人。开会如仪后，即改选理监事，结果，洪兰友，吴伯超、胡彦久等三十九人当选为理事，杨仲文等十七人当选为监事。

同日 “文协”桂林分会组织的前线慰劳团出发去前线。

七日 胡风写《今天，我们底中心问题是什么？》，内分四个部份：一、“首先，要从逻辑公式的平面上跨过”；二、“从创作里面追求创作与生活”；三、“生活、感觉、艺术的思维”；四、“抒情的发逐”。作者对郑伯奇和孔罗荪对典型的看法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虽然说法多少不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完全抛开了作家底对待对象（题材）的态度，作家的主观和对象的联结过程，作家的战斗意志和对象底发展法则的矛盾与统一的过程。”“依照他们二位的解释，创作过程就成了一种冷静的，‘精密’的，单纯的，逻辑思维底过程，新的现实主义所一再向作家要求的战斗意志底燃烧，情绪底饱满，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等等，就弄得无影无踪。”“所谓‘客观主义’，是从这里来的，所谓‘枯燥空洞’，是从这里来的，所谓‘思想力的灰白’，是从这里来的，所谓‘艺术力底死灭’，也是从这里来的……”作者还指出不能停留在中玉“指出了的逻辑公式的平面上。”“如果中玉先生所说的，‘作家们如果没有能够以一个战士的姿态出现于现实生活的斗争里，他是不能够创造出真实伟大的艺术来的，这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反转来，对于

特定作品或特定作家底创作过程的评价的分析就能够说出特定作家和客观生活的联结情况或联结程度。”作者还对穆木天、徐迟的抒情观提出了批评，反问穆木天：“说抗战诗歌底‘大部分’是‘个人主义抒情主义’，‘个人主义的感伤主义’，这是不是事实？”说徐迟“干脆地把抒情‘放逐’”，“不但把抒情监禁在对自然的感应里面，还把抒情和科学弄成了对立。”指责他们这是对于诗人底主观和现实生活的联结作用的抹杀。”该文发表于《七月》第五集第一期。

十五日 《文学月报》在渝创刊，罗荪主编。《发刊词》回顾了抗战三十个月来文艺的发展和取得的成绩，指出了现阶段的文艺运动，还不够配合了当前的需要，还不够适应了当前的速度，也就是说还需要建立更多的战斗单位，还需要展开更普遍的文艺运动。特别是在反映这新时代的青年气息上，在树立新的文艺兵的事业上，也还需要更大的努力，来开拓更广大的土地。创办《文学月报》“只是企图在那伟大的文学事业的建设过程中，加进一块石基，一根木头；是企图在工作中，在学习中，尽可能的增强我们的文艺部队的力量；因此，它需要的是年轻的，战斗的姿态；是健康的，坚实的精神。基于这两个基本要求，无论是在工作的表现上，学习的过程中，都需要严正的批评，严肃的研究。因此我们不但希望在新的理论建设中引导前进，而尤愿展开严肃的文艺批评工作，加强文艺建设的力量，推进文艺运动的影响。”还说翻译工作在今天有着非常迫切的需要。

二十四日 《新华日报》发表方然的延安通讯《延安底文艺工作》；从四个方面介绍了延安文艺工作的情况：一、文艺工作受到重视。作者引用了毛泽东同志在战地文化资料展览会上的题词：“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

还引用了毛泽东同志在鲁艺周年纪念时的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二、文艺工作者与组织。延安不仅有了玲、沙汀、何其芳、周扬等著名作家和理论家，还有文化协会、鲁迅艺术学院、“文协”延安分会等组织。三、工作。通讯谈了文艺工作者上前线、出版事业、壁报与街头诗、诗歌朗诵与讲演文学、理论研究、利用旧形式、组织文艺通讯网七个方面。四、困难。提了四点：文化食粮缺乏及与别处联系困难、印刷出版困难、大众文化水平较低、文艺工作者缺乏。

二十七日 《新蜀报》《蜀道》在汇利饭店举行首次座谈会，华林、葛一虹、罗荪、王亚平、方殷、陈纪滢、高兰、沙雁、臧云远、陈晓南、光未然、王平陵、侍桁、老舍、胡风、赵清阁、凤子、阳翰笙、陈白尘、赵铭彝、长虹、陆晶清、梅林、徐仲年、周钦岳、姚蓬子参加，座谈内容为如何保障作家战时生活。姚蓬子“提出今天的讨论纲要，第一是‘怎样提高稿费’，第二是‘怎样保障作家的版税’，第三是‘请求政府对于作家的生活保障’。”老舍对于提高稿费和保障版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想，好不好由文协出面，邀请文化当局，出版界和报馆杂志的负责人来谈谈这个问题，从中再以友谊来促进这个运动。”侍桁赞同老舍的观点，但补充说：“光是友谊恐怕是不成的。”除了友谊，同时还“应当对出版界表示作家自己的决心。”座谈会还讨论了四个小项目：规定最低限度的发表费和定稿费，如何切实保障版税，由“文协”出面邀请各方面以友谊的态度商量一个办法，要求“文协”向当局建议积极救济和保障作家的生活。

一月 《音乐与美术》月刊在桂林创刊，广西艺术师范



训练班编辑发行，实则为“文协”桂林分会主办的刊物。主编张安治，二卷七期起改由徐杰民负责。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被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强制停刊。

## 二 月

一日 《东线文艺》创刊，段梦萍、张煌主编。

三日 老舍、胡风、高兰、方殷、罗荪等二十二人假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诗歌座谈会，胡风任主席，方殷报告缘起，讨论了如何推行诗歌运动问题。

四日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给文艺作家以实际帮助》，肯定了抗战以来文艺作家们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目前文艺界同人的困难和痛苦，是无可讳言的事”，认为对“如何保障作家生活”的讨论“不仅反映重庆这一隅之地文艺作家的要求，同时也是反映全国文艺作家的要求。”社论完全支持这一行动，并提出：一、“必须提高文艺工作者的政治地位。”“在法律上保障文艺工作者言论出版自由和不受恶势力的袭击。”二、“必须给文艺作家以生活上的保障和改善，这里最主要的是一方面提高稿费版税，规定最低稿费版税标准；另一方面要求政府与以有计划的实际帮助。”三、“政府和社会人士必须给文艺作家以提高自己作品水平的可能和工作上的便利。这里最主要的是对文艺作家较完备的公共图书馆的设置，和建立奖金的制度，以及他们到各地工作交通上以及其它方面的便利。”

六日 “文协”成都分会举行年会，并改选理事。结果，肖军、李劫人、沙汀、刘开渠、赵其文、肖蔓若、陶雄等当选为理事，毛一波、熊佛西、叶菲洛等当选为候补理

事。

十一日 “文协”桂林分会为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零三周年在李子园青年会举行纪念会，林林、杨晦报告生平及著作。随即讨论了新诗的形式问题，计有中国诗传统之研究、“五四”以来的中国诗歌运动、目前的中国诗坛、新诗歌的主要倾向等。

二十一日 “文协”举行戏剧座谈会，参加者有胡风、臧云远、葛一虹、章泯等，讨论题为《对目前戏剧工作的意见与感想》。

二十五日 力扬作《关于诗的民族形式》，后发表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三期上。力扬反对肖三《论诗歌的民族形式》中提出的诗要“成形”的理论：“肖三先生把鲁迅先生等能够做得很好的古诗，以及有些做过新诗的人现在做起旧诗来，作为新诗必须有一个‘成形’的论据。我的意见是稍为不同的。”他着重谈了三点：第一、鲁迅有“深沉的古文根底”，以诗歌“作为斗争武器的大众，都是不必要的；”第二、鲁迅的诗，如“惯于长夜过春时”，要能体味非有“大学的国文程度不可”；第三、鲁迅“对于新诗并不主张有甚么规律。”

同日 “文协”成都分会召开理事会，议决：在《华西副刊》的地位出一周刊，名为《文讯》。

二月 《诗》月刊在桂林复刊，周为、婴子、胡明树编辑。

同月 “文协”广东曲江分会成立。“文协”贵阳分会成立。

## 三 月

一日 《抗战文艺》桂刊创刊，艾芜编辑，但只出了一期就停刊了。

四日 向林冰完成《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该文提出了“以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命题”。其理由：第一、“流行民间的文艺形式，不是大众生活的偶然道伴”，是“习闻常见的自己作风与自己气派”；第二、“由于‘存在决定意识’，所以‘喜闻乐见’应以‘习见常闻’为基础”；第三、“‘内容决定形式’这是解决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中间的矛盾，使民间形式内部的民族形式的胚胎发育完成而彻底肃清其反动的历史沉淀物的唯一钥匙”；第四、“民族形式的提出，是中国社会变革动力的发现在文艺上的反映。”“五四”以来的新兴文艺形式，由于是缺乏口头告白性质的‘畸形发展的都市的产物’，是大学教授、银行经理、舞女、政客以及其他小‘布尔’的适切的形式，（黄强先生在其《当前文艺运动的一个考查》所评定），所以在创造民族形式的起点上，只应置于副次的地位。”后这篇文章发表在同月二十四日的《大公报》上。

八日 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在桂林公演日语反侵略名剧《三兄弟》，从是日起共演五日，观众达六七千人，收入约万元。他们将半数作慰劳我国抗战将士，将半数作为该部基金。三月二十二日《新华日报》以《今天，剧坛上爆发了一朵灿烂的血花》为题，记叙了这次演出的盛况，最后说：“今天，中国剧坛，日本人民的剧坛，全世界剧坛，爆发了一朵灿烂的血花，两个民族只有一个敌人，被压迫者与被侵略者联合起来打倒共同的敌人吧！”

十五日 晋西戏剧界民间戏剧研究会在兴县开成立大会，到会有新旧会员四千余人，主席风起报告后，全体向壮

烈殉难之晋西南戏剧研究会发起人朱希默哀四分钟，旋推选正副主任二人，最后通过议案，计有：一、用成立大会名义发表宣言；二、以研究会名义加入晋西各界宪政促进会；三、号召成立晋西戏剧界救亡协会；四、出会刊等。

同日 《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三期出版。葛一虹发表《民族遗产与人类遗产》，说：“新的国粹主义却穿上了漂亮的外衣登了场。什么是新的国粹主义呢？抹杀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上艰苦奋斗的劳绩，责难它不大众化和非民族化”，“而所谓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完成，只有到旧形式里找寻。或者认为这样的追求是至少要‘以民间形式为中心源泉’，为‘主导契机’，等等。”作者指出：“我们的‘主导契机’或‘中心源泉’，还是在于我们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我们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二十五日 罗荪作《关于现实主义》。文章对史笃发表在《文艺新潮》第三卷第二期上的《关于现实主义》一文提出了批评。问题是从对《焦土礼赞》这首诗的评价开始的。史笃认为《焦土礼赞》是现实主义的，还认为现实主义是“可以为恶”的。罗荪认为《焦土礼赞》不是现实主义的，是客观主义的，史笃未划清现实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界线。

二十七日 《新蜀报》刊载向林冰《国粹主义“简释”》，重申了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观点，反对指责为新的国粹主义，还驳斥了葛一虹“我们的‘主导契机’或‘中心源泉’，还是在于我们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我们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观点，说“这简直是在做梦”！

## 四 月

一日 《耕耘》美术文艺综合月刊创刊，郁风主编。

同日 《战国策》创刊。战国策编辑社编。这个社的主要人物有林同济、陈铨等。第二期刊载的《本刊后事》即代发刊词称：“本社同人，鉴于国势危殆，非提倡及研讨战国时代之‘大政治’（High politics）无以自存自强。而‘大政治’例循‘为实政治’（Real politics）及‘尚力政治’（Power politics）。‘大政治’而发生作用，端赖实际政治之阐发，与乎‘力’之组织，‘力’之驯服，‘力’之运用。本刊如一‘交响曲’（Symphony）以‘大政治’为‘力母题’（Leitmotif），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此中一切政论及其他文艺哲学作品，要不离此旨。”共出十七期，一九四一年停刊。

六日 《新华日报》发表桂林文艺界同人的一组文章，总题为《我们声讨汪逆》。编者在按语中说：“这是文艺界联合讨汪的第一声，我们希望这个运动，能普及到全国整个的文艺界去吧！用我们的笔杆儿，来杀尽无耻的汪逆汉奸卖国贼！”在这讨汪专栏里，艾芜写了《把它当成一面镜子》、李桦写了《要提防“文化进攻”》、冰兄写了《连狗狐蛇鼠也不如》、宋云彬写了《痛骂铸像是不够的》、孟超写了《怎样反汪》、林山写了《扑杀另一种狗》、林林写了《打倒伪宪政》、周行写了《除恶务尽》、周钢鸣写了《更要努力》、胡愈之写了《汉贼不两立》、夏衍写了《要表示我们民族的意志》、陈闲写了《我们要打杀汪狗群》、曹伯韩写了《今后怎样反汪》、华嘉写了《不仅打落水狗》、新波写了《提防队伍里面的》、戈茅写了《没有工夫唾骂》（诗），等。

七日 “文协”假渝国泰饭店举行成立二周年重庆会员大会，到留渝会员及来宾百余人。邵力子、于右任等讲了话。老舍代表理事会报告一年来的会务，分研究、出版、组织、总务、经费逐一详细报告。

十日 《学习生活》在渝创刊，赵冬云、楚云编辑。《发刊词》曰：“帮助大众学习科学，认识生活，这就是本刊出版的目的。”认识生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学习科学，我们就不能真正认识生活。”“本刊将要以全部的力量来从事科学大众化的工作，用最通俗的文字把哲学，自然科学，文学各方面的知识介绍给读者。”

同日 《新蜀报》发表葛一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驳斥了向林冰的观点，说“旧形式的顽强的存在，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以及半封建的旧经济与旧政治在中国尚占优势的反映。”“这种形式，‘习见常闻’，可是并不能新鲜活泼，当我们已经有了比较进步与完整的新形式的时候，它仍然能拥有大量的观众和读者，这自然不是一件光荣可夸的事情。”作者对“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作了充分的肯定，还指出：“忠实的描写生活，把生活的真实在文学上显示出来，这种作品的形式便不会不是民族的。”当然，这“应该受着作家的进步的世界观，及其所持的现实主义指导的。”

十四日 中华全国美术会在生生花园举行临时会员大会，到会六十余人，张道藩任主席。议决：一、凡在战区之理事，由大会当场推人代理；二、开除方君璧等四人会员资格；三、决定五月中旬举行第二届年会，推定汪日章、吕斯百、许之骥、郎鲁逊、周圭、赵望云、袁留莘等十五人为筹备委员。

同日 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周年。“文协”假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诗歌晚会，以资纪念。到郭沫若、胡风、戈宝权、光未然、力扬、臧云远、方殷、常任侠、高兰等三十余人。主席胡风致词，臧云远报告生平，郭沫若着重谈马雅可夫斯基诗之政治作用，光未然、方殷、常任侠、高兰朗诵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原作和译诗。

十六日 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举行第二届年会。港、沪、蓉各地代表及渝电影界同人六百余人到会。张道藩、郑用之、罗学濂、郭沫若、阳翰笙、罗明佑、甘雨耕、徐浩、罗静予九人组成主席团。主席张道藩致开幕词，金擎宇报告该会筹备情形，郭沫若也发了言，旅香港代表罗明佑介绍了华南电影界动态。大会通过了会章，改选了理事。结果，张道藩、史东山、应云卫、罗明佑、郑用之、蔡楚生、孟君谋、孙瑜、罗学濂、阳翰笙、金擎宇、司徒慧敏、沈西苓、孙师毅、罗静予、王瑞麟、马彦祥、袁丛美、潘子农、郑君里、余仲英、黎民伟、甘雨耕、刘念渠、贺孟斧、苏怡、高占非等二十七人被选为理事，郭沫若、田汉、洪深、欧阳予倩、周克、夏衍、吴蔚云、王士珍、谭友六、何非光、裘逸侔、夏云瑚、洪伟烈、杜桐荪、周伯勋等十五人被选为监事。大会还通过提案多项，其中有通电慰劳前方将士及声讨汪逆。

二十日 《新华日报·文艺之页》第七期发表重庆漫画界《画讨汪逆》专页，编者在《写在画前》中说：“汪逆傀儡伪组织已在南京成立了，这是汉奸卖国贼的丑行中之更罪恶的丑行！我们特借《文艺之页》的篇幅，请留居在重庆的十几位漫画家，来给这些卖国群丑铸一次画在纸上的铁像，来暴露出这些背叛祖国利益和出卖自己灵魂的汉奸们的罪恶和丑行！我们谨在此感谢诸位作者，并愿唤起全国的读者们，

加强反汪运动，来打击和扑灭这一群无耻的汉奸卖国贼！”内载了鄧中铁、赵望云、黄尧、张望、陈烟桥、黄茅、铸夫、李可染、张文元等人的作品。

二十一日 文学月报社假中苏文化协会开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参加者黄芝冈、叶以群、向林冰、光未然、胡绳、梅林、姚蓬子、戈茅、方殷、潘梓年、方白、高兰、臧云远、黑丁、曾克、葛一虹、陈纪滢、陈波儿、罗荪、郑君里、陈白尘，罗荪主席。罗荪说：“目前在重庆所引起讨论的似乎尚只偏于一局部的问题，还没有更深入一步地来做一个整个的理解和研究。”他希望通过座谈，使“问题的研讨，得以推进一步。”以群反对向林冰以民间形式作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观点，提出：“应以新文学到现在为止所达到的成就为基础来创造民族形式，即以新文学底既有成就为基干，再加上其他的成分做枝叶”，“一定要说‘源泉’的话，那末当然是以新文学底既有成就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因为民族形式根本是新文学本身的一个发展。”向林冰对以群的意见提出了反批评，坚持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民间形式的观点。葛一虹认为要民族化，“应该向现实生活中去学习”，不能“向旧形式中去学习”。座谈会记录后发表在五月十五日《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期上。

同日 《新蜀报》发表向林冰《封建社会的规律性与民间文艺的再认识——再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之一》，指出他与葛一虹等人“分歧的核心”是在对民间文艺形式的理解上。他对照了与葛一虹的分歧。他说，葛一虹认为：一、封建社会中没有内在的对立或矛盾；二、民间文艺是封建文艺的肯定契机；三、民间文艺没法子逃避死灭的命运；四、在缔造民族形式上民间形式须要被排除；五、根据科学的世界观



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认为：一、人民大众是反封建的内在革命动力；二、民间文艺是由于封建统治的本质矛盾，在封建文艺内部孕育出来的自己否定契机；三、民间文艺随人民大众的解放而趋于生长完成；四、在缔造民族形式上民间形式为中心源泉；五、根据科学的世界观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二十四日 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文艺界委员名额增加为十一至十五人，并聘请张道藩、郭沫若、舒舍予、程沧波、王芸生、林风眠、王平陵、华林、胡风、姚蓬子、李抱忱等十一人为委员，吴云峰为秘书。办公地点暂时在九道门中央社会部。

二十五日 《现代文艺》在福建永安创刊，王西彦编辑。《发刊词》肯定了抗战以来抗战文艺运动取得的成就，也指出了缺点：“首先，我们的抗战文艺运动没有普遍地建立起战斗单位。”文艺运动仍在“重庆、桂林、香港、上海等处，很少有人想到在东南前线尚有一片如此广大的土地！我们知道生活在这里的青年男女中不乏文艺爱好者，由于交通的阻隔，与运输的困难，渝桂港沪等地方的新书很少流通到东南来，我想他们在精神过分缺乏的情况下是怎样的渴望着满足自己的欲望！”另外，“在新的文艺战士的培养这一点上，广大的东南也需要有一个文艺园地来供给他们垦植。”《发刊词》说创办《现代文艺》“虽不敢说是企图解决上述的全部缺点”，但是，是“尽可能的补救于万一。”

同日 《新华日报》刊登文艺作家奖助金管理委员会消息。郭沫若、张道藩、老舍、胡风、华林、姚蓬子、王平陵等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内分三组征求抗战文艺作品：

第一组管音乐绘画雕塑；第二组管电影与剧本、民众读物、报告文学；第三组管小说戏剧。

同日 《新蜀报》发表方白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不在“民间形式”吗？》。他对于葛一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不敢苟同”，“提出若干疑问”。具体有：第一，反对葛一虹“旧形式没有法子逃避其死灭的命运”，认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文化状态下的文艺形式”，“有两种契机，有两种可能的前途”；第二，反对“葛先生认为‘五四以来的我们的新文艺’便是‘主流’”，说“这种移植形式”“是动力，不是主力”；第三，反对“葛先生对大众‘需要’的看法”，认为说法笼统。

二十六日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文化界努力的方向》，指出汉奸文化运动，不仅依据敌寇的枪炮、金钱及其为奴隶的“文人”来发展，还要利用“国内存在着的文化上开倒车”的现象来扩散，大声呼吁“以抗战团结进步，来消灭投降分裂倒退”，并提出文化界当前的四大任务：一、“总的方面，是为着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二、“文化运动要能够有力的服务于政治，则它本身必须不断的进步发展，因此，应努力提高文化的一切部门。在科学的立场上，来批判地研究中国历史与中国历史的艺术，来认识抗战过程中的社会发展，来看作为指导全民族斗争的指南针，发动自然科学的研究，来解决长期抗战建国过程中的物质上的困难，大量地用一切有用的形式，进行艺术的创作，努力使艺术走向大众，反映现实，更广泛地深入地进行抗战教育和普及教育。这样努力从各方面来提高文化的各部门，为创造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的文化，也就是为创造广大民众需要的新的

民主主义的文化而斗争。”三、“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是文化运动进步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因此，必须“反对有背这条件的形成和发展的倒退现象，反对政治上文化上的开倒车。”四、应对文化工作者在生活上、工作上给予帮助。

二十七日 向林冰完成《民间文艺的新生——再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之二》，对照谈了与葛一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他说葛一虹认为：“（一）民间文艺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契机两种可能的前途是不可能的。（二）向林冰将只有一种契机的民间文艺的支配因素降低为从属因素，甚或倒置了其间的相互关系，因而导出了错误说法。（三）民间文艺只有一个死灭的前途。（四）社会发展民主制度的时候，民间文艺也只有成为历史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五）向林冰不了解科学的世界观及历史的规律性。”他认为：“（一）民间文艺是在自己的内部存在着两个对立的契机或两个可能的前途的矛盾的统一体。（二）正因为民间文艺中存在着两个对立的契机，所以才能有所‘降低’与‘倒置’，而且这种‘降低’与‘倒置’正是在旧质胎内促进新质产生的前提条件。（三）由于抗战建国要终结过去农民起义的反复失败而使之成为民主革命的动力之一，所以民间文艺过去的反复夭亡过程亦必终结，并在科学的世界观和现实主义的指导之下而生长为民主革命的文艺，即民间文艺的新生。（四）在民主革命现阶段上所提起的民族形式的建造，应以民间文艺形式的批判的运用为中心。（五）葛一虹不了解科学的世界观及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篇文章后发表在五月七日的《新蜀报》上。

## 五 月

八日 《新华日报》出“诗歌讨汪特辑”。力扬发表了《举起我们的投枪》，说：“我们大声地呼喊着：我们所有的诗歌工作同志，来一同举起我们的投枪，向敌寇汉奸的头上掷去，必须命中，直至他们倒毙的时候。”此外，特辑还刊登了艾青的《仇恨的歌》、丘琴的《就是他！》、王亚平的《告诉你》、光未然的《去你的》、厂民的《兄弟，就这末干》、冯玉祥的《捉汪》、方殷的《火祭》、邹绿芷的《讨汪激》、陆作特的《孩子们的恨》、戈茅的《一头驴子》。

九日 《新华日报》载“文协”消息：“文协”理事会决定：因“会员散居各地，间有失联络者”，要求重新调查登记。

十九日 中华全国美术会在生生花园举行第一届年会，到会有滕固、马衡、唐又精、汪日章、林风眠等八十余人。主席张道藩报告筹备大会经过，继由代表致词，后即修改会章，选张道藩等三十一人为理事、华林等十五人为监事。通过提案有：一、致敬电；二、决定九月九日为艺术节；三、请教育部明年四月举办第三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四、请教育部拨款十万元奖励抗战期间美术作品；五、请教育部增加中小学美术课时间；六、请教育部从速设最高艺术研究机关等。

二十日 向林冰完成《新兴文艺的发展与民间文艺的高扬——再论民族形式中心源泉之三》。文章说：“新兴文艺运动是中国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政治斗争的一环，是中国社

会变革过程上前进力量的一个表现形态，是以内在的变革契机为根据，以先进国世界性文化为条件，通过文艺的形象而争取移植性文化的中国化的变革运动的一翼。因此，它只有正确的配合着民族文艺遗产的批判改造运动（外在条件通过内部根据的矛盾而运动），只有绝对的信赖着人民大众的文艺创作力与欣赏力对于变革动力的依靠与从属是完成历史创造的前题，然后才能遂行其合理的发展。”

二十七日 向林冰完成《民族形式的三个源泉及其从属关系——再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之四》。文章说：“民间文艺形式的批判的运用，新兴文艺大众化传统的批判继承，世界文艺的批判的移植，此三者就是缔造民族形式的三个源泉。”何者为主？自然是“民间文艺形式的批判的运用”。

三十一日 郭沫若完成《“民族形式”商兑》，后发表在六月九—二十日的《大公报》上。这篇文章批评了向林冰的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观点：既不合文艺史发展的实际又是倒退行为。郭沫若认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毫无可议的，是现实生活。”在这个基础上，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文艺的遗产，继承“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优良传统，对外国文艺也要采用“拿来主义”的态度。各方面综合起来，才能完成民族形式的构成。这篇文章被认为是民族形式讨论的总结。

## 六 月

一日 《新中国戏剧》月刊创刊，左军主编。

四日 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举行会议，除商讨其他问题外，还推张道藩、老舍等负责筹办全国抗战文艺展览会。

五日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巡回工作团假渝国泰大戏院上演日语名剧《三兄弟》，并有桂林戏剧界、巴蜀小学、义民妇女服务团参加节目。演出时全场满座，盛况空前。《新华日报》为祝贺这次演出发表了该剧编者鹿地亘的《“三兄弟”的故事》、洪深的《戏剧以上的戏》、力扬的《反对侵略战争》、季凡的《写在（三兄弟）在渝演出之前》、蔡馥生的《单说“懂得”是不够的》。编者在鹿地亘文前加的介绍中说：这个剧的演出“将增加我们对于日本被压迫人民的了解和同情，促进中日两国人民战斗的联合，并且以共同的力量来加速消灭日本军阀财阀们的血腥统治。”

九日 《新华日报》在一心花园召开民族形式座谈会，参加者有以群、蓬子、黑丁、戈宝权、臧云远、胡绳、罗荪、光未然、沙汀、葛一虹、梅林、白薇、潘梓年、吴敏、力扬、戈茅、曾克、艾青，潘梓年任主席。葛一虹说：“如果谈到抗战中的民族形式，这就并不仅仅是形式问题，而是把抗战的生活很现实的具体的描写出来的问题。”艾青、沙汀认为：“新的民族形式，是新现实主义的再发展。”潘梓年认为民族形式的源泉“不只有民间文艺，同样也有过去新文艺运动中积聚起来‘不为不多’的成果，以及国际上的佳作巨著”。“用不着”“在民间文艺这一源泉上特别加以‘中心’的规定。”以群指出：“自从民族形式提出，到现在为止，一直停留在民间形式是不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问题上，现在应该把这一题向前拉一步，更深入更广泛地展开讨论。”座谈会上的发言刊登在七月四、五日的《新华日报》上。

十日 屈原忌日。“文协”举办诗歌晚会。《新华日报》出“屈原纪念特刊”，发表了郭沫若的《革命诗人屈

原》、臧云远的《屈原艺术的发展和评价》、戈茅的《关于屈原》三篇文章，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逝世二千二百一十八周年。

十八日 高尔基逝世四周年。中苏文化协会、“文协”反侵略分会等十一团体假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盛大茶会，出席者三百余人，茶会开得热烈而隆重。《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纪念高尔基学习高尔基》，概述了高尔基的伟大贡献，最后指出：“高尔基的一身奋斗，是丰富的、艰苦的、斗争的、英勇的、坚定的、同时也是胜利的。在高尔基逝世的四周年，我们纪念高尔基，我们更应学习高尔基！”在同日的报纸上，还发表了一组为纪念高尔基而写的文章。计有臧云远的《战斗的美学观》、力扬的《高尔基与诗歌》、戈茅的《风景画和风俗画》。

同日 桂林举行高尔基逝世四周年纪念会，欧阳予倩任主席，百余人参加，司马文森、林林等讲了话。

二十日 戏剧春秋社在重庆纯阳洞一心饭店举行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前会），参加者有阳翰笙、葛一虹、黄芝冈、光未然、常任侠、史东山、任光、陈白尘、章泯、吴作人、汪达之、熊岳兰、辛汉文、林千叶、田汉。阳翰笙说了文艺界一般情形，葛一虹回顾了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批评了向林冰以民间文艺形式为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理论，认为这是“要抹杀中国的新文艺艰苦奋斗的劳绩”，“而我们以为要解决民族形式问题得向科学的世界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去学习”。他还说：“在西北，张庚先生在《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论文中也主张话剧得向旧形式学习，我觉得那也有毛病。我们也并非反对批判的接受旧形式，而是以为应注意可能陷入的民粹主义的偏

向。”黄芝冈对潘梓年在《新华日报》召开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出了异议：“我们不能把民族形式单看着一种新文艺的手法或体裁，而应该注意它的波澜壮阔的内容，血淋淋的现实。我们只有根据这才能寻出文艺的新形式。梓年先生却强调语言的问题”。“民族语言虽是民族精神传统的一部分，但不能认为‘只有这个民族自己的语言’才‘能够表达得出一个民族的生活状态，生活情形’，由于环境习惯的支配，同一语言有时不限于同一民族使用。同一民族在混合的几种语言里，一样能够表达得出一个民族的生活状态，生活情形。”“第二他主张‘从活的语言吸收新的要素。’所谓活的不但应是大众的而且是时代的。儒者武大郎，勇则老黄忠，决不是活的语言。‘起来！不愿做奴隶人们’才能算是活的语言。”潘梓年在发表其谈话时已将其观点作了一些修正。他说：“新写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对新的民族形式的创造当然是很重要的。在写作的实践过程中作者不能不保有着取之无穷用之不竭的工具使写作臻于活泼生动，就是说在作者的脑底不能不储有丰富够用的语汇、语法、写法、手法、描写法，以至体裁，结构等，作为由以采集这些工具的源泉的，不只有民间文艺，同样也有过去新文艺运动积聚起来的成果，以及国际上的佳作巨著，尤其是和工农大众解放斗争有关的佳作巨著。”

二十三日 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假桂七星岩举行会员大会，到十九人，会议内容：讨论工作，改选理事。结果，选出常务理事五名：张在民、廖冰兄、黄新波、陈仲纲、刘建庵，理事九人：温涛、黄超、周令钊、黄少痴等。



## 七 月

一日 挥戈文艺社在成都成立。成员有陈道谟、徐季华、安安、赁常彬、敖学祺、谢宇衡、胡文薰、陈敬等。出版《挥戈文艺》月刊。

八日 周恩来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十日 向林冰写成《关于民族形式问题 敬质郭沫若先生》。文章说，读了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疑难之点愈益增多。全文分四个部分：“‘习见常闻’‘喜闻乐见’”；“所谓‘经’与‘权’的问题”；“‘变文’与一般民间文艺的来源问题”；“‘好多朋友定会惊讶’的民间文艺评价”。后该文发表在八月六日到二十一日的《大公报》上。

## 八 月

一日 “文协”桂林分会与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联合举办暑期文艺写作研究班。时间一个月，八月一日至九月一日。地点在青年会。凡爱好文艺的青年均可报名参加，不收费用。宗旨是推广战时文艺研究，扩大文艺影响。欧阳予倩主讲《怎样建立新的戏剧》、宋云彬主讲《鲁迅杂文的研究》、艾芜主讲《世界几个名作家写作法研究》、陈闲主讲《文艺作品的欣赏》、周钢鸣主讲《文艺写作的任务》、司马文森主讲《写作过程的分析》、鲁彦主讲《短篇小说研

究》、林林主讲《诗的写作研究》、夏衍主讲《剧作随谈》、吴晓邦主讲《舞蹈的创作、批评及欣赏》、温涛主讲《木刻艺术》、新波主讲《绘画艺术》、聂绀弩主讲《语文问题及语文运动》、孟超主讲《临时演讲》。

同日《新音乐月刊》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出版，内有“民族形式特辑”，共两篇文章：绿水的《论新音乐的民族形式》和赵沅的《音乐的民族形式》。绿水文谈了：一、音乐“民族形式”的意义；二、缔造音乐民族形式的主要要素；三、关于各种要素的基本的理解；四、怎样创造新音乐的民族形式。作者说：“我们认为比较中肯的还是这样：

‘缔造音乐民族形式的主要要素，是经过批判以后的民族音乐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部，包括各式各样的旧形式，和旧形式的各式各样的独特要素，和五四以来新形式的健康要素，还有此刻还未被民间旧形式所包纳的，然而已经在大众中间创造着运用着的，表现新事物新感情的生动活泼的音响，乐汇和样式，再加外来的适合取用的要素。’赵沅文包括：一、从历史来观察；二、怎样创造民族形式。作者对如何创造民族形式从四个方面作了概括，这四个方面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继承新音乐运动光荣的传统”，“接受民族音乐传统的宝贵遗产”，“武装西洋音乐高度技术、理论水准”。本期除刊载了天兰词，冼星海曲的《打到鸭绿江大合唱》（原名《九一八大合唱》）外，还刊载了冼星海的一封信，说：“新兴音乐是要建立在音乐界统一战线里，同时要互相了解互相帮助才能完成我们新音乐运动的任务。老实说，现在中国音乐刊物太少，中国音乐界还没有团结得更坚固。”此外，还登有《民歌研究会组织大纲》。研究会的宗旨是：“我们为了利用民歌及发展民歌创作民歌，使民歌更

适合抗战的需要，且使它完成为中国的新音乐艺术适用的宝贵素材而研究民歌。”

三日 渝文化界假中苏文化协会举行鲁迅六十诞辰纪念会。郭沫若、田汉、张西曼、葛一虹、沈钧儒、吴克坚等参加了盛会。郭沫若说：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他的肉体虽没有了，但他的思想和精神是永恒的。”

“我们要学习他，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鲁迅。”田汉、张西曼、葛一虹等相继讲了话。

《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我们怎样来纪念鲁迅先生？》，指出：为了纪念鲁迅先生，“我们就要继承他创作的光荣传统和他一生所抱的为民族、为人民，和为求进步而斗争的精神。”“我们就要学习他坚强不妥协和坚持抗战到底的精神。”“我们就要加强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此外，该报还发表了戈宝权的《略谈鲁迅先生与苏联——为纪念鲁迅先生六十诞辰而作》、潘梓年的《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罗荪的《自觉的声音》、葛一虹的《鲁迅论大众文艺——纪念鲁迅先生六十诞辰，并为目前争议中民族形式之一问题而作》，成都、桂林、昆明也举行了鲁迅六十周年纪念会。

四日 “文协”桂林分会请欧阳予倩，夏衍、艾芜、鲁彦、林林等举办暑期文艺写作研究班，讲抗战时期的文艺问题。

二十日 《野草》创刊于桂林，编辑者夏衍、孟超、秦似、聂绀弩、宋云彬等。代发刊词《野草》说：“我们虽然自称善于憧憬光明，却同时也善于忘怀灾难。前线和敌战区正在一枪一弹搏击敌人，在后方倒有人穷奢极乐，豪华郁丽，坐汽车上馆子，运私货发大财，口里说的是抗战建国，

心里想的甚至手里做的却可以是抗战建家（这里的“抗”作动词，“家”作名词解）。”“为了这些杰出的人们，和他们公子哥儿、帮闲们和帮忙们的兴趣，这一类读物真是鸿运高升，方兴未艾，而尤其销数之多，装帧之美，自视之高，又足证有钱且有闲的欣赏者正在方兴未艾。”为什么叫“野草”？因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二十六日 《新华日报》发表葛一虹文章《纪念礼锡》，叙述了王礼锡在伦敦时对祖国的思念、回国后献身抗战的事迹，表示了对王礼锡的怀念。“他所留给我们的印象，我们想是不会磨灭的。”

二十八日 “文协”致书全世界作家，痛斥日寇狂炸重庆暴行，期全世界作家共予制裁。书曰：日机“大肆轰炸，夜以继日，重庆市内市外火光冲天，延续数日，闹市家宅，尽成灰烬，被难灾民，露宿街衢，似此摧残文化，违反人道，破坏公法，诚灭绝人性的兽行，为全人类之公敌。”希全世界作家予以“谴责与制裁”。载同日《新华日报》。

## 九 月

三日 郭沫若、田汉、老舍、郑用之等五十余人所发起的音乐家张曙追悼会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举行。张曙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桂林日机轰炸时遇难的。主席郭沫若着重谈了张曙的功绩，还大喊：“离开了民族的精神没有文化，离开了民族的精神，没有一切！”周恩来同志说：张曙先生之可贵在于和聂耳同为文化战线上两员猛将。这文化战线包括着文艺、诗歌、漫画、木刻、音乐各部门，给全民的抗战起了伟大的推动作用。救亡歌咏便是最显明的，代表了

大家发出了反抗的怒吼，代表大众发出了要求团结的呼声。张曙先生便是这样的工作中的一个，这功绩是永远永远不磨灭的。接着他就谈及当前的局势：无论从日本方面，国际方面和我们自己国内方面，我们都具备了绝对可能克服困难的条件。只要很好地动员全力，正确地发挥张曙先生的勇敢精神，挺得住，再接再励，自然慢慢地就有办法。

六日 茅盾完成《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作者从四个方面驳斥了向林冰：第一，“如果我国固有的文艺形式而有所可取”，“那么，一切旧形式皆当有分，不应只推崇民间形式”；第二，“向先生的‘中心源泉’论，表面上虽似欲建立民族形式，实际上却是延长了应该被淘汰的封建社会文艺形式的寿命”；第三，“我国固有文艺形式中的一些‘特征’，实在都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产物”，“要在这上面建立”或“导引出民族形式来，那就不免是大笑话了”；第四，“向先生口里虽然一再说民族形式‘将以大众为主体的抗战建国’为其内容，但从向先生的整套接受民间形式这一主张看来，则向先生心目中的抗战建国的归宿，实在还是换汤不换药的旧中国。”这篇文章发表在九月二十五日《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一期上。该文受到进步文艺界的重视和欢迎。

## 十月

八日 《新蜀道》副刊《蜀道》举行座谈会，题为《从三年来的文艺作品看抗战胜利的前途》。出席者有田汉、黄芝冈、潘子农、沙汀、沙雁、侍桁、陈晓南、陆晶清、戈宝权、罗荪、陈纪滢、葛一虹、叶以群、华林、宋之的、沈西

苓、姚蓬子等二十二入。大家总结了“武汉会战以前”抗战文艺之情形：“作家都抱着一种天真的兴奋的情绪，歌唱胜利，憧憬光明。”武汉失守后，作家才“逐渐看清了抗战的胜利决不会廉价地获得，于是批判地来描写光明，同时也暴露黑暗”，当然，“暴露黑暗是为了消灭黑暗，作家的根本观念依然是乐观的积极的，和抗战初期并没有改变。”座谈会指出：摆在作家面前的任务是“如何更深入的去观察现实，把握现实，如何从光明和黑暗的交织中去正确理解光明，理解黑暗。”

十三日 “文协”桂林分会召开周年纪念大会，同时改选理事。选举结果，欧阳予倩、艾芜、林林、宋云彬、黄药眠、夏衍、司马文森、周钢鸣、李文钊、聂绀弩、欧阳凡海、孟超、冯培澜、秋江、林山、莫宝铨、陈此生、芦荻、谷斯范十九人当选。《救亡日报》出了纪念特刊。

十九日 “文协”、中苏文化协会、中国文艺社等十二个团体在巴蜀小学举行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到会有周恩来、冯焕章、沈钧儒、郭沫若、梁寒操、陈访先等三百余人。主席冯焕章致词说：“鲁迅先生的伟大精神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是‘真’，他对于大众，对于国家，他从来不说一句假话。第二是‘硬’，他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地步，他一生从没有向恶势力屈服过。第三是‘韧’，他愈失败愈不屈，愈困难愈战斗。”国民党市党部陈访先大声说要学习鲁迅的奋斗精神，而田汉更主张发扬鲁迅尖锐的批判精神。晚上，渝文艺界同人在一心饭店举行聚餐会，到五十余人。主席老舍讲话后，周恩来同志演说。他指出鲁迅有四大特点：一、律己严；二、认敌清；三、交友厚；四、疾恶如仇。

《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悼念青年的导师鲁迅先生》；指出我们“追念的是他爱护青年的热烈而诚挚”，“追念的是他历久不疲不倦的战斗生活和他给予文化运动以及整个革命运动推动力量的强大”，“追念的是他一生好学之勤，求进之猛”，“追念的是他对于劳动大众的忠诚，对于革命叛徒的深恶痛绝。”该报还发表了叶剑英的《我也来纪念鲁迅》、茅盾的《纪念鲁迅先生》、张望的木刻《纪念鲁迅先生》、冯玉祥的《纪念鲁迅》（诗）、于玲的《“开会”之于鲁迅》、陈烟桥的《鲁迅怎样指导青年木刻家》、戈宝权的《论鲁迅——见一九三九年苏联文学日历》（译文），以资纪念。

同日 “文协”桂林分会、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生活教育社、“木协”等举行了鲁迅逝世四周年紀念会，到二百余人，欧阳予倩主持，陈此生、刘季平讲了话。

二十日 画家张善子在歌乐山宽仁医院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二十一日 “文协”召开理事会。考虑到重庆已入雾季，作家纷纷返城的情况，理事们讨论了今后之研究及出版工作。理事会对七月成立的“文协”晋察冀分会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是在敌后建立的一巨大文艺堡垒，特致电庆祝。“文协”举行了小规模茶会，欢迎外国友人。老舍、胡风、卢鸿基等人对日前抗战中作家与画家之生活作了简要叙述。

二十二日 全国木刻十年纪念展览会在桂林举行，展出木刻作品五百余幅，木刻书报一百五十余幅，木刻史料图片近百种，观众八千多人。

二十七日 “文协”举行诗歌晚会，五十余人出席，胡

风主席。老舍及常任侠朗诵了诗歌，艾青就三年来的抗战诗歌运动发表了意见。

十月 罗荪作《关于现实主义——答史笃先生》。这是针对史笃发表在《文艺阵地》第四卷第十二期上面的《再关于现实主义》一文而发的。他驳斥了史笃对《关于“现实主义”》的错解，提出了自己对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相互关系的看法。同时还指出世界观对于创作方法是有指导作用的，但是，“世界观也并非完全绝对的决定着创作方法”。

## 十一月

一日 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这是在第三厅被“改组”后成立的。郭沫若、阳翰笙分别为正副主任。在翌月七日举行的招待会上，郭沫若说：“‘文工会’内分国际、文艺研究组和对敌工作组。希望所有的笔杆一致对外，将来更一致建国，抗战就是伟大的新文化运动，盼望大家担负起这个伟大的担子。”

同日 《戏剧春秋》创刊，田汉、欧阳予倩、洪深、杜宣、许之乔编辑。《戏剧春秋》是月刊，但实际刊期未定。出至第二卷第四期，一九四二年十月停刊。

二日 戏剧春秋社在重庆天官府街举行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郭沫若、阳翰笙、杜国庠、胡风、老舍、郑伯奇、陈望道、茅盾、孙师毅、洪深、赵望云、姚蓬子、辛汉文、朱洁夫、安娥、施白芜、力扬、章泯、凌鹤、龚啸岚、应云卫、贺绿汀、常任侠、程梦莲、盛家伦、苏怡、王瑞麟、马彦祥、黄芝冈、田汉参加了座谈。郭沫若说：“追求适合新内容的新的民族形式，无非是到达世界文学的



一个过程。”他认为：“将来的世界形式当然应以社会主义为内容，今天苏联的文艺不过是过渡期的文艺，所以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因各民族狭隘的特异的生活习惯、风俗、传统等一时不易扫掉。这些特异性或因经济基础或因交通关系而存在，到了新的社会当然可以渐次消灭或减少。而各民族间的共同性必然加强。当然，大同中还容许小异，这不仅男女性别或人种的肤色不可变易而已。但过去因贫富悬隔而引起世界观的悬隔，对事物的看法以及感情的悬隔，这些悬隔决定了文艺在社会阶级间的特异性，在新社会的新文艺中大约是不会再有了。”茅盾《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一文谈了民族形式与经济基础有关，发言除强调这点之外，还指出：“我们为建立中国的民族形式要紧的是深入今日的中国的民族现实。比如我们要写中国农民必须是其声音笑貌、忧愁、烦恼、争论时的手势等完全是中国农民的，而不是外国农民的，同时是现代中国农民的而不是前一时代中国农民的。”田汉谈到话剧的民族形式问题，说：我们的话剧或歌剧现在都在追求着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在革命的实践上能组织鼓动更广泛的民众。二、在创作方法上能配合日益波澜的生活内容。这一种形式我们叫它民族形式。”盛家伦在谈到新民族歌剧之音乐改造问题时，主要指出了两点：“乐器西洋化！形式中国化！”

同日 戏剧春秋社在桂林召开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宋云彬、聂绀弩、易庸、夏衍、欧阳予倩、黄药眠、蓝馥心、姚平、许之乔、杜宣等人参加。座谈会讨论了民族形式的原则问题。宋云彬说：“记得有人提出过民族形式的三个原则，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我以为这说法比

较具体。”还讲：“我们可以说，凡是反民主、反科学、反大众的，无论是旧有的也好，外来的也好，都不是民族形式。”欧阳予倩认为：民族形式的原则“就是：‘中国的’，‘现代的’，‘大众的’。”“现代是科学的时代，因此也可以说：‘现代的’就是‘科学的’，‘现代的’就是要现代适用。”“‘中国的’就是适于中国的，中国人民所能接受，所能理解的。”“‘大众的’，是通俗的。”夏衍认为：“民族形式的定义，可以把欧阳先生与宋云彬先生刚才所发表的意见综合起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以现代中国大众生活所有的东西作为内容；以现代中国大众所喜爱，所理解的形式作为形式。”与会者普遍认为，“民族形式不是固定的而是向前发展的。”在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上，主要谈的是旧瓶装新酒的问题。欧阳予倩说：“在创造民族形式的过程中，采纳各种形式的长处——不管是外来的，还是旧有的，是必须的。但在采集旧的形式方面来说，我极反对旧瓶装新酒的办法。”他又说：“以旧的形式来表演新的内容，如用特别的方法来处理也不会肉麻。”聂绀弩说：“在武汉时，曾看过老舍写的‘旧瓶装新酒’的《忠孝图》，看过之后，觉得非常肉麻。可是我也看过欧阳先生编导的《玉堂春》、《桃花扇》却并不感到肉麻。”“旧剧的形式，是在旧时代产生用来‘表示’旧人物，旧生活习惯的东西；纵然改良，它的表现范围，还是不够宽广。”宋云彬也说：

“‘旧瓶装新酒’果然要不得。”会上，一些人对向林冰的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提出了批评，表示同意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中的观点。

十日 老舍、胡风、章泯、黄芝冈、葛一虹、应云卫、王平陵等六十余人举行戏剧晚会，胡风主席，讨论题为《怎

样表现主题与怎样创造人物》。讨论甚为热烈、深入。

十二日 “文协”、中苏文化协会等团体联合主办盛大晚会，请中华交响乐团演奏名曲，还放映了《白云故乡》。

十七日 老舍、沙汀、陈铭枢、张西曼、胡风、黄芝冈、宋之的、叶以群等七十余人举行小说晚会，沙汀任主席。欧阳山宣读了论文《抗战三年来的小说》。

二十三日 郭沫若、王平陵、黄芝冈、田汉、叶以群、宋之的、艾青、老舍、蓬子、阳翰笙、冯乃超、欧阳山、葛一虹、罗荪，举行汇报座谈会，蓬子任主席。蓬子说：“今天所要讨论的题目是《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在“这一个总的题目之下，包括了四个小的讨论节目。就是：‘新现实与新风格’，‘新内容与新形式’，‘创造历史性的作品’，‘扩大文艺战线的新队伍’。”与会者主张合起来谈。郭沫若说：“抗战的条件如果一九四一年没有改变”，那么，“更雄大的叙事诗、更音乐性的抒情诗、多幕剧、长篇小说，将更多地出现。所以争取这客观条件是必要的，这就是说，作家在创作实践之外，政治斗争是必要的。”“更贡献一点意见。无论任何工作，一定要先有准备工作。目前文艺创作上的准备工作有三方面，就是：材料的准备，人的准备，方法的准备。”欧阳山、葛一虹、艾青等分别从小说、戏剧、诗歌方面对一九四一年作了展望。该座谈记录以《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为题发表在《抗战文艺》第七卷第一期上。

二十四日 “文协”举行诗歌晚会，到七十余人，艾青任主席，讨论诗的语言问题。老舍、徐迟、长虹、任钧、王平陵等人发了言，艾青、光未然、常任侠朗诵了诗歌。

## 十二月

一日 “文协”诗歌朗诵队举行联欢大会，光未然任主席，臧云远、方殷、安娥、李嘉等三十余人出席。柳倩、任钧、戈宝权等人发了言，徐迟、丘琴、方殷等朗诵了自己之诗歌。

同日 “文协”举行戏剧晚会，田汉、洪深、葛一虹、高长虹、黄芝冈、安娥等五十余人参加，胡风任主席，讨论题为《怎样发扬戏剧上的现实主义》。

七日 “文协”假中法比瑞同学会举行茶话会，欢迎茅盾、冰心、巴金等来渝作家。到会者有周恩来、郭沫若、老舍、吴文藻、田汉、张西曼、冯乃超等七十余人。大家互相恳谈，表示要为抗战胜利而奋斗。

八日 “文协”假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小说晚会，讨论小说中的人物描写，具体包括对人物的看法，现实里面的人和作品里面的人，从发展中看人物、人物的特征。到老舍、茅盾、胡风、以群、沙汀、黄芝冈、胡绳、常任侠、徐盈、潘梓年等六十人，黄芝冈任主席。以群发言指出：应该从人的社会关系和矛盾中，而且从矛盾的发展中去理解人的本质。作品里面的人是经过概括和提炼的，因此比现实中的人更为真实。作者在写作中对题材应作主观的加工，否则便流为市儈的现实主义。同时，作者的主观亦需与客观的真实配合，才不成为主观的突破，才不成为标语口号的公式的文学。

九日 《新华日报》刊载“文协”讨汪通电，怒斥汪精卫罪大恶极，要求大家口诛笔伐，讨汪除奸。

十日 “文协”桂林分会组织的文艺讲习班在桂正式开班。上课时间定为每周的星期三与星期五下午。

十五日 “文协”、国际反侵略分会等八团体举行联合晚会。会上演奏了《黄河大合唱》，还放了电影。

十八日 电影剧作家沈西苓在渝病逝，享年三十七岁。

十九日 《新华日报》载：“文协受贵阳《中央日报》、宜昌《武汉日报》之托，征求、评选抗战长篇小说。

“文协”在《抗战文艺》第四卷第三、四期合刊上发布了征文通告：“征十万字以上创作小说”，“题材限于：（一）前线的战斗形势，或（二）沦陷区域的生活动态，或（三）后方生产建设的进展过程。”“中选者受奖金一千元。”“收稿期本年十月底截止”。结果，s.m之《南京》与陈瘦竹之《春雷》得奖。

二十日 “文协”诗歌朗诵队举行扩大座谈会，讨论怎样朗诵。

二十一日 中华全国漫画家抗敌协会假中苏文化协会举行成立大会，到高龙生、陆志庠、张光宇等十余人。大会通过了章程，并推举理事九人，常务理事五人，还决定于短期内举办鲁少飞个人速写画展，第二次全国漫画展览以及继续出版抗战漫画月刊、丛书、会报和加强各地漫画界联系工作。

同日 “文协”举行诗歌晚会，到五十余人，黄芝冈任主席。老舍、方扬、王平陵、艾青等谈了创作经验，光未然、方殷、李嘉、任钧等朗诵了诗歌。

二十六日 文化工作委员会举行音乐晚会，地点是中国电影制片厂，贺绿汀率育才学校音乐组参加演出，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参加了晚会。周恩来应育才学校陈贻鑫同学之

请，在其纪念册上题词：“为新中国培养出一群新的音乐天才。”

二十七日 “文协”于张家花园召开理事会，讨论了下届理事改选及在明年三月号《抗战文艺》上发表各部会务报告等多种问题。

二十八日 文化工作委员会主持之文艺讲演会在渝国泰大戏院举行。千余人参加。郭沫若任主席，茅盾、老舍、洪深、马彦祥、史东山、贺绿汀、阳翰笙等担任了报告任务。郭沫若致词说：召开文艺演讲会之主旨在检讨二十九年文艺战线上的战士们对于抗战建国的贡献，亦即策励今后文艺工作者之努力方向。中国今日正与最粗野、凶横、破坏文化之日本帝国主义者搏斗，因之今日中国在文艺上的反映亦为建设性的，创造性的，进步的，反侵略的。而当二十九年行将告逝，新的三十年度瞬即到来之际，检讨文艺工作不特含继往开来之意，更进而期望民国三十年，中国将有大批青年作家诞生，用文艺之笔来帮助抗战早日胜利。旋即举行报告，题为《一年来抗战文艺的回顾与前瞻》。老舍、茅盾、马彦祥、龚啸岚、赵汎、史东山分别报告了文学、戏剧、音乐、电影等方面的情况。

十二月 《木艺》在桂林创刊，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编。创刊号刊载有刘建庵的《对当前木刻运动的几点意见》及李桦、建庵、冰兄、温涛、新波的《十年来中国木运总检讨》。

## 一九四一年

### 一 月

一日 “文协”发布《致苏联文艺界书》，谈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从没有因为困难而放弃过自己底岗位，在客观条件非常艰苦境遇下面是这样，在敌机残酷轰炸下面是这样，甚至在黑暗的沦陷区或者炮火连天的前线也是这样。”而且，“在这个艰苦的然而伟大的斗争里面，从参加实际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间，从觉醒了的人民中间，饱含着新的生命健康的作家，在不断地成长，出现。”还谈到苏联文艺对中国的关系，“你们底作品，特别是伟大的M·高尔基的作品，对于我们底新文艺所发生的影响，决不是在简单的叙述里面能够说明的。”最后表示了中国作家准备走艰苦道路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心。这个文献发表在同日出版的《抗战文艺》第七卷第一期上。

同日 “文办”桂林分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漫画协会联合在桂举行街头诗画展，地点是乐群社，时间两天。诗之作者是婴子、紫秋、韩北屏、孟超、林山，漫画与木刻的作者是汪子美、新波、温涛，共展出五十来幅。

五日 “文协”诗歌朗诵队在渝举行朗诵会，这是由一部分诗人、音乐家发起而由陈纪滢、光未然、方殷等负责组织的。

七日 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泾县茂林地

区暗集八万余部队，对我新四军北移部队九千余人实行突然袭击，造成了严重伤亡。十七日，顽固派又发布命令，竟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

同日 《新华日报》发表惊秋的连载文章《陕甘宁×区新文化运动的现状》，对边区文化作了全面介绍。全文分：一、滋长中的大众文化；二、学术研究；三、群众文艺的道路；四、戏剧、歌咏及其他；五、两种文字运动；六、鲁迅在延安；七、文化团体举略；八、刊物一览等。

八日 茅盾、胡风、戈宝权、庄启东、以群、罗荪、宋之的、葛迪鹤、胡绳、艾青、光未然、葛一虹、力扬、臧云远举行座谈会，座谈作家的主观与艺术的客观问题。胡风说：

“现实主义的力量可能把不正确的世界观打碎，减弱。强调现实主义的力量就是在此。但是，并非是说，正确的世界观可以妨碍艺术作品，如果这个作家有正确的世界观，他的成就一定更伟大。也就是说，不正确的世界观在现实主义面前便要被打碎，被减弱；如果是正确的世界观，则现实主义的力量便显得更大。”光未然说：“现实生活是复杂多样的，要是一个作家没有正确的方法和态度去认识它，把握它，自然形成一种支离破碎的世界观、不正确的甚至于反动的世界观。尽管是这样，要是那个作家肯忠于现实，在创作上始终执着于现实主义，久而久之，他渐渐的认识了现实生活的矛盾面，由此加深加剧了他自己世界观的矛盾。”艾青也认为：“在创作实践的过程中是可以改变和提高作家的认识的。”以群对于“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成功，是由于现实主义减弱了他们底反动的世界观的作用”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巴尔扎克虽然是属于贵族阶层，对他所属的贵族有着同情，曾经说过表明拥护王党统治偏见的话，但是，这一切，只能说是表现了



巴尔扎克世界观底一部分，而不能说是全部分。”“他底世界观内有着落后的成分，也有着进步的成分。而他的作品之成功，则是他底世界观进步成分占优势，落后部分占劣势——进步的成分战胜了落后的成分的结果。”茅盾认为：“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固然是一大变动，但和人类历史上正在到来的目前的社会大变动，有一点本质上的不同，即资本主义是拥护私有财产制的，与封建制度一样。所以我猜想，巴尔扎克虽然同情于封建贵族，却未必视新兴资产阶级为洪水猛兽，他对于新兴资产阶层那种干练精明，宁是赞美的。”座谈会还讨论了什么是世界观、世界观是怎样形成的、世界观的发展等问题。座谈记录以《作家的主观与艺术的客观性》为题发表在《文学月报》第三卷第一期上。

十二日 “文协”桂林分会召开民族形式讨论会。讨论民族形式之提出、提出中心源泉之经过、构成民族形式的基本条件等问题。主要发言人是周钢鸣与艾芜。

十四日 《新华日报》载：“文协”诗歌朗诵队最近出一油印刊物，刊名为《朗诵通讯》。

十八日 《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抗议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题词和题诗。题词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题诗是：“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十九日 留渝木刻工作者假文化工作委员会开谈话会，到会有陈炳桥、卢鸿基、王琦、张望、魏磊、丁正献、邵恒新、张时敏等数十人。谈话会决定：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主办一全国抗战木刻展览。二月底齐稿，三月初展出，售出作品作慰劳前方抗战将士之用。

一月 “文协”成都分会在春熙路青年会举行年会，叶菲洛任主席。年会举行了选举，刘开渠、刘盛亚、厉歌天、

苏子涵、洪毅然、罗永培等被选为理事，李劫人、刘盛亚被推为代表成都分会的总会理事。

## 二 月

五日 洪深及夫人和女公子一家三口服毒自杀，郭沫若等闻讯借医生急往，使得脱险。遗书曰：“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且归去。”凌鹤七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关于洪深先生的“不幸”》，指出：“什么原因使他们自杀，在绝命书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事业和政治不能分开，在他看来是毫无办法。而家庭中因其女公子久病不愈，医药费甚巨，姑不必说，而心情的烦燥，使家庭间满布着惨淡的空气，也确实使人觉得不安的。尤其是洪夫人工作心切，难以如愿，早已有厌世之念，这是时相过从的朋友们深切知道的。”

七日 国民党成立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副主任委员潘公展、洪兰友。内分文艺、新闻、出版、音乐、美术、戏剧等组，还有个设计委员会。任务是“规划全国文化运动之各种方案”，“协助策进各地文化事业”，对于“有关文化运动之调查设计。”

十日 重庆《新蜀报》副刊《七天文艺》创刊，这是文化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共出了一百三十多期，一九四四年十月终刊。

十三日 为响应渝文化界出钱劳军运动，“文协”在《新蜀报》《蜀道》上发布重要启事：“陪都文化界出钱劳军竞赛正在开展，同人等自应参加，虽生活艰难，首推文人；但

事关爱国，自当分衣食之资以献国家。惟因时间短促，未及一一通知。兹特商借‘蜀道’一角，敬请本会同人暨所有文艺作家，从本月十四日起至二十日止，尽可能投文陪都各刊（‘蜀道’当由本会商请蓬子先生尽先披露作家劳军稿），并于稿末注明‘本稿稿费赠前线将士’，由该刊将稿费汇交‘陪都文化界出钱劳军竞赛动员委员会’，并付收据，披露芳名。事关争取抗战胜利，希望作家从速动笔！”原定止于二十日，但因劳军稿多，遂延长至三月一日。

十九日 茅盾作《抗战期间中国文艺运动的发展》。这篇文章谈了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文艺中心的变化。抗战前，北平和上海是中心。北平、上海沦陷后，文艺中心是武汉和广州。武汉、广州陷落，文艺中心又转移了。“事实上，今天的中国文坛已形成了好几个中心点，重庆是一个，桂林、延安、昆明、金华，乃至上海，也都是其中之一。”此外，谈了文艺队伍的变化问题。抗战开始后，“中国的前进的文艺的后备军，是在大量地产生了，培养了，这是中国抗战文艺运动中最光辉的一页，而且也是最主要的特征。”第三，谈“我们的文艺的内容与形式问题，也就提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指出：“中国作家所必须反映者，正是这样的抗战的现实。”“至于形式问题，由从前的‘大众化’，而更进一阶段，即所谓，‘民族形式’”。

二十一日 “文协”发起会员卖字运动，所得均劳军。地点在渝观音岩《新蜀报》营业部。口号是：“文协出纸，作家出力，请诸公出钱。”价格便宜，成绩不坏，二十八日累计卖了一千元。卖字运动截止时间是三月十一日，共十八天。

二十六日 冯雪峰在浙江义乌被捕，关上饶集中营。后

经周恩来、董必武等多方营救，一九四三年夏始出狱。

二十八日 “文协”理事会决定：改选第三届理事采用函信选举方式，不举行大会投票，以节省人力和物力。

同日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成立戏剧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治中，副主任委员郭沫若、何浩若，常务委员洪深、田汉、熊佛西、郑用之、鲁觉吾、马彦祥、应云卫等。

二十九日 老舍代表“文协”首次捐献劳军款五百元。

### 三 月

二十日 《抗战文艺》第七卷第二、三合期出版。刊载有“文协”《总务部报告》、《研究部报告》、《组织概况》、《出版部报告》。总结两年来之工作。此外，还刊载有一组“关于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意见”。发表意见的有巴金、靳以、胡风、叶以群、茅盾、老舍、草明、吴组缃。他们从不同角度谈了塑造人物形象的感想。

二十五日 文化工作委员会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戏剧批评座谈会，凌鹤主持。参加者有阳翰笙、张骏祥、葛一虹、凤子、章罍等。会上探讨了《国贼汪精卫》、《天长地久》、《乐园进行曲》、《秦良玉》等剧中提出的问题，还研究了剧运中出现的重要问题。

二十七日 “文协”举行三周年成立纪念会，出席者有老舍、胡风、巴金、阳翰笙、姚蓬子、华林等五十余人。老舍报告本届改选理事及响应出钱劳军之经过，旋即进行茶会。本届理事的改选没有举行大会投票，改用的是信函选举方

式。信函选举是二月理事会定的，三月十五日就揭晓了。选出的在渝理事二十五名：叶楚傖、冯玉祥、郭沫若、张道藩、老舍、茅盾、田汉、姚蓬子、冰心、王平陵、郑伯奇、巴金、胡风、洪深、曹靖华、孙伏园、华林、徐仲年何容、老向、陈望道、阳翰笙、孔罗荪、冯乃超、宋之的。选出的各地理事四名：邵力子、林语堂、叶圣陶、曹禺。选出上海理事二名：郑振铎、楼适夷。选出候补理事十五名：马宗融、沙汀、黄芝冈、张恨水、潘梓年、戈宝权、陈纪滢、葛一虹、沈起予、靳以、顾一樵、鹿地亘、艾青、叶以群、宗白华。

二十八日 文化工作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合办之战时木刻展览会从是日起至三十日止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作品义卖劳军，来自战地作品甚多。

三月 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被国民党非法解散。托词是逾期不汇报工作。

## 四 月

十四日 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一周年。《新华日报》发表了纪念诗文，计有 S·E 的《纪念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一周年（诗）》、A·斐父拉尔司基编、S·C 译的《马雅可夫斯基礼赞》（诗）、《马雅可夫斯基身后褒典三则》。

二十六日 “文协”筹办的渝各界文化团体联欢晚会在广东酒家举行，二百余人到会，老舍任主席。他在会上朗诵了《阿 Q 正传》中之一段，冯玉祥也朗诵了新作。

二十七日 文化工作委员会在抗建礼堂举行文艺讲演会，听众拥挤。首由老舍讲小说创作方法，包括选材和描写

方法等。次由孙伏园讲散文创作方法及散文与小说、诗歌之区别。末由郭沫若讲诗歌创作方法，勉今日之诗人多反映抗战之现实生活，为新中国的将来而努力。讲演完毕后，即由孩子剧团合唱《乐园进行曲》里之插曲。

## 五 月

一日 胡风编的《民族形式讨论集》本日出版。这本论文专集，收集了二十九篇文章，还有两个座谈会记录。编者将文章分为十一组：第一组是提出问题，第二组是关于旧形式的作用，第三组是各部门创作者的意见，第四组是戏剧民族化论文，第五组是关于“中心源泉”论的前哨战，第六组是对“五四”新文艺传统的评价，第七组是“中心源泉”论者的大规模反攻，第八组是对于“中心源泉”论的批评及“中心源泉”论者的反批评，第九组是各展开详细见解的两篇论文，第十组是两个座谈会记录，第十一组是从大众化方面对“中心源泉”论的再批评。尽管文章收集得不算多，但民族形式讨论的发展情况基本上反映出来了。

二十三日 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万岁剧团为推进戏剧运动，增加演员经验，联合该厂同人从是日起举行星期公演，演至二十五日。上演剧本：《人约黄昏》、《赎罪》、《皇军的刺客》。票价低廉，为保证星期公演的进行，他们还组织了星期公演委员会，并决定每周至少公演一次。

二十五日 文化工作委员会在渝举行民歌研究演唱会，参加演出的有边疆歌舞业余歌咏团、四川水泥厂职工歌咏团、舞蹈家吴晓邦等。

二十八日 桂林市第一次民众音乐会在公共体育场举行，节目甚为丰富。其中青年歌咏团与前锋联唱之《前程万里》及黄花岗纪念校之小童指挥，最为精采。最后参加单位与全体听众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声震遐迩。参加音乐会的六千余人，情状一直极为热烈。

三十日 屈原忌日。中国诗歌工作者定是日为诗人节，以资纪念。“文协”假中法比瑞同学们举行首次诗人节庆祝会，到会有于右任、郭沫若、阳翰笙、老舍、姚蓬子、孔罗荪、周钦岳、潘梓年等二百余人。主席于右任致词说，诗人乃民族之灵魂，屈子守正不阿，洁人忧国，堪为今人之效。老舍报告诗人节筹备经过。郭沫若讲了屈原的死期，应是二千二百一十六年以前，即楚襄王二十一年。投汨罗江那一年恰六十岁。还说：屈原投江实由于不甘忍受楚国之沉沦，并非一般所指的牢骚而自杀。屈原确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诗人。讲演完毕即进行朗诵。庆祝诗人节，“文协”还发布了《诗人节缘起》，高度赞扬了屈原守正不阿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诗歌创作上取得的伟大成就，并说：“我们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的精神，是要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是要了解两千年来中国诗艺术已有的成就，把古人的艺术经验，作为新诗的创作途中的养料，是要现代的诗人们互相检阅，互相砥砺，以育成中国诗歌的伟大的将来，是要向全世界高举起独立自由的诗歌的旗帜，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

《新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庸剑·龙舸·鲤帜》、柳倩的《纪念与任务——祝贺第一个诗人节》、申的《吊屈原》（七律一章）、和山的《关于离骚》、李石峰的《“从咚咚……”说到屈原》，以示祝贺。

三十一日 桂林青年界为筹款购献滑翔机，发起举行的

盛大露天歌舞大会在乐群社球场举行。负责人陈大文曾说：“此次演出，相信是南中国之空前热烈的演奏创举。同时是献滑翔机捐款，入场票价虽然定得贵一点（分十元，二元两种），希望各界当作赞助滑翔运动一样的热烈，来赞助露天歌舞大会。”节目：器乐方面有铜乐合奏，口琴，钢琴等；声乐方面有《民族战歌》、《战斗的爱》、《播种之歌》、《空军歌》、《喀秋莎》、《桐花谣》等；舞蹈方面有《胜利舞》、《团结舞》、《乌克兰舞》、《虞姬舞》、《祭祖舞》、《斗牛舞》等。参加单位和个人有绥署部队、各中学、国艺社。艺师班、特师班、前锋歌咏团、狄润君、兰乾碧、郑蕾、李秀琼。

## 六 月

十七日 《文艺新哨》创刊，徐西东、吴凤楼、罗洛汀等编，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五日终刊，出至第二卷第二期。

十八日 高尔基逝世三十五周年。中苏文化协会联合文化工作委员会、国际反侵略分会、“文协”、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留俄同学会等十四个单位假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纪念会。到会有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冯玉祥、沈钧儒、老舍、张西曼、王昆仑、姚蓬子、曹靖华等多人。主席梁寒操。郭沫若斥责了痛恨高尔基和中国的高尔基鲁迅那些人，还说：“有了高尔基这样死了又永远活着的人，令我们对比地不得不联想到很多活着而永远死去了的人，特别是在高尔基逝世五周年的今天，我们的一位出卖民族利益的大汉奸汪精卫，正亲身在日寇的宫庭里朝觐。”演讲后即进行朗诵。老舍



朗诵了高尔基的《鹰之歌》。最后放映了电影《在人间》。

《新华日报》发表了时评《高尔基——列宁的至友》，指出：“高尔基逝世已经五周年了。五年以来，我们每年在这个忌辰都要举行盛大而肃穆的纪念。这说明我们对这个世界新艺术的巨星是懂得尊敬的，也正在说明我们的新艺术运动是和高尔基所指导的新艺术运动同其旨趣——为劳动人民而服务。”此外，该报还发表了戈宝权的《回忆高尔基》、秀兰的《高尔基还活着》。

十九日 《诗创作》在桂林创刊，社长李文钊、主编胡危舟、阳太阳、陈迺冬。

二十二日 《诗创作》杂志社假桂林大华饭店招待全市诗歌工作者，二十余人参加，李文钊主持，讨论了诗歌的倾向问题，还商定要定期召开座谈会，研究中外名诗人、名诗作。

## 七 月

八日 文工会主办的文艺演讲大会假抗建堂举行，郭沫若任主席，郑伯奇、应云卫、阳翰笙、叶浅予等讲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等抗战艺术的新任务。郭沫若说：一般人以为文武是不相容的，其实艺术艺术的本质，就是鼓励斗争精神。武力有两种，一种是破坏性的武力，以今日法西斯为代表，它们破坏文化，破坏艺术，阻止人类进步，要把人类拖回到原始时代去。另一种是建设性的武力，是要保卫文化，保卫艺术，为人类进步而不断地斗争。这种文化就是为鼓励这种武力，这种文化和这种武力是不可分的。还说：

今日讲抗战艺术的新任务，目的是要根据客观和主观的力量来检阅一下阵容，并且针对着新的国内外形势所引起的各种现实问题，来决定新的战略和战术。讲演毕，孩子剧团表演了歌咏节目。

十一日 《新华日报》载郭沫若、沈钧儒、茅盾、郁达夫、曹靖华、陶行知、田汉、胡愈之、老舍等二百六十四人署名的中国文化界致苏联科学院会员书，说“四年来我们在极凶残的血火里，据守着文化的岗位，给东方野蛮强盗——日本法西斯以致命的剥露与打击。”“现在当我们的英勇自卫战进入第五个年头的时候，西方强盗——德国法西斯的血爪，又向人类的和平堡垒——社会主义的苏联伸去了！”“我们要英勇的并肩作战，扑灭人类的公敌——法西斯强盗，维护人类的正义，争取世界的和平。最后胜利一定是归于我们的！”

## 八 月

五日 《新华日报》载我国戏剧电影界慰问苏联戏剧电影界书。编者在按语中说：“我国戏剧电影界人士，为表示同情苏联抵抗纳粹德国的侵略，特发起致书慰问苏联戏剧界电影友人发起签名运动，原书已拟就交由苏联驻华大使馆寄往莫斯科，本报兹获得该书原文及签名特发表如下。”慰问信说：“我们非常关心贵国的军事胜利消息”，“也深信你们能战胜敌人”，并“相信你们在戏剧电影艺术的工作上，一定有许多辉煌的成就。希望你们尽量的将那些成功的作品向我国介绍。”“同样我们也将以鲜血写底稿的关于抗战的戏剧

电影作品和你们交换，互相观摩，使中苏两大国的抗战艺术交流，作为冲洗东西法西斯匪徒罪恶的洪涛，并加深我们之间的兄弟之谊。”签名者有田汉、洪深、欧阳予倩、夏衍、阳翰笙、郑用之、章泯、应云卫、蔡楚生、史东山、孙瑜、司徒慧敏等约二百人。

十五日 社会科学与文学艺术综合月刊《文化杂志》在桂林创刊，邵荃麟主编。共出了十六期，一九四三年五月停刊。

## 九 月

九日 美术节。中华全国美术协会假渝生生花园举行纪念大会，同时召开第三届会员大会，到会四十余人。会员大会于午后五时举行，首由主席汪日章致开幕词，继由该会秘书陈晓南报告会务。各机关代表演讲后，旋即聚餐，席间讨论了今后工作。

同日 《艺术新闻》创刊，社委九人。刘建庵、杨纪、焦菊隐、张安治、马卫之、胡危舟、宗惟贻、李文钊、司马文森。

十四日 郭沫若、张铁弦、安娥、石凌鹤、臧云远、李嘉、方殷、冯乃超、阳翰笙、罗荪、任钧、姚蓬子等三十余人举行新诗座谈会，冯乃超任主席。郭沫若讲诗经的语言与楚辞的语言，是座谈中最精采的一段。他说：国风多少有民歌的风格保存着，大雅小雅及三颂则是庙堂文学或士大夫文学。而凡是庙堂文学大体上已经和言语脱离了。又说：楚辞是民间诗体的扩大，在楚辞时代即战国时代，中国文学又和

言语生了一次结合。此次座谈会被认为学术空气甚为浓厚。

十五日 《文艺生活》月刊在桂林创刊，司马文森主编。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停刊，共出了十八期。一九四六年一月出光复版第一号，一九四八年一月迁香港出版。

十八日 “文协”等十七个文化团体为“九一八”事变十周年发表纪念宣言，谴责日寇。

二十六日 在渝诗人举行诗歌座谈会，阳翰笙任主席。到会者有黄芝冈、陈白尘、臧云远、安娥、姚蓬子等人。臧云远作关于诗的样式问题的报告，常任侠对中国古代的诗体详加分析，姚蓬子、凌鹤、李嘉、任钧、黄芝冈等也发表了意见。

## 十 月

五日 新中国剧社在桂林诞生。田汉任名誉社长，杜宣任社长，主要演员是演剧队骨干。十日该社就在桂林举行首次公演，剧目为陈白尘的《大地回春》。

六日 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中国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同学会等二十余团体在上清寺实验管弦乐团举行追悼萧友梅筹备会。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萧友梅是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上海逝世的。筹备会议定：在渝开追悼会，演奏萧氏遗作，举行纪念音乐大会。音专留渝同学顷电萧氏家属致唁，电文曰：“萧师母世兄礼鉴：顷阅报载，惊悉友梅夫子兴学积劳，尽瘁沪滨。生等久沐雨化，初解音律，痛闻恶耗，深增悲感，尚祈节哀应变，善自珍摄为祷。国立

音乐专科学校留渝同学谨叩。”

十日 戏剧节。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一园大戏院举行纪念会。阳翰笙发言肯定了抗战剧运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迎合观众低级趣味的倾向。

《新华日报》出了戏剧节专刊，发表了钱烈的《建立现实主义的演出体系》、演剧之友的《后方的戏剧运动者要怎样跟功利的，买卖的倾向斗争？——演剧之友座谈报告》、欧阳凡海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来写剧评》、舒非的《谈今日大后方的演员生活》等。

上旬 周恩来去郭沫若家向正在商量工作的郭沫若和阳翰笙提出要庆祝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和五十寿辰。郭沫若辞谢。周恩来说：“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他建议具体由阳翰笙来组织。还说：“我们这次要举行全国性的纪念活动。估计这事情问题不大。但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由各方面的人来参加筹备工作，不能单独由‘文工会’来出面。”谈话后，阳翰笙即开始筹备。（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载1980年《新文学史料》第二期）

十一日 中华剧艺社在渝成立，应云卫任理事长和社长。理事有陈白尘、陈鲤庭、张骏祥、贺孟斧、辛汉文、孟君谋。陈白尘与赵慧深，刘郁民主持日常工作，还兼任秘书。十一日《新蜀报》出“中华剧艺社成立特刊”，发表了郭沫若的《戏剧运动的开展》。

十四日 戏剧岗位社在中苏文化协会召开座谈会，讨论

如何建立现实主义演出体系问题，阳翰笙主持，郑君里、安娥、徐昌霖、贺孟斧、孙师毅、周彦、苏凡、凌鹤、史东山、潘子农、陈鲤庭、赵慧深、舒湮、陈白尘、李嘉等人参加。影谈记录发表在《戏剧岗位》第三卷第五、第六期上。

十九日 鲁迅逝世五周年。由“文协”等八团体联合在抗建礼堂举行纪念晚会，到会群众极为拥挤。主席冯玉祥致开会词，谓鲁迅可纪念之处在于他有硬骨头精神，肯说实话，值得青年效法。郭沫若讲了鲁迅和王维国。他将鲁迅与王维国并论，王系中国近代新史家，而鲁迅则为一伟大的新文学家。两人所处的时代大致相同，而王则停滞在旧的学术思想范畴里，鲁迅却接受了新的思潮，因而成为了伟大青年的革命导师。在纪念会上，曹靖华讲了鲁迅先生与翻译，孙伏园还报告了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

《新华日报》出了纪念专页。在专页的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话，编者所加的题名为《鲁迅先生与新文化运动》。曰：“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此外，还发表了芦荻的《学习鲁迅精神——纪念青年导师逝世五周年》、郭沫

若的《O E索隐》、廖化的《“不行”之所在——纪念杂感》、艾云的《鲁迅先生避难在北平——关于研究鲁迅的资料断片》、欧阳凡海的《鲁迅精神不死——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而作》。

同日 “文协”桂林分会假三明戏院举行鲁迅五周年逝世纪念会，二百多人到会，李文到任主席。田汉讲了历次鲁迅纪念会情形、鲁迅与戏剧的关系等，聂绀弩讲鲁迅生平。

二十日 邱东平、许清在盐城遇难。

二十三日 《新音乐》月刊邀请桂林文化界人士举行座谈，到二十余人。联抗主席并致词，熊佛西、焦菊隐等发了言，座谈的主要问题是歌词、歌剧的创作问题。

二十七日 《新华日报》刊载了中国诗歌界致苏联诗人及苏联人民书。这个文献引用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同法西斯蒂讲话，／要用烈火代言词，／用刺刀代唇舌，／用子弹代讽刺；／这个口号。”说：“你们保卫祖国的英勇战斗，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正是人类历史行为中的一篇悲壮的伟大的诗章。”“我们屈原、杜甫爱世爱国精神的继承者，对你们普希金、莱芒托夫、尼克拉索夫、马雅可夫斯基战斗精神所熏陶的苏联人民，伸出热烈的友谊的手。让我们抗战的歌声互相穿过世界的屋脊，让我们手携手地打击人类中的丑类——那东西方的野兽吧！”署名者有冯玉祥、郭沫若、田汉、冰心、老舍、冯乃超、长虹、穆木天、胡风、王统照、姚蓬子、卞之琳等百五十人。

## 十一月

十日 《抗战文艺》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出版，内载：

郭沫若从事文艺创作即将二十五年，阳翰笙、孙师毅、老舍、姚蓬子等数十人为其“二十五年来在新文艺运动上之艰苦战斗与巨大贡献”将发起举行纪念会。

十五日 陈纪滢、臧云远、常任侠、马宗融、柳倩、安娥、任钧、高兰、潘孑农等为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举行座谈会，陈纪滢任主席。大家座谈了郭沫若的作品，并朗诵其诗。

同日 “文协”桂林分会在三教咖啡厅举行文艺茶会，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田汉主席，一百五十余人参加。田汉、熊佛西、宋云彬等讲了话。

十六日 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重庆文化界举行盛大庆祝茶会。冯玉祥致开会词，指出要向郭沫若学习：一、革命精神；二、忠心为国；三、永远和青年们在一起。老舍说：要拿工作来纪念郭沫若，成立研究所、设立讲学金、刊行郭沫若全集与选集。周恩来同志勉励大家要学习郭沫若的革命热情、研究精神与战斗生活。他说：“郭沫若不只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在反对旧礼教的战斗中、郭沫若是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仍是一只号角。”郭沫若答谢道：他一定献出他的力量给多难的祖国，一定为人类幸福和反法西斯的斗争，作出更大的努力。

《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同志写的代论《我要说的话》，指出：“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响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



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此外，该报还出了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特刊，发表了潘梓年的《诗才·史学·书征气度——为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而作》、沈尹默的《沈尹默先生赠郭先生诗》、绿川英子作、赵琳译的《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为郭沫若先生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董必武的《沫若先生五十大庆》（诗）、邓颖超的为《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与五秩之庆致祝》、吴克坚的《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诗）、田汉的《南山之什——为沫若兄五十寿辰而作》（诗）、张西曼的《又一个活的模范——祝郭沫若先生的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诗）、王亚平的《火的歌者——祝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诗）、欧阳凡海的《我们应该研究郭沫若先生的作品》等纪念文章。

同日 桂林文艺界在桂林大戏院举行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文娱晚会，新中国剧社演出了《英雄的插曲》等剧目。十五日晚桂文化界举行了庆祝文艺茶会。一百五十余人参加，主席田汉报告了意义，说郭沫若经过了百般艰苦，尚不断努力，忠于国家。抗战后抛妻别子，在严密监视之下，逃回祖国，对抗战有极大贡献。熊佛西、荃麟、宋云彬、聂绀弩、杜宣、伍禾等也讲了话。

十九日 文艺生活社在桂林三教咖啡厅举行座谈会，到会有田汉、荃麟、艾芜、孟超、吕复、杜宣、许之乔、魏曼青、徐桑楚、司马文森、雷蕾、胡危舟、伍禾、宋云彬，座谈题为《一九四一年文艺运动的检讨》。荃麟说：“在一九四一年这一年，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文艺运动在朝低潮走”。他认为从客观上检查，有这些原因：一、“政治朝低潮走，文艺运动也自然免不了受影响。”二、“是整个文化

中心据点的转移。从前大后方有重庆、桂林、上海等三大文化据点。现在在重庆的文化人因为环境困难很多呆不下去，纷纷走开了，上海也不能立足，留下的只有桂林一大据点。”三、是“现实主义的困难。”“其次是交通的困难。”从主观上来检查，他认为也有原因：一、“文艺批评不曾建立，没有斗争，理论家不替作家指出当年的道路，不批评那些不正确的倾向，不推荐新的成功的作品。”二、“文艺工作者生活的没有保障”，“写作成了一种副业。”三、“作家跟现实接触的机会少。”与会者发言后，司马文森把“座谈会所得作了一个简单的总结”：“（一）作家在写作时深感现实主义的困难，所受的限制太多。（二）文化中心转移，大批文艺作家离开原有的文化据点。（三）交通困难，影响到书籍杂志的流通。（四）物价飞涨，生活日益艰难，作家得不到保障，纷纷改行，写作时间自然受了剥削。（五）文艺理论和批评贫乏，作家失却领导。（六）受局势影响。（七）作家的生活逐渐和现实脱节。（八）市儇主义又在文艺运动中抬头。第九点，虽然整个文艺运动是低潮的，不过在低潮中也有发展，只是发展得不怎样平衡就是了，比如：（一）在本年度，杂文杂志和文章非常流行，且均获有广大读者；（二）长诗特别多，在内容和表现技巧上，且都有了进步；（三）翻译作品多；（四）戏曲界相当活跃，尤其是历史剧非常流行，在技术上比以前进步；（五）文艺作品产量虽少，但是写长篇的人却比以前多。至于今后在文艺运动方面应该注意的，也有好几点：（一）应该如何克服主客观的困难。（二）应如何继续展开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并切实实践。（三）应如何建立文艺理论和批评。”

二十日 《新华日报》载中国文化界人士致苏联人民书，

说：“亲爱的苏联人民们！我们全中国的人民，时时刻刻都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自从疯狂喝血的德国法西斯蒂，在六月二十二日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无耻地冲进了你们的边疆之后，我们更怀着热切和钦佩的心情，注意着你们每一次向全世界的号召，你们每一次的英勇战绩，以及目前的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英勇的保卫战。你们的人民，已向全世界显示一个最光荣的英勇斗争的榜样来！虽然德国法西斯蒂强占了你们的一些城市、蹂躏了你们可爱的土地，但我们也和你们一样地坚信，胜利是一定属于你们的，全世界一切进步的与优秀的人士，将永远是在你们的一边！我们也和你们一样地深信：未来的世界是属于那上升的进步的新人类，而不是属于那群下降的腐朽没落的无耻的法西斯蒂！”签名者有郭沫若、沈钧儒、张一麟、柳亚子、韬奋、茅盾、许广平、田汉等人。

同日 文化工作委员会主办的第二次木刻展览会在渝夫子池励志社举行预展，到左舜生、孙伏园、陶行知等七百余人。郭沫若、冯乃超主持预展会。正式展出从二十一日起到二十三日止。二十一日《新华日报》出了第二次木刻展览会特刊，登载了王琦的文章《新的收获新的努力——木展杂记》，介绍了李桦、刘仑、徐甫堡、野夫、纳维、陈九、朱鸣岗、韩尚义、王树艺、黄克靖等人的作品，接着说：“以上所举出的那些优秀的作品，我虽不敢说，那就是标准的民族形式的作品，但至少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即是说这些作品可能而且一定是在欧洲和美洲的木刻展览会上所见不到的。”

同日 留渝剧人为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在抗战堂上映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郭沫若谈到该剧时曾说：“我写这个剧本也像歌德写浮士德一样写了

“翠亨”。该剧从是日起演到二十六日。反映强烈。

二十二日 文化工作委员会召开欢迎会，欢迎从昆明讲学归来的老舍，老舍对西南文艺状况作了详尽的说明。

## 十二月

七日 “文协”桂林分会在广西剧场举行年会，到五十余人，欧阳予倩任主席，李文钊报告会务。田汉发言希同人注意训练身体，使文章能下乡、入伍，深入大众。通过的提案有为死难文艺工作者募捐，要求提高稿费，限制印刷费，筹设艺术家宿舍，举办文艺晚会等。大会选举了十五名理事：欧阳予倩、李文钊、宋云彬、艾芜、田汉、聂绀弩、邵荃麟、王鲁彦、孟超、司马文森、胡危舟、巴金、伍禾、彭燕郊、洗群。后补理事七人：葛琴、芦荻、陈闲、熊佛西、杜宣、秦似、莫宝健。

同日 《新华日报》出《棠棣之花》剧评专页，载有欧阳凡海的《论历史剧》、章罍的《从〈棠棣之花〉谈到评历史剧》、舜瑤的《正义的赞诗、壮丽的画图！》，高度评价了《棠棣之花》取得的成就。

十二日 “文协”举行诗歌晚会。郭沫若报告《中国音乐之史的检讨》，安娥、方殷朗诵了臧云远的诗剧《雾海》，江村、陈天国朗诵了方殷的《平凡的夜话》。

十五日 桂林出版的《诗创作》第六期问世。该期杂志辟有“祝福郭沫若诗人”专页，发表了田汉的《与郭沫若在诗歌上的关系》、宋云彬的《奔放的感情·缜密的头脑》、穆木天的《在露风雨中微笑吧》、孟超的《五十之颂》、韩北屏

的《一个世纪的二分之一》、胡危舟的《金刚坡下》(诗剧)。田汉的文章回顾了宗白华介绍他认识郭沫若、与郭沫若在东京的交往、孩子头上的“郭沫若氏洞”、“北伐战争的大波”、抗战的烽火……最后说：“作为诗歌工作者，沫若不仅在新诗歌运动的初期尽了启蒙的任务，由他最近的几篇创作也可知道沫若将不再徘徊于旧诗形的半趣味的尝试而将继续翻开新诗歌运动的新页，在全世界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死活决斗中展开一个狂飙怒涛般的新诗歌时代，假使我的预言不错，毫无疑问的我仍将拿起我的一切追随沫若，为实现这一时代而奋斗！”编者在《编后杂笔》中说：“今天，我们以巨大的篇幅刊出了‘祝福郭沫若诗人之页’，倒并非仅仅因郭先生活上了五十的诗生命，而是给周作人之类想一想：难道离开北平比离开日本还困难吗？”

十七日 戏剧界在渝夫子池社会服务处礼堂追悼沈西苓，到会百余人。罗学濂介绍沈西苓工作成绩。郭沫若说：“西苓是不该如此早死的，虽然，伤寒是严重的病症，但在今天医学进步的情况下，因这种病而死的并不多。西苓的死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在抗战艰难时期，医药和调养的困难。所以我们要纪念西苓，要完成西苓未完成的志愿，首先要为西苓报仇，消灭法西斯侵略者……”《新华日报》还发表了悼念诗文，该报以集体名义写的挽词是：

银幕英才凭作育  
剧坛奇绩足讴歌

文章有潘子农撰的《沈西苓氏传略初稿》、熊辉的《哭西苓》。

二十五日 日寇占领香港。香港文艺工作者多数陆续返回内地。

本年 周恩来派专人向抗敌演剧队《地下党组织传达我

党在国统区的方针：“隐荫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与顽固派的斗争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周恩来同志还指示，要保存团体，争取工作。要坚持原则，不演反共剧戏。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要学会交朋友，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吕复、徐桑楚《周总理与抗敌演剧队》，载《周总理与抗敌演剧队》）。

## 一九四二年

### 一 月

二日 郭沫若开始写五幕历史剧《屈原》，十一日完成。屈原是战国时代伟大的爱国诗人。郭沫若重现了二千多年前这位伟大诗人的光辉形象，重现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渴望光明的崇高理想。在创作期间周恩来曾对郭沫若说：“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受压迫，感到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金山《痛失郭老》）国民党御用文人攻击“雷电颂”，说屈原没说过和写过这样的话，郭沫若是用现代话攻击当局。周恩来驳斥说：“屈原是爱国诗人，当时是被迫害的，是反对投降的，所以就写下了《离骚》、《天问》等不朽的诗篇。‘雷电颂’是完全符合屈原精神的。关于形式问题，在台上出现的是古人，但是说着今天的话，这不应非议。历史发展到现在，有两千多年了，古人说的话，今人也听不懂。历史书上记载屈原说的话，也是后人为他写的。因此舞台上的屈原完全可以这样说。”

《屈原》于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七日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发表。林辰回忆说：“郭老的《屈原》写好以后，当时孙伏园在编《中央日报》的副刊，他与郭老要稿子，郭老就把《屈原》交给他，就在《中央日报》上连载起来了。结果被国民党发现了，大为恼火。潘公展说：‘怎么搞的，我们的

报纸还要登载骂我们的东西？’国民党就下令停止刊登称赞《屈原》的文章。后来孙伏园还被撤销了《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的职务。”（《访问林辰同志谈话记录》，载黄中模《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屈原》演出，轰动山城。

三日 中国木刻研究会假渝中苏文化协会召开成立大会，到重庆木刻作者丁正献、刘铁华、汪刃锋、王树艺、黄克靖、邹恒秋、宗其香、罗颂清、李玄剑、刘平之、廖冰兄、梅健鹰、伍必端、邓野等二十多人。大会选举了王琦、丁正献、刘铁华、罗颂清、邹恒秋五人为常务理事。选出的在渝理事有卢鸿基、汪刃锋、刘平之等。选出的外地理事有：李桦（湖南）、宋秉恒（福建）、野夫（浙江）、刘建庵（广西）、刘仑（广东）、徐甫堡（江西）、杨漠因（贵州）、刘文清（云南）等。在渝的五位常务理事分管总务、出版、展览、研究、供应五个方面的工作。

十二日 育才学校画展在中苏文化协会开幕。共三间展览室：第一间全是木刻，第二间是水粉画，第三间是粉画、油画、钢笔画、铅笔画。《新华日报》为育才学校画展出了特刊，发表了廖冰兄的《控诉与呼吁——写给育才小朋友画展的观众们》、铁华的《育才学校绘画组概况》。此外还发表了展出作品：邓军（十六岁）作的木刻《集会》、张大羽（十五岁）作的木刻《击敌》。

十五日 《文艺杂志》在桂林创刊，王鲁彦主编。一九四四年三月休刊，共出了三卷三期。一九四五年五月在重庆复刊，邵荃麟主编，编号为新一卷第一期，共出了三期，一九四五年九月停刊。

十六日 《新华日报》发表《中国木刻工作者给苏联木刻家信》，对“从西战场俄罗斯大陆传来雪片似的捷报”表



示欣喜，又说：“正和我们中华民族一样，你们也同时为了捍卫自己祖国和人类文明、世界和平而艰苦奋斗着，历史的重任分别压在爱好和平的民族的肩上，苏联的木刻家和你们祖国人民一样地卷入这战斗的洪流里，在伟大领袖斯大林先生英明领导下，不断用自己的武器打击着敌人。”“中国的木刻工作者，站在辽远的国土上，遥向你们英勇斗争的姿态，表示无限的敬意与钦佩”，同时表示了进行艺术交流的愿望：“将把我们的作品送给你们，请你们批评，而同时也希望你们不惜把作品送给我们”，“学习你们”。签名者有李桦、罗清楨、宋米云、卢鸿基、邹恒秋、汪韧锋、王琦、杨隆生、张望、丁正献等二百五十余人。

## 二 月

六日 《戏剧岗位》邀重庆戏剧界开座谈会，讨论戏剧问题，涉及剧本、演出、剧评等方面，时达四小时之久。史东山、贺孟斧、陈鲤庭、陈白尘、阳翰笙、孔罗荪、黄芝冈、郑伯奇等三十余人参加了座谈。

七日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文化界的动员》，说“从今天到十五日已定为文化界宣传周。”社论说：“平心检讨一下过去文化界的活动，不论在新闻方面也好，文艺方面也好，理论方面也好，教育方面也好，工作者本身，不能说热情不够，努力不够。”“然而，文化界动员宣传工作做得远不充分，这也是事实，需要再百倍的加强，这也是当务之急。”

同日 文化界宣传周在渝广播大厦举行，这是文化运动委员会联合三十六个机关团体举办的。主持者潘公展，陈立夫、谷正纲、黄少谷等讲了话。

同日 “文协”假中央电台举行广播讲座及诗歌朗诵。老舍讲《文艺界动员的意义》、姚蓬子讲《文艺界与总动员》、王平陵讲《今后中国的文艺运动》、王平陵朗诵《太平洋的暴风雨》、常任侠朗诵《诗，是时候了》、方殷朗诵《少年中国进行曲》、安娥朗诵《民众们动员起来》。

八日 文化界宣传周文艺日。“文协”召开文艺座谈会，讨论题为如何加强文艺界总动员，到会五、六十人。讨论具体内容有：一、在抗战中，每个文艺作家应怎样集中精力努力创作；二、怎样使文艺作家能安心努力创作，给以生活上的保障；三、抗战以来文艺界动员之情形。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假新运广场举行露天音乐会，参加者有政治部抗敌歌咏团、育才学校等十一个单位，听众千余人。欧阳凡海在《新华日报》发表连载文章《论文艺动员的成果缺点及其任务》，对抗战以来文艺界情形探讨甚详。

九日 文化界宣传周戏剧电影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假中英文化运动委员会举行座谈会，讨论戏剧界如何加强总动员问题。发言具体内容有：一、戏剧界总动员之对象，须配合同盟国反侵略战争之进度；二、加强戏剧界抗敌协会组织，领导解决戏剧界自身之困难。电影界抗敌协会也召开了座谈会，讨论如何加强电影界总动员问题。

十日 文化界宣传周音乐日。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假中苏文化协会进行改选，并举行座谈会。晚，在广播大厦举行歌咏广播晚会。《新华日报》出“时代音乐”（第一期），发表了云阶的文章《时代音乐工作者应有的认识——中音国乐史的发展》、山根银二作、李嘉译的《“音乐社会学”论》等。

十一日 文化界宣传周美术日。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假

新运模范区广场举行展览，展出作品琳琅满目。晚，汪日章播讲《国家动员与艺术家之责任》。《新华日报》出“木刻阵线”（第一期），代发刊词为《我们的方向》，指出“‘木刻阵线’它正是整个反侵略阵线中的一小环节”，希望“全体的刀笔战士，共同举起他们的武器——刻刀”，向法西斯侵略者及其走狗们进行攻击。同时，发表了《木刻简讯》及凡夏夫斯基作、黎真译的《艺术作品中的列宁》。刊载的木刻有丁迈的《拾零归来》、王琦的《冬日之防空洞》、华莱的《买面粉》。

十二日 “文协”桂林分会召开理事会，决定由田汉、李文钊、欧阳予倩等筹组“文协”受难同志救济委员会，还议定了要将稿费提高到最低每千字十五元，版税最低额为百分之十五的问题。

二十二日 “文协”假中苏文化协会开会员大会，除讨论筹备改选下届理事外，还有：一、致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公开信；二、关于版税、版权问题；三、慰勉香港脱险作家。

二月 《戏剧岗位》邀重庆戏剧界开座谈会，讨论剧运方面的问题。阳翰笙任主席，史东山、贺孟斧、陈鲤庭、陈白尘、孙师毅、阳翰笙、王瑞麟、张骏祥等三十余人到会。与会者认为：剧目选择要有利于抗战，演出要认真严肃，剧评要具体深入，此外还要注意开展农村剧运。

## 三 月

一日 “文协”成都分会在青年会举行年会，改选。结果，李劫人、叶圣陶、陶雄、牧野、陈翔鹤、王余杞、王冰洋被选为理事，车瘦舟、苏子涵被选为候补理事。

五日 从是日起到四月五日止为渝音乐月，这是教育部音乐管理委员会决定的。在音乐月中，要举行个人音乐会、管弦乐演奏会、国乐演奏会、室内乐演奏会、独唱会、歌咏大会等。参加团体有中央训练团音干班、政治部抗敌歌咏团、军政部军乐演奏团、国立音乐学院实验管弦乐团、中华交响乐团、大同乐会、中央广播电台国乐组、重庆曲社、怒吼社等。

同日 陈铨的话剧《野玫瑰》在重庆抗建堂演出。该剧受到进步文艺界的严肃批评。但受到国民党的赞赏，教育部学术审议会还给予奖励。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延安《解放日报》的重庆讯说：“目前在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及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联合招待戏剧界同人茶会上，剧界同人再度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撤销奖励’，禁止上演。而与会有关当局仍持原议，教育部长陈立夫首称：审议会奖励《野玫瑰》乃‘投票’结果，给以‘三等奖’自非认为‘最佳者’，不过‘聊示提倡’而已。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对该剧获奖表示两可态度，但称‘抗议是不对的，只能批评’。最后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潘公展则说：《野玫瑰》不惟不应禁演，反应提倡；倒是《屈原》剧本‘成问题’，这时候不应该‘鼓吹爆炸’云云。”

十五日 《创作月刊》于桂林创刊，张煌主编。一九四三年一月被迫停刊，出了二卷一期。编者在《发刊词》中说：“一分刊物出版，编者照例有个极其灿烂的希望，这心情不必隐讳，我们也有。刊名《创作》，暗示出一条新路径，挥别旧的探寻新的正是求进步的不二法门。”“希望着今后本刊能够担当起介绍好作品，研究创作上诸般问题的责任。实现理想的艰难我们想到过……”“我们没有宗派的成见，我们

办的不是一个同人刊物，我们满怀诚实和热情要求看重眼前这个时代的师友们，请你们经常赐寄文章，坦坦白白的赐给意见，能如此，我们不仅感激，也会因这鼓励增添了百倍勇气。”最后还说：“如今是严冬将去的时候，最好还是盼望着我们的理想将随了欲来的春风开花吧！”

十七日 《新华日报》发表“文协”致印度作家的公开信，希望中印作家携手，为共同的胜利而奋斗。

二十日 文化工作委员会在重庆两路口社会服务处社交会堂举行文化讲座，连举行三天。主讲人宗白华，讲题为《中国艺术之写实、传神与造境》。

二十三日 《新华日报》发表颜翰彤的文章《读〈野玫瑰〉》，指出这个剧“不但因为主题颇有些模糊，结构殊欠严整，人物仅被概念的表现着，语言没有性格化”，“而且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它隐藏着‘战国派’思想的毒素”。

## 四 月

三日 中华剧艺社公演郭沫若五幕历史剧《屈原》。《新华日报》出“屈原公演特刊”，登载了郭沫若的《屈原与厘雅王》。

十日 “文协”假义林书院举行诗歌晚会，清初大告教授讲西洋诗歌之沿革及其影响。

十七日 《新华日报》发表了延安举办的画展消息，并发表了黄钢、力群、江丰、华君武等的文章。编者在按语中说：“延安美协主持之画展，于本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先后假军人俱乐部，文抗作家俱乐部，市商会俱乐部作公开展览，作品共七十余幅，内容为对延安新社会所残余的某些弱点，

作严正之指出，执笔者为张谔、华君武、蔡若虹三人，延安各界前往参观者甚众，对此次画展，颇多好评，今日本页所载《讽刺画展给了我们些什么》、《我们需要讽刺画》、《关于讽刺画展》、《讽刺画展作者自白》等四文，内容均系批评此次画展的文章，曾载二月十五日的《解放日报》，特转载于此，以飨读者。”华君武、张谔、蔡若虹在《讽刺画展作者自白》的文章中说：“我们已经看到了新社会的美丽和光明，但也看到了部分的丑恶和黑暗，这些丑恶和黑暗是从旧的社会中、旧的思想意识中带过来的渣滓，它附着在新的社会上而且在腐蚀着新的社会。我们——漫画工作者——的任务，就必须是：指出它们，埋葬它们。”

二十六日 “文协”桂林分会召开座谈会。地点：艺术馆；内容：保障作家合法权益。议定向出版家和书商提出的办法有：初版税最低百分之十五，再版百分之十八，三版百分之二十；原稿审查一待通过出版者即付第一版版税之一半，书出后三个月内付清版税稿费；如书籍加价，要照付版税；最低发表稿费，文字千字十五至二十元，诗每行五角至一元，图刻每幅五十元，歌曲每首四十至六十元。座谈会还推荐茅盾、田汉、胡风、司马文森、宋云彬、艾芜、李文钊、秦似、胡危舟办理此事。

同日，中华全国美术协会在桂召开成立大会，叶浅予、傅思达、沈同衡、刘建庵、刘元、徐德华、张安治被选为理事，郁风、周泽航被选为候补理事。

## 五 月

一日 从是日起至三日止，中苏文化协会主办中国送苏

木刻预展。展出作品二百五十余幅。三日《新华日报》出了预展特刊，刊载了季植的《中苏木刻艺术之交流》，还刊载了尚莫宗作的《山地》、王琦作的《嘉陵江上》（运煤）等木刻作品。

同日《文学译报》在桂林创刊，蒋璐、伍孟昌、秦似、庄寿慈等编。一九四三年九月终刊，共出八期。编者在《创刊的几句话》中说：“我们仅有一点计划，在内容方面，（一）不是笼统的不拘形式，一律欢迎，我们希望着重于现代写实作品的介绍，古典和浪漫作品是次要的。（二）每期以一个作家为中心，有几篇集中的文章。（三）我们以为在中国愈不为读者所熟悉的作家，就愈需要介绍，只要他有一技之长，值得读的作品。”“我们对于翻译的技巧的态度，以为‘滥译’的损害译品，不比‘滥造’的损害作品浅，因此我们虽不敢夸靠得住，却不能不以细心自勉。翻译批评远落后于翻译工作，是大大值得留意的，要提高就要批评，但这恐怕是在我们能力之外的罢”。编者最后表示要“试着走”。

二日 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这是中国文艺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光辉文献围绕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进行了精辟的、深刻的分析，给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十八日 新中国剧社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成立会，三十余人参加，主席余克稷。会上通过了会章，选举了周峰等九人为理事、白杨等三人为候补理事、刘厚生等二人为监事。议定短期内排练名剧多部，准备雾季上演。

二十四日 “文协”桂林分会在广西艺术馆召开保障作家权益大会，决定尽快召开市内各文艺刊物编辑者会议，交

换提高稿费的意见。

## 六 月

三日 中华交响乐团举行成立两周年音乐会。到中外人士三百左右。二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李嘉的文章《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为中华交响乐团二周年纪念演奏会而作》。十六日该报又发表了兹德的《写在中华交响乐团音乐会后》，评价了这次音乐会之得失。

十二日 《新华日报》转载五月十四日延安《解放日报》上刊登的肖军的文章《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这是肖军亲自听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部分而写的感想，介绍了《引言》的内容，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进行了复述。文章分：一、立场；二、态度；三、给谁看；四、写什么；五、如何搜集材料；六、学习。作者在文章开头说：“五月二日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举行过一次‘文艺座谈会’。作者为参加者之一，对当时提出诸问题，曾口头上表达过个人的见解，并提出几个问题，作为个人的补充。这里想把它所能记忆的大致写出，同时增删一些，以佐参考。”

十三日 梁寒操在中苏文化协会招待渝研究苏联专家。到郭沫若、西门宗华、曹靖华、邓颖超、葛一虹、丁文安、吴清友、戈宝权、侯外庐、王云五、米克拉舍夫斯基等人。大会商讨了出版苏联政治经济文艺丛书计划，并计划年内出丛书十种。文艺方面有苏联革命后著名小说、诗歌、戏曲、



民俗及作家传五种。

十七日 为纪念诗人节和高尔基逝世六周年，“文协”举行诗歌晚会，讨论《目前诗歌之创作及技术》。

十八日 高尔基逝世六周年暨第二届诗人节。中苏文化协会、文化工作委员会、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中苏文协重庆分会、“文协”等十一团体假中苏文协举行纪念晚会，到三百余人。郭沫若演说：今天是屈原先生二千二百二十二周年的忌辰，又适逢苏联大文豪高尔基先生逝世六周年纪念日。他们两位都是代表人民利益，也都是反对暴政的。还说：屈原先生在艺术上是成功的，这构成了屈原先生的历史悲剧。但悲剧的深刻意义，还不仅限于他本人，而且还是当时楚国的悲剧。他号召：每一个中国人，今日纪念世界上两大文学家，要学习他们这种代表人民利益的精神，学习他们反暴政、反法西斯的彻底斗争精神！

同日 “文协”桂林分会邀集桂市诗歌工作者游漓江、聚餐，纪念诗人节，纪念屈原。

二十二日 《新华日报》刊登《中国诗歌界为苏联抗战周年致斯大林先生及全体苏联战士书》，赞扬其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取得的成果，并祝“早日歼灭纳粹匪军”。郭沫若、茅盾、田汉、欧阳予倩、穆木天、胡风、老舍、马宗融等九十二人签了名。

## 七 月

八日 文化工作委员会假中苏文化协会举行抗战五周年纪念晚会，渝文化界人士到会百余人。梁寒操任主席并致开会词，姚蓬子报告抗战五年来的文艺工作。晚会上作家们围

绕关于抗战文艺及我是如何离开北平的发言。会后方殷朗诵《芦沟晓月》、殷野朗诵《保卫芦沟桥》，此外还表演了大鼓、歌咏等节目。

十日 《种子》创刊，华嘉主编。

十四日 田汉在七星岩主持召开座谈会，茅盾、欧阳予倩、柳亚子、于伶、胡风、宋云彬、蔡楚生、周钢鸣、端木蕻良等应邀参加，中心是座谈历史剧问题。

十五日 熊佛西主编的《文学创作》创刊。

十八日 昆明歌咏界召开聂耳逝世七周年纪念会，会址在锡安圣堂，至者踊跃。大会开始先唱挽歌，继由聂耳兄长报告聂耳生平、林志音报告聂耳在上海苦学音乐之经过、陈瑞甫对聂耳作品与时代的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李公朴谈了应以推行歌咏工作来纪念聂耳。演讲完毕，各歌咏团体即演唱聂耳遗作，计有《饥寒交迫之歌》、《新女性》、《铁蹄下的歌女》、《前进歌》、《码头工人》、《挖矿歌》、《自卫歌》、《打桩歌》、《打长江》、《梅娘曲》、《开路先锋》、《毕业歌》等。最后，全体合唱《义勇军进行曲》。

十九日 文化工作委员会举行文化讲座，胡风主讲《论对于文艺的几种流行见解》。

## 八 月

二十九日 中苏文化协会举办之文化讲座在该会俱乐部举行，听众颇多，苏对外文化委员会代表米克拉舍夫斯基及多洛菲也均出席。该会邀秦涤清讲苏联之农业、戈宝权讲苏联之文学。戈宝权说：苏联之作家皆生活于人民中间，并亲身参加各种社会建设工作，故能有极生动之伟大创作。苏联把

文学家视为“心灵上之工程师”，政府对作家尽量给以一切写作上之便利与保障，并有巨额文学奖金。他还说：抗战之苏联作家上前线与红军并肩作战，为消灭法西斯匪群及争取祖国之自由解放而斗争。

## 九 月

一日 《文化先锋》在重庆创刊，文化运动委员会主办，始为周刊，从第一卷第十八期后改为旬刊。一九四八年十月停刊。张道藩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提出“六不政策”：一、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二、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三、不带悲观的色彩；四、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五、不写无意义的作品；六、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又提出“五要政策”：一、要创造我们的民族文艺；二、要最受苦痛的平民而写作；三、要以民族的立场来写作；四、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五、要用现实的形式。

同日 沈从文作《文学运动的重造》。作者认为：“谈及文学运动分析它的得失时，有两件事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第一是民国十五年后这个运动最先和上海商业资本结了缘，新文学作品成为大老板商品之一种。第二是时间稍后这个运动又与政治派别发生了关系，文学作家又成为在朝在野工具之一部。因此一来，如从表面观察，必以为活泼热闹，值得令人乐观。可是细加分析，也就可看出一点堕落倾向。”他反对作家从政，认为“不过是从此可以作官，吃碗‘文学运动’饭，做个政客小帮手，写成的作品，在野则利用社会心里，在朝则依赖政治实力，可以得到许多推销便利，不问好坏，一例又都能用作政治上的点缀物罢了。”他主张给文学“一种

较新的态度。”“这个新的态度是能努力把它从‘商场’和官场解放出来，再度成为‘学术’一部门，则亡羊补牢，时间虽晚还不算太晚。”后发表在《文艺先锋》第一卷第二期上。

八日 施蛰存作《文学之贫困》。作者将文学分为“纯文学”与“一般文学”。“纯文学”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一般文学”包括的范围自然还要广泛得多。作者认为：“照现在的情形看来，我们显然可见文学愈‘纯’则愈贫困，纵然书店里每月有大量的诗歌、小说、戏曲、散文出版。——这是出版业的繁荣，不是文学的繁荣。”“我们的文学界，即使在这个贫困的纯文学圈子里，也还显现着一种贫困之贫困的现象。抗战以来，我们到底有了多少纯文学作品？你也许会说：我们至少有了不少的诗歌和剧本。是的，我也读过了不少的诗歌和剧本，但是如果我们把田间先生式的诗歌和文明戏式的话剧算作是抗战文学的收获，纵然数量不少，也还是贫困得可怜的。”后发表在《文艺先锋》第一卷第三期上。

九日 为庆祝“九九”艺术节，桂林美术界假青年会举行庆祝会，到二百余人。

同日 “文协”成都分会在青年会开会欢迎到蓉的老舍、冯玉祥，六十余人到会。老舍报告了“文协”的工作，分会负责人也谈了分会的情形。

十三日 《新华日报》载：为纪念歌德一百九十三年诞辰，文化工作委员会举行诗歌晚会。臧云远主席并致词，郭沫若讲歌德的思想、艺术及翻译歌德作品之经过。他还将孔子和歌德作了详尽分析，谓二人颇多相同之处。旋由该会同人朗诵《浮士德》及《少年维特之烦恼》。郑伯奇、杜国庠讲话后即散会。

十五日 《文学创作》创刊，熊佛西主编。

二十日 “文协”桂林分会召开理事会，讨论会务，推定胡风、李文钊、胡危舟负责起草出版合同，与出版界交涉。

## 十月

十日 中国木刻研究会举办全国木刻展览会，“这次全国木展，共有七个地区举行，并分别在当地各个城市巡回展出。总会收到各地区分、支会寄来的展出情况报告，展览会的海报、广告、报纸上有关展出的消息报导及评介文章，真是琳琅满目。长沙区还专门出版了一本展出特刊。”《新华日报》刊载了毓林的《漫谈〈全国木刻展〉》以兹介绍。展出木刻中有三十余幅是周恩来从延安带回的。“在十月九日举行预展时，延安的全部作品都陈列在中苏文协正中的一间屋子里，应邀前来参观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徐悲鸿先生也来到会场，他仔细地一张一张地从头看起，边看边评论，都是赞词居多，当他看到延安部分作品时，在古元的作品面前停住了，他以惊讶的神色反复欣赏《割草》和《哥哥的假期》等作品，连声称赞说：‘真了不起！真好！’他一定要收购这两幅作品。我们请他为展览会写一篇文章，他满口答应。展览会尚未闭幕，他的文章《全国木刻展》便在《新民晚报》上登出来了。”（王琦《回忆抗战时期的木刻运动》，载1983年《抗战文艺研究》第1期）

同日 《青年文艺》于桂林创刊，葛琴主编。出了一卷六期，一九四四年七月停刊。

同日 《文艺先锋》于重庆创刊，文化运动委员会主办，丁伯骝等主编。该刊称：要“加强全国文艺界的总动员，

补充全国读者精神食粮，供给全国作家发表作品，促进三民主义文艺建设。”

十一日“文协”假观音岩中国文艺社举行茶会，商讨提高作家稿费及版税办法。华林主席，四十余人出席。张道藩、徐仲年、姚蓬子、张静庐、凌鹤、梅林等相继发言。张静庐特别指出邮寄上存在的问题：如邮局能允许出版商之小包邮件畅行无阻，书籍就易销出，稿费及版税的提高问题则好解决些。凌鹤指出了作家之种种痛苦，除稿费赶不上物价上涨外，有时作家耗尽心血之作，被审查机关扣押，不能取得稿费。大家推定叶以群、陈白尘、梅林三人草拟条文，使提高稿费成为一种运动；并提出与出版家另行会商，双方共同寻求提高稿费、版税之合理办法。

十三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再卷起文化入伍的巨浪》，“热烈地期望千万爱国有为的青年把热情和艺术活泼地带到军队中去”。

十五日《人世间》在桂林出版，凤子等编。该期刊登了胡风的《抗日民族战争与新文艺传统》、骆宾基的《幼年》（连载）、茅盾的《雨天杂写之四》、郭沫若的《月光下》等。一九四七年凤子在该刊的《复刊词》里说：“太平洋事变后的桂林，曾被荣誉为文化城。事实是多数作家、出版家、艺术界的朋友，经历了多年的离乱生活，暂时借那么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落下脚。交通便利，环境清静，尽管落脚是暂时的，既然住下来，多少总可以做点分内的事，何况，人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希望，共同的苦闷。当时客观的困难并不弱于今天，可是，人的力量终于克服了一切问题，比如没有白报纸，就利用土纸，而许许多多书籍刊物都先后印行出版了。人世间社发行的人世间文艺月刊，也就在这时候在桂林发行战时版。”

十九日 鲁迅逝世六周年。“文协”原拟假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纪念晚会，但未能开成。《新华日报》以《鲁迅祭日》为题报道了两句话：

纪念会因故未开

参加者默然引退

《新华日报》发表了纪念文章，计有姜添的《用“整风”来纪念鲁迅》、欧阳凡海的《鲁迅与自我批评》、李健的《鲁迅先生论“八股”——鲁迅文学论管窥之一》、林曦的《鲁迅在群众中》。

二十一日 沈友谷、潘梓年、艾青在《新华日报》分别发表《关于“人性论”与“平均主义”》、《王实味所给我们的教训》、《现实不容许歪曲》，批判王实味。

二十八日 “文协”理事会通过《保障作家稿费版权版税意见书》。《意见书》分“缘起”、“办法”、“实施”三部分。

“缘起”曰：“近来物价高涨，而文艺作家稿费之增加则极为有限，作家生活于是日趋艰窘。清苦生活为文人之本色，但实在今日写作得酬，每每不足谋一饱，即使自甘坐以待毙，究非文化界之幸事，况稿费版税为作家合法之权益，于此求之，固不难获得合理之解决也。”“同人等深知今日之经营出版事业者，其艰难并不减于作家，故保障作家合法权益之提出，并非于出版家处对立之地位，而系以妥适之原则，及出版家之协助，以期获得合理之结果而已。”“办法”谈了稿费问题和版税问题。确定：“发表稿每千字暂定最低额为三十元”；“著译出让版权之稿费，已发表者，暂定最低额为千字五十元；未发表者最低额为千字七十元。”“版税率按出版的售价最低抽百分之十五，再版后酌加至百分之十八或二十。”

三十日 桂林《诗创作》第十五期出版，这期是诗论专

号。内载胡风的《涉及诗学的若干问题》、茅盾的《“诗论”管窥》、力扬的《我们底收获与耕耘》、黄药眠的《论诗底美、诗底形象》、黄绳的《诗——青春之恋》、伍禾的《论诗的形象》、伍辛的《形式的囚笼》、静闻的《诗论杂钞》、达史的《诗人在历史上走过的足迹》、胡危舟的《新诗短话》（续二），此外还有萧爱梅的《正确地认识马耶可夫斯基》、周钢鸣的《关于〈欧根·奥尼金〉的几个问题》、以及宗玮译的《二十世纪英美诗人论》、宋维基译的《论讽刺诗》、李葳译的《黑奴反抗之歌》等。

## 十二月

三日 “文协”桂林分会假广西剧场召开会员大会，田汉任主席，到七十余人。田汉勉各会员明确任务，为反侵略战争而努力。李文钊报告了会务。大会进行了改选，选出理事二十名：田汉、欧阳予倩、宋云彬、王鲁彦、胡危舟、巴金、李文钊、邵荃麟、艾芜、孟超、杨刚、周钢鸣、胡仲持、秦似、司马文森、熊佛西、伍禾、郁风、柳亚子。候补理事七名：穆木天、陈闲、骆宾基、韩北屏、端木蕻良、新波、杜宣。

四日 渝电影戏剧界人士假文化会堂举行谈话会，到会百余人。张道藩主席并谈了开会之意义及商谈有关电影戏剧诸问题。旋即由从港沪归来之导演吴永刚、姚苏凤、蒋君超等分别致词。吴永刚谓孤岛沦入敌手后，一般有良心的电影戏剧工作者除离去者外，尚有少数因无钱无路，只得困居岛上，希望当局援助。后即自由发言。应云卫以剧团负责人资格首先代戏剧工作者呼吁剧场问题，并列举因无剧场致上演



时发生之种种困难与痛苦。张骏祥举音乐家莫扎尔德为例，说明戏剧工作者生活及精神之苦。提出上演税问题。国立戏专校长余上沅申述戏剧工作之诸多困难。

十二日 《新华日报》刊登“文协”《保障作家稿费版权意见书》，并发表《保障作家合法权益》短评。短评说：“抗战以来，靠卖文度日的作家们，生活困苦万状，而社会上只听到责怪作家们为什么不能产生伟大作品的，却少听到同情作家困难，重视作家最低限度生活维持的。”“作家合法权益的保障是万分应该的，提高稿费版税皆有必要。但同时除了几家有后盾的大出版商外，目前多数出版业也切身感到痛苦很深，也要代为筹谋。他们的痛苦，中心到并非版税稿费提高，而是出版与行销上的不容易。”

十五日 《新华日报》发表吕之吉的短文《关于作家权益》。文中说：“改善作家生活，要求出版家改善版税稿费还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我们以为目前作家们应该与出版家们保持一个精诚合作的态度，一方面要以包括出版家在内的全文化工作者的协力，请求政府在尽量予出版物审查与寄递上的便利，使真正为抗战文化而努力的出版家有业可营，有书可出，他方面要以全文化界——特别是出版业当事人的努力，彻底肃清一切形式的剥削作家为得计的不道德行径。”

十八日 《新华日报》发表谷谿的短文《保障作家权益》。文中说：作家“不仅生活没有保障，而写作出版的自由亦常常受到阻碍”。“保障作家权益，首先出版家要能与作家密切合作，同心协调，提高稿费，保证版税利益，要有道德信用，不印多报少、偷印、翻印、拖欠版税，并消除售价与定价不符等等不良现象，这是希望于出版家者。同时也希望政府当局能予以帮助，给予作家以写作的便利，在审查上

放宽一些，并给予出版家以运售寄递的便利，在营业上得到合法的保证。”

三十一日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第三届理事改选事宜假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办理完毕。选出的理事有张道藩、田汉、阳翰笙、吴漱予、王瑞麟、马彦祥、应云卫、宋之的、潘子农、余上沅、张骏祥、余克稷、洪深、熊佛西、凌鹤、王泊生、罗学濂、欧阳予倩、傅心一、郭沫若、王平陵、老舍、张德成、史东山、马守义、辛汉文、周伯勋、王若愚、龚晓岚、富少舫、魏香庭三十一人。候补理事有鲁觉吾、黄芝冈、孙师毅、姜公伟、万家宝、夏衍、阎哲吾、林刚白、贺孟斧、陈鲤庭、吴瑞燕、吴天保、章泯、郑用之、葛一虹十五人。监事有郑君里、鲍东生、陈白尘、袁璧玉、徐俗文、赵丹、沈云核、金山、唐庸三、陈凝秋十人。候补监事有常任侠、高月楼、袁牧之、郑伯奇、万籟天五人。

二十五日 教育部主办之第三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假中央图书馆开幕，陈立夫主席，到了许多国民党大员。全国第一、二两次美术展览会，均系抗战前在南京举行的。这次展览分木刻室、油画室、国画室、雕塑室等。木刻尤为出色。参观者颇多。木刻作品是全国美展发出要求合作，由中国木刻研究会提供的，然而，木刻都受到歧视。王崑回忆说：“我是在元旦那天去参观的，我走遍了所有的展览厅，也不曾发现一张木刻作品，我以为是他们又变了卦，不展出木刻了，我带着愤愤不平的心情离开展览会场，当我沿着会场的‘由此出口’的指路标走下楼时，才在楼梯下面一个阴暗的过道处的墙壁上，发现不带镜框地把我们的四十余幅木刻用图钉钉在墙上，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抗战艺术竟遭如此封锁！”（《回忆抗战时期的木刻运动》，载1983年《抗战文艺研究》

第1期)

二十七日 文化工作委员会假天官府该会地址举行诗歌座谈会，到臧克家、臧云远、王亚平、柳倩、方殷、任钧、枫林、戈茅等十余人，讨论内容为怎样选择新诗主题与题材、抒情诗与叙事诗的创作方法、对过去新诗歌的检讨及对未来新诗歌的展望，发言极为热烈。

同日 “文协”与中华全国美术会主办的渝文化界月会在渝都邮街广东大酒家举行。老舍与林风眠讲了抗战后的文学与美术。

二十九日 中国艺术剧社假恒社举行成立大会，到潘公展、陈方、陆京士、何葆仁、朱学范、潘公弼、王新卫、边定远、奚东曙、郑应时、沈楚宝、赵班斧、蔡叔厚、金山、宋之的、孙师毅、章泯、丁聪、吴铁翼、沙蒙、蓝马等百余人。主席金山报告筹备经过，潘公展等致词后，即通过章程，选举理监事，并拟修建剧场一所。

三十日 洪深五十寿辰。渝戏剧电影界假百龄餐厅举行庆祝茶会，到会有沈钧儒、郭沫若、茅盾、老舍、张西曼、鹿地亘、曹禺、夏衍、曹靖华、张骏祥、应云卫、郑伯奇、阳翰笙、宋之的、王瑞麟、史东山等三百余人。老舍任主席并致词：洪深为我国戏剧界之领导人，二十余年来，努力于戏剧电影工作，始终弗衰，实为我辈之楷模。郭沫若述洪深值得学习的四点：一、保养身体之健康；二、思想之深远宏博；三、生活之艰苦；四、作品之丰富。沈钧儒说：洪深不仅是位天才作者，而且谦和好学，能在一事业中孜孜不倦，足为我们砥礪鞭策。洪深答谢时说：“回想到从前我放弃了化学工程不学而开始做戏剧工作的时候，就有许多朋友来劝阻我，但我认为如工作是值得做的，是应该做的，即使我只

能胜任一位二三等戏剧家（也要去做）。记得从前在上海，某报为我做这工作，曾提名骂了十天，不提名骂了三十天，但事实证明，男女合演戏的效果是胜过了男性的反串。那时演员在社会上是被认为连戏子都不如的，经过我们二十余年来的斗争，总算在今天社会上，我们有了光荣的文化工作者的地位。我并不像郭先生讲的那样年青而健康，但人终是要过去，而事业——对人类的贡献——是永生的。”最后，富贵花唱了《赞美梅花》，这是老舍为洪深祝寿而写的大鼓词。

三十一日 《新华日报》发表沈钧儒、郭沫若、曹禺、张骏祥、应云卫、郑伯奇、阳翰笙、王瑞麟、史东山的、宋之的、吴永刚、贺孟斧、夏衍、金山、凤子、潘梓年对洪深的祝寿词，还发表了茅盾的《祝洪深先生》、韦彥的《为中国剧坛祝福——祝洪深先生五十生辰》、陈辛慕的《献身演剧三十年——为庆祝洪深先生五十寿诞写》，以示庆贺。

中国艺术剧社金山、于伶、孙师毅、宋之的、章泯、王幸、凤子等还给洪深上了祝寿诗，曰：“洪先生/五十庆/穷虽穷/骨头硬/写剧本/宣民隐/做导演/有本领/上舞台/包得行/教学生/满有劲/剧运史/第一人/戏剧家/学兼品/不怕死/向有名/老青年/打前阵/古话说/知天命/新道理/才十龄/好戏码/压轴心/到最后/定输赢/不成文/三字经/词虽俗/意思诚/祝高寿/剧坛幸/祝多产/为人民。”

十二月 桂林举办“香港的受难”画展。盛此君、新波、杨秋人、温涛、郁风、特伟六人参加。观众踊跃，轰动一时。《广西日报》发表了评价文章和开幕消息。孟超、华嘉、韩北屏写了文章。翌年该画展又在重庆展出。郁风回忆道：“当我们刚到桂林时，也正是大批各界人士从香港陆续

集中到桂林的时候。田汉、洪深和夏衍合写了《再会吧香港》的话剧。首场演出时遭特务破坏，几个暴徒跳上舞台扯下大幕，捣毁了剧场和台上道具。后来洪深站出来向观众宣布退票。我当时也在场，眼前观众激于义愤，纷纷表示不退票，当场把票撕掉，深受感动。我由此想到，何不搞一次画展，以‘香港的受难’为题，于是分头去联系。鉴于话剧演出遭特务的注意和破坏，于是，为顺利起见，我们想最好利用英国人出面。我们便去找我原来熟识的美国记者G·peck(派克)商量，并得到他的热情支持，约见了英国驻桂林总领事兼中英文化协会负责人班以安”，“他也表示极力赞助。从筹备到展出，约一个月，主要是新波、特伟和我三人负责。”（郁风《关于〈香港的受难〉画展》，载1982年《学术论坛》第3期）

本年 重庆《新民报》社几个人请周恩来分析一下形势。“总理关心地问到《新民报》的情况，问有没有什么困难。我们说：敌人的轰炸并不可怕，但怕反动当局的新闻检查官，弄得你束手无策，并表示我们未能如实报导皖南事变真相的愧怍心情。总理笑着说：反动派的新闻检查，只是表示他们纸老虎的虚弱本质，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能坚持真理，主张正义，终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在没办法中找出办法来。”周恩来还很风趣地对张恨水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干革命，总是要冒一点风险的，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困难面前，是容易动摇的。应该在斗争中锻炼自己，坚定自己，不要迷失方向。”（罗承烈《难忘的深情教诲》，载1977年《四川文艺》第2期）

## 一九四三年

### 一 月

一日 郭沫若、茅盾、老舍、田汉、邓初民、翦伯赞、郑伯奇、冯乃超、阳翰笙、夏衍、于立群、姚蓬子、洪深等文艺、文化界人士五十人为沈衡山祝寿，作《沈衡山先生七十寿辰》，说：“衡山先生爱石，凡有所游，必拾一石以归焉。石无大小，有文采足取而仪态殊异者，皆入其居。石之视先生，盖亦如父，如师长。曾入先生之居，见先生之石。石无不怀肃然坚实之敬慕以待先生。石犹如是，故世之青年，更无不受先生之爱而敬爱先生。其有不如是者，则无文而粗之顽石，先生于意无介也。先生今年七十，精神之坚毅也如石，身体之康健也如石，守道之笃实也如石，爱国之纯挚也如石，受先生之感召者，世之青年，亦皆如先生之如石也如石。呜呼，石之意义大矣哉。吾侪其亦能如石乎？愿慕先生无言之石教，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卓然独立，怡然相爱而不移。敬愿石焉，以为先生寿。”载同月三日《新华日报》。

同日 育才学校儿童美术展览开幕。展览室九间，展出美术作品共六百五十件。第一部分为小孩作品，占展览室三间。这些作品是育才学校、国立重庆师范附小、半山小学、云南省立云端中学及新疆小朋友画的，其中有素描、木刻、浮雕、松板画、水彩画、钢笔画、速写等。第二部分为参考

室。有中国历代名画、西域及敦煌艺术品、中国现代名画家作品、世界各国生活图片。参观者踊跃。

十一日 中国木刻研究会为纪念成立一周年假夫子池励志社举行木刻展览，作品共四百余件，售出收入悉作文化劳军之用。展期四天，十四日闭幕。

十六日 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假中央图书馆举行敦煌艺术展览会。此次展品约二百余件。第一陈列室内以沙土制就了敦煌莫高窟石洞模型。第二陈列室为照片，五十余幅。第三陈列室为考察团工作人员的临摹画等。第四陈列室系绘就的河西风景风俗人物。

同日《音乐知识》在桂林开始发行，该刊一九四二年就已印好，因故拖延了发行。甌伯爵、薛良编辑。一九四四年终刊。编者在《关于〈音乐知识〉》中说：“在目前，关于灌输音乐知识的读物，当然已经很有一些；而且它们这些也都是非常丰富、优秀的。但我们却不以为有了这一些就满足了，建立中国的新音乐艺术的工作，绝不是这样简单的！还需要更多方面的努力！何况在今天对音乐深具学习热诚而没有接受音乐教育的机会，甚至连自修都没有办法的朋友如此众多，在学校担任音乐课程的教师对于教材供给的缺乏，所感的困难又是如此严重呢？他们怎样地需要读物，需要歌曲，由于这些迫切的需要所给予我们的刺激，使我们觉得此类刊物的出版是必要的。”

十九日 《新华日报》载：茅盾、老舍、曹靖华、郑伯奇、夏衍、张恨水、姚蓬子、姚苏凤、施蛰存等二十余人发起张静庐从事出版事业二十五周年纪念征文。征文说：“安慰一个朋友二十五来辛苦的生涯，并勉励他于未来二十五年间对于文化建设有更光荣的贡献。”征文分两种：一种文字，须作与“书”有关的文章，或文艺史料，最少四千字；

二是书画，须用宣纸八开大小的尺寸。

二十日 《文化先锋》第一卷第二十期出“文艺政策讨论特辑”（上），发表了陈铨的《柏拉图的文艺政策》、赵友培的《我们需要“文艺政策”——兼评张梁两先生关于本问题的意见》、夏贯中的《谈张先生的“文艺政策”》、该杂志社的《关于文艺政策的再答辩》。《文化先锋》第一卷第二十一期又出了“文艺政策讨论特辑”（下），发表了王梦鸥的《戴老光眼镜谈文艺政策》、常任侠的《关于“文艺政策”的补充》、丁伯骝译的《社会对于艺术家的责任》。

一月 《戏剧月刊》创刊，为大型戏剧刊物，陈白尘、张骏祥、潘梓农、曹禺、贺孟斧等合编。共出五期，一九四四年四月停刊。

## 二 月

十六日 从是日起，杨华在《新华日报》上连续发表时评，至月底就发表了《关于文学的民族性》、《文学的“商业性”和“政治性”》、《文学与真实》、《“抄袭”论和“奉命”论》、《“拿货色来看”和“文学贫困”论》五篇文章。他批评了陈铨提出的抗战爆发“正是民族文学应运而生的时候”，指出这种文学“早在十年前就已‘应运而生’了”，揭示了民族文学的谬误。他批评了沈从文希望文学“从商场和官场解放出来”，强调作家应在作品中表现政治见解。他批评了梁实秋文艺“与抗战无关”、文艺脱离政治的偏见，肯定了文艺与抗战的密切关系。

十九日 银行界同仁进修服务社邮政储金汇业局支社假



上清寺储汇大楼请曹禺讲悲剧的精神，听众拥挤。曹禺说，构成悲剧的要素有二：首先，悲剧的主人不是走的一条平坦的路，他所遇到的悲哀，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哀。他必须有崇高而伟大的目的，以义士之良心强烈地反抗压迫、罪恶与黑暗，在他艰苦的斗争过程中所遭受的不幸或牺牲，才能称为悲剧。其次，悲剧的主人必须是主动的，能够充分显示出他的意志能力，他必须有所“要”，有所“取”。仅仅是被残酷的社会辗碎了的人，他没有坚强的意志、反抗的热情和高尚的风度，而是一个屈服于恶势力之下的可怜虫，或者他仅是为小我的目的而赴难，即使投身于水火之中的，也不能称为悲剧。

### 三 月

十二日 渝举行大规模音乐会。主办者为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参加者有国立音乐学院本院、分院暨该院管弦乐团、国立歌剧学校、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大同乐会等十余单位。活动中心是夫子池、川师、较场口。节目有军乐、管弦乐、国乐、歌咏等项。

十五日 《天下文章》创刊于重庆，吴熙祖、周彦、徐昌霖编辑。《发刊词》谈了创刊的四点原因：一、出版界有的是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哲学、诗歌、小说、戏剧等专门单一性的刊物，综合性多面性的东西少，而这是“足以适合任何口味的人咀嚼的”；二、读者购买力薄弱，“事实上”，“每个人都这样渴望着”“求得一本能包罗万象的书刊”；三、思想界还“存着不少的残渣”，“正须得有人去导引”；四、战时交通阻隔，资料不易搜集、保管，“我

们每期有系统地搜集一个或几个有永远保存的价值的专门材料。”《天下文章》“基于上面的原因产生了。”“但愿天下的好文章，今后都能尽量搜集进来，更希望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有它的踪迹；任何范畴的研讨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得他方便的参考对象；陷在谬误思想上的青年，都能从这里获得正确的解答；有志于资料搜集的朋友，更能在这一本册子中，求得他们所需要的题材。”

十九日 育才学校分别在大梁子青年会、管家巷儿童美术馆、夫子池励志社三处举行版画、国画展览会，连展三日，发起人为张一麟、许世英、许士骥、冯玉祥、陶行知等。此次展出之百余幅名画均系徐悲鸿、吕凤子、许士祺、赵望云、伍蠡甫、黄君璧、关山月、张聿光、蔡淑慎、宗其香等四十余人捐赠育才之杰作。

二十四日 《新华日报》刊登了一则延安讯，报道说：三月十三日《解放日报》以首页大部分篇幅报道了中共中央文委及中央组织部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消息。毛泽东同志去年五月二十三日在文艺座谈会上之结语摘要，更在注目地位刊出。毛泽东同志指示，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是此次会议的指针，也是文艺运动的总方向。

二十七日 “文协”假渝文化会堂举行成立五周年纪念会，到百余人，由邵力子、张道藩、舒舍予、郭沫若、茅盾、孙伏园等组成主席团。大会通过了取缔任意编选偷印、救济贫病作家、筹募文艺基金等要案多项。大会进行了改选，选出重庆理事二十一人，计有老舍、茅盾、姚蓬子、郭沫若、张道藩、邵力子、胡风、王平陵、孙伏园、阳翰笙、徐霞村、冯乃超、李辰冬、叶以群、宋之的、姚雪垠、马宗融、陈纪滢、曹禺、夏衍、梅林；外埠理事五名，计有巴金、

洪深、朱光潜、张天翼、沙汀；监事九人，计有冯玉祥、叶楚傖、叶林、谢冰心、郑伯奇、顾一樵、曹靖华、潘梓年、张西曼。

为纪念“文协”成立五周年，老舍写了《五年来的文协》，重申了“作事的宗旨”：“第一，团结不是一时一地的事，而是要保持得长远，推展得普遍。第二，大家要多对团结尽力，而不苛求团体的供应周到，因为文协命定是个清苦的团体。第三，事事公开。”他回顾了“文协”五年走过的艰难历程和取得的成绩，希望今后“更有一番新气象”。该文发表在《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上。郭沫若连续撰写了两篇文章：《新文艺的史命——纪念文协五周年》和《抗战以来的文艺思潮——纪念“文协”成立五周年》，认为“抗战以来在中国文艺界最值得纪念的事，便是‘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结成。”他还批评了抗战文艺中出现的不良倾向——

“起先我们是听见‘与抗战无关’的主张，继后又听见‘反对作家从政’的高论，再后则是‘文学的贫困’的呼声”。这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新华日报》和《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上。茅盾也连续撰写了两篇文章：《文协五周年纪念感想》和《抗战以来文艺理论的发展——为“文协”五周年纪念作》，谈了一些人对“文协”的责难，并指出：“诚恳的互相督促，坦白的交换意见，热诚的互助——这是全国作家们更团结得密切些的精神基础，而文协就是这一基础上的一面旗。已经艰辛地支撑了五年的文协，希望它从此以后这精神基础更加坚强，这就是它的比什么都宝贵的成就了！”茅盾还谈了文艺理论之发展，特别是民族化、大众化问题，并认为这是“这几年来我们的理论工作”的“两大项目”，“其它的论辩都可以归进这两大项目，都是分支出来的。而这两大项目又是‘五四’以来新文

艺理论之发展”。这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时间的记录》和《新华日报》上。《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祝“文协”成立五周年》，肯定了“文协”五年来取得的成绩，并指出：

“神圣的抗战在继续，反攻的准备更在迫切，为了实现民族自由解放这崇高的目的，一方面我们期望祖国能够给文艺工作者以更广大、更自由的园地，他方面我们期望灵魂工程师们能够以更诚实生活态度、更真切的现实关心，充分地利用这一切祖国所供给的可能，而在壮阔的文化战斗中发展我们头等的技术与威力。”“全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站得更紧，战斗，战斗到自由解放的明天！”

三十日 “文协”二十七日选举因为时已晚，未曾开票。今日开票，计选出老舍、郭沫若、茅盾、姚蓬子、邵力子、张道藩、巴金、洪深、朱光潜等重庆及外埠理事共二十六名，选出冯玉祥、叶楚伦，叶林，谢冰心、郑伯奇、潘梓年等九名监事。

## 四 月

一日 “文协”召开理事会，选出老舍、徐霞村、王平陵、胡风、姚蓬子五人为常务理事，老舍、徐霞村为总务组正副组长，王平陵、陈纪滢为组织组正副组长，胡风，姚雪垠为研究组正副组长，姚蓬子、叶为群为出版组正副组长，梅林为秘书。

十四日 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三周年。《新华日报》出了纪念特刊，发表有戈宝权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光荣传统——从“罗斯他通讯社的窗子”谈到“塔斯通讯社的窗子”》、简壤的《读诗和写诗》、马雅可夫斯基作、林曦译的《关于

库兹乃次克建设的话》（诗）。

十七日 中国音乐学会假文化会堂举行第一届年会，到会有潘公展、吴伯超、卢前、陈济略等多人。杨仲子主席并报告一年来之会务，后即由洪友兰、罗学濂、刘季洪致词。年会讨论了提案，通过了要案，计有筹划沦陷区音乐人才内迁案、筹设音乐制造厂案、声讨附逆音乐界败类案等。

二十日“文协”桂林分会庆祝成立五周年，田汉主席，百余人到会，地点：艺术馆。田汉报告分会五年来取得的成就，熊佛西、许之乔等讲了话，会后表演文娱节目。

## 五 月

八日 渝戏剧界、文化界假新运会礼堂追悼沈硕甫，到会四百余人。郭沫若致哀词。沈硕甫的老同学报告了沈硕甫的历史，述及当年在北平为学业、家庭所历之辛苦，以及参加戏剧工作的苦干精神。应云卫致答词，说及沈硕甫在中华剧艺社之辛劳时，泣不成声。他还说，希望以后戏剧界同人能够相互更关怀，更爱护，用工作中同志间的温暖来补偿工作中的艰难困苦。他号召戏剧界同人成立剧人福利事业的组织，为剧人谋福利。

十五日 综合性文艺月刊《艺丛》创刊，孟超主编，出了两期而终。

十六日 中国木刻研究会召开临时会员大会，到会十余人，刘铁华主席。大会举行了二届理事改选。

二十八日 “文协”桂林分会召开理事会，重订稿费标准：各种著译文稿发表费为每千字一斗米。

## 六 月

七日 第三届诗人节。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与“文协”假文化会堂联合举行文艺晚会，到会有张道藩、胡风、姚蓬子、宋之的、夏衍等六十余人。首由张道藩致词。晚会还通过了以“文协”名义向鄂西前线将士的致敬电。最后是大同国乐社演奏国乐。《新华日报》出了诗歌专页，发表了艾青的《吴满有》长诗的节选及《附记》、郭沫若的《鞋袜劳军》（诗）。

同日 “文协”桂林分会举行纪念诗人节茶会，到会百余人。李文钊任主席，韩北屏报告了会务，田汉、熊佛西、柳亚子等均发了言，最后还朗诵了诗歌。

十六日 《新华日报》发表苏联艺术家联盟组织委员会致中国木刻界同志的信，说：“苏联艺术家们为了你们赠送中国现代版面拓本向你们敬致诚挚的祝贺与感谢。”这些作品“无论在构思方面无论在技巧方面都是卓越的”。“我们把苏联版画家的作品集赠给你们，以作为我们跟伟大中国人民底艺术家间的一个友情的标记。我们将非常高兴听取你们对于这些作品的意见。从这些作品中，你们将看到苏联艺术家们，是怎样参加红军与全苏人民反对侵略者希特勒强盗（这全体进步人类与全世界文明底不共戴天的仇敌）的英勇斗争。”

十八日 高尔基逝世七周年。中苏文化协会于该会举行高尔基生平照片展览，共计四百余幅。展期四天。晚放电影《在人间》。《新华日报》发表了亚历山大·克利摩夫作的《列宁、斯大林和高尔基——为纪念高尔基逝世七周年》，巴拉巴诺夫作、以沛译的《高尔基笔下的俄罗斯人民——纪念

高尔基逝世七周年》，友谷的《向高尔基学习》等。

二十日 “文协”桂林分会召开文艺刊物编辑会议，由熊佛西主持，议定原则三项：遵循总会提出的稿酬为千字斗米；暂定七、八月千字八十元，九月后按平均米价为准；稿件看清样后即付稿酬。

六月 郭沫若主编之《中原》在渝创刊。郭沫若在他五月八日写的《编者的话》中说：“园地是绝对公开，内容是兼收并蓄，只要是合乎以文艺为中心的范围，只要能认为对于读者多少有一些好处，我们都一律欢迎。因此创作也好，翻译也好，小说诗歌戏剧评论以及关于其他姊妹艺术部门的研究介绍，我们都一视同仁，毫无轩轻。”它声明决不许“袒护法法西斯主义”的人或“稍微带些那样的气息”来扰乱《中原》，还不登“一味的泥古不化，或拘泥于文言文与旧形式的古董”。

## 七 月

一日 《文学杂志》月刊创刊，孙陵主编。

七日 《民族文学》于重庆创刊，陈铨主编。出到第一卷第五期，一九四四年一月停刊。

八日 “夜萤画展”在桂林举行。这个画展展出了余所亚的漫画和新波の木刻，共百余幅作品。刘铁华在《看了“夜萤画展”》一文中写道：“展出是可喜可敬的，那血淋淋的写实，悲壮的场面，黑暗面的泄露，多少总会给后方整日享受的人们，一点小小的刺激，和不安。”

十五日 《新文学》创刊，为大型文学月刊，社长钟坚，编辑肖铁。第一期为小说专号。

十六日 《群众》第八卷第十一期出版，“民族化问题讨论特辑”占了许多篇幅，刊登了劲秋的《略谈创造新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瀚若的《关于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华岗的《我们应该怎样来表现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余约的《我们还要大胆的摄取》、任广的《正还有待于创造》、香汀的《向大众学习》、钳耳的《中国的民族化》、卓芬的《怎样接受中国的文化遗产》、东君的《民族化断想》。

二十一日 重庆图书杂志审查处召开谈话会，各书店、出版社、杂志社负责人参加。审查处处长张兆声在会上说：自七月十五日起，各书店杂志出版预告，都须标明该处审查号数；普通图书封底应印出审查号数；各书店印刷所应依照书店印刷所管理办法，向警察局申请登记，再转社会局发给许可证。

二十三日 桂林文艺界为聂耳逝世八周年举行纪念会。到会百余人，地点是青年会。会上，聂守先报告了聂耳生平，欧阳予倩、蔡楚生等讲了话。

同日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规定：从八月一日起，凡中央机关及文化团体出版不公开发售的中、英文刊物，不论适合免审规定否，一律将原稿送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凭核发审查证或免审证。

三十一日 《群众》第八卷第十二期出版，内有“民族化讨论特辑”（二），载登了沈友谷的《论中国民族的新文化的建立》、远庸的《论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谷溪的《创造新风气》、德君的《民族化杂谈》、黄磷的《民族化和接受文化遗产》、正文的《从几首歌谣来看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编者的《论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



## 八 月

十五日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为抗建文化着想》，指出物价上涨，作家生活贫苦，要求“提高稿费、保障剧作税、设法改善作家生活”，并“治标兼治本”，从速解决实际困难。

## 九 月

七日 应云卫四十寿。洪深、孟君谋、马彦祥、潘子农等发起，于中央青年剧社举行纪念茶会，到会有剧作家、导演、舞台工作者、演员等五六十人。主席洪深，报告了中国话剧运动草创时期的困难情形及应云卫起的积极作用。潘子农、凌鹤等对初期剧运作了怀旧追述，极为兴奋热烈。

## 十 月

四日 渝戏剧电影同业公会开会商讨售票加价问题，评论会也派员出席。戏剧方面，大家认为，京戏川戏（话剧更甚），过去票价最高是三十元，各种捐税开支扣除，还不算演员生活，就要用去收入的百分之九十，近来水电、院租又加价，希望最低票价能加到三十三元至四十五元；电影方面，大家认为，成都、昆明的票价都高于重庆，而院方与片商又采取了折账方式，所以许多好片子不肯来重庆，且近来水电加价，人工伙食又增高，希望最低票价由八元、十三元增到三十元、三十五元。

十日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在广西剧场庆祝第五届戏剧节。欧阳予倩主持，省艺术馆戏剧部、新中国剧社、剧宣四和五队、中兴湘剧团等参加。大会强调要认清国际形势，不要用戏剧粉饰太平，要通过戏剧鼓舞抗战必胜信心，把艺术献给抗战。

十六日 全国木刻展览会在大梁子青年会举行，展期两天，展出作品三百余幅，内有套色木刻五十多帧。

同日 《新华日报》载：“文协”将邀请文艺界人士，会谈合理厘订稿费问题，拟参照桂林文艺界曾提出过的“千字斗米”的原则进行。同时，该报还发表了《提高稿费问题》的短评，支持“文协”。

十七日 “文协”在中国文艺社约请文艺界人士座谈稿费问题。文艺工作者许多靠稿费维持生活，但每千字的稿酬，比每千字的排工低得多，所以生活十分清苦。《新华日报》在十六日发表的《文艺作家生活清苦要求提高稿费价格》这则消息的按语中说：“上面所说的排工印刷所承印价格，不是工人所得每千字的工价。据目前一般印刷所包给工人的排工工资，每千字为十二元（每天拣还各三千），另加厂方供给工人膳宿等费平均每天约二十四元；即每千字加上八元的膳宿费，所以排字工人每千字的排工实际所得约二十元，包括厂商利润在内的承印排工，每千字的价格，按照一般市价是八十到一百元，不能和排字工人的实际工资相混同。”座谈会当即会商决定仿桂林“千字斗米”办法，发表费每千字一斗米，卖版权照发表费“千字斗米”再加一倍，未发表的照“千字斗米”加倍后再加一倍发表费。版税抽百分之十五，再版时抽百分之二十。

十八日 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召集渝市出版界会议，到会有方治、谢澄宇、谢康、史久芸、张静庐、刘百闵、华

林、梅林等五十多人。主席方治报告：一、书刊邮寄改善办法；二、国际书刊流通管理办法；三、出版业同业公会成立经过等。在讨论稿费、版税后决定：一、三十元千字之最低稿酬应予提高，至于提至何处由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审慎考虑同“文协”代表与出版业代表商议解决；二、版税仍维持照售价抽百分之十五，但各出版业应从速拨付稿费，并可酌情预付版税若干；三、出版业同人应常聚会，交换意见，联络感情，以推进文化事业。

十九日 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新华日报》在翌日的一则报道中说：“今年仍没有举行大规模的纪念会，然而在人们的心里并没有忘掉这个日子。许多书店为了纪念这个中国的文豪、青年的导师，都自动地减价出售鲁迅先生的遗著和其他的文艺书籍，读者也很踊跃地购买这些书籍。据书店方面的人讲：‘平时鲁迅先生的著作，就销得很好，而在昨天较往日更好。’鲁迅先生仍然活在人们的心里。”

二十日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治标与治本——如何解除文化工作者的苦闷》。社论说：“我们绝不讳言我们文化工作者的清苦，我们更衷心地期待着文化工作者生活的改善，但，我们却不能同意，以为物质生活上的困顿就是唯一使我们文化工作者感到苦痛的原因。”社论指出，“文化出版事业陷于困顿的原因”，是“别有所在”，期待解除“文化管制”。

同日 《自学》杂志社和《广西日报》副刊《读书俱乐部》在桂联合召开座谈会，胡仲持主持，巴金、艾芜、田汉、周钢鸣、司马文森、安娥、孟超、韩北屏、灵珠、端木蕻良、黄药眠、洪遒、胡明树、林焕平、孙怀琮等人参加，座谈茅盾的新作《霜叶红似二月花》。大家认为这是抗战以

来文学上的巨大收获，并决定联名向茅盾致祝贺电。座谈记录刊登在《自学》二卷一期上。

二十一日 《新华副刊》出戏剧专页，刊载了章罍的《剧季的过去和现在》、刘沛雨的《杂论〈杏花春雨江南〉》、伊的《听着：江南，和所有失去的土地！》（诗）、梅令宜的《另一个范险——略论戏剧界的“市侩主义”》等。编者在附言中说：“雾季开始了，我们的‘戏剧号’难航在漫天风雨之中。在周遭都是暗礁的状态之下，确实地把握我们的罗盘针是必要的。本期《新剧》戏剧专页刊出了两篇文章，可以说指出了横阻在我们前面的两块礁石。一方面，在我们戏剧工作者之中还存在某些不顾客观现实，而尽在自己头脑里面描画一些美丽希望的倾向，而另一面，都市市侩主义开始蠢动，拚命的想演‘卖钱的戏’来作为少数‘投资者’（居然也叫做‘演出者’了）牟利的资本，为资剧运的正常发展，我们相信这两篇都是值得一读的文章。”

## 十一月

一日 《新华日报》出版戏剧专页，内发表了白芩的《宁肯碰壁，不走小路——“态度严肃”并不等于“艺术成功”》、李治的《改善我们的健康状态》、章罍的《走向目标的道路》、杜镜若的《〈戏剧春秋〉先读所感》、金梓凡的《读〈金凤剪玉衣〉》等。白芩的文章对上月二十一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章罍的文章《剧季的过去和现在》提出了异议，问题主要集中在走否小路、态度与艺术问题上。白芩反对章罍提出的“前面有人筑起一道墙，我们也就只好歪一点拐到旁边的小路去”的观点的，而主张“宁肯碰壁，不走小

路”，还反对章罍在态度与艺术上的提法，认为“‘态度严肃’并不等于‘艺术成功’”。章罍在《走向目标的道路》对自己的观点作了进一步解释，对白芩进行了反驳。编者在附言里指出：“对于章罍梅令宜二位的文章，编者在上期附言中已经指出：这同时对我们指明了当前戏运的两种有害的倾向，前者指摘了不顾客观现实而尽在头脑里描画一些美丽希望的倾向，而后者则痛论了所谓‘市儇主义’抬头的毒害。一般而论，在一种运动遭遇到困难的时候，慷慨牺牲容易，委曲撑持艰难，所以章罍先生全文论旨，要求戏剧工作者对当前现实有更深入的认识，发挥韧性作风，迂回曲折地为剧运的存在与发展而奋斗——我们同意这种意见。也许，从字面讲，‘前面小路筑起一道墙，我们也就只好歪一点拐到小路去’这句话可以引起白芩先生的误解，但是，我们相信，就全文论旨来看，就可知道章先生的所谓‘小路’决不是贪图便宜而走向歪曲的乃至后退的路子。通罗马的路多得很，只要把握得住方向，不能走康庄的时候现实主义的工作者有时候是也不惜走一段泥路的。当然，白芩先生的顾虑是值得警惕的：在暗夜中走，失不得足，在泥泞中走，先要有‘不染’的自信才对的。”编者还指出，使章白二先生意见相左的原因“在于前者就全盘剧运立论，而后者则有感于目前出现于成都的某些演出的市儇倾向而发。”同时，还说“当然，我们也很理解白芩先生的孤愤”，因“白芩先生的大声疾呼可以唤起剧运工作者的反省与警戒”。

九日 西南戏剧展览会（简称“剧展会”）在桂林广西剧场举行筹备会。到欧阳予倩、田汉、李文钊、熊佛西、瞿白音等。议定：“剧展会”由广西艺术馆主办，新中国剧社及桂市文艺界协助。拟邀请黔、滇、湘、粤、闽、赣、鄂等

省参加。

同日 《新华日报》发表萧曙的《作家生活与文化出版事业》。文章指出，不仅作家生活困难，正直的出版，也“几乎没有一家不叫苦连天”。作者认为，提高稿费、版税只是个治标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乃在政府重新考虑目前的文化政策，铲除目前文化出版事业发展中的各种障碍。”此外，“开放民众运动”，这不但“有助于作家生活的改善，而且社会其他部门也因之得到改革，直接间接都与作者生活有极大裨益。”

十一日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文化建设的先决条件》。这篇社论是根据《讲话》精神结合国统区的情况写成的。社论指出：“我们今天要建设的，不该是专为不满百分之十的人们的文化，而应该是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的文化。”“‘为人民群众，为中国的人民群众’，这是我们的前提。我们的文化应该以人民群众的利害为利害，以人民群众的好恶为好恶。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应该熟悉人民群众的生活，贴近人民群众的感情，勇敢地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把自己的思想情绪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一方面耐心地帮助他们摆脱背上‘因袭的重担’，他方面积极地从不断成长中的人民群众之中吸取健康丰富的养料，加工整理，而创造出清新泼辣的‘中国人民大众化’了的文化。”

同日 《戏剧时代》于重庆创刊，编辑者洪深、吴祖光、马彦祥、焦菊隐、刘念渠，共出了六期，一九四四年十月停刊。

十二日 国民党公布《文化运动纲领》，包括六个部分的内容：第一、文化的意义；第二、中华民族文化的哲学基础——民生哲学；第三、中华民族文化的建立；第四、民族文

化的五大建设——心理、伦理、社会、政治、经济的建设；第五、中心工作的实施；第六、文化运动之指挥、执行、考核机构。

二十八日 《文学创作》在桂林举行座谈会，田汉任主席，欧阳予倩、邵荃麟、胡仲持、李文钊、熊佛西、宋云彬、周钢鸣、司马文森、彭燕郊、芦荻、灵珠、孟超、阳太阳、胡危舟、秦似、张煌、洪遄、韩北屏等二十余人到会，座谈内容：展望战后中国文艺。田汉谈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和抗战文艺的发展，欧阳予倩、邵荃麟等也发了言。

## 十二月

十一日 《扫荡报》载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公告，曰：“本会鉴于抗战以来，戏剧工作之突飞猛进，为了加强戏剧工作之联系，及收观摩切磋之效，拟于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戏剧节）在桂林举行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及西南戏剧工作者大会。业经广西政府核准备案，并分辖湘、粤、桂、黔、滇西南五省及闽、赣、鄂等三邻省戏剧团队，请俱参加，如有未曾收到‘通启’及‘简则’者，请径函广西省立艺术馆内本会索取为荷。”

二十日 《新华日报》发表简壤的文章《诗人的忧郁——读王亚平〈生活的谣曲〉》，指出王亚平在《生活的谣曲》中表现的忧郁是有代表性的。作者分析了原因，诗人的“热情容易燃烧，也容易马上冷却”“更加上生活的单调和沉闷，他感到淤塞枯寂的烦恼。这正是诗人所以忧郁的原因。”还指出：“为了更大的进步，那末就必须抛弃掉这种病态的忧郁，否则诗人便不能更爽朗地生活，更深入地去思想，

更广阔地去接触世界。”

二十五日 中国著作人发起人会议在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礼堂举行。会议推定夏衍、徐仲年、常任侠、徐蔚南、程希孟、卢于道、宗白华、简又文、王新农、李辰冬、刘百闵、胡一贯、阳翰笙、鲁觉吾、姚蓬子、华林为筹备员，并推潘公展为召集人，鲁觉吾兼总干事。

三十日 “文协”与中国文艺社在文化会堂举行辞年恳谈会，一百多人到会，孙伏园主席，胡风主持会议。常任侠、冯雪峰、阳翰笙等围绕“一年来文艺成果的感想”发表了意见。



一九四四年

一月

一日 《新华日报》以第六版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部分内容。总题为《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具体包括三篇文章：《文艺上的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艺的普及和提高》、《文艺和政治》。编者在附言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发表过两次讲话，有系统地说明了目前文艺和文艺运动上的根本问题。原文不可能全部发表，只好提要介绍一下。在这三篇文章中，关于普及与提高问题的一篇，全部是毛泽东同志的原文，另外两篇中加着引号的部分也都是他的原文。原文全部共二万余字，此地所节录出来的自然只能传达出其中若干基本的论点。”

同日 熊佛西主编的《当代文艺》在桂林创刊。编者在《卷头语》中说：“创刊伊始，我们不愿空立诺言，愿以将来的行动来表示我们现在的意旨。我们是文艺爱好者，誓以文艺报国——以文艺为武器，争取我们的胜利，完成我们建国的心理建设。”还说“胜利的曙光已照耀在眼前”，“本社同仁愿与全国作家读者诸君共同奋勉，发挥文艺的功能，争取民族国家的自由独立。”

同日 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成立仪式在千佛洞举行；同时，在敦煌城中举行展览会两日，陈列敦煌艺术作品三百余件和意、法、伊朗等国壁画印刷品数十件。

十五日 “文协”桂林分会开欢送会，欢送李济深调军事参议院院长。欢送会由田汉主持，李任仁、柳亚子、端木蕻良、周钢鸣、熊佛西等相继讲了话。

二十二日 中国木刻研究会为了纪念成立两周年，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全国木刻展览，展期一周。参加展览的有重庆、成都、贵阳、桂林、广东、湖南、江西、浙江、河南、陕西、甘肃和敌后等地的木刻研究分会送来的作品，共五百多幅，包括作家八十多人。翌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刘铁华的《全国木展巡礼》，说：“这次所展览的作品，不但内容广泛新鲜，而技巧上也都有进步，如构图的精细新颖，光线的配置，刀触的运用，主题的表现等等，都显示了新的不同的风格。”作者对李桦、梁永泰、王立、吴忠翰、阿杨楨、力夫、黄荣灿、金风烈、刘平之、鄧中铁、谢梓文、野夫、陆因、黄克靖、荒烟、漾兮、纳维等的作品作了逐一评述。

## 二 月

六日 吴晓邦新作舞蹈欣赏会在渝道门口银社举行，“文协”主办。演出节目，计有嘉禾舞、钓鱼乐、花之歌，思凡、网中人、心愿、鸯鹅、愁怨。

十四日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招待新闻界，罗学瀛任主席。马彦祥、周伯勋叙说了戏剧界的状况、贡献和要求。他们说，戏剧工作者生活没有保障，在前线的只享有士兵待遇，在后方的贫病交加；捐税多而重，“希望税收合理”，还希望能合理提高票价。最后主席说：“我们不反对任何税和捐，只希望政府减轻我们的负担，如果觉得戏剧不是单纯的娱乐，而值得争取观众的话。”同日，剧协发布广

播讲词《携起手来，更勇敢地前进！》，回顾剧运的历史，经历的曲折和贡献，表示：“将永远永远站在中国民族中国人民的立场，”为“新中国而工作，而创造，而奋斗。”

十五日 戏剧节。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召开纪念大会，地点：文化会堂。到会有邵力子、梁寒操、郭沫若、顾毓琇、潘公展、黄少谷、洪深、罗学濂、马彦祥、周伯勋、夏衍、宋之的及美国新闻处总编辑华思等，共二百多人。主席罗学濂说：今天是纪念政府明令规定后的第一次戏剧节，纪念大会，第一为的怀念与敬悼在戏剧岗位上努力奋斗而牺牲的同志；第二对过去剧运加以检讨，以求得将来的发展；第三配合建国的任务，以发挥宣传教育有效的力量。马彦祥代表剧协报告戏剧节工作情形，并提出减轻捐税的要求。他说：戏剧界负担实在是太重了。重庆去年的娱乐捐抽百分之三十，今年加到百分之五十，加上印花税、营业税、冬令救济捐、湘灾救济捐等总数达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他反对把戏剧当做“单纯的娱乐”看，说课以重税是在限制发展。他还指出：戏剧界非常艰难，由此而产生了两种倾向：一是选择剧本与抗战脱节，不得不迎合观众胃口；一是公演减少，因实赔不起钱。

《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抗战戏剧到人民中去！——祝三十三年度戏剧节》，概述了剧运的艰难进程，取得的成功，特别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在前方，戏剧运动渐次的消沉，工作团队日见减少，在后方，由于物质条件的困难，由于检查标准的苛杂，由于物价波动而造成的生活艰难，由于票价提高而观众逐渐限制于有钱有闲者的事实，后方剧运有脱离广大人民，游离抗战现实，而渐次趋向于卑俗娱乐和高

蹈自喜的倾向。”号召“用更大的决心来扭转我们剧运危机。”该报还出了纪念特刊，刊登了郭沫若的《戏剧与民众》、夏衍的《我们要在困难中行进》、焦菊隐的《扩展戏剧抗战的领域》、史东山的《今日戏剧的命运》、梅令宜的《发扬新演剧的优良传统》。

教育部宣布获奖的剧本，共四部。老舍、赵清阁的《桃李春风》、奖二万元；曹禺的《蜕变》，奖一万五千元；于伶的《杏花春雨江南》，奖一万元；沈浮的《金玉满堂》，奖一万元。此外，《桃李春风》的导演吴永刚，《蜕变》和《杏花春雨江南》的导演史东山，《金玉满堂》的导演潘子农，各奖五千元。再，演出《桃李春风》和《金玉满堂》的中电剧团、演出《蜕变》的中国万岁剧团、演出《杏花春雨江南》的中国艺术剧社，各得奖旗一面。

同日广西艺术馆新厦落成典礼与“剧展会”开幕合并隆重举行。到会有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李文钊、瞿白音、赵如琳、陈劭先、千家驹等及桂、粤、黔、滇、闽、赣、鄂八省戏剧工作者共千余人。欧阳予倩报告筹备经过，张道藩致词，田汉演说：“要求政府予戏剧工作者以应有之爱护及工作上之便利。希望此次剧展会中各戏剧工作者，能诚恳坦白自我批判，检讨过去得失，推进戏剧理论运动，籍使今后戏剧能获得正确之发展方向。”“剧展会”包括的内容有：一、戏剧演出；二、戏剧工作者大会；三、戏剧资料展览。同日，《力报》刊载剧展会发布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开幕启事》：“敬启者：西南各省市戏剧工作者，鉴于戏剧发展至今之阶段，益应加紧团结，互相研讨，以收观摩切磋之效。几经集议，于本年戏剧节日，在桂林举行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筹备以来，荷蒙各地首长加意匡复，社

会人士热心赞助，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今各地参加团队已陆续到达，爰订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假座桂西路广西省立艺术馆大礼堂，举行开幕典礼。唯事属创举，工作艰难，一切容有未周，恭请莅临指教”。

十六日 剧协为庆祝戏剧节在文化会堂举行学术讲演。马彦祥和洪深主讲。前者的讲题是《地方剧演技体系研究》，后者的讲题是《拍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戏剧理论》。十七日再次举行了讲演。主讲焦菊隐，讲题是《表现民主的戏剧》。曹禺也参加了讲演。

二十二日 “文协”桂林分会组成剧展演出批评团，对剧展演出剧目进行讨论，并写出文章。田汉、韩北屏、孟超等十人参加了这个批评团。

二十八日 “文协”桂林分会为欢迎剧展团队举行茶会，田汉任主席，百余人参加。田汉、李文钊、欧阳予倩、熊佛西、周钢鸣、邵荃麟等相继讲了话。

二十九日 “文协”桂林分会举行茶会欢迎参加“剧展会”各团队代表，地点：大华饭店。百余人参加。田汉、李文钊、欧阳予倩、熊佛西、周钢鸣、邵荃麟、秦似、魏曼青、曾也鲁、刁光覃、赵越等相继发表讲话，希确定今后剧运方向，扩大农村、前线的演剧运动。创作适宜于大众的有教育意义的剧本。

## 三 月

一日 “剧展会”戏剧工作者大会在广西艺术馆新厦举行，到会戏剧工作者千余人。开幕后，主席团决定：为更加

充实内容及让来桂各团队有充分时间准备，大会改在五日举行。五日按时举行了大会。孟君谋、赵如琳、曾也鲁分别报告了重庆、广东、江西等地的戏剧运动情况。

十四日 《新华日报》载：“文协”桂林分会和书业公会最近举行了联席会议，通过了欢迎政府改善图书审查的办法，还提了不少改进的具体措施。

十七日 “剧展会”之资料展览在广西艺术馆新厦开幕。展出包括团队历史、统计图表、舞台模型、舞台画片、剧作家手稿、剧票脸谱、海报、说明书等数千件。参加展出的单位有十几个。

十九日 郭沫若在《新华日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精辟地论述了明末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还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同日 “文协”桂林分会举行会员大会，一百余人到会。田汉任主席，在报告中，检讨了一年来分会之工作，还谈了改选事宜和今后文艺工作的积极任务。李文钊作会务报告。会议通过的提案有：设立西南文艺工作者联谊会、响应当前宪政运动、加强与印刷厂的联系、出版定期刊物、编印文艺年鉴、恢复文艺讲习班、加强与国际友人之联系、介绍优秀作品出国等。大会进行了改选，结果选出理事二十一人：田汉、欧阳予倩、艾芜、李文钊、柳亚子、周钢鸣、巴金、胡仲持、韩北屏、孟超、司马文森、邵荃麟、黄药眠、

宋云彬、熊佛西、骆宾基、端木蕻良、穆木天、蔡楚生、瞿白音等。候补理事五人：洪道、伍禾、王鲁彦、王西彦、陈闲。

二十二日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西南支会筹备会在桂广西艺术馆举行，这是为执行“剧展会”戏剧工作者大会的决议而召开的。主持者吕复。议定：一、支会地址设在桂林；二、包括粤、桂、湘、鄂、赣、闽、滇、黔八省；三、以从事剧运时间久否会员分为甲乙两种；四、推选理事十一人、常务理事五人、主任常务理事一人，理事会下设总务部、学术部、供应部、组织部、福利委员会等。大家公推欧阳予倩为筹备主任，瞿白音、吕复、王小涵起草章程。

二十四日 油画家唐一和乘船从江津到重庆，不幸因轮船遇难逝世，终年三十九岁。

二十七日 《新华日报》载：“文协”桂林分会因作家生活更困难，开会讨论增加稿费问题，决定每千字发表费提高到一百二十元。

三月 四川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召集戏剧界和报纸副刊编辑举行座谈会，万籟天、杨村彬、吴祖光等三十余人出席。戏剧界向当局提出了要求：保障剧人生活、放宽审查尺度、严格检查上海拍摄的影片、减低娱乐捐税、迅速审发剧本、建立剧场、平抑剧场租金。

## 四 月

一日 《青年文艺》新一卷第一期出版。《革新献词》说：“《青文》原是一个注重灌输文学知识，推荐新人作品的刊物。这方针，我们还是照旧坚持，我们总愿望热诚而

虚心地为新人更多做一点服务。然而，为着对新人们寄以更高的期望，我们决定把选稿水准略略提高。”还说：“我们的目标是非常单纯的，既无远大的幻想，亦无惊人的企图，只想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在可能范围之内，以农夫底辛勤和耕牛底努力，为年青的中国新文艺贡献一点力量！”又说：

“这窄小的地盘，不是任何人底私产，而是一切忠诚于文艺的工作者底交誼室，是一切具有年青的精神的文艺者（当然大家也在内）底竞技场，是种种色色年青而健康的文艺花果底培植地！”

五日 音乐节。中国音乐学会主持的音乐节纪念大会和第二届年会合并举行，地点：广播大厦。主席顾毓琇。大会听取了会务报告，并决议编辑音乐学会丛书，请免音乐演奏会娱乐捐等。大会选举的吴伯超、李抱忱、赵光任、江定仙等二十七人为理事。午后音专举行学生独唱比赛会，评判员由杨仲子、吴伯超、李抱忱、应尚能、胡然、斯义桂、戴粹伦等担任，演唱均是我国作曲家的作品。

十五日 “文协”召开座谈会，胡风、茅盾、老舍、马宗融、姚蓬子、王平陵等数十人到会，论题为《文艺与社会风气》。

同日 《新华日报》载：郭沫若、沈雁冰、孙伏园等二十余人，为老舍从事创作二十年发起举行纪念会。

十六日 “文协”在文运会举行六周年纪念会，到一百五十余人，邵力子主席，老舍报告会务，略述了文协年来以每月二千元之经费处置全国会务的拮据情形。胡风在会上宣读了“文协”理事会推举五位理事商讨了要点由研究部执笔草成的参考论文《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该文从客观实际和主观战斗精神的关系出发，回顾了抗战文艺的发展，



特别指出了“主观战斗精神的衰落”：“我们看到了对于生活的追随的态度”，“我们看到了对于生活的做假态度”，“我们看到了对于生活的卖笑态度”。文章强调：“文艺家底人格力量，文艺家的战斗要求”；“对于生活的深入和献身”；“用具体的努力开发广大人民底文化生活”；“促进新作家底出现和成长”。

《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祝“文协”成立六周年》，指出：“抗战已经快七年，而我们的文艺运动却沉滞在黯云低迷的状况之下”，“现在我们的文艺作家，局促在后方的小天地之中，被阻塞了和人民大众接触的路子，出版事业濒于窒息，文艺不当作整个抗日战争的一环而被视为‘娱乐’的手段，于是而风花雪月的风气抬头，消闲猎奇，谈狐说鬼的‘文艺’继起，文艺变成了少数人茶余酒后的消遣，健康而有益于抗战的文艺反受了阻抑与冷遇”。社论最后说：“但是今天，我们还是衷心地祝福和珍重着这个文艺工作者们的节日，春已酣，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日子已经近了，我们祝祷着全国文艺工作者的奋斗。”

十七日 老舍从事创作二十周年。文艺界假百龄餐厅举行纪念茶会，座无虚席。主席邵力子致词说：今日参加茶会人士的踊跃，足以证明社会对于舒先生敬慕之忱，与企望之重。在座有友邦人士、有民间艺人，所以舒先生真是“蜚声海外，深入民间”。我们既庆贺他过去二十年创作的成绩，也希望今后二十年、四十年能更多读到老舍的创作，贡献民族人群，尤其盼望文艺界人士都能效法舒先生以文艺创作为终身事业，矢志不贰。郭沫若、黄炎培、邓初民、程中行、顾毓琇、沈雁冰、张道藩、沈钧儒等也相继致词，赞扬老舍二十年所作的贡献，赞扬他对国家的忠忱，对朋友的亲切，

维持“文协”所作的苦心与努力。老舍幼年同学杨云竹报告《二十年前之小老舍》，对老舍和他在北平师范学堂同窗时的情形作了详细叙述。老舍致答词说：今天承诸友好集会纪念，愧不敢当，二十年从创作，虽历尽辛苦，得来不容易；但是拉洋车做小工二十年的人，也历尽辛苦，得来也不容易。本人生病近半年，最近才好，籍机会大家见见面，谈谈天，反觉有意义。今天诸友的厚爱，我敬谨接受，并深致谢意。此后必定用笔写下去，写下去。

《新华日报》为祝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周年发表了短评《作家的创作生活》，说：“他在抗战七年来为文艺界团结所尽的力量是值得人们永远追忆的，他又曾为了实际的需要而尝试运用各种艺术形式（包括民间艺术形式），这对所谓既成的作家是很难能的事。他曾屡次为文艺界生活的困难而向社会呼吁，但他同时又斩钉截铁地说：‘尽管贫穷，我们要咬紧牙关忍受，要保持清高，不可变节’”。同时，该报还出了纪念特刊，载有茅盾的《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郭沫若的诗《文章入冠》、胡风的《在文协第六届年会的时候祝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年》。

二十日 桂林文艺界在省立艺术馆举行集会，庆祝“文协”总会成立六周年，济济一堂。田汉主席，并报告了抗战以来文艺界工作之情形，指出了今后文艺运动之路线，提出了应密切与国际文艺联系的问题。柳亚子、熊佛西等人也讲了话。熊佛西申诉了出版家的困难。文艺活动开始，剧宣七队朗诵了自作的《亲爱的先生！请静听》、表演了苗瑶民歌独唱、提琴四重奏、中国剧社演了活报剧《一盒火柴》、四维平剧团演了《明末遗恨》。

二十二日 桂林“文协”主办的诗歌朗诵夜会开幕。

邵荃麟对夜会作了简短介绍。朗诵节目有李实中、朱琳分别朗诵艾青的《黎明的通知》、何其芳的《平静的海隐藏着波浪》及《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安娥朗诵普希金《恋歌》中之《哥萨克》、韩北屏与方莹等朗诵了自己的作品。朗诵中还夹有两个歌唱节目：一是陆滨的新疆民歌独唱，《你要娶她吗？》，二是舒模独唱自己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朗诵毕，田汉、周钢鸣、孟超等即发表观感，在朗诵的内容和方式上提了许多意见。田汉认为这次朗诵计划性还不够，朗诵的作品内容均健康，但还要加强战斗性。

二七八日 为庆祝欧阳予倩五十六寿辰和创作三十三周年，“文协”桂林分会举行了庆祝会。

## 五 月

三日 渝文化界假百龄餐厅举行茶会，到孙伏园、张申府、曹禹、潘子农、吴藻溪、张静庐、马彦祥、沈志远等五十多人，张申府主席。议题是言论出版自由。发言者十分踊跃。要求取消审查制度，杂志出版后再登记，各地军政当局不得禁扣各种书刊及干涉出演戏剧，取消过去的关于剧本的禁令，发还扣押的原稿等。当场推举沈志远等六人负责整理各项意见，起草重庆文化界对民主文化意见、告全国同胞书、致国民党十二中全会要求取消新闻图书杂志戏剧演出审查制度函。

十二日 全国美术学会举办的全国美术展览会假中央图书馆举行，中西图画金石书法挂满了大厅及走廊。《新华日报》在翌日发表的短讯中评述说：“在油画与水彩画中，尚有几张描写抗战与反映真实战时生活的画，如吕斯百的缝衣

人，秦宣夫的公务员家庭”；“宗其香的纤天、张茜英的灌县都江堰三幅，把劳动人民的生活也表现得很逼真”；但绝大多数异然：“走到图画展览室，几乎全是古刹丛林，深山幽壑及花鳥之类，简直与目前的战争和社会生活相隔十万八千里，它所给参观者的印象是‘超尘脱俗’的生活，这一点，在目前抗战七年，正是处于艰苦的局面之下的我们，不能说不深以为异。”

同日 《新华日报》报道戏剧界要求减低娱乐税和调整票价消息，说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要求政府减低娱乐税为百分之一，并重新调话剧票价为最高一百五十元。剧协理由有五：①话剧是政府所提倡的，不得认为是不当的行为而课以重税；②话剧和美术音乐同为艺术，美术音乐没有听说课税；③话剧演出都经政府通过，非单纯的娱乐性质；④年来物价暴涨，已增到五倍，而戏票不过增加四十五元，相距很大。⑤话剧负担已重，不应当课以重税。”同日报纸又一则简讯说：社会局已将话剧票调整为六十五元与五十五元两种，娱乐税、印花税均在內。并公布：本年一月渝市收娱乐捐为三百多万元，二月分为六百多万元，三月分为五百八十余万元，四月分为四百八十余万元。

十六日 张恨水五十寿辰。渝新闻界、文艺界拟举行茶会，以表庆祝。然张恨水不愿接受，于十五日返南泉。《新华日报》发表短评《张恨水先生创作三十年》，指出：“我们不仅要为恨水先生个人致祝，同时还要为中国文坛向这位从遥远的过程，迂徐而踏实地走向现实主义道路的艺人，致热烈的敬意。”他的作品“在主题上尽管迂回而曲折，而题材却是最接近于现实的；由于恨水先生的正义感与丰富的热情，他的作品也无不以同情弱小，反抗强暴为主要的‘题目’。”

十九日 “剧展会”在桂广西艺术馆隆重闭幕。李济深、黄朴心、阮毅成、欧阳予倩、田汉、柳亚子、瞿白音、吕复等千余人参加。田汉作抗战殉难剧人生平的报告，要求社会对剧人生活给予关怀，并呼吁援助被某地非法拘捕的广州儿童剧团二十六名团员。大会通过了十则戏剧工作者公约：一、认清任务；二、砥礪气节；三、面向群众；四、面向整体；五、勤研学术；六、磨练技术；七、效率第一；八、健康第一；九、尊重集体；十、接受批评。翌日，“剧展会”在《扫荡报》发布了闭幕启事：“敬启者：本会开幕以来，为时三月，荷蒙各机关首长鼎力匡扶，社会人士热心赞助，全部工作赖以顺利进行，本会同入实深感谢。现各项活动均告结束，本届大会已于本月十九日圆满闭幕。惟是属创举，工作艰难，布置容有未周，疏忽自所难免，特此申明并致歉忱，尚祈亮察是幸。”

同日 《新华日报》为西南剧展闭幕发表短评，题为《西南剧展闭幕》，指出：“西南剧展，在许多贤明的帮助之下，好容易结束了。重庆几个艰苦奋斗了一年多的职业剧团，现在以困难太多，不能不无声地离去。我们在这里除开向西南八省的戏剧战士，遥祝他们今后的工作顺利之外，同时也希望今年的雾季，那些现在不能不离去的剧团，能够有重到陪都的时候。中国的文化要保卫，中国的民主我们更要争取！”

二十三日 剧人江村病逝成都传染病院，年二十八岁。这位江苏南通人在内地没有一个亲戚，又贫又病，他的医药费全由同行资助。中国胜利剧社演出《两面人》，拟将所得捐一万给江村做药费，可是，江村没有来得及用这笔钱就与世长辞，这一万医药费就作了安葬费。江村逝后，重庆

《新民报》发刊了一组纪念文章，《新华日报》也刊载了纪念文章。孙宗明在《哀江村》里述说了生活与事业的艰辛，最后写道：“每一个观众不会忘记江村在舞台上、在银幕上给了他们些什么。每一个读者也不会遗失掉江村的诗里的爱。所以我们今天纪念江村，不悲哀更不沮丧，只是惋惜这不过二十几年的一片青春，像一朵未放的花，像一颗殒星。他死得太早了！”

二十八日 桂林文化界假社会服务处礼堂，举行柳亚子五十八寿辰纪念茶会，一百多人出席。田汉致祝寿词，李铁夫、梁漱溟、金仲华、宋云彬、千家驹、熊佛西等相继演说。宋云彬、金仲华指出：要了解柳氏的旧诗作品，应该从他整个为人的气质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评论。熊佛西指出：柳氏的思想为人，重于实事求是，见于行动，他的实际行动比诗文更能感人。最后柳亚子致答词，述说了五八初度的感想，还说愿多活几年，尽力从事研究工作。

三十日 《新华日报》发表张健的《再谈“尊重作家”》。这篇文章着重谈了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有一位论客”引用了毛泽东同志艺术要服从政治的话并说这是要剥夺作家的自由，作者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服从的只是“自己阶级的政治要求，而并非说所有的作家都应该服从一个阶级，一个党。”

五月 文化界人士聚郭沫若家，欢迎从延安来渝的何其芳、刘白羽二人。他俩是奉周恩来之命随林伯渠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到重庆的，任务：介绍延安整风及文艺界情况。他俩按周恩来的指示，先向郭沫若谈延安整风及文艺界情况。郭沫若深受启发，即按周恩来在延安的嘱托，第二天就召开了座谈会，请何其芳、刘白羽谈了延安整风情况、文艺座谈会

前后及《讲话》精神。

同日 “文协”成都分会纪念屈原，庆祝诗人节。邹荻帆主持。庆祝会原拟邀金陵大学陈中凡讲屈原生平，陈中凡说身体不好，推荐孙次舟去介绍。孙次舟在会上大讲屈原是弄臣，把屈原与投降派的斗争诬蔑为是楚王爱男风而失宠的丑闻。陈翔鹤、洪钟、邹荻帆等当场予以回击。事后，孙次舟将自己观点写成文章发表在《中央日报》上。郭沫若、闻一多等在报刊上即撰文批驳。

## 六 月

五日 从是日起，作曲家沙梅假渝广播大厦举行个人作品演奏会，连续两天。演出节目有《秋收》、《祖国之恋》、《打回东北去》、《嘉陵江船夫曲》、《抗战的烈火》、《小夜曲》、《模范小曲》等。

六日 “文协”发《向全世界反法西斯作家致敬》电，称：“在今天，伟大的民主阵营用雷霆万钧的力量向法西斯的元凶希特勒德国开始了最后的致命打击的六月六日，我们，全中国的为民族的彻底解放，为民主的彻底胜利而奋斗的作家们，在激动狂热的情绪里面，向你们表示兄弟的关怀，向你们致送战友的敬礼！”还表示：“在战斗要求上，工作的道路彼此相连，我们要用艰苦的斗争来响应你们的艰苦的斗争，要汲取你们的斗争经验，要学习你们的斗争精神，要配得上被称为你们的战友，为民族的彻底解放和民主的彻底实现而不在任何困难面前却步。”

十七日 “文协”在文化会堂举行文艺欣赏晚会，曹禺谈创作经验，史东山讲导演经验，白杨、舒绣文等朗诵了诗

歌。

十八日 高尔基逝世八周年。中苏文化协会在该会举行纪念晚会，放影苏联影片。同日，举办高尔基作品绘画和斯大林奖金照片展览。《新华日报》发表了舒木的《消灭一切形式式的法西斯主义来纪念伟大的高尔基》，指出：“我们应该记着：只消灭德意日等法西斯主义的根源还不够，我们还要消灭一切形式式的隐藏的和半隐藏的和半法西斯主义，才能保证全人类将来的幸福、友爱和繁荣。这也才是纪念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士高尔基的好办法。”同时，还发表了戈宝权译的高尔基早期作品《伊塞吉尔老太婆》中的第三段《英雄丹科的传说》。

二十日 “文协”桂林分会在该会会址召开桂市文艺刊物编辑及发行人会议，熊佛西主席，商讨稿费问题，决定：一、拥护总会提出的千字斗米运动；二、因近米价波动大，暂定七、八月千字八十元稿酬，九月以后则以上月米价的平均数为标准；三、看清样后即付酬。

二十五日 诗人节。渝诗人假文化工作委员会举行纪念会，参加者有胡风、臧克家、王亚平、臧云远、柳倩等五十余人。胡风致开会词。何其芳报告华北敌后诗歌活动，戈宝权讲苏联抗战诗歌，王亚平、臧云远等也讲了话。后即举行朗诵，朗诵者有柳倩等。《新华日报》发表了臧克家的《吊古，自吊。》、王亚平的《遥向汨罗吊屈原》（诗），张西曼的《发扬屈原救国精神》（诗）。臧克家在文中赞扬了屈原的高洁志向后说：“今日的诗人同样有高尚的政治理想——民主与自由；同样有献身民族的意志，也同样有高洁的人格与爽朗的胸怀。可是，在精神上，多少诗人却作了屈足的献宝者！把整个灵肉交给了国家，但，还须双手捧着自己的一颗血淋淋



的心到处求人辨认。”“今天，诗人节，诗人们吊罢古人，更该自吊，自发、自奋！”

六月 吉安当局令各戏院一律停演，借口是加强战时生活。《新华日报》发表短评对这一专制行为进行抨击，说这样做“只有一种理由可以解释：戏剧是一种文化，今天是不需要文化的，戏剧中也包含着思想，而一切思想现在是在禁止之列。”

## 七 月

二日 柳州文化界扩大动员抗战宣传工作委员会在柳侯公园举行“一切为前方”诗歌朗诵夜会，热烈异常。节目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总为“吹起进军的号角”，计有《吹号者》、《队长骑马去了》、《军民联欢》、《你这个坏东西》、《王老二当顺民》、《我们是游击队》、《进军》、口琴独奏等。第二部分总为“怒吼吧，柳江”，计有《怒吼吧，柳江》、《把敌人赶出鸭绿江》、《一起搬上山》、《打到东北去》、《丈夫去当兵》、舞剑等。第三部分总为“再来一次总动员”，计有《朋友检查一下你的心》、《醒一醒吧大后方》、《献金运动歌》、《为保卫衡阳而歌》、《向湘江》、《我们歌唱》、《一切为了前方》、《再来一次总动员》等。

七日 《新民报》载：“七七”前夕，文艺界假文化会堂举行献金晚会，二百人左右到会。“文协”代表老舍、张道藩等参加了晚会。

八日 郭沫若、张申府、邓初民、茅盾、沈志远、夏衍、金山、宋之的、司徒慧敏、叶以群等联名致电广西党政军及教育与文化界，响应桂林文化界发动的保卫东南运

动，要求采取民主办法，组织人力物力，保卫东南。

十五日 “文协”在《新华日报》发布筹募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缘起：“敬启者：抗战七年，文艺界同人坚守岗位，为抗建之宣传，勸军民从忠勇，曾未少懈。近三年来，生活倍加艰苦，稿酬日益低微，于是因贫而病，因病而更贫；或呻吟于病榻，或惨死于异乡，卧病即全家断炊，死亡则妻小同弃，政府当局虽屡屡垂念，时赐援助，而一时之计，未克转死为生，而粥少僧多，亦难广厦尽庇。苟仍任其自生自灭，则文艺种子渐绝，而民族精神之损失或且大于个人之毁灭，因特发起筹募，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由本会组织委员会妥为保管，专作会员福利设施之用。一元不薄，百万非奢，爱好文艺者必乐为输将！捐款祈交重庆张家花园六十五号本会，或重庆各报换取收据；自即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截止。”同日报载，《新华日报》捐款一万元。

同日 契诃夫逝世四十周年。《新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契诃夫在东方》、戈宝权的《契诃夫的作品在中国》、葆荃的《关于契诃夫》三篇文章，以资纪念。郭沫若的文章是苏联作家对外文化协会电请写的，而且要求寄苏联发表。

十七日 《新华日报》为纪念聂耳逝世九周年发表短评《纪念民族的歌手》，感慨地说：“以聂耳同志为先驱，以民族抗战为背景的中国新音乐运动，曾经代表着全中国人民的声音，一新世界的耳目，而现在却如昙花的浮现，波浪的回流，在大后方只成了我们追怀的过去了。现在大后方的广播也好，唱片也好，靡靡之音重新抬头，抗战的新歌倒成了广陵绝唱，倒成了地底的声音。”短评还指出，原因并非是“新音乐已经沉寂”，新音乐家“已经缄默”，“原因

是别有所在”的。

二十一日 《新华日报》载：有名苏东先生者捐助国币一千元，并有致“文协”信一封，说：“作为抗战的宣传鼓动者，灵魂的工程师，而陷在这样悲苦的境遇中，这在‘自由太多’的作者眼中，该是多么煞风景的啊！”“然而‘因贫而病，因病而更贫，呻吟病榻，惨死异乡，以病则全家断炊，死亡则妻小同弃’，这是值得大家同情和援助的。”

“我们是生活在‘自由太少’的空气中人，我永远以强烈的挚情，来和你们紧紧地握手，虽然我的生活也很艰窘，也许比你们更为危难，然而我愿意在我‘还有一点儿办法’时，按月捐助国币一千元，直到我毫无办法时为止。”“最后，我有一点小小要求，就是把这点基金供给主张团结民主进步的作者，不要给那些‘自由太多’的空头文人。因为我这钱太少，他们决不会要，而我也雅不情愿也。”信最后还祝：“坚毅地生活下去！顽强地工作下去”！

二十四日 朱涛、石怀池在《新华日报》副刊上分别发表《风砂之恋》（一）和《风砂之恋》（二）的文章，对碧野《风砂之恋》提出了批评。归纳起来，大致有：塑造的人物是“一些飘忽的影子”，布局不够严谨，揭示生活不深刻等。碧野读这两文后，写信给编辑部。《新华日报》以《〈风砂之恋〉作者对于批评者的答复》为题全文发表了这封来信。除解说及反批评外，最后说：“当然，《风砂之恋》里边的缺点是不不少的，感谢朱涛、石怀池两位先生给了我许多意见。我相信一个善意和严格的批评，对于一个作者是必需而且是可宝贵的；不过我希望批评者对于作者的作品除了指摘之外，还需要把作品中的优点或多或少地指出来。”

二十九日 《新华日报》载：“文协”成都分会为响

应总会捐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的号召，召开了理事会，通过：一、蓉全体“文协”成员写文章在各报副刊指定日期发表，捐出稿费；二、排印捐册请各会友捐募；三、稿子性质随意，创作翻译均可。

## 八月

十日 《新华日报》揭载绵阳罗成基及其友伴寄来了二千一百块钱，还写了封信。信上说：“文协向社会请求援助贫病作家的呼声我已听见了。我寄上这一点钱时，心中无限难过与痛苦。我所难过的不是舍不得，亦不是抱歉钱太少（这点钱还是几个入凑的），而是感觉到人类文化的工程师们今日已经不仅到了在饥饿线上挣扎，而且到了非救济就不能活命的程度。我所感到的是这种向人求救的耻辱不是作家朋友们，而是国家的无确切办法与社会漠然视之的心理。……我承认充实的生活是写作的最好源泉，但我最恨‘穷而后工’尤其是把‘穷’字讲成饿肚子的说法。我不怕穷，但我不承认作家就应该穷，而且要穷得一塌糊涂的狗屁说教。我自己是仅仅只有两月存粮的人，如果不工作就要挨饿，断无力量救济谁，但我朋友还不少，我一定请他们多多尽力，拿出他们的爱好，爱美爱长进，爱那些坚贞不拔，战斗不息的人们的一点同情心出来，我相信他们定能掏出他们的良心。”

二十一日 王鲁彦病死桂林，享年四十四岁。

二十六日 《新华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

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十日 桂林文艺界举行王鲁彦追悼会，到会有欧阳予倩、邵荃麟、司马文森、端木蕻良、曾敏之等二百多人，欧阳予倩任主席。邵荃麟代表总会致悼词。

## 九 月

十一日 桂林发布强迫疏散令，并限三天内全部撤离。桂林之文艺活动即全部停止。

十二日 《新华日报》报道又收到读者捐款国币八千元，托转“文协”。还有署名绿蒂、德昌、谭凤、津秋、秋俊、苗苗、成宽、水源、诸华的信一封，说“发国难财者，危害抗战和贪污者们朋比为奸，得到间接或直接的保护，你们在庄严的工作中瘦了，贫了，还有的倒下了！”“我们晓得黑暗是不会长存的，而现在即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愿你们能更大胆地正视黑暗，揭发黑暗。”

十七日 “文协”昆明分会为响应总会提出的募集贫病作家基金号召，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决定了募集贫病作家基金办法十一项；并改选了理事，结果闻一多、徐梦麟、李何林、高寒、常任侠、凌鹤、光未然等二十一人当选。

二十四日 光未然、章泯、李何林、吕剑、高寒等昆明文艺界人士举行文艺民主座谈会。光未然作了《民主运动的新时期和文艺运动的新发展》的发言。会上，大家对文艺与

民主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认为“政治上不民主，文艺便得不到顺利发展”，“民主主义文艺运动，就是反封建、反假民主的文艺运动”，“必须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文艺批评”，“必须培养大批文艺干部”，“必须和人民群众结合”。

二十九日 宋庆龄为援助贫病作家主办晚会，除是日外，还有三十日，共两天。晚会中设有一项节目为抽奖，奖品是郭沫若、茅盾、老舍、孙伏园、曹禺、巴金、雪峰等人的著作。晚会捐款共计八十万元。

三十日 《群众》第九卷第十八期出版，内有文艺问题特辑，载了郭沫若的《谢陈代新》、余伯约的《如何做大众的牛》、何其芳的《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刘白羽的《新的艺术，新的群众》、戈宝权译的《论文学中的人民性问题》（上）、雒耳的《评吴组缃的〈鸭嘴涝〉》、陆定一的《读〈向吴满有看齐〉有感》，此外，还有秧歌剧《牛永贵受伤》。

## 十 月

一日 《新华日报》在“读者园地”发表署名向天的短文《作家生活为什么这样惨》，举例说：作家王鲁彦因贫病，无力就医，而至于死！接着又有剧作家洪深卧病的消息传出，记得他以前曾因贫病交加而服毒自杀一次，经友人急救才得复生，而今又病倒了，而且穷病着！”作者发问道：“为什么这些人在生活上得不到保障？——鲁彦、洪深等人要陷于穷愁潦倒的境地？”“这是什么原故”？

同日 重庆银社举行邹韬奋追悼会，邹韬奋是七月二十

九日逝世的，追悼会盛为隆重。郭沫若、茅盾、胡风、曹靖华、孙伏园、叶以群等参加了追悼。

七日 《新华日报》摘转《云南日报》社论《充实言论自由》，指出：“言论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因此，不仅在平时需要言论自由，在战时更需要言论自由。”

十四日 “文协”电贺苏联科学院院长柯马洛夫七十五寿辰，电文说：“今天是你七十五岁寿辰和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纪念的日子，我们中国文艺作家敬向你遥致祝贺，并热望您为新人类的新文化底创造而继续奋斗！”

十五日 沈钧儒、郭沫若、任鸿隽、曾昭抡、老舍、茅盾等一百五十人签名的贺苏联科学院院长柯马洛夫七十五寿辰的电文在《新华日报》刊出，电文说：“反法西斯的胜利，是民主的胜利，科学的胜利。”“真正的科学家一定能成真正的民主战士，真正的民主战士一定具有真正的科学精神。”

十九日 鲁迅逝世八周年。宋庆龄、沈钧儒、茅盾等在百龄餐厅举行纪念茶会，文化界百余人到会，还有些外国朋友。沈钧儒报告了筹备这次纪念茶会的困难和苦衷，还说：鲁迅先生一生爱民族，为人民工作坚韧到底。今天横在我们眼前的还有许多特殊的遭遇和障碍。我们要学习鲁迅坚韧的精神，特别是在这极端危机的时候。胡风说：鲁迅先生揭露了中国旧传统的丑恶，揭露了奴才主义与阿Q主义。他不但是文学家，而是民族战士。因为他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他看见了人民，看见了未来。他指出了中国未来的道路。茅盾

说：抗战七年来没有了鲁迅先生，没有能够好好的来纪念鲁迅先生，没有能够检讨我们反法西斯文化战线的力量，这是无限的损失和感触。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思想家、民族战士。他热爱民族，痛恨法西斯。他揭露了那些为奴才们用着欺骗人民的社会病态。他的笔是尖刻的，心是苦痛的。他爱得切，恨得深。我们要冲破障碍，发扬鲁迅先生的精神作用。孙伏园说：鲁迅先生所热爱和憎恨的，也就是人民所热爱和憎恨的。鲁迅先生憎恨专横、憎恨法西斯，这是今天全中国全世界人民所憎恨的；鲁迅先生爱人民、爱自由、爱民主，这是今天全中国全世界人民所深爱的。鲁迅先生最憎恨奴才主义，他说奴才主义们不鞭击是站立不起来的。这深值得我们警觉和努力。接着是张西曼讲演。讲演完毕，舒绣文、常任侠朗诵鲁迅先生遗著。对于这次纪念会，《新华日报》在报道中加着重号说：茶会在艰苦环境中举行，在混敌中散会。

同日 昆明隆重举行鲁迅逝世纪念晚会，地点：云南大学。这个纪念会是由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和联大五文艺团体联合主持的。参加者，除联大、云大、中法大学的同学外，还有中学生、文化界、公务员等参加，约四五千。晚会开始，首由徐梦麟代表“文协”分会致词，接着由尚钺、李何林、姜亮天、楚图南、朱自清、闻一多相继演讲。大家特别强调的，是鲁迅的战斗精神。主张学习的，主要还是鲁迅的战斗精神。演讲在热烈的气氛中足足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演讲毕，联大五文艺团体朗诵鲁迅的诗及田汉改编的《阿Q正传》剧本第五幕。深夜，晚会在《义勇军进行曲》声中结束。

二十日 “文协”召开常务理事会，商讨关于援助作家和展开文艺工作，决定紧急援助法和通常援助法，以及举办文艺奖金、翻译作品出国、文学顾问会、建造作家宿舍等文



艺事业开展之问题。议定：会刊稿费暂定千字二百元，再由出版者负责一百元，共三百元。

二十七日 育才学校绘画组举行绘画展览，地址是中苏文化协会。三间大客厅挂满铅笔、水彩、图案等画，琳琅满目。作画者均是十二岁到十七、八岁之间的孩子。《新华日报》在报道中评述道，他们“作画的技术的熟练，比重庆市上历届名画家的画展并无逊色。”

十日 中国木刻研究会在渝举办木刻联展。由于湘桂撤退，交通中断，无法联络，“三届双十全国木展未能举行。这时，从广东、桂林、柳州一带来重庆的木刻同志有陈烟桥、梁永泰、黄荣灿、陆地等。于是在重庆的木刻同志便计划举办一次木刻联展，开始是由我和陈烟桥、梁永泰、汪刃锋、丁正献、王树艺、陆地、黄荣灿八人筹备、后来听说刘岷从延安调来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我们立即写信邀他参加联展。他带来了一批解放区的木刻新作，也一并在联展里另辟专栏陈列。”（王琦《回忆抗战时期的木刻运动》，载1983年《抗战文艺研究》第一期）。这次木刻联展，正处在重庆画展高潮期，八人漫画联展、幻想曲漫画展、西游漫记画展先后举行，获得了一定成功。

## 十一月

一日 《高原》于西安创刊，月刊，共出三期，一九四六年一月出革新号，仅出了三期又停刊。

五日 中国著作人协会在广播大厦成立。张道藩报告筹备经过，梁寒操致词。接着大会讨论提案，首先通过名誉会员，内有吴敬恒、于右任、张继、戴季陶、孙科、王宠惠、叶楚傖、邵力子、陈布雷、陈果夫、朱家骅、王世杰、冯玉

祥、吴铁城、蒋梦麟。大会还通过关于组织工作、稿费、著作人权益、作家救济等类议案。沙汀在《建议·希望·祝贺》中回忆道：“这个阴谋，就是由一批文化官僚和少数不知底细的文人学者发起，邀请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著作人协会，借以削弱、乃至代替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及其他进步文学艺术组织的作用，为其反动政治服务。其实质也就是篡夺党对国统区文学艺术的领导。但是南方局的负责同志很快就识破了敌人的阴谋！”“遵循党组织的指示，经过周密安排，开会那天，就由夏衍同志率领，所有的党员和一向团结在党的周围的进步文学艺术工作者，几乎全部都参加了。”“其初，空气相当平静，一到洪深先生发言，会场内的来宾立刻活跃起来。因为洪深先生发言的内容是对图书审查制度进行批评，而且要求立即通过决议，取消这一钳民之口的反动措施！”“他们的鹰犬则都开始向洪深先生进行狡辩”。“当主席台上宣布开始选举理事，以便正式成立著作人协会的时候，夏衍同志领先退出会场。这是一个事先约定的暗号，他一走，于是我们和一切党的朋友，也纷纷退席了。”

十一日 柳亚子从桂林到渝，郭沫若在天官府四号寓所设夜宴洗尘，差不多在渝民主人士均到了。就这天，周恩来从延安飞来，也立即参加了宴会。他报告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传达了《讲话》精神，介绍了延安文艺的新面貌。

“那晚上大家实在是尽了兴，又‘痛哭’，又‘狂欢’，而且还跳了秧歌舞。”沈钧儒回顾这次难忘夜会，作诗一首：

“经年不放酒杯宽，雾压江城夜正寒。有客喜从天上至，感时惊向域中看。新阳共举葡萄盏，触角长嘶獬豸冠。痛哭狂欢俱未足，河山杂遝试凭栏。”郭沫若和诗曰：“顿觉蜗庐海



元，余所亚一万三千元，黄药眠、杨晦、郑延毅、吴似瀚、孟昌、张煌各一万元。曹伯韩、张治安、尹瘦石、张白山、陈逸冬、端木蕻良、许幸之、芦荻、伍禾、新波、宋云彬、熊佛西、李九仙、徐德华各五千元。华嘉、安娥、黄宁婴、洪适、瞿白音、胡危舟、司马文森，魁夫、于逢、易巩、周钢鸣、陈残云、孟超、何家槐各三千元。

十一日 周恩来在渝《新华日报》采访部会见部分木刻、漫画工作者，被会见的有王琦、余所亚、汪刃锋、丁正献、王树艺、梁永泰、刘岷等同志。“先是由潘梓年、徐冰、戈宝权、陈舜瑶等同志接待我们，在大家吃完了晚餐后，周恩来才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大衣，一望便知道他是在百忙中抽空赶来的。他顾不上用晚饭，一进屋子便和每个同志热烈地握手，并立即坐下来和我们谈话，从国内外形势谈到当前的文艺运动。他诚恳地向我们指出，木刻现在仍然停留在大城市，它的基本观众仍限于城市市民和一般青年知识分子，要设法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扩大它的影响。他建议我们多制作一些连环木刻画，因为连环画是最易为广大工农群众所理解所接受的形式。他十分肯定当时在国统区的木刻、漫画运动，认为这两支队伍在民主运动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当时对刘岷同志说：‘你是否可以把最近在重庆的几次木刻、漫画展览活动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向延安美术界汇报，给他们打打气！’刘岷同志点头表示一定照办。恩来同志还以十分亲切的态度问及每个同志的工作、生活情况，特别对因失去双腿而行动不便的余所亚表示格外的关切和慰问，使所亚和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王琦《回忆抗战时期的木刻运动》，载1983年《抗战文艺研究》第一期）

## 十二月

十六日 “文协”假中国文艺社举行茶会，欢迎来渝作家宋云彬，彭燕郊、严杰人、华嘉、伍禾等。老舍致欢迎词，宋云彬等报告了旅途艰辛之情形。

同日 画家沈振黄在独山从车上跌下殒命。“文协”决定捐赠三万元救济其家属。

二十日 萧蔓若主编的《文学新报》（半月刊）创刊。

三十一日 “文协”发布结束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公启。公启宣布自本年七月开始的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至十二月底正式截止，还对援助和支持者“提出简单的声明和诚挚的感谢”：一、这个运动“从文艺运动以及民主运动的立场说，是一个令人感奋的胜利的标记，但从本会以及一个一个作家的立场说，所感到的应该不仅仅是安慰和鼓舞，而且更是沉重的鞭策和深刻的警惕。”二、“文协”承认新文艺还“包藏着一些严重的不良倾向”，“和人民之间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表示要战胜前进中的阻力。三、贫病者的援助只是救急之计，根本的是要推进文艺事业的发展，“为民族服务，为人民服务，使文艺作家更快地在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国里面分受到应有的待遇。”翌年一月二十四日《新华日报》刊登了这个公启。

冬 周恩来在渝会见许多编导和演员。他充分肯定了进步戏剧界的成绩，也严肃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他说：“抗战七、八年，我看了你们七、八年戏了。你们总高兴听听我这个观众的意见，我也极愿谈谈个人看法。作为观众，我过去对你

们总是表扬肯定多于批评，基本上是表扬的，满意的。可是，我今天应该坦白地说，我对你们演的戏，越来越不够满意，至少没有以前那么满意了。这并不是说他们退步了，今不如昔了。而是形势发展，形势逼人哪。两年来，我每一次看了延安的各种演出，回来再看你们的，一次比一次明显地感到不满足了。毛主席《讲话》发表后，边区的文化教育和文艺队伍有了飞跃的变化，从文艺工作者生活、学习、精神面貌的变化，到作品和演出质量的变化可谓一日千里，你们可不能让我失望啊！”（于伶《噙泪忆教诲，深深怀念周总理》）

## 一九四五年

### 一月

一日 重庆诗歌工作者在文化工作者指导委员会举行新年诗歌座谈会。郭沫若、茅盾、戈宝权、何其芳、王亚平、袁水拍、徐迟、臧克家等百余人参加，冯乃超主席。主席致词说迎接新年要加强团结，要争取民主。郭沫若、茅盾、何其芳、任钧等发表了演说。与会诗人还朗诵了诗作。

六日 “文协”三台分会假东北大学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到会四五百人。会报为《文学期刊》，冯沅君主编。

七日 胡风主编的《希望》创刊号要目见报。上有胡风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和舒芜的《论主观》。何其芳、刘伯羽等曾在重庆召开座谈会，对主观论提出批评。胡风等极为不满。

十日 骆宾基、冯维典在丰都被捕。“文协”理事会得知特开会集议营救办法，决定孙伏园等向参政会、卫戍总部等机关交涉，要求保障人身权利，恢复自由。王亚平回忆说：“有一天在黄昏的时候，从丰都中学来了一个学生，他告诉我，我们的两个老师，丰村和骆宾基被国民党抓去了，他们是在回重庆的船上被捕的。”他听了以后，即去找冯乃超。冯乃超又叫他去找郭沫若。他找到郭沫若后，郭沫若即向周恩来报告，“总理指示叫我们向社会上公开这件事，另一方面设法营救。郭老与我写了一个条子，意思是：‘我们

的作家丰村、骆宾基在丰都被捕，请即发消息营救’。条子写好以后给老舍看，老舍同意了。”于是，复写了八份消息，连夜分送八个报馆，结果《新华日报》、《新蜀报》、《国民公报》登了这消息。（《访问王亚平同志的谈话记录》，载黄中模《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诗话》）迫于舆论的压力，当局释放了骆宾基、冯维典。

二十日 “文协”开理监事联席会议。去年湘桂战起，“文协”有紧急援助内迁文艺作家之举。由于近来战局稳定，疏散終了，决定从即日起停止紧急援助。贫病文艺作家，可予以通常济助；一般文化人士之援助，非区区捐款所能济事，“文协”表示爱莫能助。还具体规定：湘桂内迁文化人拟赴蓉可径到蓉与陈白尘、陈翔鹤、刘开渠接洽，由他们介绍到蓉协济文化人士委员会招待。

二十三日 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假文化会堂欢迎来渝的政治部抗敌戏剧宣传队第六与第九两队，到会有阳翰笙、于伶、吴祖光、宋之的、贺孟斧、郑君里等百余人，先后致欢迎词的有马彦祥、阳翰笙、王瑞麟、史东山、金山、孟君谋等。大家一致认为两队历年来转战第六、九两战区，历尽艰苦，和战士民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树立优良的工作作风，表示大后方戏剧工作者愿意竭诚学习；并盼望两队同志严厉批评后方戏剧运动。九队队长吕复及六队队副鲍训端分别报告各队近年工作概况。会后九队同志朗诵集体创作之长诗《我们是从这些路走来的》，并合唱了《五月礼赞》、《插秧鸟》、《我所爱的大中华》三曲。

二十五日 《新华日报》出“追悼罗曼·罗兰特辑”，刊登了戈宝权的《罗曼·罗兰的生活与思想的道路》、严杰人的《呼吸英雄的气息》和王亚平的诗《欧罗巴，民主的巨



星殒落了》。

同日 冯乃超在渝主持召开座谈会。会上，茅盾等对舒芜的《论主观》一文提出了批评。

## 二 月

十四日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新华日报》发表通告和启事，通告说：“查二月十五日为国定戏剧节本会为庆祝节日起见特定于是日上午九时假座文化会堂（曹家庵十六号）举行本年度戏剧节纪念大会务希我戏剧界同仁及各剧团体团员踊跃参加为幸。”启事曰：“本会为济助贫病剧人特于本届戏剧节发行‘剧人之友’纪念章乙枚持有该项纪念章者可换取本会所主办在青年馆举行之戏剧节庆祝大会入场座证乙纸。”同时，还载有戏剧节庆祝大会节目，计有歌咏、川剧、昆剧、平剧等。

十五日 戏剧节。全国剧协在文运会召开纪念大会，到会四百余人。张道藩任主席并报告本届大会筹备经过，继由邵力子，黄少谷等讲演。下午二时，同乐大会在青年馆举行，表演各种戏剧、歌咏、杂耍等，到会二千余人，盛况空前。剧宣九队的民间歌舞，博得极大好评。翌日，《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戏剧的生路》，指出：“戏剧节有戏剧工作者慨然叹道：话剧演出成本每在百万以上。剧本，是外国名剧；演员，最整齐；灯光效果道具，化了很大代价，“然而，结果是失败了！”那么，如何办呢？“方向是有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戏剧进农村，戏剧宣传队的戏剧上前线，他们早已开辟了一条广阔无垠的道路。”“但是有人会不许戏剧进农村，有人会不许戏剧上前线。这是一个严重的前

提。只要大家认清了这个前提，合力争取，世界才可以改造，铁门才能够打开”。“戏剧的生路只有一条：是争取民主！”

同时 留渝漫画木刻界同仁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联谊聚餐会，到会有陈烟桥、唐英伟、刃锋、梁永泰、王琦、王树艺、沈同衡、刘铁华、郝滋，黄克靖等二十余人，刘铁华任主席。议定：艺术节开座谈会。举行木刻漫画展览、出特刊等。

二十二日 文化界发表对时局进言，说：“内部未能团结，政治贪污成风，经济日趋竭蹶，人民尚待动员，军事急期改进，文化教育受着重重扼制，每况愈下，以致无力阻止敌寇的进侵，更无力配合盟军的反攻，在目前全世界战略接近胜利的阶段，而我们竟快要成为新时代的落伍者。”进言提出实行民主的两大纲：“一、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党派所推选之公正人士组织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应付目前时局的战时政治纲领，使内政、外交、财政、经济、教育、文化等均能有改进的依据，以作为国民会议的前驱。二、由临时紧急会议推选干练人士组织一战时全国一致政府，以推行战时政治纲领，使内政、外交、财政、经济、教育、文化等能与目前的战事配合。”具体提出六大项：“一、审查检阅制度除有关军事机密者外不应再行存在，凡一切限制人民生活之法令皆应废除，使人民应享有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等之自由及早恢复。二、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使学术研究与文化运动之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三、停止特务活动，切实保障人民之身体自由，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四、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的政策，枪口一致对外，集中所有力量从事反攻。五、严惩一切贪脏枉法之狡猾

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使国家财富集中于有用之生产与用度。六、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采取对英美苏平行外交，以博得盟邦之信任与谅解”。签名者有郭沫若、茅盾、夏衍、老舍、冯雪峰等三百余人。

进言发表了之后，当局竭力进行反攻，分化签名者，使自行登报声明否认；同时进行威胁。浙大教授费巩因此而失踪，好些人也因此而失了业。为了抵消这个《进言》的影响，顽固派还组织了一个“反签名运动，由另外一批‘文化人’发表了拥护政府的另外一种‘宣言’，起初的目的务想争取三百七十二人中的多数人重签，然而这目的却没有达到。”（《沫若文集》第13卷第404页）

### 三 月

一日 《新华日报》载：郭沫若与“文协”电唁苏联作家协会，对阿·托尔斯泰的逝世表示哀悼，认为是“全人类之一大损失。”

十日 《新华日报》刊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为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鸣谢》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征求独幕剧本启事》。前者详述了募集的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的收支情况，对捐助者表示感谢；后者强调了“目的是为加强抗战宣传，以士兵与战区民众为对象”，“切忌概念化，应活泼地反映现实生活”，还说明了被选中的剧本要给予相当数量的奖金。

同日 《贵州日报》出《新垒》副刊，蹇先艾主编。其办刊方针是：一、侧重学术性及文艺性；二、不登趣味太低

级的东西；三、取材自然以有关抗战为主，但同时也选发其他方面的优秀作品（只要是健康的），以开稿件的来源；四、暂不登八千字以上的长稿；五、内容不拟固定，虽然面积很小，但我们却满怀希望把它变得十分肥沃。《新垒》一九四六年九月终刊，共出了一百一十一期。

十五日 漫画联展在渝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特伟、叶浅予、张光宇、余所亚、丁聪、沈向衡、张文元、廖冰兄等人参加，展出了一百余幅作品，展期六天，参观者万人以上。

二十五日 渝召开罗曼·罗兰追悼会，于右任任主席。郭沫若代表“文协”致悼词。墨西哥代表卡斯特曼·瓦叶叙述了罗曼·罗兰生平，说他先是个人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他的观念，成为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他和巴比塞发表过反法西斯的声明。追悼会还唱了挽歌：“……你伟大的民主战士，罗曼·罗兰，你永生了……”《新华日报》出悼念罗曼·罗兰专页，发表了郭沫若的《和平之光——罗曼·罗兰挽歌》（诗）、胡风的《向罗曼·罗兰致敬》、陈学昭的《愿你安息在自由的法兰西》。此外，还载了“文协”的《悼念罗曼·罗兰》。悼词说：“罗兰先生，你是一位人生的成功者，你现在虽然休息了，可你是永远存在着的。你不仅是法兰西民族的夸耀，欧罗巴的夸耀，而是全世界人类的夸耀。你的一生，在精神生产上的多方面的努力，对于人类的贡献非常的宏大，人类是永远的纪念着你的。你将和历史上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伟大的灵魂们，像天空中的星群一样，永远在我们人类的头上照耀。”并表示：“我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们，更一定要以你为模范，要象你一样，把‘身后的桥梁’完全斩断，不断地前进，决不回头，像你一样始终走着民主的大道，把自己的根须深深插进黑土里面

去，从人民大众吸收充分的营养，再从黑土里面生长出来。”

同日 《文哨》召开座谈会，以群主持，主要议题是面向农村。夏衍论述了文艺面向农村的重要性，特别指出要使面向农村成为一种运动，不仅要从思想上认识这个问题，还要亲自去实践。茅盾建议《文哨》应多登反映农村生活的稿子，注意培养农村文艺青年。周而复介绍了去农村的经验。

三十日 国民党当局下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在谈到文工会解散的原因时指出了两点：一是发表了《文化界时局进言》，搞了签名运动，这样，“‘罪大恶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终难幸逃罗网了。”二是“同国际人士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罗曼·罗兰追悼会。”“开会是近因，而签名依然是主因。”（《沫若文集》第13卷第404页）

三十一日 《新华日报》刊载了文化工作委员会被解散的消息，并加了编者按说：“郭沫若先生于七七抗战爆发后，自日本只身逃归祖国，领导战时抗敌宣传工作。于民国二十七年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二十九年解职，复奉命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该会委员，计有阳翰笙、李侠公、茅盾、杜国庠、沈志远、胡风、老舍、洪深、田汉、张志让、孙伏园、冯乃超等，都是文化界知名人士。几年以来，该会在郭先生领导下，对于抗战文化，贡献宏伟，驰名友邦朝野。这次突被解散，闻者颇感惊异。”

同日 文化工作委员会被解散的消息发表后，各方人士表示震惊和关切，纷纷去郭沫若寓邸拜访慰问。去慰问者有驻渝外交使馆人员、新闻记者、律师、医生、青年、郭沫若好友等。一些人致函《新华日报》，请转达对郭沫若的慰

问。翌日该报以“代邮”形式复函一则：“白云辉、王荇、朱刚等先生：来函敬悉，先生等对郭沫若先生领导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突被当局下令解散，甚表震惊，并对郭先生及其他文化界人士此番遭遇，深表同情。我们当愿将先生等这种主持正义的情谊，转达给郭先生。此复。”

同日 《新华日报》刊载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提航诺夫关于苏联名作家阿·托尔斯泰给毛泽东同志的来电及毛泽东同志的吊唁电。该报还发表了纪念文章：亨利·罗维契作、郁文哉译的《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与热情的爱国主义者》和《A·托尔斯泰传略》。

## 四 月

一日 为纪念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七周年举行聚餐会，到沈钧儒、章伯钧、翦伯赞、马宗融及国际友人共百余人。沈钧儒说：抗战期间，文化工作各方面都很需要，文工会的被解散，只能认为是由于暂时政治上的变动。机关可以被解散，但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精神，是无论如何不能被解散的。翦伯赞说：我不明白，同是抗战时期，同是一个部长，今日认为机构重复而解散文工会，但当初为什么不怕重复设立文工会？我不明白，为什么是文工会重复了三厅而不是三厅重复了文工会？为什么裁文工会而不裁三厅？又说：历史的发展，是全体支配局部，而不是局部支配全体。机关虽被解散，到马路上也可以团结起来的！中国是绝对不能从世界主流分开的！“终于今日”，也正是我们文化工作者从事新民主主义文化工作的开始。郭沫若说：所谓“始于今日，终于今日”，不是说的文化，而是说的“花瓶”。今天我们是被

解散了，我们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我们更自由了。正如邓初民先生来信所说：“对于先生崇高伟大之人格，毫无丝毫损害。相反地，郭先生战斗的精神将永远成为青年人的模范。”从纪青、陈尔东、胡邦杰三位的信里也可以看出。他们写道：“人们已经逐渐知道眼泪是无济于事的，自己的世界要靠斗争来争取！他们不要文化，但人民是欢迎先生的，青年是敬爱先生的，千千万万的青年是一定作为先生的后盾的。”

同日 画家沈振黄追悼会在渝夫子池举行，到文艺界人士二百余人。沈钧儒主祭，致悼词。金仲华报告了沈振黄生平与死难经过。郭沫若致词勉励文化工作者学习沈振黄关心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服务或与人民生活在一起的精神和作风。

六日 《新华日报》载：“文协”昆明分会参与筹办文艺讲习班。闻一多、李广田、李何林、朱自清、刘思慕、周钢鸣、常任侠等担任教授。

八日 重庆各党派领袖及文化界人士欢宴郭沫若及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到会有郭沫若、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柳亚子、黄炎培、董必武、王若飞、谭平山、陶行知，张志让、马寅初、邓初民、郭春涛、史良、沙千里、施复亮、翦伯赞、侯外庐、高崇明、孟宪章、何公敢、吴藻溪，史东山、阳翰笙，于伶、吴祖光、夏衍，高龙生、胡风，冯乃超、宋之的、白薇、傅彬然、梅林、叶以群等一百余人。与会者对国民党当局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表示谴责、抗议，对郭沫若等给予了崇高评价。王若飞说：“文工会虽已解散，全国人民及全世界民主人士都是同情和拥护郭先生的，会虽解散，中国人民仍需要郭先生。董必武同志来渝

后，我们共产党已向政府提出要求委派郭先生为我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顾问。以郭先生的学识和声望，代表团有这样的顾问应引为荣。我们提出不是随便的，中共领导的解放区现已有一万万人口，九十万军队，二百五十万民兵，一百二十万党员，这样大的地区和人民希望郭先生当我国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的顾问，政府应该能接受。万一不可能实现，那么此既不能做事，我们欢迎他到边区解放区去。”邓初民说：“有人说文工会解散了，文化工作不能解散。这点使我怀疑，我看是文化工作也被解散了。”“我要特别提出：凡是没解散文化工作，有言论集社身体思想自由，没有特务集中营的，都是民主的地方！反之，都是法西斯。今天单说安慰是不够的，要争取各种民主自由，文章才做得通！我们要当心魔鬼的花样，但是我们也坚信‘人民的世纪’，魔鬼再会变成美丽小姐噬人，终不能逃出人民的手掌。希望郭先生永远站在我们前面战斗。”在陶行知发言后，郭沫若致词感谢，并表示决心：“文工会是解散了，文化工作却留下了，从今天起我们要真正开始工作。我回国的時候有一首诗说到：‘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我这抗战八年的生命是赚来的，老早应该死了，今年五十四岁，可说‘五十四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我随时随地可以死，但是只要我一息尚存，在诸位先生鼓励下，我仍要做一个民主、文化、文艺的小兵。我补充陶先生一句话，我就是死在坟墓里，也要从事文化工作。”

十日 昆明文化界光未然、李公朴、李广田、沈从文、吴晗、尚钺，常任侠、周钢鸣、费孝通、闻一多等五十四人联名写信慰问郭沫若，说：对于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这不幸的消息，我们虽是愤慨，却不惊异，因为我们知道这件事



的发生，是中国反民主势力又一政治罪恶的表演。”慰问信概述了进步文化人八年的奋斗，揭露了“眼前政治的腐败，经济的破产，军事的挫折，”表示：“请你和你的朋友坚持着我们文化界庄严的大纛，去争取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命线——民主政权！”后该信发表在五月十四日重庆《新华日报》上。

十四日 中大中国文学系请杨晦演讲，题为《文艺与民主》，听众颇多。杨晦讲了题目的意义和讲解的动机后说：

“文艺本来便是民主的。在人类的童年原始时代，没有个别的艺术家，大家都可以参加艺术活动，人人都有表现艺术才能的机会，这段期间的艺术作品极丰富，和近代的艺术水准比起来，毫无逊色。这为甚么？因为这时的艺术是完全在民主的条件下产生的。”他用中国文学的事实证明不把人当人的专制时代不能有伟大的艺术作品；纵然有，也是病态的东西。“一般认为唐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文艺活动特别高涨，但其实，以中国面积这样大，人口这样多，这点文学成果和俄国法国短期间比较起来，真是太微渺不足道了。如果那时唐朝是个开明的时代，情况就会更好些了。”文艺不仅是民主的产物，本身也应是民主的。他说：“文艺注重形象，注重表现的本领。然而，不民主的社会环境偏偏处处破坏人的表现才干，不要人衷心地哭和笑流露真正的情感。”还说：“文艺应该争取民主，争取人人有创作的权利。”

“文艺像一面镜子照出生活的形形色色，它比别种方式更能形象地描绘出生活的真相，因此文艺也是争取民主中最有效的工具。”

十五日 阿·托尔斯泰悼念会在抗建堂举行，到会一千五百多人。邵力子任主席，并致词略述阿·托尔斯泰的贡献

及纪念的意义。曹靖华报告了阿·托尔斯泰的生平，称他永远追求真理，永远向现实学习，因此是一个永远前进的作家。他曾受象征派影响。十月革命使这位作家放弃了脱离现实的倾向，放弃了对政治的冷淡态度。阿·托尔斯泰不仅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反法西斯的战士。郭沫若谈了阿·托尔斯泰取得的成功，并分析了成功的原因。他认为在主观上，阿·托尔斯泰不断充实自己，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如受象征派影响等，还有就是吸收民间语言。当然，仅主观上的因素也不行，在客观上苏联当局也给他创造了充分条件。阿·托尔斯泰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是最高苏维埃代表，还得过列宁奖章，战争中他可去前线任何地方观察，不受限制。郭沫若还说：“在中国对作家有一种不正确的了解，认为诗穷而后工。假如这个作家还不穷，就必须打入地狱，使作家穷！好多人在喊中国没有伟大作品，原因就是作家太穷了。苏联文化代表特洛雪也夫对阿·托尔斯泰生平有详细叙述，还说“托尔斯泰艺术的力量，就在于他底文学创作是与我们国家的时代、国际生活的时代一同迈进的。”会上，张瑞芳朗诵了托尔斯泰的《刽子手的卑劣》。

《新华日报》出了悼念专页，发表了曹靖华的《无言的悲怆》、戈宝权的《悼念一位伟大的作家和战士》等悼念文章。

二十一日 “文协”昆明分会与联大新诗社在昆明联合举办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五周年纪念会，常任侠任主席，到会二百人左右。郭梁甫报告了马雅可夫斯基生平，田汉、李何林等讲了话。后，何达朗诵了新作《献给马雅可夫斯基》、李实中朗诵了马雅可夫斯基的《给当兵的弟兄》、郭梁甫朗诵了《顶好的诗》、光未然朗诵了《好》。

二十二日 “文协”昆明分会与联大文艺社、冬青社在联大联合举行罗曼·罗兰与阿·托尔斯泰追悼会，袁成源任主席，五百余人参加。主席致开会词后，即由合唱团唱《马赛曲》、《祖国进行曲》、《罗曼·罗兰挽歌》，吕剑宣读“文协”的悼词及苏中文化界发的关于阿·托尔斯泰的讣闻和唁电。最后，“文协”代表楚图南致词，说罗曼·罗兰与阿·托尔斯泰生前热爱人民、保卫真理，为文化而战斗，于今遽失巨星，实为全世界人民无可比拟的损失。闻家驷、白澄、李何林、尚越等也相继讲了话。

三十日 芦蕨在《群众》杂志第十卷第七、八期上发表批评文章《糖衣覆盖着什么？——评坊间的几册“特务文学”》。该文剖析了《间谍夫人》、《风萧萧》、《相思债》等，指出特务文学流行并非完全是因为生意经，还与特种人物对人民的摧残分不开。这种文学的出现，是在为镇压和虐杀人民的罪犯洗刷、出脱，缓和人民的愤怒之情。

月底 “文协”三台分会假东大礼堂举行文艺晚会，参加者有陆侃如、冯沅君、董每戡、赵纪彬、姚雪垠、黎丁、谢梓文等一百五十余人。

春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社举办秧歌演出。演出剧目有《兄妹开荒》、《一朵红花》、《牛永贵挂彩》。情绪十分热烈。当跳集体秧歌舞时，周恩来等领导同志“首先从座中参加进秧歌队，兴致勃勃欢欣鼓舞地扭了起来。应邀在座的多数演员也坐立不住了，纷纷插进队伍去，队伍越来越长，情绪越来越热烈，观舞者的心情仿佛飞到了延安，在毛主席身边大扭秧歌了。更动人的情景是，在广场围墙之外，报馆附近的居民，凡是跟工作人员熟识而又被认为是善良的劳动人民早已被让进来，席地而坐，看扭秧歌了。不少人还

拥在围墙外面，垫着凳子之类扒在墙上看。也有普通的警察，不好意思地摘下了制帽，看得出了神。”（于伶《噙泪忆教诲，深深怀念周总理》）许幸之说：“我看完了‘秧歌舞’的演出之后，从心的深处激起一种新鲜、活泼、而又亲切的共鸣。”（许幸之《秧歌舞与广场演戏》）

## 五 月

一日 为纪念“五一”节，昆明云大至公堂举行音乐会，二百余人参加，参加的团体有青年歌咏团、昆明歌咏团、海啸声乐团、凯旋歌咏团、五月合唱团等。

四日 “文协”假渝文化会堂纪念成立七周年和第一届艺术节，到会百余人。郭沫若说：今天庆祝艺术节，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责任加到我们头上来了，感到责任更重了。没有民主，文艺与科学不能发展。文艺界要完成这个使命，一方面必须消灭文化运动中的“三寸金莲”主义，另一方面也必须克服“高跟鞋”主义，就是说不要复古，也不要脱离群众而为几个人享受。王芸生说：文艺界既定“五四”为艺术节，就应该从今天起继承五四精神，要有青年气，要有些爆炸力。国民党“五四”以来有意无意在复古，抹杀了新文化，这是值得当局来检讨的。希望今后作家有写作自由、思想自由。老舍报告会务，谈到救济贫病作家基金时说：我们很快募到七百多万，这证明作家的血汗没有白流，没有洒到沙漠里，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在关心我们。他又慎重地对那恶意污蔑买黄金的事作了一个声明，说作家救济费宁可存在银行贬得一钱不值，也决不买黄金。大会通过了与世界作家加强联系、请切实保障人权、保障作家身体自由写作自由等提

案。改选结果，选出邵力子、郭沫若、老舍、茅盾、孙伏园、胡风、巴金、夏衍、姚蓬子、冯乃超、曹禺、阳翰笙、梅林、洪深、叶以群，马宗融、冯雪峰、靳以、曹靖华、艾芜、王平陵、二十一人为在渝理事，朱光潜、沙汀为各地理事，张天翼、宋之的、徐盈、吴组缃等十三人为候补理事，叶楚傖、冯玉祥、张道藩、柳亚子、潘梓年、张恨水、华林、谢冰心、黄芝岗九人为监事，陈望道、史东山、聂绀弩、张西曼四人为候补监事。

老舍作《文协七岁》，盼望：“大家再拿出武汉时期的热劲儿来；”“会刊是文协的旗帜，会员们必须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旗帜上；”“社会上热心捐助贫病作家基金，我们贫或病，就该索用”，“不应过余矜持；”“援助贫病作家基金都存在银行里，当然有一点利息。我们应当运用这点资金推动会务，使文协发挥更多的社会影响。”“对于会务，我希望，我们都该对小事闭一闭眼，勿过余求全责备；对大事，我们须力争，绝对不许损伤了团体的尊严。我想，这也许就可以叫作民主精神吧？文艺既是民主运动的先锋，那么，我盼望，文协就必须成为一个民主精神的团体。”（载《文协成立七周年并庆祝第一届艺术节特刊》）郭沫若发表《人民的文艺》，指出：“人民的文艺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因而它必须是大众化的，现实主义的，民族的，同时又是国际主义的文艺。”（载《文协成立七周年并庆祝第一届艺术节特刊》）茅盾发表《五十年代是“人民的世纪”——纪念文协七周年暨第一届“五四”艺术节》，指出：“不民主，中国就没有前途。文艺应当配合着今天的民主运动。而要在这大时代中担当起本身的任务，文艺界应当加强自我检讨，对于民众的认识是不是充分？有没有站

在民主之上或站在民众之外的非民众立场的观点？如何更能接近民众？如何虚心学习，从民众的活的语言中吸取新的血液以补救苍白生硬的知识分子‘白话文’？如何批判地运用和改进民间形式？如何掌握民间形式而真正实现‘文艺下乡’？如何撷取民间形式的精英作为创造民族形式的一个元素？”（《新世纪》第一卷第一期）。

“文协”发布《为纪念艺术节公启》，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觉醒的表现”；“五四运动的口号，科学和民主，不但开发了那以后的中国人民的光辉的英勇的斗争潮流，而且依然是今天的中国人民的光辉而英勇的斗争方向”。“中国人民在五四运动中的觉醒”，“特别是文艺运动里面取得了最尖端的表现”；“为中国文艺，中国作家，只有坚守且发展这个光辉的性格和传统。”建议：“文艺节的纪念应该放在人民的争取民主生活的伟大斗争目标上面”。“文艺节的纪念应该愈广泛愈好”，“要动员一切文艺社团、文艺工作者、文艺爱好者、用各种形式的工作参加，一直到工农大众里面。”“文艺节的纪念应该诚恳地检讨过去的成果，特别着重在和人民的解放要求的结合这一点上，使新文艺能够真正争取到广泛的发展和伟大的前途。”

《新华日报》出了纪念专页，发表的诗文有冯乃超的《能够默不做声吗？》、汤波的《在搏斗中前进》、田间的《我爱战争》（诗）、王亚平的《“文艺之神”改装了——祝第一届艺术节》（诗）、臧克家的《精神的囚犯》。

同日“文协”成都分会假蓉青年会举行了纪念会，到百余人，李劫人任主席。他报告了一年来的分会的工作，叙述了分会基金的募集、援助流亡文化人运动等。通过了在诗人节扩大举行纪念和增加理事名额案。聚餐后，叶圣陶主讲了

《五四意义》，周太玄主讲了《五四精神》，此外还表演了诗歌朗诵，口琴独奏、唱歌、京戏等节目。

同日 《文哨》在渝创刊，月刊，叶以群编。共出了三期，一九四五年十月停刊。

五日 “文协”假青年会举行文艺欣赏会，数百人参加。孙伏园致开会词：文艺界很少有这样盛大的会，连着两天。今天虽然是五月五日了，但今天的会还是为了纪念“五四”艺术节，用旧金山的钟点来计算，恰好昨天下午同今天下午是在一天里。第一个节目是徐迟朗诵《狂人日记》。接着是胡风作文艺报告。报告中心是以五四以来文艺发展的各个时期的情况，来说明要继承“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的传统，必须在人民大众里面生根，必须与人民大众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发扬光大。大革命时代与抗战时代，就是很好的例。欣赏会演出了话剧《求婚》、《哈哈》。在这两剧之间，老舍与山药旦说了相声，很受欢迎，掌声雷动。

同日 昆明文艺界在联大纪念第一届艺术节，参加者踊跃。温功智朗诵了艾青诗《索亚》、吕剑报告改“五四”为艺术节之经过及意义、徐梦麟讲五四运动的经过、闻家驊讲艺术与人生、楚图南讲抗战以来二三文艺问题，尚钺讲鲁迅、常任侠讲五四以来的诗歌问题、李广田讲文学的普及与提高、李何林讲新文艺中的文艺批评、周钢鸣讲报告文学、闻一多讲艾青与田间并朗诵艾青诗《大堰河》。

七日 “文协”改选理事。结果，选出郭沫若、茅盾、老舍、孙伏园、姚蓬子、胡风、王平陵等二十一名在渝理事，朱光潜、沙汀二名各地理事，还选出张天翼、宋之的、徐盈、吴组缃等十三名候补理事，叶楚傖、冯玉祥、张道藩、柳亚子、潘梓年等九名监事及陈望道、史东山、聂绀

弩、张西曼四名候补监事。

七日 “文协”召开理事会，推老舍、孙伏园，胡风、姚蓬子、王平陵为常务理事，张道藩、华林、黄芝同为常务监事，并推老舍、孙伏园为总务组正副主任，胡风、叶以群为研究组正副主任，王平陵、冯乃超为组织组正副主任，姚蓬子、巴金为出版组正副主任，冯雪峰负责《抗战文艺》编务，梅林为理事会秘书。

同日 贺孟斧逝世。在其卧病期间，“文协”赠送医药费五万元。

十二日 “文协”昆明分会主持的张文元漫画个展在青年会开幕。

## 六 月

八日 中苏文化协会、“文协”、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假文化沙龙举行欢送大会，欢送郭沫若赴苏。他是应邀去出席苏联科学院第二百二十周年纪念会的。茅盾、史东山、侯外庐分别代表“文协”、“剧协”、中苏文化协会致词。茅盾说：郭先生是代表了中国人民，是以人民大使、文化大使的身分参与盟邦苏联的这一盛会的。他希望郭沫若将中国人民为民主而斗争的精神藉以传与世界盟邦。郭沫若说：“中国人民和诸位文化界人士都是主人，好比是我的君，我实是一个‘差使’而已，但愿能够‘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就好了。”翌日郭沫若赴苏。《新华日报》发表时评《欢送郭沫若先生赴苏联》，谈了郭沫若在文化上的贡献，最后说：

“我们今天欢送郭沫若先生作为人民的使者，文化的使者出国去，深信必能由此而使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的交



流、更进一步的展开。”

九日 “文协”托郭沫若带信给科马罗夫，祝贺苏联科学院盛典。郭沫若乘飞机赴苏。

同日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文协”等十团体假文化会堂追悼贺孟斧。

十四日 昆明文艺界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庆祝诗人节。徐嘉瑞报告开会意义，姜亮天、田汉、罗庸、闻一多、游国恩、徐嘉瑞、尚钺等相继讲话。闻一多说：当认识了人民时才能认识屈原，因为屈原是人民的诗人；现在是我们是认识了。尚钺分析了屈原所处的时代和纪念屈原的现实意义。楚图南、李广田检讨了“五四”以来新诗的成果，指出了远大前途。田汉说新诗人要活，坚强地活，“憔悴”不是我们注定的命运，要反对一切迫害。讲话后即进行朗诵，光未然朗诵了《涉江》、《哀郢》、《怀沙》，韩北屏朗诵了新作《在南方的天底下》，李实忠朗诵了何其芳的《黎明之前》、《都市》，何孝达、常任侠、冯至、安娥也进行了朗诵。

同日 《新华日报》出版诗歌专页，发表有臧克家的《向黑暗的“黑心”刺去——谈政治讽刺诗》、王亚平的《诗人，为新民主而斗争！》、P译的《欧洲抗战诗二首》、力扬的《诗人·人民》、长虹的《边区是我们的家乡》（诗）

十八日 昆明文艺界在联大纪念高尔基逝世九周年，到会千人左右。白澄、李广田、李何林、尚钺等报告了高尔基生平、著作和思想，麦浪朗诵了《海燕》（俄文），光未然朗诵了《市儇颂》，此外还一起朗诵了《海燕》的汉译文。会上合唱团还唱了《苏联国歌》、《高尔基纪念歌》等。十

九和二十日昆明《扫荡报·扫荡副刊》连续发表了纪念文章，计有麦波翻译郭滨、沙联的《海燕——为纪念高尔基作》，文雄翻译贝赫尔的《高尔基——新人类的火把》、《高尔基致孙中山书》，郭俊翻译B·柯左明的《高尔基——反大日耳曼主义的战士》以及任钧的《诗人高尔基》。

十九日 中苏文化协会、“文协”假抗建堂举行高尔基逝世九周年纪念会，到百余人。邵力子任主席并致词说：

“消灭一切法西斯力量，高尔基为此目的，贡献了他的一生。他曾经说：‘敌人不投降，就消灭它’。我们在这些战争中所提出的，要敌人无条件投降，消灭一切法西斯力量，这就是高尔基精神。我们消灭法西斯的战争还未结束，还要用很大的力量，希爱好正义和平的人士仍应本着高尔基这种精神。”曹靖华报告了高尔基生平，甚详。演讲完即进行表演，有苏联彼楚洛娃朗诵了高尔基《意大利童话》中的《巴尔米大罢工》张瑞芳朗诵《海燕》。

二十一日 《新华日报》载：郭沫若、老舍、叶圣陶、洪深、陈白尘、巴金等二十四人发起，为茅盾诞辰五十周年举行茶会。通启说：“今年茅盾先生五十岁了。五十岁正在壮年，祝寿的事又是俗套，我们不愿意从俗，为他做什么寿。可是，二十七八年以来，他倡导新文艺，始终没有懈怠过，而且越来越精健；对于他的劳绩，我们永远忘不了。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他经历了好些艰难困苦，只因中有所主，常能适然自得；对于他的操守，我们永远忘不了。现在他五十岁了，我们虽然不愿意从俗，却真个乐意与他叙一叙，一方面对他表示慰劳的意思，一方面彼此互相共勉，加倍的振起精神来，一同走以后的路。因为，我们决定六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开个茶会。我们诚恳地请你参加，想必会得到你

的许可。”

二十三日 《新华日报》载：昆明纪念诗人节，举行盛大晚会。晚会是由“文协”昆明分会和大学等十五个单位联合举行的。地点：公园。到会一千多人。徐梦麟主席并致词。他将屈原的宇宙观作了一番引证和说明。姜亮天、闻一多、尚钺、田汉、楚图南等先后讲话。他们把屈原及他所开辟的道路用新的观点给予了估价，分析了这位人民诗人的特点，以及他的时代背景，并联系目前的诗歌运动指出具体任务，接着是诗歌朗诵。光未然朗诵了《离骚新译》。

二十四日 茅盾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渝庆祝会在西南实业大厦举行，到七八百人，沈钧儒任主席。沈钧儒对茅盾创作表示敬意，继而谈了三点看法：第一，茅盾先生的创作是有中心思想的，围绕这中心选择材料描写；第二，作品中表现出认清了整个时代的各种关系；第三，写老百姓的东西。他总起来说：“茅盾先生能抓住时代，是文化战士，现在什么问题都脱离不了时代，茅盾先生和我比起来还是青年，是青年的作家。”邓初民说：庆祝茅盾先生五十寿日的会，是庆祝也是鞭策，不仅对茅盾先生是鞭策，对大家也是鞭策。每个人都可以自问：我做了多少呢？他接着说：“只要是不装聋，不装瞎，不装死，通过文艺的揭露，我们会认得更清楚更深刻的，可是我们现在的文艺政策是怎样呢？色情文艺充塞市场，瞒蔽善良人民的脑筋。”茅盾答谢说：“做文艺工作时间很长，贡献很小，错误很多。本来我觉得过了四十岁写不出什么来，是再也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来了。今天听了邓初民先生的话，我再想活二十年，做一点点事。其次看到许多中国优秀的儿女牺牲了，看见许多年青人经历着许多不是他们那样年龄所需经历的事。看了许多

许多的事，在中国胜利在望时，我要活下去，不看见民主的中国，我死也不瞑目。”

《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路程》，概述了茅盾在文艺上所走过的道路，还说：“五十岁正是壮年，在目前这伟大壮阔的大时代中，茅盾先生的创作活动也到达了圆熟的境地。回顾一下五四以来的同时代文化工作者，我们觉得中国新文艺运动中有茅盾先生这么一位弥久弥坚，永远年青，永远前进的主将，是深深地值得骄傲的。”此外，还发表了王若飞的代论《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祝茅盾先生五十寿日》，追述了茅盾所走过的路程和贡献，指出：“他所走的方向，为中国民族解放中国人民大众解放服务的方向，是一切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应走的方向。”该报还出了纪念专页，发表了叶圣陶的《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亚子的《祝茅盾先生五十双寿》（诗）、恨水的《一段旅途回忆——追记在茅盾先生五十寿日》、吴组缙的《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祝贺》。

同日 成都文化界庆祝茅盾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参加者有李劫人、叶圣陶、陈白尘、黄药眠、沈志远等。叶圣陶说：“我们要和茅盾一样，提着灯笼在黑夜里行走。现在成都、重庆、昆明各地到处有人点着灯笼，光明越来越多，黑暗终将被冲破。”

二十五日 昆明文艺界在文艺沙龙庆祝茅盾创作二十五周年及五十寿辰，李公朴、闻一多、田汉、吴晗、朱自清、楚图南、李何林、光未然、韩北屏、邵荃麟、马子华、宋云彬、何家槐、吕剑、李广田等二十余人到会。大家对茅盾给予了很高评价。翌日昆明《扫荡报·扫荡副刊》发表了纪念茅盾创作二十五周年及五十寿辰的文章，计有田汉的《忆茅

盾》，叶圣陶的《雁冰兄的文学工作》、邵荃麟的《感谢和希望》。

六月 中苏文艺联络社成立，茅盾、以群、徐迟等主持。这个社的任务是要“沟通中外文化，联络各地作家，介绍各方稿件，交换文化消息，资料。”

同月 茅盾、戈宝权、郁文哉、葛一虹四人合译的《高尔基传》在渝出版。这本书是四月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决定翻译的，而且要赶在高尔基逝世九周年纪念前出版。郭沫若作序，说“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开始工作仅仅一两个月，得到四位好友的协助并得于极有文化意义之纪念日出版第一种书籍，是尤其值得感谢的。”

## 七 月

七日 昆明文化界在文艺沙龙举行文艺检讨会，出席者有闻一多、李公朴、田汉、潘光旦等三十多人。大家认为：“政治不民主，一切文化都没有前途，”还说“当前的文化正在被绞杀，我们要把文化从严酷的灾难中救出来，我们要把绞杀文化的黑手击退，文化才有发展的前途。”

十七日 《新华日报》刊载马可的秧歌剧《夫妻识字》。编者在按语中指出：“这是今年春节在延安演出的秧歌剧，普受群众欢迎。从这里，可以看到秧歌正向更朴素，更大众化的趋向发展中。”

同日 昆明文化界纪念聂耳逝世十周年，到千余人。徐嘉瑞报告聂耳生平及对乐坛的贡献，田汉及聂耳家属也相继发了言。后新中国剧社与昆明合唱团联合举行音乐演奏。昆明《扫荡报·扫荡副刊》出“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逝世十周

年专号”，刊载了吕剑的《聂耳和他的歌》、仁荪的《聂耳——新音乐运动的旗帜》、周依维的《怎样才能“蜕变”》。十八日，该报又发表了安娥的《为纪念聂耳而写》。

## 八 月

三日 《新华日报》载：茅盾文艺奖金已开始征文，该项奖金是在重庆茅盾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时开始筹备的。征文以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速写、报告为限，文长以五千字左右为宜，不得超过一万字。征文时间：截止于同年十月。老舍、靳以、梅隼、冯乃超、冯雪峰、邵荃麟、叶以群七人为评选委员。《文哨》、《文艺》二杂志代收征文。共收到征文一百零八篇，评选结果，获奖作品有：徐疾《兴文乡疫政印景》（甲等奖）、田苗《互替的两船夫》（甲等奖）、木人《丰收》（甲等奖）、温士扬《会议》（乙等奖）、李俞《还政于民记》（乙等奖）、生群《农村的一角》（丙等奖）、夏培静《么店子》（丙等奖）、汪文孙《风波》（丙等奖）。甲等奖赠国币四万元。乙等奖赠国币三万元，丙等奖赠国币二万元。

五日 “文协”成都分会举办的暑期文艺讲座会举行结业典礼，除一百五十多学员外，还有叶圣陶、叶丁易、姚雪垠等十余位作家到会。大家热烈讨论了民主政治与文艺前途问题。

上旬 茅盾开始创作一生中唯一的一个剧本《清明前后》。他在后记中写道，“刚写完了两幕，敌人投降的消息来了”，但他“还是顽强地写着”。九月，该剧在重庆青年会上演。周恩来同志看后对茅盾说：“你的笔是犀利的投

枪，方向很准呀！什么样式都可以试试，都可以发挥应有的力量啊！”

十三日 “文协”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欢谈会。大家认为，抗战胜利了，“文协”颇有改名的必要；但主要的，还是在考虑战后言论、著作、出版自由与否的问题。几乎一致的意见是：要求立即废除战时图书杂志审查条件，立即发还八年来被审查机关扣检的文稿。大家还讨论了卖国投敌的文化汉奸问题，随即就成立了附逆文化人调查委员会，推孙伏园、徐迟、于伶等人负责调查罪行，以便从严惩处。

二十二日 附逆文化人调查委员会开会，议决：凡担任伪文化官、主编和出版书报杂志以及著述为伪方的宣传品、伪特务文化人员以及在敌伪控制下的文化机关、团体中工作和其他不洁人物，都属附逆文化人范围之内。处理办法是：一、公布姓名及罪行；二、拒绝其参加作家团体和其他文化团体；三、通知出版界拒绝为其出书；四、凡学校、报馆、杂志社等一律拒绝其参加；五、编印其罪行录；六、要求逮捕并公开审判。

二十九日 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茶会，欢迎参加苏联科学院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归来的郭沫若与丁燮林二人。到会百余人，邵力子主持。郭沫若在谈到苏联情形时，一再重复“看得很多，说不尽”，他只能说一说印象。他谈了苏联许多方面的情形，丁燮林也讲了自己的感受。最后是李德全讲话。她“希望郭丁两先生，在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两方面，领导全国文化工作者前进。”

三十日 “文协”等团体假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欢迎会，欢迎郭沫若、丁燮林归国。

## 九 月

二日 日本在美舰米苏里号上签字投降。

同日 “文协”拟定《为庆祝胜利告国人书》，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的将士和群众衷心致意，同时指出抗战虽然胜利了，“人民的心里依然波动着一股焦虑甚至笼罩着一片愁云”，还指出“决不应该是回到战前的原状”，并“诚恳地提出处理国事的三大目标”——团结、民主、和平。此外，还“对于一切束缚文化思想工作的阻力提出谏告”。“现在战争结束了，但这决不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生的功成事毕，而是中国人民开始跨进了创造光明的民族事业的第一道门。要能够执行这样的伟大事业，首先得彻底地消灭日本法西斯的武装机构和它的社会基础，得认真地改造混乱而贫困的中国的现实状况，而这就非得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和信心，非得一个体现团结、民主、和平三大目标的国家不能够完成。”这个文献载《抗战文艺》第十卷第六期。

五日 昆明教育文化界发布《庆祝胜利大会宣言》，要求“和平、民主、团结”。

八日 重庆木刻工作者举行聚餐会，到会有陈烟桥、王琦、丁正猷、王树艺、梁永泰、刃锋、陆地等十人。聚餐会讨论了木刻界当前任务，怎样迎接并争取人民胜利，复员问题，如何在上海、北平、广州开展木刻的新生工作。还讨论了要在十月十日到十九日在重庆举行新阶段木刻联展，展后选一部分送苏联、英国、美国去展出。

十日 成都《中国日报》、《华西日报》、《华西晚



报》、《成都快报》、《新新新闻》、《川康通讯》、自强通讯社等深感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和钳制言论等极不合理，为了争取民主及言论自由，从是日起停止送审。

十四日 《新华日报》载：“文协”召开紧急会议。鉴于在各方复员工作积极开展中抗战作家复员束手无策，刊物停顿、生活难以维持，“文协”提出：必须由政府予以协助才能谈到复员及解决目前的生活问题。该会已拟具复员计划，并推代表向有关当局接洽。

十八日 文化界和文艺界在文化会堂举行纪念会，并庆祝抗战胜利，到会一百多人。席间对文化界问题作了详细讨论；为谋此后国内文化进展和国际文化合作，到会者签名发起组织国际文化合作促进会和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

二十五日 昆明报刊出版界假文艺沙龙举行座谈会，出席者有民主周刊、人民周刊、北门出版社、诗与散文社等十余团体。议决：成立昆明出版界联谊会，并通过筹备缘起。内称：“现在抗战胜利结束，我们正迈入一政治文化上的新时期。在此时期，为了争取文化自由，争取减轻成本，争取在编辑出版发行邮递条件上的本身福利，以及经常交换意见，为今后建立民主新中国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任务而努力，都必须团结本身力量，共同从事。”

同日 《新华日报》载：“文协”致景宋、振铎、丐尊、统照、健吾等在敌人魔掌下坚贞不屈的上海文艺界战士书：称“谨代表大后方及解放区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向诸位表示诚恳的慰问。八年以来，诸位先生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而是在敌人的直接的屠杀威胁之下不屈不移，备尝辛苦，为中华民族保存了崇高的气节，中国人民以诸位为光荣，中国文艺界以诸位为骄傲。”慰问书附带了一个请求：“在这次

神圣的抗战中，汉奸如此之多，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本会已设立机构，负调查文化汉奸之责，但因情形隔阂，进行不易，现特恳诸位先生分头着手调查并搜集证据，”不让一个文化汉奸漏网。

九月 成都文化界集会，并发布了《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的呼吁》，要求“民主统一”、“和平建国”。李劫人、姚雪垠、陈白尘、陈翔鹤、张天翼、叶圣陶、罗念生等二百四十八人签了名。

## 十 月

二日 《新华日报》载：昆明文化界提出六项主张：  
一、当局宣布十月一日起废除新闻检查制度，必须做到“彻底”二字；二、取消中央社的新闻垄断政策，民营通讯社和报馆有自由采访、收发新闻、和翻译新闻的自由权利；三、人民有经营通讯社和创办报纸杂志、印行书籍的绝对自由；四、取消邮电书报检查，一切信息和出版品的流通，不受任何限制或阻挠；五、保障民营出版机构：取消以命令强迫接受印件、废止纸张的垄断和囤积独占、减低邮包寄费、优先协助民营文化事业复员；六、尊重文化人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保证人民有批评以及反对政府的权利。

十日 丁正献、王琦、王树艺、汪刃锋、陆地、梁永泰、陈烟桥、黄荣灿八人木刻联展正式展出，新自西北来渝的木刻家刘岷也有十余幅作品参加展览。陈烟桥在《木刻联展感言》中说：“这次木刻联展的作品，大都以反映最近的现实为多，这也是它的特点，本来木刻运动一开始的时候起，就不曾与客观现实脱节过，这是为许多人都知道的。但在

过去，木刻工作者常因对于社会体验不当嫌不够，以致削弱了他们的作品的力量。现在慢慢地把这个缺点克服过来了，自然同时对于创作技法也跟着年龄的增进而增进。所以在这次展出中，我可以肯定的说，它们无论在内容上在形式上都与过去的不同，尤其刘岷兄从延安特别带来一批新作也参加到里面去，是值得欢迎的。”

十三日 北方旅渝文化人曹靖华、侯外庐等发起的北方文化工作者联谊会在中苏文化沙龙召开第一次筹备会，骆宾基、石嘯冲、臧云远、王亚平、田仲济、亚克、丰邨、刘铁华、钱新哲等二十余人到会。王亚平被推为主席。他说：本会召集旨在商谈复员回乡工作，固守岗位，推进文化，实现民主理想。到会者踊跃发言。议定：成立北方文化工作者协会，曹靖华、侯外庐、王亚平、臧克家、臧云远、骆宾基，刘铁华、田仲济、石嘯冲九人被推为筹备员。

十四日 “文协”召开理监事联系会，商讨改名问题。议定：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称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简称仍为“文协”。工作方面，除商讨了筹办文艺界复员事宜外，还商讨了要本着团结全国作家精神，发展文艺事业，保障著作权益，以期对新中国的建设有所贡献。

十九日 重庆在西南实业大厦隆重举行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到会有周恩来、邵力子、冯玉祥、郭沫若、柳亚子、老舍、叶圣陶、曹靖华、冯雪峰等五百多人，许寿裳主持会议。冯玉祥说：鲁迅文章里有这样的故事：有一家生了个小孩，客人纷纷来道喜。头一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一定要发财，主人大为喜欢。第二个客人说将来一定要做大官，主人更高兴。第三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会死，主人大不高兴。鲁迅讲完后说：本来发财升官都是靠不住的，但有人偏爱

听，人会死倒是真的，却有人偏不爱听。冯玉祥感叹起来：今天的世界也是一样，靠得住的话偏不爱听。郭沫若提议为鲁迅建立博物馆，铜像，改西湖为鲁迅湖。胡风说：中国文化界和知识分子对于鲁迅的态度有一变化，在斗争精神上也有一个变化。抗战一起，全国人民普遍爆发着热情，以为这一下好了，鲁迅所追求的愿望今天实现了，以为鲁迅所生活、所斗争的中国过去了。后来，到了持久战的形势下，许多人渐渐知道事情并不那么容易。鲁迅的斗争精神还有学习的必要。他们愈感到鲁迅所生活、所斗争的中国并未过去，要继承鲁迅先生的斗争道路。鲁迅先生的精神就是在确定的光明的目标与远景之下，努力靠流血流汗去争去。鲁迅先生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又是坚强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说：鲁迅先生的许多话，活生生地在记忆之中，成为奋斗的指南针。他首先提到鲁迅先生所说的“革命的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接着说：抗战胜利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每个文学和文化工作者，在这大时代中，跟政治跟革命的进展是息息相关，无法分开的。全国如何进入和平建设（文化建设也在其内），这是全国全世界人士所关心的。这次政府与中共的会谈，决非两党的事情，这是关系全国人民的事，自然也为文化界所关心。鲁迅先生这句话，告诉文化界朋友，不可能离开政治革命运动。所以这次会谈，我们与政府双方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我们提议能有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参加，使在协商国是的时候，文化界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很清楚，讲建设，政治经济军事之外，文化建设也很重要。如此重要的问题，在协商国是的时候，应有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与代表意见。我们希望文化界朋友们，能有意见和主张提出，希望能听到这

种意见并反映到政府将召开的施政纲领和宪草之中去。又说：中国的革命文化距离目标尚远。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尚未完成，鲁迅先生作了披荆斩棘的开路工作，然而坦途尚未造成。不过中国的文化，也是不平衡的，一方面需要披荆斩棘，继续做开路工作；一方面，我们已看到在中国有些土壤上已有了文化建设。方向是有了的，但须大家努力，大家动手建设。还说：我又想到十几年前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斗争，要坚决、持久，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实力。这句话首先说明鲁迅先生的目标非常清楚，要向封建的、复古的、法西斯文化斗争，去开辟新的道路。其次说明了，要是没有这种持久下去的清楚认识，我们就不会了解新文化是需要长期去建立，而且还要靠人民大众来铺路，要唤起和依靠人民来参加。文化战线要扩大，应广泛吸收文化斗士参加，去动员广大人民为新文化奋斗。鲁迅先生对文化青年新战士的欢迎、提携、培植不遗余力，这精神也是今天非常需要的。鲁迅先生所说的以上三点意见，是今天我们所需要接受的，此也看得出鲁迅先生的立场和态度。鲁迅的立场是与革命息息相关、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的立场，鲁迅先生的态度是对敌人狠、对自己严、对朋友和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值得每一个作家学习的。周恩来最后大声说：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尚未完成，还需要持久战斗下去。旧的封建势力是大的，但是只要有鲁迅先生说的一个倒下去，一个跟上去，甚至千百人跟上去的精神，只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奋斗下去，即令我们一代不能完成新文化建设，本此精神，一定能使中国新文化开出奇花异果，让中国人民能享受新文化的成果。在纪念会上，老舍朗诵了《阿Q正传》第七章。

《新华日报》发表北桥的专论《文艺工作中的群众观》

点》、指出：“鲁迅先生是一个真正具有群众观点的人，而在我们今天的文艺工作中，最感需要的也是群众观点。那么，就让我们用坚持和发扬文艺工作中的群众观点，来纪念鲁迅先生吧。”“今天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已看到中国在开始着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中，将兴起一个强大的人民民主运动（对于没有得到民主权利的人民）和一个人民文化运动（对于已经得到民主权利的人民）。在这个时代中，我们的文艺运动将比在过去的战争时期得到更广阔的发展，完成更伟大的任务。在这个时代中，坚持和贯彻文艺工作中的群众观点，也就更切要。”同日的《新华日报》还出了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专页，发表了郭沫若的《我建议》、许寿裳的《鲁迅的几封信》、景宋的《研究鲁迅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

二十日 “文协”在渝举行记者招待会，老舍主席，茅盾、胡风、梅林等参加。老舍报告该会历年工作概况：曾组织战地访问团访问慰劳各战地；曾参加南北慰劳团赴各地慰劳；不断援助贫病作家；出版《抗战文艺》杂志，已出十卷。该刊将改名，但改什么未定。“文协”总会将设上海，已请郑振铎、许景宋、夏丏尊、李健吾等着手进行。老舍指出目前的主要工作：一、帮助作家解决复员中若干困难，希当局给各地作家复员以交通便利；二、目前书刊多正暂停发刊，希当局设法救济；三、郁达夫在苏门达腊为日人逮捕，请当局电有关盟邦军事当局查究释放；四、将印行文化汉奸罪行录，要求政府逮捕文化汉奸，并要求文化界派代表参加审判。胡风报告了该会征求独幕剧本，已征得十三个。当选者为黄谷柳所作的《墙》。此剧除给奖金外，还将在《抗战文艺》上发表。

同日 留渝木刻家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复员会议，到会

有陈烟桥、刘岷、丁正献、梁永泰、刘铁华、王树艺、刃锋、王琦等。议定：把中国木刻研究会改为中华全国木刻作家协会，明春在上海举行抗战八年木刻画展览，编辑《抗战木刻八年鉴》。

二十一日 “文协”假重庆张家花园举行会员联欢会，到会有周恩来、郭沫若、叶圣陶、巴金、傅彬然、赵家璧、常任侠、胡风、冯雪峰、华林等五、六十人。老舍报告了开会目的：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名问题商讨有关事宜，商讨正在准备中的复原问题。叶圣陶报告了“文协”成都分会的工作概况，主要谈了救济贫病作家与举办文艺讲座。郭沫若说：“文协”改名后，定会象抗战八年中一样努力，为和平建国而工作。周恩来应邀讲“文协”延安分会活动。他说延安的文艺活动大约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抗战初期，那时各方面的作家，许多作家到延安去了，产生了许多反映适应抗战初期的作品。”“原因是这样的：初期因各方面来的作家，经历了抗战初期民族抗战的那种热潮，所以有许多作品出来。”第二是中间一个时期，没有产生什么作品。“延安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性质上还是农村环境，社会生活比较少，大家忙于生产，生活很紧张，也单纯，没有什么复杂曲折的生活，因此这时期作品产生较少。”“第三个时期：一方面因为经过了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即整风），其次是生产运动，后者是物质基础，人民对于文化的要求增高了。思想解放以后，许多作家过去对于城市生活人物比较有把握去表现，憎爱也极分明。所以对旧社会的认识很深，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如曹禺先生的《日出》、《北京人》这样的作品。但到延安不同了，这是新社会，熟悉城市的作家，对农村环境就不一定熟悉了。许多就从城里走到乡村，走到广大的

农民中去，并且生活在他们中间，因此发现了深厚的民间艺术源泉，如秧歌舞等等。中国的新歌剧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话剧也要吸收这个形式的优良因素。现在又是一个新的时期到了，延安的作家，又大批的到收复区去，去深入生活。我到重庆来以前，就送走了一百多位文艺工作者，其中有作家、诗人、木刻家、音乐家、演员等等。重庆的作家、朋友，在目前也是在新的时期中，求得更大的发展，驰骋的地方也多了，今后一定会有更大的成绩的。”（《文协昨开联谊晚会》，载1945年10月22日《新华日报》）就在这个晚会上，郭沫若还联老舍诗一首：“今夕复何夕，文林盛开会。烛光鸡尾酒，月影凤头钗。香华随风举，词华逐电来。宵深人不觉，清话共徘徊。”

二十三日 《新华日报》发表留居上海的文艺战士郑振铎、许景宋、夏丐尊、李健吾、周建人、柯灵、许杰、满涛、佐临、师陀、唐弢等对“文协”的慰问复信，内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过去领导全国文艺工作者走着正确的道路，获致举国无比的拥护，这正是中国团结的象征。以后建设民主新中国，尤望诸位先生勇敢负起责任。文协既已取得合法地位，只要省去‘抗敌’二字，继续领导全国文艺界，从事建国工作，名正言顺。此间友好，必当竭尽棉薄，加以声援。”“至于调查文化汉奸，我们正在设法进行，并在各刊物中发动言论，严正检举。我们相信，只要全中国人民不忘记这八年的苦战，创钜痛深，绝不会轻易饶恕汉奸的，尤其文化汉奸，以歪曲言论，毒害国民思想，强颜事敌，卑鄙恶劣，无所不用其极。此间文艺界同人深明除恶务尽之理，摘奸发优，不敢后人，誓当为中华民国洗涤这一奇耻大辱，知承关注，并以奉闻。”



二十四日 柳（亚子）诗尹（瘦石）画联合展览会在渝中苏文化协会举行预展。展览有柳亚子诗数十首，尹瘦石画百余幅。翌日的《新华日报》出了毛泽东题的“柳诗尹画联展特刊”，发表了郭沫若的《今屈原》、茅盾的《“柳诗”“尹画”读后献词》、林北丽的《柳亚子先生的为人比他的诗文更值得珍贵的一面》、徐悲鸿的《尹瘦石之画》。

## 十一月

九日 中外文艺联络社举行漫画木刻联展。此次展出作品有大后方、延安、晋察冀等地区的漫画木刻。徐迟发表《略论木刻——观文联社漫画木刻联展零感》，对这次联展作了充分肯定。

十日 《新华日报》召开《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两个剧的座谈会。座谈纪要以《两个话剧的座谈》为题发表在二十八日《新华日报》上。编者说：“十一月十日，本刊召集了一个小小的座谈会，座谈重庆最近演出的《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两个话剧。因为都是门外汉，意见当然很幼稚，而且彼此也并不一致，但为了表示一部分观众的反应，现仍将座谈记录择要发表，希望得到戏剧界各位先进与各位读者的指教。”在座谈会上，H说：看了《清明前后》“我是感动的，印象是完整的，虽说在个别小情节上有不满意处，但整个的剧是满意的。如果把小缺点与大优点并立起来谈，我想那是不公平的”。J说：“只有觉悟者看此剧后才能感动。工业家的痛苦没有具体的写出来，如不民主的实际情形，政府的统治管制政策怎样摧残工业等等，在这里都没有具体表现。”“这个剧的主要缺点，是予人一堆散漫的

印象。导演不是克服了剧的这些缺点，而是扩大了它们。” R说：“《清明前后》的上演，实在有很大的意义。听说曹禺先生也说：这是第一次有了话的话剧。就剧的题材言，作者是企图从这个剧来反映重庆一个时期的横断面。主题很广的，不像主题单纯的剧，易于往深处发掘。”在谈到《芳草天涯》时，C说：“《芳草天涯》正是一个非政治性倾向的作品，和《清明前后》恰成对照。”还说这剧是“让人糊涂而不让人清醒的东西。”L说：《芳草天涯》“以湘桂撤退为背景，这本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弱点和黑暗之总暴露，但在这里，却一点也看不出来，一点也没有表示一个艺术家所应有的愤懑，却反而迁怒于无辜的人民了。”S说：“第四幕孟文秀的那几句话，不是针对腐败的统治者，而是针对人民。我也有此感觉。这种思想是值得检讨的。”

二十三日 《新华日报》载：上海文化界反对国民党当局压迫人民自由，要求废止收复区的新闻检查制度，要求实现言论出版自由，发表宣言。指出：“民主国家应有的权利，无疑的我们都应该享受的；言论、出版、集会三大自由，是民主国国民应有的权利。”“胜利来临了，濒死的我们得活了，活人便应该有自由的。现在我们姑且不讲别的自由，我们大家都是文化人，文化人的生活，离不开言论出版集会，如果我们不得到这三大自由，我们的生活安顿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生存有何意义？”宣言呼吁：“还给我们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废止阻碍言论出版自由的检查制度！”签名者有丁聪、于伶、什之、平心、朱维基、佐临、李健吾、金仲华、周建人、胡曲园、柯灵、柳无垢、许广平、曹聚仁、葛一虹、赵景琛等九十一人。

同日 《新华日报》发表郭沫若、洪深、老舍、茅盾、

叶圣陶、孙伏园、曹靖华、胡风、阳翰笙、马彦祥、靳以、宋之的、冯乃超、冯雪峰、陈白尘、吴祖光、梅林致赛珍珠和全美作家的信，说：“我们写这封信的当儿，我们的心是沉重的，因为不祥的内战已在中国普遍的爆发了，而美国在中国的士兵有卷入这中国内战的迹象。”“盼望我们的美国朋友也将尽力阻止凡有可能阻碍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行动。我们特别要请你们发挥你们的如椽之笔的力量，使美国人民明白那些已经在中国发生的事实的真相，并为了东亚的和平，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前途，以及中美两国人民悠久的友谊，而采取明智而有力的措施。”

二十四日 东北文化协会假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筹备会，到会有周鲸文、杨晦、徐仲航、刘寅、沈扬、姚奔、骆宾基等数十人。筹备会除拟定会章讨论会务外，议决：一、呼吁立即停止向东北人民进攻；二、主张东北地方自治；三、要求政府释放张汉卿先生和全国政治犯；四、要求增加东北人民代表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名额。

二十五日 昆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专四校学生六千余人，在联大举行晚会，讨论如何制止内战问题。国民党军警赶来弹压。昆明学生与之进行斗争。十二月一日，学生集会示威又被殴打，伤甚众，死数人。

十一月 周恩来在重庆天官府郭沫若家里召开文艺座谈会。他讲了一个多小时。“讲话的第一部分是建议文艺界的同志们朋友们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检查自己过去的文艺工作，来改进自己的工作。”“他这次讲话的第二部分，谈到郭沫若和茅盾同志。他先讲五四运动以后，当时一些知名的文艺团体起了什么作用，鲁迅起了什么作用，还讲到创造社和鲁迅的关系。他说，鲁迅起的是最好的作用。鲁迅的许

多思想和毛主席的思想一致。在革命的文艺界，鲁迅的思想的革命性、深刻性和影响最高最大。创造社也起过很好的作用，冲破封建枷锁，也是进步的。他对郭老五四运动的新诗作了肯定，说那些诗是革命浪漫主义，对青年的影响很大。”

“然后他讲到茅盾同志。这一段话讲得短一些。他先讲到文学研究会，肯定这个文艺团体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肯定它也起了好的作用，进步的作用。”郭沫若说：他五四以后写的新诗也有缺点，但当时他是要求革命的，听了恩来同志的讲话，他对自己的认识更清楚了。

## 十二月

六日 《新华日报》发表柳亚子、宋云彬给昆明受难学生的慰问电：“同学为反内战而牺牲，暴徒以手榴弹为武器。穷凶极恶，亘古未闻。欲哭无从，人间何世。特电慰问，万望继续奋斗，俾竟全功。为死者复沉冤，为生者争民主。临电哀号，伏维努力。”

七日 重庆漫画木刻界致书昆明学生：“我们，一群木刻界、漫画界的朋友，不能不以沉痛的心情来悼念因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而被难的同学，同时也不能不以最大的热诚来为你们英勇的行动声援。”“我们相信，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狂潮，绝不是统治者的手榴弹和机枪制止得住的，牺牲者的血没有白流，它感召了千万的青年朋友，将踏着你们的血迹继续斗争到底，而全中国的人民，也将是你们最有力的后盾。”“漫画木刻界的朋友，将用画笔和刻刀与你们的工作融成一片。”还说：“为表示对于受伤同学的关怀，我们最近将以自己的力量，凑集一笔款子作你们的医药费。”

八日 《新华日报》发表郭沫若、茅盾、巴金、曹靖华、宋之的、陈白尘、邵荃麟、葛琴、冯乃超、阳翰笙等十八人致昆明众师生电：“诸位代表全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反内战，争民主，以致流血牺牲，同人等不胜感佩，特电对死者致悼，对伤者慰问，祝生者继续努力。同人等愿竭诚共同努力，以期达到制止内战，实现民主和平之目的。”同日的《新华日报》还刊载了成都学生团体及文化界声援昆明学生运动之声明，说：“人民在我们这边，我们便会胜利！我们呼吁全国同胞同学，随时随地负起一切你们已开始的工作，展开这为人民为国家的反内战的英勇斗争！”

十七日 “文协”上海分会召开成立大会，六、七十人到会。大会发表了宣言，并通过向总会及全国作家致电及检举文化汉奸等议案。宣言说：“最后胜利已经属于苦难的祖国，但我们知道跟着胜利来的是一段更艰苦的路程：和平的建设待争取，民主的政治待创造，同样，在文艺领域里，弹伪文化的余毒待清洗，健全的精神食粮待制作，我们疲憊的身体不仅不容休息，相反的，要绞更多的脑汁，流更多的血汗，来培养民主文艺的蓓蕾。”“我们必须继承总会八年来的团结传统，光大总会八年来民主的作风，才能挑得起这一付历史给我们的重担。”“从这天起，我们的眼光要朝着一个方向，我们的喉咙要喊出一个声音，我们的作品要表现一个主题：和平、团结、民主。”在致总会及全国文艺作家中说：“故土重光，百废待举，而中国却已面临着荣枯得失的重大危机，更加坚苦的工作横在前面。希望你们本八年的宝贵经验，再接再厉，以竟建设民主中国的全功。”表示分会亦将在总会领导下，“共同努力”。

二十五日 文艺界、戏剧界、音乐界、木刻界共二十余

人在渝张家花园举行座谈会，商讨对于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一致认为必须立即停止当前的内战。阳翰笙说：过去八年抗战中的狗熊——今天内战中的英雄，应该停住手了。再打下去，中国所有老百姓都会起来反对的。一致要求取消一切出版限制，还拟定将草拟文化政策供政治协商会议参考。

二十七日 重庆《民主星期刊》、《中原》、《文艺杂志》、《文哨》、《希望》等十七家杂志发表声明，抗议二十三日重庆市党部无理查禁《自由导报》，并提出五项主张：一、此次政治协商会议，应决议立即在全国实现结社、集会、言论、出版、通讯之绝对自由，首先杂志界有权要求和新闻界派记者一起列席政治协商会议旁听；二、废除现行报刊登记办法，今后一切报纸杂志、通讯社之设立及变更等，国民党党部不得任意干涉；三、废除二十六年、二十八年颁布的出版及有关条例，要求“另订合于民主原则之出版法”；四、在拒检运动胜利之后，即日起建议全国文化、出版、新闻杂志各界，实行拒绝登记运动，径自出版发行，以反对束缚言论自由之一切法令和管制；五、政府此次拒绝美名记者史诺等人入境一事，完全不是中国人民的意见，我们认为新闻自由，对民主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有百利而无一害。

二十八日 留渝木刻界与延安木刻界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联展，共三百余幅作品参加展出，作者有沃查、胡一川、刘岷、陈烟桥、江锋、刘铁华、马达、张望、古元、力群等二十六人。展出日期：从是日起至一月二日止。

## 一九四六年

### 一月

二日 渝电影、戏剧界因不堪苛捐杂税之苦开始停业问题招待新闻界。提出了两项要求：第一、取消一切附加的捐税，只负担正当娱乐捐及印花税；第二、要求开放票价。戏剧业表示各剧场不买票看白戏的人太多，不但影响营业，而且影响剧院秩序，经常闹事，戏剧业深受其苦。

三日 《新华日报》载：中国木刻作家协会召开了第二次理监事会议，出席者有刘岷、刘铁华，陈仲刚、汪刃锋等，讨论推选代表出席文化界联系会议问题，汪刃锋被选为该会代表。

五日 渝举办去年十月三十日在莫斯科逝世的人民歌手冼星海纪念演奏会，到会有周恩来、郭沫若、陶行知、邵力子等一千数百人。陶行知赞扬了冼星海为人民而歌唱的精神，表示对他艰苦奋斗的历史的钦佩。郭沫若追怀了武汉时在冼星海和张曙领导下开展抗战歌咏之情形，接着说：“从武汉撤退以后，七年来人民的歌声，便被压抑着欲唱无声，而当今天人民正要怒吼反对内战的时候，冼先生却与我们永别了。现在只有让我们踏着冼先生的足迹前进，齐声吼出人民反对内战的歌声，吼出反对任何国家帮助中国进行内战的歌声！”周恩来说：“冼先生是由于不能自由回国，在边疆流浪中使他那被幼年贫苦生活磨折坏的身体一病不起。我们

今天得到了一点点在这里开会纪念他的自由，就是这一点点自由也不是什么人赐与的，而是依靠人民的力量，依靠大家多年来的奔走呼号而得来的。洗先生的死也是由于交通不自由，因此现在我们要求恢复全国铁路、船舶、航空、邮电的交通自由，好让人民自由的走来走去。洗先生的死更由于生活的贫苦。如今我们还有许多天才的音乐家被沉重的生活困苦着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因此我们急迫的需要生活的权利。中国人民的歌手聂耳先生正当年轻有为的时候死了，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任光先生在三十年新四军事变中牺牲了，现在洗先生又别我们而去，这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如今敌人被打倒了，世界是和平民主的世界，中国也一定要是个和平民主的中国。我们全国人民必须站起来为自由和民主权利而奋斗！”会上演奏了冼星海生前遗作，如《热血》、《太行山上》、《夜半歌声》、《茫茫的西伯利亚》、《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新华日报》出了郭沫若题词的“冼星海纪念特刊”，刊载了马思聪的《忆冼星海》、郭沫若的《吊星海》、何其芳的《记冼星海同志》、沙汀的《悼冼星海先生》、吕骥的《冼星海同志》等。

八日 渝文化界学术、教育、文艺、戏剧电影、音乐、木刻漫画美术、编辑者、出版业等联名发出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书，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规定要具体，要有有效约束；改组政府问题必须名符其实，依政党平等原则改组；国民大会问题，立宪不能走日本立宪的途径。

九日 《新华日报》发表《重庆出版业致政治协商会议意见书》，说：“日本投降，举国腾欢。八年苦战余生，正望休养生息，孰料庆祝最后胜利之声未歇，弥漫全国之内战即起。”

“全国人民吁请停止内战，声不绝耳；而内战烽火，则愈张愈炽，全民疑惧，不可终朝。”对于出版业方面，具体谈



了：一、废止出版法；二、取消期刊登记办法；三、撤销收复区检查办法；四、明令取消一切非法检扣；五、取消寄递限制。署名的出版单位有大学印书局、文通书局、自强出版社、现代出版社、新地出版社、中外出版社、世界书局、作家书屋、开明书店、群益出版社、文化生活出版社等三十五家。

二十日 《新华日报》刊登了茅盾、胡风、冯雪峰、曹靖华等五十余文艺界人士致政治协商会议各会员意见书的主要内容。意见书说：“四个月以来，国内依然不团结，不民主，人民过着比抗战时期更加黑暗更加惨淡的生活，如果不及时改革，大祸就要临头。”他们提出的具体希望和意见是：

“要求这个会议有权策划并监督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以立刻恢复和平生活的各种措施。”“改组中央至各级政府，结束一党专政，制定和平建国纲领，在民主原则上重选国民大会代表，草拟宪法等措施。”另外，还“要求切实解决下列与文化教育有关的问题”：一、废止文化统制政策，确立民主的文化建设政策；二、确保各项基本自由权，如人身、讲学、研究、写作、发表、出版、集会、结社、公演展览自由等；三、改组各级文化教育行政机构，废止党化教育，取消豢养特务，确保学校自治等；四、有关限制文化艺术团体及文化活动自由的法令一律废止；五、彻底调查文化汉奸并迅速予以审判及处罚；六、缩减军费至最大限度，大量扩充文化教育经费预算；七、发展勤劳人民的文化团体，普遍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八、改革并建立各种培植奖励文化工作者的制度；九、协助文化工作者复员并救济贫病作家。

同日 《新华日报》以《戏剧界的意见》为题刊载了洪深、马彦祥、阳翰笙、曹禺、潘梓年、宋之的等五十余戏剧

界人士致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六点消极要求与五点积极要求。六点消极要求是：一、废除对话剧、电影、旧剧、新剧的一切审查制度；二、要求政府保障戏剧电影业的营业自由；三、要求除戏院之国税及印花税商业规定贴百分之四十外，豁免娱乐捐及一切苛杂；四、要求公布戏剧电影界汉奸名单，要求焚毁一切敌伪电影；五、要求将接收的敌伪戏剧电影产业分配给在抗战中受损害的以及有功的戏剧电影团体，并要求彻底检查中央电影服务处，并且解散这假官营私的组织；六、要求政府帮助复员。五点积极要求是：一、确立影剧事业在国内自由发展的国策；二、确立在国际间发扬中国电影文化之国策；三、建立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国立剧场；四、扶助戏剧电影事业；五、奖助戏剧电影艺术技术之研究与教育工作。

同日《新华日报》以《漫画木刻界的意见》为题刊载了全国漫画木刻界致政治协商会的意见：一、废止出版审查，全面取消审查制度；二、废除关于展览陈列张贴之限制；三、有关于写生摄影之自由；四、废除关于统制包揽美术团体与限制人民组织自由之事项；五、保障美术家生活等。对于国是，还提出：一、停止内战；二、恢复交通；三、组织调查团；四、用民主的方法产生国民大会；五、组织联合政府。

同日“文协”为老舍、曹禺应美国国务院之请即将赴美举行欢送酒会，到茅盾、巴金、阳翰笙、王平陵、潘梓年、黄芝冈、张西曼、胡风、冯乃超、杨晦等五十余人。茅盾任主席并致欢送词。老舍谈了去美要说的三点：一、讲讲中国人民的生活；二、讲讲中国的文艺；三、介绍“文协”这个组织。还说：“我们连做梦也没忘掉革命，争取自由！”

老舍还特别谈到“文协”今后的工作，留下了宝贵的意见。他希望珍视这个团体，今后和将来，还应在各处开展工作。曹禺说去美后应努力使美国人更多了解中国。还说：我们写我们应该写的，反对那种先有为了外国人看再去写作的态度。张西曼要求老舍、曹禺到美把一般华侨的艰苦与那些在巴西置橡树园的中国官僚资本家表现出来。潘梓年除感谢老舍八年来领导“文协”的辛苦外，还希他俩研究美国人民的生活。

二十二日 《新华日报》载音乐界林声翕、周龄、黎国荃、伍伯就、夏白、李绿林等十余人举行座谈会。对国是问题的意见是：“①望国共两党速即全面停止内战。②取消一切特务组织。切实保障人民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自由。并释放一切政治犯。③取消一党专政，组织民主联合政府。④和平建国纲领应由政治协商会草拟，交由民主联合政府实行。⑤国民大会代表应合理重选。⑥严惩汉奸、亲日分子、彻底解除国内日军武装。⑦速即裁编国内军队，废除党军。”对音乐方面的意见是：“①取消一切限制出版的法令与规章。②取消一切演出捐税的法令规章。③保障人民有进行音乐组织与唱歌的自由。④保障人民有创设音乐学校的自由。⑤要求国家充实音乐教育经费，大量设立免费音乐学校，并建设音乐工业，增加音乐留学名额。”

同日 东北文化协会假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萧红逝世四周年纪念会。郭沫若、茅盾、冯雪峰、胡风、杨晦、阎宝航、周鲸文、张西曼、鲜特生、王卓然、王冠吾、徐仲航、徐寿轩、刘清扬、曹孟君、潘梓年、聂绀弩、骆宾基等八九十人到会，主席周鲸文。周鲸文说：萧红的一生是反抗黑暗势力的一生。她先从封建的家庭里跑出来，以后又在她的作品中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郭沫若说：对旧社会不妥协的萧红女士是人民的作家。他希望作家能走人民作家的道路，反对什么“法统”等等。茅盾说：萧红女士的死与其说是死于疾病，不如说是死于所有在现社会的作家共同遭遇到的困难和不自由。胡风、冯雪峰、张西曼、骆宾基、徐寿轩等均赞扬了萧红作品及反抗精神，一致惋惜她的早逝。

二十四日 《新华日报》举办的延安生活艺术展览假中苏文化协会正式展出。展品有延安和解放区军民生活照片六百余幅，木刻绘画二百余幅，还有各种生产品。参观者络绎不绝。张西曼在批评册上写道：“史上边区号瘠贫，疮痍遍地是呻吟。久愁苛政猛如虎，何幸甘棠爱化春！万姓昭苏生产力，全球惊佩变工人。应教歌颂新民主，示范多年有德邻。”郭沫若写道：“并不是奇迹，人民是有这样伟大的力量，只要认识了人民的力量，中国的前途都可以这样呈出乐天的景象。”洪深写道：“确保和平，才能认真生产，一切好极。”

二十五日 贵阳举行冼星海遗作演奏会，地点在贵阳艺术馆。这个演奏会是在马思聪、舒模和剧宣四队合作下举行的，演出了《炭夫歌》、《拉犁歌》、《新年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

## 二 月

一日 《新华日报》刊载政治协商会议圆满闭幕的消息，还刊载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五要案：改组政府、制定和平建国纲领、军队国有化、改组国民大会、重订宪法草案。《新华日报》还发表了社论《和平建国的起点》，指

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结束后，即努力以求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实现。此次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虽然仅是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有化的初步，但这些决议既然符合于今天中国与人民的需要，有它的进步意义，因此我们愿意和大家一致，不分地域，不分党派，为其实现而奋斗！”政治协商会议一月十日召开，三十一日闭幕。

九日 当局颁发废止戏剧审查令：“查戏剧检查，在抗战时期，中央方面由中央戏剧电影审查所统筹办理，地方方面剧本审查，由各省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办理。戏剧上演检查，则由各该当地政府主管机关（在省各教育厅、市各社会局、县各社教主管科）分别派员临场检查。抗战胜利以后，因书刊审查办法废止，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及各省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均经撤销，剧本出版，既属于图书一类，自可毋庸再事审查；至于各地戏剧上演检查，如有因表演情节猥亵，诲淫诲盗，有损社会风化，可由当地警察机关依据违警法取缔。”

十日 为庆祝政治协商会的成功，近万群众在重庆较场口集会。顽固派组织暴徒破坏大会，大打出手，郭沫若、李公朴等及到会群众多人被殴伤。广大人民群众极为愤慨。翌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较场口暴行》，控诉了顽固派的罪行，还指出：“没有坚决的不懈的奋斗，人民所受的痛苦就要延长下去。‘提高信心，准备曲折，联合起来，努力奋斗’，敬以此十六字，作为一切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奋斗的人们的座右铭。”

十二日 “文协”致书郭沫若，说：本月十日陪都人民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遭捣乱者暴力破坏，主席团诸先生受辱，先生及文化界劳工界新闻界数位被殴受伤，本会同

人对于先生之健康深为关怀，特致诚恳之慰问，并请向受伤之其他诸先生代致慰问之意。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后全国人民欢腾鼓舞，国家地位与人民生活将随民主政治之奠基与展开而逐渐提高，但在一国威望所在的首都，人民四大自由刚刚得到保障诺言的现在，居然发生此种不幸现象，使世界知名的作家如先生者受辱受伤，本会同以为舆论界有保持严正态度的义务，政府有彻查内幕，依法处办的责任。后该书载十四日《新华日报》。

十三日《中原》、《希望》、《文哨》、《文艺》四杂志致函慰问较场口事件中被打伤的郭沫若、施复亮、李公朴等人函，明确表示：“我们认为此次血案为一重大事件。此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暴行与丑剧乃系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一小部分反动分子破坏政治协商会成果的显著行动。”要求“迅速负责进行处理，严惩主犯与凶手，以息公愤，以保障人民自由，以利政治协商会议结果之实现。”同时：“我们吁请社会公正人士与当时到会的广大民众主张正义，坚持真理，或组织公正调查团进行严密调查，将所得结果向全世界，全国和政府作负责报告，或根据当天目睹，群起证明，以使颠倒黑白，淆乱是非者无以所施其技，以利此案之早日得到合理解决。”十四日《新华日报》刊登了该函。

十五日 重庆戏剧界同人为庆祝戏剧节和欢迎田汉举行盛大集会。郭沫若、田汉、茅盾、陶行知、胡风、阳翰笙、应云卫、王瑞麟、山药旦、金素秋等百余人到会。田汉谈到顽固派一手制造的较场口事件，还含着泪说：为了国家民族，为了民主团结，这一辈子牺牲定了，不要打算抗战胜利了可以享福。他觉得抗战到现在在戏剧技术上虽有进步，但缺乏热情。什么叫热情呢？他认为是不使戏剧运动和国家

民族民主团结的要求脱节。阳翰笙谈到戏剧界的人，这几年死的死，穷的穷，抗战胜利了要回家回不了，本来没有什么好庆祝的。大会通过了决议案：一、声援“二·一〇”较场口血案，包括（一）严惩肇事凶手；（二）立即取消特务机关；（三）推派田汉、王瑞麟二人代表本会慰问较场口受伤人士。二、惩处附逆剧人。通电全国剧团永不录用附逆剧人。大会还对较场口事件的受害者郭沫若、马寅初等致慰问函：“对你们的被殴打，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对于那些顽劣的暴徒，我们表示极端的憎恶，对中央社的不忠诚的报导，表示至深的遗憾。我们要求政府当局彻查此次事件，予以严厉处分。我们必作你们的后盾、谨致慰问之忧。”签名者：刘巍、朱家训、洪波、李世仪、赵美佳、朱江、周伯勋等一百五十人左右。

同日 上海剧人在卡尔登戏院隆重举行纪念会，并进行会员临时登记，到曹禺、夏衍、于伶、熊佛西、宋之的、吴祖光、张骏祥、史东山、吴永刚、徐苏灵、孟君谋、赵丹、耿震、王豪、蓝马、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秦怡、叶仲实等五百余人。上海剧艺社演出了《马嵬坡》。又，上海戏剧电影界因娱乐捐增高不胜负担，向各界发表宣言，说：最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的和平建国纲领有“戏剧电影捐税分别减轻之”的明文规定，当是指重庆市百分之三十，而上海却于明文规定减轻之时，反而增高百分之五十。要求将新增的百分之二十撤销外，还呼吁将原来的百分之三十遵从决议予以减轻。

十六日 《新蜀夜报》刊载消息，说王若飞在渝戏剧节纪念会上致词，表示欢迎再来一次更大的流血事件。戏剧节参加者大波、曹克冰、黄若海、刘念渠、崔小萍、郭玲、田汉、王侠、丁然、陈戈征等一百二十余人致书《新华日

报》，予以驳正：“顷阅十六日新蜀夜报刊载消息一则，题为《流血为快乐之本》，又谓王总司令之传闻，昨日已正式证实。内容谓：共产党政协代表王若飞，昨日在江苏同乡会戏剧节庆祝会上致词谓：‘吾人决以再接再厉之精神，发动第二次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并准备十倍于上次之流血’云云。查此次戏剧节庆祝会，纯系在渝戏剧团体自动发起举行，当时主席为王瑞麟先生，演讲人只有田汉、应云卫、阳翰笙、茅盾、黄若海五先生，从未有政协代表王若飞氏到场，更未有人作如斯之演讲。当日计有戏剧界同仁二三百人，均可作证。此种无中生有，淆乱视听之报导，实荒谬可笑之极。不但有损新闻工作者之道德，亦足以阻碍剧运顺利开展”。十八日《新华日报》刊登了全文。

同日 山东省文化协会电慰较场口事件中被殴伤的郭沫若、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获悉先生等遭受特务袭击，身负重伤，群情震愤，莫可抑制”，“此辈暴徒”“阻挠民主，破坏和平”，“如不严惩，和平民主有何保障？”我们要求“解散一切特务组织，严禁一切特务活动，务使此等丑恶现象不复再见于民主之中国。诸先生为全国和平民主奋斗努力，至感敬佩，今竟不幸负伤，山东文化界暨全国人民将为诸先生后援，万众一心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建设。”该电文刊登在二十一日《新华日报》上。

十七日 晋冀鲁豫边区文化新闻界驰电重庆：“重庆新华日报转郭沫若、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姚江屏、邓蜀生、高学遑、梁柯平等先生鉴：诸先生奔走和平民主，为国表率，全国莫不敬佩。政协成功，薄海欢庆，宵小肆虐，同声愤慨。希善自调治，早日恢复健康，继续为巩固和平实现民主改革而奋斗。遥祝痊安。”后发表在二十一日《新华日



报》。

同日 中国诗歌音乐工作者协会在渝育才学校成立，田汉、力扬、伍伯就、戈矛、夏白、柳青等三十余人参加。成立会通过了会章，选举了田汉、马思聪、贺绿汀、光未然、欧阳予倩、伍伯就、何其芳、臧克家等二十五人为理事，还决定了今后工作纲要：一、每月召开座谈会一次，研究新旧创作；二、每月举行诗歌音乐晚会一次，作研究表演；三、筹备中国诗歌音乐月刊。大会还致书较场口受伤人员郭沫若、李公朴等，说：在这政治协商会议圆满结束的今天，在这中华民族走入和平建设的今天，先生等同我们一道，正庆幸中国的命运即将从数千年封建专制的黑暗和落后中解放出来，迎接着自由、和平、民主和幸福的时候，先生等在陪都所在地——较场口受伤了。有心肝的人，谁不愤怒，谁不惋惜？先生等为国奔走几十年了，我们诗歌音乐工作者站在先生的后面，誓死作先生等的后盾，自由是不可侮的，民主的洪流是谁也阻挡不住的，先生等的受伤将在民主运动史上写下民主战士的勇敢和光荣。先生等不是孤立的，我们在这里敬祝先生等为民主保重，早日恢复健康。

同日 前文化工作委员会同人暨文化界人士假中苏文化协会举行晚会，欢送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回国，并慰问郭沫若、欢迎田汉。到鹿地亘、池田幸子、郭沫若、田汉、茅盾、邓初民、阳翰笙等数十人。鹿地亘赞扬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与击破了日本法西斯的胜利，指出这胜利不但对中国有很大意义，而且对东亚也有很大意义，今后中国能否获得和平，就要看能否获得民主。他表示：回到日本当尽一个国民应尽的义务去努力工作，希望和中国的友人取得更多的联系。郭沫若说：鹿地亘先生能突破狭隘的国家观念站在人类的立场为反法西斯而努力，这是不容易的，值得我们学习

的。他还说：文化工作者今后争取民主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虽然现在有许多人还在推波助澜，阻碍民主运动，但正如有雾一样，雾是晴天的预兆。太阳一定会出来，雾是一定会散的。他还以较场口事件说，他遭过打，这并不算什么。非洲有一种蚂蚁，遇到了水沟，前面的蚂蚁就填在沟里作桥梁，让后面的蚂蚁过去。他表示自己愿意作这样的桥梁，让四万万五千万人民过去。田汉说，他也愿作桥梁为民主而奋斗，并说以前我们文化工作者在统一战线上的工作做得不够，大家缺少批评。今后我们一方面要合作，善于与兴趣意见不同的人合作，一方面批评。邓初民也激昂地说愿作桥梁为真民主而奋斗。

十八日“文协”上海分会举行欢送、欢迎会，即：欢送老舍、曹禺赴美讲学，欢迎最近从内地来上海的作家们。老舍、曹禺、夏衍、戈宝权、葛一虹、蓬子、郑振铎、宋之的、吴祖光、叶以群、叶圣陶、许广平、张骏祥、凤子、施蛰存、赵家璧、钱君匋等七十多人参加。郑振铎致开会词。他希望老舍、曹禺将中国人民生活的真实情形告诉美国人民，还希望美国作家们也派代表来中国，以沟通两国的文化。叶圣陶特别指出今后文艺运动应与民主运动密切结合，并积极推动民主运动。在谈到民主运动的阻力时，他说：

“应该死亡的或迟或早总要死亡，应该成长的或迟或早总要成长。我们必须积极去推动，使应死亡的早日死亡，使应该成长的迅速成长。”老舍说：“抗战八年来，认识了许多朋友，朋友虽然多，但真理只有一个。今天相聚在一起的，都是追随着真理的朋友们，生活虽然艰苦，良心上却发出真正的笑容。希望今后用我们的笔，用我们的思想，永远朝着真理走。”他还说：“文协”是最干净最珍贵的团体，不分党

派地团结了全国的作家们，为抗战而工作。希望“文协”本着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为民主运动多多尽力。他最后还说：“希望回国时，政治协商会议的议决多少实行了些，使我们这团体的活动能自由些。”曹禺说：“这许多年来为争取真理，作家们所受的苦难、折磨，各有不同的滋味，但我们能感到骄傲的是我们心中的火焰不但没有熄灭，反而更为炽热。”“文艺工作者都想用各种方法替老百姓说话，使高高在上的人知道老百姓的生活情况，知道他们的痛苦和意见；使高高在上者知道，在国家的新组织中，谁能为老百姓谋幸福就能存在，谁只开空头支票不兑现就要站不住足。”还说：这次到美国，一方面是向美国人民学习，一方面是要把一个现代的中国，一个正在变化中的中国，告诉美国人民，使美国人民真正地认识中国，认识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

会议最后由风子宣读了苏北作家给“文协”上海分会的信：“我们简直不能想象你们这几年是怎样坚持过来的，在暗无天日的暴敌统治之下，你们像一盏孤灯，独守在漫漫的长夜，不顾一切的对于生命的与生活的血淋淋的威胁，为民族为文化保持了崇高的气节与传统！我们虽在敌后的战争环境中，但是人民的军队与人民的政府，不顾一切长期封锁和农村落后状态的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无微不至爱护我们，帮助我们的工作，使我们得为抗战为人民尽了最大的努力，特别是享受到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的自由的空气及毋须为生活而奔忙的人生最大的愉快。愈是我们工作得自由，愈是我们怀念着你们所度过的不自由的与不愉快的日子，……你们的工作依然受着严重的阻碍，你们的生命和生活的安全依然受着不应该受的威胁！……我们愿意甘心地在抗战中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忍受最艰苦的生活，并不是为了使少数人独吞

胜利的果实，更便于奴役和残害自己的人民，而是使广大人民可以享受自由民主幸福的生活。……我们应该加紧团结、互相取得联系，建立华中解放区与上海及各大城市的文化工作上的交流。……欢迎你们到解放区来参观，你们底被禁止出版的书稿和被禁止上演的剧本，解放区愿替你们出版和上演。……这儿有着你们广大的读者。”

十九日 延安各界致较场口事件被殴伤的郭沫若、施复亮、李公朴、马寅初、章乃器等电：“顷闻庆祝和平胜利群众大会被暴徒捣乱，殴伤六十余人，远道闻之无任愤慨，当全国和平民主开建之初，在光天化日下，无法无天之特务却变本加厉，横行于首都，不特有污国际观瞻，实是和平民主之障碍，而为中华民国之奇耻大辱，同人等痛恨之余，特请黄齐生先生代表慰问诸先生，善为调摄，早日恢复健康，为巩固和平铲除阴谋破坏者，完成民主大业而奋斗。”签名者有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张曙时、刘少白、钱来苏、陈绍禹、刘道衡、李木庵、柯仲平、阎力宣、宋子纯、张善匠、毕光斗、吴汉章、张宗麟、艾思奇、柳湜、姚尔觉等。二十一日《新华日报》刊载了全文。

## 三 月

二日 《新华日报》载东北文化协会发表的解决东北问题的诸种意见：“甲：内政上，基于民主、和平、统一的原则，要作到：①实行东北地方自治。②以协商的方式，在宪政实施以前，建立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地方民主政府。③避免党派的倾轧，避免把内战牵涉到外交上去。④避免党派的军事冲突，军事调处团应在东北执行其任务。⑤欢迎各党派及无党派组织调查团前往东北调查真象。”“乙：在国际关系上，基于国际协调、亲善、合作的原则，要作到：①中国的领土主权必须完整。②中苏双方彼此尊重条约义务和其权益。③中苏两大民族为反法西斯主义，为世界和平，亲密携手。④中苏两政府洽商解决苏联撤兵问题，在环境许可下尽早撤退，免得发生更多误会。⑤国际经济合作以不丧失中国主权及行政完整为原则，其性质应完全为经济范畴。”

三日 “文协”举行欢迎田汉、马思聪、端木蕻良茶会，到邵力子、茅盾、阳翰笙等二十余人，茅盾任主席。邵力子、田汉、马思聪、阳翰笙等讲话，谈到和平建国时期文艺界要做什么。阳翰笙特别指出了三点：一、要打击反民主的法西斯文艺，不让它浸到文艺界来；二、到人民中去，过去有些作家虽然去过，可是以后又被隔离开了，现在还要到人民中去；三、过去文艺界是在“抗日”的总口号下团结起来了，今后应更加团结，为民主而奋斗。欢迎会最后决议成立“文协”重庆分会，当即推艾芜、沈起予、金满城、阳翰笙、陈白尘、聂绀弩、黄芝冈、赵铭彝、肖蔓若、

李兰十人为筹备员，拟最近一周内即召开第一次筹备会。

四日 《新华日报》摘要载昆明《民主周刊》、《时代评论》、《妇女旬刊》、《学生报》、《文艺新报》、《昆明新报》、《中国周报》六家报刊给重庆较场口受伤的民主战士的慰问信。该信提出了五条意见：“一、在筹组中的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立即邀约公正的法官、律师和各界人民代表，组织罪行调查委员会及人民法庭，收集一切证据，公审此案。二、政府应立刻严惩一切从主使到行凶的阴谋分子。三、改组专事造谣的中央社，成为服务人民的新闻发布机关，对于此次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新闻从业人员，亦应处以应得之罪。四、受伤者的医疗和抚恤以及大会的损失，由政府负全责，这应该是当然的事。五、政府如果真的决心实行民主，就应该切实保障人民的一切自由，从根解决一切违背人民的机构与制度，并立即颁布妨害人民自由治罪法。”又载昆明文艺界楚图南、李何林、洪深、白澄、闻一多、石炎、刘平、赵枫、郭良夫、夏康农、周士礼、顾德荫等的慰问信，谓：“在政治协商会议刚刚闭幕，陪都各界热烈举行庆祝大会时，竟有破坏民主的暴徒，捣乱会场，先生等遭受无端迫害，同人闻讯之后，亟为愤慨，誓作诸先生后盾，共同为民主中国之实现而努力，谨此慰问，并颂康复。”又载西安文化界郑伯奇、党晴梵、成柏仁、青苗、李敷仁、武伯纶、郑竹逸、景梅九、杨玉珊、王澹如、梁益堂致郭沫若慰问信，谓：“惊悉先生于政协庆祝大会席上，不幸被暴徒殴伤，愤激莫名。先生保卫民主，发扬文化，全国人士久所倾心，同人等避居西北，不克亲临慰问，抱歉实深，特此专函致候，敬祈善自珍摄，早日康复为祝为祷。章、李、施三先生处同此候问。”

十三日 重庆青年联谊会、中苏文化协会、中国妇女联谊会、中美文协等二十一团体借西南实业大厦为鹿地亘夫妇及日本反战同志回国举行欢送会，到会有李俊龙、郭沫若、李德全、邓初民、何思敬、罗隆基、田汉、周鲸文等。《新华日报》发表了西民的《送鹿地亘夫妇回国》、冯乃超的《欢送鹿地亘先生》、鹿地亘等的《临别赠言》。

二十五日 上海《国讯》、《世界知识》、《人人》、《文萃》、《文汇》、《文章》、《中原》、《周报》、《月刊》、《时代》、《民主》、《综合麦籽》、《文联》、《文坛》、《新文化》、《生活知识》、《时代学生》、《经济周报》、《青年知识》、《艺文杂志》、《文艺复兴》、《文艺春秋》、《五金半月刊》、《真理》等二十五种杂志为抗议摧残言论、出版、发行之自由并声援重庆、西安、北平、广州被压迫同业，发表宣言。该宣言历述了国民党顽固派摧残言论出版、发行自由的罪恶事迹，具体指了上海、重庆、西安、北平等地，令人发指。宣言指出：这些摧残“不是简单禁止几个杂志发售的问题，而是中国政治能否民主的试金石，亦是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反民主势力表现在出版界是禁止出版，摧残言论自由，表现在政治方面即为诺言的延宕与企图破坏政协的决议。”宣言“希望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努力，用集体的力量争取我们最基本的自由。”

## 四 月

八日 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乘飞机赴延安，飞机失事，在山西省黑茶山遇难。

九日 《新华日报》载张道藩密电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暗中禁止茅盾的《清明前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密电各区分部，云：“准中央宣传部艺成艳密电开‘准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张主任道藩十月三十日函，为茅盾（即沈雁冰）所著之清明前后剧本，内容多系指摘政府，暴露黑暗，而归结于中国急需变革，以暗示煽惑人民之变乱，种种影射既极明显，而诬蔑又无所不至，请特加注意’等语，查此类书刊发行例应禁止，惟出版检查制度业经废止，对该剧本出版不易限制；用此电达，倘遇该剧上演及剧本流行市上时，希即密饬部属暗中设法制止，免流传播毒为荷。等由准此，合行仰遵照办理设法制止以免流传播毒为要。”

十日 广州自由世界社、文猎社、新生代社、文艺生活社、新音乐社、文艺作家社、国民杂志社、文化展望社、广州风社、文艺新闻社、学习知识社、公论社、民主星期刊社、戏剧艺术社、正风社、民主与文化社、新希望社、中国诗坛社、新建设社、草莽社、新世纪社、现代生活社、生活导报社发出通电，谓：“顷据香港报载，本市近有不法分子印发秘密文件一种，内称：‘近来各书局经售之书刊即自由世界，文艺新闻，新世纪、学习知识、愿望、民主生活、大千画报、文猎、国民、现代生活、文艺（按：或系文艺生活之误）等杂志，皆共党所办之宣传书刊，有攻击政府煽动青年之不良文字，在省会地方，已由党工干部会报特种宣传小组，在不抵触取消新闻检查和言论出版自由之原则下，以消极或积极之种种方法破坏其推销发展，希所属仰体斯旨，善用环境，对上列各杂志书刊，会同当地党政机关予以有效查禁，并将工作情形具报’。等语。上引秘密文件所录自由世界等十一杂志，除《愿望》，《民主生活》非在本市出版



外，其余九杂志系本会会员，均为文化界知名人士所主办，并无党派关系，立场纯正，所有言论绝对符合国家及人民之利益，原刊具在，当为全国人士所共见，今者蒋主席四项诺言犹在耳际，政府保障人民言论出版自由之法令墨渾未干，发布上引秘密文件之个人或机关，竟不顾国家法令，政府威信，人民自由，指使所部破坏合法刊物之推销发展，结果，惟各杂志之合法权益备受摧残，人民之基本自由亦被剥夺殆尽。”“种种非法措施，若不严加制止，坐视少数不法分子逞其阴谋，人民势必误会政府言行相悖，出尔反尔，影响所及，必使道路侧目，万邦腾笑。本会为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及政府保障人民言论出版自由法令之尊严起见，对此无理迫害，势难缄默，用特沉痛呼吁，尚冀政府当局接纳舆情，对上述种种非法措施予以制止！撤消各种秘密禁令，查办非法分子。并希各界先进予以支援，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十七日 华中文协召开诗歌座谈会，黄源主持，到朱维基、陆维特、关露、缪文渭、张泽易、汤池、段扬、葛葆桢、庄重、俞言等十余人。陆维特报告了苏北墙头诗运动。座谈会讨论了诗歌方面问题，均认为应开展大众诗歌运动，诗歌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座谈会讨论决定发起组织诗歌座谈会，当即推陆维特、朱维基、关露、锡金、江陵、庄重、葛葆桢七人组成筹备会，陆维特为主任委员，草拟章程，征求会员，展开工作。

十八日 《新华日报》刊载于立群、王琦、巴金、田汉、司徒慧敏、史良、安娥、杜国庠、沈起予、李公朴、何其芳、茅盾、柳湜、洪深、郭沫若等七十余人联名给美国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的信，内称：“当前中国政情复杂，和平已受威胁，国内团结尚未巩固，人民尚未获得民主生活。在

这种情况下，贵国对中国之帮助，虽感情可感，理无可议，唯实际效用，则适得其反。如对日作战剩余之贵国武器与装备，已对中国当前和平问题起了不幸作用。如魏德迈将军指挥下之美军司令部，为中国运兵运械前赴东北，亦已造成东北军事冲突局势。”表示“中国人民现在有最大决心与力量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我们坚信，中美两国人民将并肩为世界的和平民主共同奋斗。”

十八日 《新华日报》刊载夏白、谭林、清云、何思予、音乐艺术社、星海合唱团、民主合唱团、民主音乐社、民主星期研究会、社会大学致周恩来信，对王若飞、叶挺等遇难表示哀悼。内称：“王若飞、叶挺等十三烈士在暴风雨的空中牺牲，我们感到一种怒愤的悲伤，我们音运工作者以及所有为和平奋斗的人士，都将因此而更加勤奋，望先生保重，并请转致诸烈士家属节哀！”

十九日 重庆各界在青年馆举行隆重追悼大会，追悼黑茶山飞机失事遇害的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等十三人，到会六千余人。郭沫若宣读了祭文：“呜呼诸公，国步艰难，民生凋敝，八年浩劫，满目疮痍。救困扶危，回生起死，曰惟民主，众议所持。乃见协商，三项决议，和平建国，方奠初基，赖尔奔走，宏我多士，匪惟党彦，国士之奇。堂堂王公，坚毅沉着，献替谋猷，惴惴为国。泰山崩前，谈笑自若，庙堂之争，侃侃谔谔。秦公博古，南方之强，守正不阿，寡默深藏，为民请命，锐不可当，言室满室，言堂满堂。国之干城，叶挺将军，左右国父，早建殊勋。英勇善战，四海知名，五年圉圉，尤见坚贞。工人领袖，邓公表表，奔走革命，不惮辛劳。世界职工，大会方了，膺选执委，国际名高。黄老石公，今之文

中，教人不倦，大德有容，不畏强御，不计困穷，振聋发聩，声若洪钟。呜呼诸公，诸公之德，众民所仰，实黔在眼，席暖未遑。或敷无教，或拟宪章，或将士国，或整戎行。四月八日，飞赴北方，天时不豫，雨暴风狂。晋之西疆，黑茶山上，飞机殒坠，颓岱坏梁。祖孙甥舅，夫妻子女，皆遭焚如，惨绝寰宇。普天同悲，挥泪如雨，百身莫赎，万民无语。呜呼诸公，诸公之生，生为民主，诸公之死，死为民主，民主建国，粗具楷模，实现之责，端在吾徒，务期团结，促进和平，尊重协议，俾底于成，与民更始，殖产弭兵，自由中国，将庆诞生，昭我嘉谟，示我懿则，生死以之，同心戮力。用以纪功，用以报德，俎豆馨香，百世不忒，呜呼哀哉，尚飨。”周恩来沉痛悼念，最后说：“他们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事业而奔走到最后一口气，流了最后一滴血，以致粉身碎骨，他们的死是惨痛的，但又是光荣的。为了继续他们未完成的事业，我们要使任何破坏协议的企图都不许其成功，任何冲突都要停下来，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我们要把悲痛的心收起来，化成团结的力量，冲破黑暗，迎接光明。”同日《新华日报》还刊登了毛泽东同志的《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

数十年来，你们为人民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

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将加强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它将加强中国人民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事业的决心！

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将继承你们的遗志，继续奋

斗，直到胜利，决不懈怠，决不退缩！

还刊载了朱德的《完成死难者所遗下的事业》、周恩来的代论《四八烈士永垂不朽！》、刘少奇的《痛悼我们伟大的死者》、邓颖超的《悼》、林伯渠的《悲痛与悼念》等。该报今日还增加了八个版，出“追悼飞延遇难诸先生特刊”，发表若干悼念诗文。

二十二日 《新华日报》载昆明十三家刊物——昆明民主周刊、中国周报社、学生报社、昆明新报社、文艺新报社、音乐报社、真理周报社、生活知识社、诗与散文社、两周文艺社致函悼念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死难烈士，曰：“四先生长期为中国民主和平奋斗，功绩不朽，现当风雨如晦，国势阽危，正待奔走努力，共挽狂澜之际，四先生竟中道殒逝，不仅为贵党及贵家属之沉痛损失，且为全中国人民不可补偿之损失。”

二十四日 “文协”张家口分会正式成立，到成仿吾、萧军、萧三、艾青、古元、江丰、沃渣、吕骥等百余人。成仿吾致开会词，后即讨论并通过奖励文艺创作，组织群众业余文艺活动、出版综合性文艺刊物及丛书等十余案，还通过了宣言及致“文协”总会及各分会电。大会后选出了丁玲、沙可夫、吕骥、艾青、萧三、成仿吾、周巍峙、沃渣、古元、江丰、于力、向隅等二十三人为理事。

二十九日 东北政治建设协会，东北文化协会、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民主建国会重庆分会、中外文艺联络社、中国诗歌音乐工作者协会，重庆杂志联谊会等二十个团体致函马歇尔特使，内容五点：一、立即停止东北的内战，并立即停止任何方面向东北的军事运输；二、同时协商解决东北的政治问题，成立由东北地方人士及各党派参加的东北临时政

务机构；三、同时商谈整军问题；四、美国立即停止运输政府军队到东北去；五、在东北内战没有完全停止，政协各项协议没有彻底实现以前，美国不要贷款给中国政府。

## 五 月

一日 “文协”为冯玉祥、郭沫若、田汉举行欢送会，同时成立重庆分会，通过了会章，选举了沈起予、金满城、聂绀弩、艾芜、萧蔓若、沙汀、陈翔鹤为理事，屈楚、李文钊三人为候补理事，李兰、冼群、柳倩为监事。

二日 《新华日报》刊载昆明学术文化工作者唁“四八”烈士电：“若飞、希夷、博古、邓发、黄齐生诸民主斗士的死，不止是中国共产党无可估计的损失，而是全中国人民的最重大的损失。他们的死，是为了保卫政协协议，为了和平，为了团结，为了民主，一句话是为了中国人民。”表示要“继承死者的努力，排除万难”。签名者有李何林、王振华、潘大逵、姜震中、尚钺、丁月秋、吴晗、袁震、闻一多、赵沅等。

同日 “文协”举行同乐晚会，庆祝第二届艺术节和该会成立八周年，地址：渝民生路韦家院坝。郭沫若、田汉、冯乃超、邵力子、臧克家、郑君里、安娥、阳翰笙、陈白尘、孙坚白、应云卫、萧蔓若、司徒慧敏、黄芝冈、冼群、力扬、何其芳等三百余人到会。田汉主持开会并报告同乐会意义。

四日 “文协”借渝抗建堂举行庆祝“五四”艺术节大会，到会有田汉、沙汀、巴金、周文、郑君里、聂绀弩、力扬、萧蔓若、柳倩、何其芳、碧野、端木蕻良、刘郁民、夏白、沈起予、安

娥、梅林等三百余人。主席团由郭沫若、曹靖华、阳翰笙、艾芜、杨晦、黄芝冈、臧克家七人组成。阳翰笙主席并报告纪念胜利后第一个文艺节的意义以及今后文艺运动总的目的和方向，指出要切实争取民主的彻底实现，以文艺工作者的笔，忠实于全国人民的要求，向反民主的势力作倔强的斗争。他还指出争取民主、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是当前迫切的任务。他号召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共同努力。郭沫若说：“双十”、“七七”、“五四”三个日子都是争取民族独立、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纪念碑，而这些都是直接间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领导。我们要继承孙先生四十年为人民革命的未成事业，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使全国人民真能达到民治、民有、民享的境地。他还说：今天文艺工作者应首先攻破自身中不自觉所残留的封建思想，与在反帝运动中一切狭隘的排外与狭隘的国家主义。关于盟国的帮助，我们要求的是帮助中国人民来建设，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一切轻率，不慎重，不以中国人民为对象的帮助。否则，义务上是帮助中国，实际上是残害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不容许任何帮助造成反民主、反和平的结果！还说：“五四”时代提倡的德赛二先生，即科学与民主，二者不应是对立不相容的。他认为科学就是为人民服务、不自私、客观的精神，而科学精神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民主。今天政治要民主化，文艺也要民主化，因为文艺本身负有宣传、教育、反映人民生活、为人民说话的伟大效果。所以文艺工作者的战斗，更应提高政治性，争取和平、争取民主、反对任何战争。他大声疾呼：今天争民主是全国文艺工作者及全国人民的迫切任务，但争民主首先要区分真假，为了真正民主的实现，要彻底粉碎一切假民主、假自由、假和平的任何面目与企图。郭沫若讲话后，即进行八

年文艺之总结。艾芜报告八年来的小说，臧克家报告八年来的诗歌、杨晦对八年来的文艺理论作了深刻的检讨。本来还有陈白尘报告戏剧、黄芝冈报告民间艺术、周文报告华北文艺现状，因时间关系，改作以后书面报告。

同日 《新华日报》刊登了“文协”《文艺节告全国文艺工作者》，谈了纪念文艺节的意义，和平民主运动的重要、文艺工作在和平民主运动中的意义、今后我们应该如何工作四个问题。此外，还刊载了臧克家的《斗争，前进！》陈白尘的《举起笔来》、梅林的《更实际的工作起来》、沙葳的《要唱出民主的阳光》（诗）等纪念诗文。

同日 “文协”上海分会为纪念文艺节假辣斐戏院举行文艺欣赏会，到会有宋庆龄、郑振铎、许广平、欧阳山尊、李丽莲、丁聪、赵景深。叶绍钧任主席并致开会词，说：文艺工作者应该有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周予同指出：“五四”时代所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到今天还没有过去，大家应竭力争取。许广平说：五四运动的胜利，是全民团结的民主力量的胜利。讲演毕，李健吾朗诵了诗，赵景深唱了大鼓、丁聪吹了笛子、欧阳山尊与李丽莲表演了陕北秧歌舞《兄妹开荒》等。

同日 《抗战文艺》第十卷第六期出版。这是以这个刊名出版的最后一期。“文协”在该期《启示》中说：“本会机关杂志《抗战文艺》，自二十七年创刊，迄今已有八年，兹因抗战结束，本期《抗战文艺》即为终刊号，今后易名《中国作家》，随本会迁沪出版。”

五日 何其芳在《新华日报》发表《大后方文艺与人民结合问题——为第二届文艺节作》，提出：大后方文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首先要扩大这个异常狭

小的新文艺读者圈子。”“大后方的文艺还很不够适合大后方的广大人民的需要。”谈到大后方文艺要在今后的民主运动中贡献力量问题，说：“首先我们应该在内容上有力地反映大后方人民的各种痛苦，各种要求。”“除了提出问题而外，我们还应该在内容上尽可能地解决各种人民的问题，为他们找出苦闷中的出路，或写出他们当中的英雄，他们当中的模范人物，写出他们是如何找到道路，并如何在困难环境中奋斗。”形式方面，“大后方的文艺也可以有多种的形式去适应多种的读者。”如：适当改造“五四”以来的形式，大量刊用各种民间形式、新旧形式都应和报纸结合，文艺和其它艺术结合等等。

七日 郭沫若翌日要离渝飞沪。《新华日报》记者走访郭沫若。郭沫若谈了自己的感想：离开重庆，只深深感到过去的工作仍然作得不够，虽然在文艺的道路上找到和树立了为人民服务及民主的正确方向，今后还要加倍的努力。关于政协决议，他说：反动派企图推翻、拖、骗，但是以全国人民拥护政协决议的坚定意志和力量，中国的和平一定会将现。对于沧白堂、较场口事件，他表示：就他个人来说是“不予重视”的，但这表现了反动派的垂死挣扎。谈到东北问题，郭沫若说：首先内战必须马上停下来，一切问题都必须用协商的办法解决。人民不要内战，谁要内战，谁就会为全国人民所遗弃。今天谁只靠军队武力来解决问题，一定会失败的。

十日 “文协”假中苏文化协会招待戏剧界及新闻界。主席阳翰笙感谢八年来彼此在工作上的合作，还介绍了“文协”重庆分会，也提出商讨筹募分会基金问题。沈起予报告了重庆分会情形。

十二日 上海戏剧界假伶界联合会开会，出席者有中电



剧团、上海剧艺社、剧作者联议会、苦干剧团、上海艺术剧团、新华剧艺社等十七单位，计有代表田汉、于伶、吴祖光、岳路、沈昌辉、孙浩然、梁一鸣、张白云等四十余人，内容是反对当局倒行逆施的“艺员登记”。各代表痛陈意见，指斥当局破坏人生自由。当即一致决议成立上海全市剧艺界拒绝艺员登记委员会，要求政府立即收回此无理办法。如不取消，就全体停演，以示坚决抗议。

二十日 上海戏剧界为反对艺员登记，于新利查饭店招待新闻界。主席梁一鸣表示：剧艺同人为了维护艺人应有的人格，不愿被别人视同娼妓，将积极进行反抗艺员登记运动，不达目的决不停止。田汉说：“艺员登记是一种不能忍受的侮辱，中国的传统观念一向不把搞戏剧的当做艺术家，而是‘王八戏子吹鼓手’。这观念现在决不应存在。”又说：

“只有文艺与戏剧才是代表国家的。郭沫若先生到苏联回来说：苏联人士只知道鲁迅和梅兰芳，而根本不知道谁是警察局长，在这一点上，我希望剧界同人不要妄自菲薄，剧艺运动是有其地位的，是有人认识它的价值的。”赵丹说：在新疆坐了监牢，出狱后还是像在监牢里。他认为反对演员登记，不应该是软绵绵的请求，而是一种斗争，“我们要抱着斗争的态度去争取，只有斗争，才能使他们认识我们是人！”

二十六日 《新华日报》载：苏联驻华大使馆参事、汉学家费德林、塔斯社远东分社社长施维卓夫、副社长叶夏明等日前由许广平、曹靖华等陪同去虹桥路万国公墓凭吊鲁迅墓地并留影纪念。费德林表示：在今年十月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日，愿协助把墓面修好。为着纪念这伟大的战士，并拟在墓穴地方建立一庄严、朴素、雄伟的纪念物。这由费德林向苏联艺术家请求代为设计。许广平表示感谢。

同日 《新华日报》载沈起予、李文钊、沙汀、艾芜、端木蕻良、力扬、王亚平、姜庆湘、陈迺冬、何其芳、周文等十九人给柳亚子六秩大庆的祝贺电：“欣逢我公六秩大庆，留渝同仁举行聚餐祝贺，敬愿我公长寿无疆，与中国人民永远站在一起！”

二十七日 《新华日报》载：美国爱好民主自由人士组成争取和平委员会，提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六原则，其中有“反对以武器与军备给与盟邦使其进行内战”等。昆明“文协”分会、民主周刊社、人民艺术社等十三个文化团体、尚钺、许杰、夏康农、陆钦墀、闻一多、费孝通、杨希孟等九十八人致书美国争取和平委员会，赞扬了他们这一正义行为，同时指出：“现在中美两国正在洽商一件贷款案，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巨大的一笔借款，它可能帮协中国进入建设与繁荣。但是，最可虑的，它也可能造成中国的灾祸。”“这关键的转移是在于贷款的承受者是否能足以有效地代表中国人民的民主政府，抑或只是积习难改的一党专政的政府。”

二十八日 张家口文化界电贺柳亚子六十大寿，说：“你是真正的爱国者，从二十岁参加同盟会后，经过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及抗联三个伟大时期，历尽艰险，始终忠于革命，热爱真理，主持正义。你是太无畏者，你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因而招致了他们的嫉忌。你的为人，你的诗文，你的字，真是‘能纵能控，亦狂亦狷’。而‘纵控狂狷’都出发于为中国人民谋取解放的思想”。

## 后 记

抗战文艺是我国现代文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而国统区抗战文艺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极左思潮给我国现代文艺研究带来的恶果。“文革”以后，极左思潮的影响逐渐清除，国统区抗战文艺日益提到了重要的研究日程。国统区抗战文艺是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在郭沫若等具体领导下前进的，为抗日争民主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我国的文艺史增添了光辉。我国的抗战文艺是世界反法西斯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研究课题。一九八〇年法国巴黎就举行过抗战文艺的学术讨论会，中心就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运动。

一九八〇年底，重庆地区中国抗战文艺研究学会成立，此后，四川的抗战文艺研究活跃起来。其他一些省市的抗战文艺研究也陆续展开，而且进展迅速，成果显著。

我一九八〇年底开始从事抗战文艺的专业研究，至今四年有余。其中甘苦，自不必说。在研究中，我查阅了当时出版的报刊杂志，搜集了不少资料。我深深感到，抗战文艺实在是太丰富了，太值得研究了。《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就是从我搜集的资料中整理出来的。在整理过程中，也参看了其他一些抗战文艺研究者编的大事记。这些大事记给我启示，给我帮助，我衷心感谢。

我企图在《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中比较全面地反映抗战时期国统区文艺的情况，但是，个人所见，毕竟有

限，错误遗漏之处，定然不少。敬请批评指正。

一九八五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献上此书，以示纪念。

最后，对能使这本书问世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表示诚挚的谢意。

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

